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7 · 第1辑



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7. 第1辑 / 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200-13225-0

I. ①中… II. ①中…②中… III. ①纪念馆—研究—中国 IV. ①G269.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8463 号

责任编辑: 于蕊

责任印制: 毛宇楠 刘文豪

封面设计: 张薇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7·第1辑

ZHONGGUO JINIANGUAN YANJIU 2017·DI-1 JI

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9 毫米×1194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34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3225-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责任编辑电话: 010-58572473



编委会

主 编：李宗远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延俊	王 凯	王志强	王起宝	王晓玲	王培军	井晓光
孔令欣	厉 华	史永平	朱 军	朱成山	刘加量	刘宇祥
刘春杰	阳国利	孙为祥	李立夫	李宗远	杨 光	杨卫东
肖邨华	沈 强	宋沛然	张 柏	张建军	张建儒	张宪义
张黎明	陈 松	陈宗良	范丽红	罗存康	赵继敏	洪麦恩
钱 奇	倪兴祥	黄 芬	黄亦兵	康金凤	康静波	蒋越峰
魏国英						

特邀编辑：欧阳敏 黄春锋





目 录

馆长论坛

社教创新 打造党性教育大课堂

——西柏坡纪念馆的探索与实践 陈宗良 1

抗战馆的大学生党课活动是如何炼成的 董立新 5

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

——以无锡为例 王 玲 9

遵义会议纪念馆践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 王志力 14

纪念馆管理模式创新

——以郑州二七纪念馆为例 邓学青 20

扬长避短 注重特色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公共教育浅析 邱晓云 23

浅谈博物馆讲解员能力结构 张 玲 27

新形势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实践与发展

——以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为例 贾洪瑜 32

高金城舍身营救西路军有关情况探析 陈殿才 吴宏瑜 36

纪念馆建设

纪念馆发展与管理创新 张 超 41





名人故居类纪念馆的保护与利用

- 以张学良将军公馆为例 邓普迎 45

陈列设计

- 中山舰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实践与新思路 刘尔亮 50

- 浅谈如何做好纪念馆的陈列档案管理工作 刘燕 54

浅谈革命类纪念馆临时展览的策划与实施

- 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为例 王莹 58

- 浅谈革命类纪念馆陈列设计 李健 62

文物遗迹

解放战争时期纪念章、奖章等研究

- 以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为例 宋晓蕊 66

- 试论武汉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的特点及其保护 邓艳梅 73

- 武汉红十字会碑座价值考释 郑卉 77

-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珍贵抗战图书简述 张胜磊 82

- 浅析番禺学宫“庙学合一” 杨琳 90

社会教育

-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潘黎黎 96

-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王春山 101

特色宣教活动的实践探微

- 以南京孙中山纪念馆的宣教活动为例 夏影 106

工作论坛

- 博物馆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研究 魏鹏 110



博物馆在数字化时代下的发展与探索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新媒体建设为例	赵迪立	113
“博物馆+”发展模式下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责任、角色		
——能量主导 思想引领 形式迎合	张 琴	118
试析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杨晓慧	125
浅析红色基因的提炼与弘扬		
——以渡江战役红色基因为例	王 高	130
“互联网+协作”在文博领域的应用		
——以大英博物馆“众包模式”完成藏品数字化工作为例	刘文杰	134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品编目工作实践的体会与思考	桂星星	141
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浅谈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	张媛媛	145
志愿者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载体	金恒薇	152

历史研究

周恩来对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贡献	刘媛之	156
农村妇女动员与中共的策略选择		
——以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徐霞翔	163
董必武的“严”与“实”	胡妍娟	170
征稿启事		175





社教创新 打造党性教育大课堂

——西柏坡纪念馆的探索与实践

陈宗良

(西柏坡纪念馆 河北石家庄 050411)

内容提要:西柏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近年来西柏坡纪念馆致力于在工作实践中整合、依托西柏坡丰厚的红色教育资源,创新干部党性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针对不同对象,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增强培训的互动性、实践性和实效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通过西柏坡纪念馆对党性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以求与同行更好地担当使命,发挥革命纪念馆资政育人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纪念馆 创新 社教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参观调研时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之后,习近平同志又多次讲到,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西柏坡纪念馆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创新社教方式,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致力于打造党性教育课堂,在红色遗产保护、革命精神研究及宣教方式等方面创新形式,为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继续前进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一、实施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为党性教育提供坚实基础

2010年3月29日,李长春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强调:“要加快组织实施红色文化保护工程,使这些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成为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内容,世代传承下去。”因此,西柏坡纪念馆利用党史资源进行党性教育,对红色遗址、红色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与保护,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

(一) 做好革命文化保护与延伸,为开展党性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各中央机关分布在以西柏坡为中心的100多个村庄里。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就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同志的旧居和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十余处,革命遗址见证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奋斗史和英雄史,是进行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为此,近年来,西柏坡纪念馆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保护、复原这些文化载体,根据资源价值、历史意义,坚持科学分析论证,有序研究、建设,做到“修旧如故”,集中修复了西柏坡时期中央部委旧址区、华北人民政府旧址区,以及中宣部旧址、中组部旧址、中央统战部旧址、中央妇委旧址和《人民日报》社旧址,现均已建成开放,全面系统地重



现了当年中央机关战斗生活原貌，真实还原历史面貌。同时在西柏坡历史陈列馆外，又修建了国家安全教育馆、廉政教育馆、西柏坡丰碑林、领袖风范雕塑园，扩展了进行党性教育的资源容量。西柏坡现在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国家廉政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学习的精神家园。

（二）对革命历史资料进行抢救与挖掘，赋予红色文化鲜活生命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北京时，带走了当时中央所存的档案、资料，这些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件、决定、电报、信函、报刊等历史资料具有非同寻常的文献价值，尤其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留下的大量文献，对于研究西柏坡历史、西柏坡精神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西柏坡纪念馆联合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西柏坡档案》（三册）一书，收录文献千余篇。结合这些文献史料，又开展了“抢救历史，走访当事人”活动，对曾在西柏坡工作过的老同志手中的笔记、日记、著作手稿、书信、讲话稿及照片、回忆录等文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出版了《西柏坡记忆》（四册），并征集到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用过的大量宝贵物品近百件，充实到陈列展览中，使展览真正做到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做到不仅见人、见物，而且见精神。

当事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亲历或目睹被研究事件的相关回忆与访谈，是研究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这些史料很多被尘封在当事人的记忆当中，有着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具有原生态性、鲜活性和逼真性，散发出独特的光芒。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比较真实地从各个角度记录着历史，同样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是红色文化躯体，那么文史资料就是它的生命，与文物结合起来，红色文化才会“活”起来。因此，我们对这些革命历史资料的抢救与挖掘在红色文化保护工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加大对红色精神的研究，找准党性教育“结合点”，为党员干部提供生动教材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实践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充分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光荣传统和精神风范，蕴含着丰富的西柏坡精神。只有在党性教育的过程中，不断高度概括和凝练其精神内涵，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并转化成精神力量，激励和启迪人的思想，才有利于我党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开展党性教育。因此，西柏坡纪念馆加大研究力度，重点从红色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等方面集中研究，为党性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一）准确提炼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

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每一个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革命实践活动各异，每一处遗址和遗存所见证和蕴含的精神实质不同。例如，延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长征精神的显著特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西柏坡精神是由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所决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如何彻底打倒国民党，二是如何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三是如何进行执政党的建设，所以形成了以“坚持为了群众，坚持依靠群众的为民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到底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进取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律己精神”等等，而其中以“两个务必”为核心和以“赶考”为内容的西柏坡精神，因其鲜明的时代价值更是受到特别关注和传播。

（二）重点挖掘当代价值，为现实服务

红色文化的生命在于代代相传，薪火不息，因此，研究西柏坡精神中，做到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联系，与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相联系，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相联系，不断注入活力，赋予其新内涵。例如，研究土地会议，就需要与党的群众路线



线结合起来,研究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就需要与中央提出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联系;研究我党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就需要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所取得的考试成绩联系起来研究,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结合起来,为当前提供更多资政育人的借鉴经验。

(三) 注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西柏坡纪念馆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更把研究目光和视角放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这样能更准确地找准党史党性教育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使党性教育目的明确,有的放矢。一方面从历史长河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党的工作失误中总结教训,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从历史中研究和总结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样,使党员干部在党性教育中既能获得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又能在历史中以史为鉴,树立自身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能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强化理念与形式创新,找准党员干部“兴奋点”,打造党性体验教育大课堂

体验式教育改变了传统的说教方法,强调体验的生成与情感的丰富,重视实践活动和探究性学习,有效地创设出一种“身临其境”或“心临其境”的体验氛围,使施教和受教双方在共同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在心理上拉近距离并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深化教育效果。西柏坡纪念馆力求创新教育形式,找准党员干部的“兴奋点”,更好地发挥党性教育功能。

(一) 根据观众结构,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明确教育目的

西柏坡纪念馆是全国五大革命纪念地之一,每年都会会有众多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把西柏坡作

为其党性教育基地,不再是简单地参观,而是目的非常明确地设计一系列学习环节,进行现场授课教学,把革命纪念地作为其体验式党性教学课堂。在这种大背景下,西柏坡纪念馆更新服务理念和方法,根据观众不同职业、不同单位性质、不同年龄和需求,在分析自身资源、挖掘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准确定位教育主题,并围绕主题。在确立教育主题时,要做到三点。一是突出指向性。即要及时与参观单位的组织者主动联系沟通,与参观单位的活动方案对接,准确把握观众活动主题和目的。二是要突出独特性。就是要与纪念馆自身历史资源特色和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相对照,设计不同的体验教育形式。三是突出可行性。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定位主题,不宜过高,导致达不到目的;也不宜过低,搞成形式主义。有了明确的、合理的体验目标和主题,可整合体验者的体验和诱导出他内心潜意识的期盼愿望,使观众需求与资源特色达到高度一致,形成合力,使整体活动不偏离方向。

(二) 营造和增加体验式教育元素,增强观众现场体验氛围

在党性教育体验活动中,观众的直接参与是提高认识的重要途径。西柏坡纪念馆把观众心理需求和活动内容融合起来,有目的地为观众创设恰当的情境,设计、组合出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产品,做到感同身受,身临其境。一是注重外部环境营造。例如,在景区内以大量革命历史雕塑,到处红旗招展,播放革命歌曲,可以增加观众感官上的冲击力,随之而来的还有临场体验的丰富性与持续性,使观众一走进纪念地,思想和情绪即可被调动和收拢起来,从内心生成庄严肃穆的心理体验。二是注重展览体验元素的营造。要在内部陈列展览的设计上进行考虑,以革命历史教育体验为主题灵魂,以高科技虚拟、幻影成像等现代化技术为载体,利用特效优势,系统全面地回顾和体验党的革命历史、事迹、精神,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感受,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三是要注重活动设计。开展历史革命主题的情景演出、给领袖献花、演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听取历史讲座等活动,可



为观众提供广泛的体验空间。

通过在参观过程中增加的一系列内涵丰厚、品牌突出、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规模和较高服务水准的体验活动，使教育活动寓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体验的方式传输给观众，给观众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

（三）把握节奏，设计不同的体验式活动

西柏坡纪念馆通过精心设计，为观众增加了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使整个参观活动本身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艺术的表现是需要节奏的，所以在设计体验活动中，做到针对观众的需要考虑重点和亮点的展示、节奏的轻重缓急，使观众有兴趣欣赏和体验。西柏坡在每个体验项目的安排上，节奏根据整个参观活动的主题而律动，在把握参观活动的总体节奏的前提下，按照不同体验项目的风格、内容、长短的变化进行配合、铺垫，使整个参观活动张弛有序。如在“赶考行”学习主题的体验活动中，针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思想，在活动中重点设计了六个环节，使活动高低起伏，舒缓相间，从视觉、听觉、感觉、味觉等方面让观众有立体化、多层次的体验和感受。例如，设计向五大书记敬献花篮—参观中共中央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听西柏坡精神专题讲座—观看西柏坡的影像资料和西柏坡小分队的情景剧演出—重走“赶考路”。其间大家还安排互动演唱红色革命歌曲，走访农户，有兴趣的还可以安排品农家饭、干农活，了解民情，通过馆方的引导，围绕主题，让观众通过眼观、耳闻、手触，真正做到不忘历史，不忘理想，不忘宗旨，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在体验活动的安排上，革命纪念馆的管理方要始终把观众的现场体验感受当作整个主题教育活动的核心，从其心理上考虑，激活观众的思维，使观众感情变化随体验的变换而波动，使讲解服务与活动参与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在党性教育的过程中，纪念馆的管理者实际上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而真正的体验者是观众。所以，一次精心设计

的体验活动，观众就是特邀演员，能融进去，被体验活动的节奏所感染，情感得到升华，才是一次成功的教育。

（四）互动性参与，点睛式内化提升

知识只有内化，成为智慧，才有力量。体验是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紧紧相连的，它通过观众亲历，并对亲历过程进行抽象、概括，形成概念或观念，并通过在新情境下的反思，最后生成新思想，并不断循环，不断体验，直至达到内化提升。

观众通过在纪念馆的参观学习和体验，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独特感受，如何内化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并形成新的价值观，西柏坡纪念馆还进行了后期设计，实现画龙点睛之功效。如开展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知识竞赛，全面回顾和温习所学知识的内容，加深记忆；或是召开现场访谈会，通过互相交流，拓展和延伸学到的知识，使知识面更加丰富，知识结构逐渐完善，实现由“形”到“神”的提升和转化；或是举办征文活动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感受，通过征文比赛，总结所领悟知识的精华，提炼精神实质，成为指导和激励人生的内在力量和指导工作生活的标尺。通过不同环节的实施，使现场体验感受得到求证，在心灵的共鸣和思维的共振中求内化。

总之，西柏坡纪念馆利用历史资源，开展党性教育，要注重把握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抓住干部学习的“兴奋点”，找准触发激情的“切入点”，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课堂+教育基地”和“两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延伸并深化为党校课堂教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教学、警示教育、调研实践“四位一体”体验模式，引导观众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体验中感受“红色”精神，把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内化为自我需要和自觉行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陈宗良：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



抗战馆的大学生党课活动是如何炼成的

董立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 100165)

内容提要：2016年5月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按照中央、北京市委关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充分利用抗战纪念教育资源，突出创新党员教育形式和党课方式要求，积极对接高校党建工作需求，着力加强大学生党员信仰信念和党性教育，推出了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

关键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大学生 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

2016年5月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简称“抗战馆”）按照中央、北京市委关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充分利用抗战纪念教育资源，突出创新党员教育形式和党课方式要求，积极对接高校党建工作需求，着力加强大学生党员信仰信念和党性教育，推出了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至2017年3月初已相继举办党课活动45场，有38所高校、17家社会单位来馆参加党课专场活动，并通过抗战馆网站和大学生网及其微博、微信将党课活动内容覆盖到十余万人次，受到了高校师生欢迎，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创新了纪念馆社教工作品牌，成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有效举措。

一、加强思想教育，在要求、需求和追求上寻找生长点

1. 落实党中央的要求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中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中办下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来开展，要“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特别是在主要措施中明确要求要“创新方式讲党课”。这指引着我们思考如何发挥革命类纪念馆优势，探索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方式方法，创新党员培训载体，更好地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

2. 对接高校的党建需求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面对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和永恒主题，高校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更加紧迫，高校党建任务更加重要。特别是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部署，突出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如何统筹好校内外资源，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党史、国情和革命传统教育，强化青年学生的政治意识、理想信念和价值引领，增强他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是高校党建的需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探索的课题，更是纪念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课题。

3. 革命纪念馆的永恒追求

革命纪念馆姓党，是宣传党的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必须把贯彻执行党的要求、服务人民群众需求作为永恒的追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国家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地，也是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首批廉政建设教育基地，这里既有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馆出席活动的一系列讲话，也有在伟大的抗战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党章党规党史内容，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很好载体。馆党组认为抗战馆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应该仅仅是面向全馆党员的，而是应该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需要整合资源，发挥优势，以有助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根本出发点，以抗战史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阵地作用，面向社会开辟一个服务党员教育的课堂。

二、注重团结协作，在上下协作、内联外通上形成合力

1. 上级部门的重视支持

抗战馆的大学生党课活动从策划启动到组织实施，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有力领导和支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同志亲自审定了活动方案，要求抗战馆要充分利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在对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有所作为。市委宣传部主管领导和分管处室多次听取、研究了工作方案，积极联络协调市委教工委、团市委共同主办，三家以市委宣传部的文件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的通知》，在全市宣传、教育和共青团系统进行了部署。在党课活动实施中，市委宣传部等三家主办单位经常听取汇报，加强指导协调。市委教工委将大学生到抗战馆上党课活动作为高校“两学一做”的重要举措，并纳入新生入学“领航计划”等，专门制定具体通知进行安排，促进了高校与抗战馆的联系。团市委积极组织青年团员通过团课、团日等参与到抗战馆的党课活动中。

2. 活动内容的用心安排

看展览，听讲座，抗战馆，上党课。这几句话，是高校学生对这次大学生党课活动的直观印象。抗战馆在策划组织党课活动中，着眼于中央提出的“创

新党员教育和党课方式”的要求，着力于高校党建需求和青年学生的特点，充分利用抗战馆教育资源，通过引导大学生党员“看展览、听讲座、讲心得、悟真理、带研学、促践行”六个方面内容，搭建起馆校结合党建协作综合教育实践平台，打造出情景化、故事化、体验化、生活化党课教育模式，努力用抗战精神、红色基因、廉政文化来加强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

3. 举全馆之力的组织实施

馆党组高度重视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大学生党课活动，加强研究部署，要求举全馆之力来培育党建工作新品牌。党组书记李宗远馆长、党组成员罗存康副馆长亲自给大学生讲党课，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唐开文副馆长坚持把为大学生讲党课活动作为机关党建重点来抓，有力带动了全馆力量的参与。全馆成立大学生党课活动联席会，形成周通报、月小结、重要时间节点沟通协作制度，通过教育交流部牵头，办公室、人事部、编辑研究部和信息资料部配合，统筹展览讲解、专家讲座、信息宣传、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力量，确保了党课活动扎实有序开展。

三、坚持主动作为，在扎实、务实和落实上多下功夫

1. 广泛发动促开局

抗战馆积极争取主办单位的支持，于2016年5月21日启动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来自北大、人大等高校500多名大学生党员、预备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在抗战馆里接受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教育。启动仪式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卫东主持，抗战馆党组书记、馆长李宗远介绍党课活动总体安排和活动内容并做了首讲，与会领导向首都高校学生代表赠送《重读抗战家书》《抗战馆廉政教育基地（光盘）》，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邹瑞阳代表大学生党员向首都各高校发出了积极参与党课活动的倡议，市委教工委委员陈江华专门提出了要求。启动仪式得



到高校积极响应和社会广泛关注。

2. 精心设计促开展

为保证活动顺利实施，抗战馆专门设计党课活动宣传折页，内容包括活动目的、活动内容、讲座课程信息表、“学抗战英烈事迹、做合格共产党员”主题征文安排、“中国共产党抗战英烈的信仰”语录、“党的主要领导人论党建”等供高校使用。同时，还在抗战馆官方网站上制作“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专题，设立“活动动态、在线讲坛、专家信息库、主题征文、志愿风采、寄语感想、媒体聚焦、在线调查”等栏目，通过网上线下推动党课活动开展。此外，还积极争取大学生杂志社，利用大学生官网及其微信、微博贴近高校、面向大学生的优势，加强党课活动同步推送和跟踪宣传，扩大了党课活动的影响力。

3. 周密组织促深入

大学生党课活动通过教工委统一安排与各高校自主预约结合、馆校结合、专家讲座与大学生研学、重要节点活动与日常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由抗战馆提供活动建议流程、课程菜单，建立专家资源库，与各高校协商确定课程内容。一是在授课人员上，既有市委宣传部、团市委等主办单位领导登台主讲，也有抗战馆领导和业务研究人员现场授课；既有应高校预约的像岳思平、汤重南等党史、军史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也有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时代楷模郑福来等典型人物。二是在授课内容上，既有抗战史专题讲座，也有中日历史渊源和外交关系；既有党史热点难点问题分析，也有从史实结合、从网上和同学们关注的问题入手答疑解惑；既向同学们讲述抗战英烈的不平凡事迹，也引导大家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样的党课活动受到高校师生的欢迎。

4. 热情服务促成效

抗战馆以党课活动为平台，加强馆校协作，更好服务社会。每一周针对预约高校情况，举办高校

党课活动专场，提前在馆办公区电子预告来馆活动高校和专家讲座信息，当天在抗战馆序厅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专场字幕，提供专门讲解和茶水服务，并安排人员摄影摄像采访报道。抗战馆还针对“七七”和“一二·九”等重要纪念日来馆参观高峰期，举办党课活动周和党课活动月，提供党旗、誓词背板、鲜花、流动音响等服务措施，引导高校在参与党课活动中，组织重温入党誓词、向英烈献花、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同时找准寒暑假期间，面向全社会及时开放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资源，提供课程目录，安排专家授课，先后为17家中央部委办局和社会基层单位举办党课专场，极大地拓展了抗战馆党课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创新工作品牌，在活动特色、作用和影响力上见到成效

1. 党课活动得到领导的高度肯定

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紧随“两学一做”安排部署，从加强党建工作需要出发，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锻炼，积极探索创新党员教育方式，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北京日报》三次在头版报道党课活动。抗战馆机关党委在全市宣传系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市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现场观摩了大学生党课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同志来抗战馆调研时，认为党课活动不仅锻炼了馆内干部，联络了专家学者，也提高了教育基地育人能力。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将这项活动称为北京市纪念建党95周年特色活动、首都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

2. 党课活动获得了首都高校的热烈欢迎

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适应高校党建需求，面向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强了馆校合作、联合育人、以史育人，让大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接



受教育，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有利于他们知古鉴今，学史明智，不忘本心，走好自已的长征路。来馆参加活动的高校师生纷纷表示，抗战馆的党课活动形式新、内容实、创意好，是党员教育和党课形式的探索创新，是推进首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为首都大学生开展“两学一做”活动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正如有同学在党课活动寄语中写的那样：“了解了抗战史，更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知道了抗战英烈的事迹，更明白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自己肩上的责任。”

3. 党课活动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首都大学生“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不仅对接高校党建需求，还利用寒暑假期间主动服务社会，以抗战史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阵地作用，促使专家学者与党员干部交流沟

通，面向社会搭建一个开放式党课课堂。参加活动的既有中央党校组织的地方党校校长秋季培训班和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也有北京环卫集团、公交公司的基层党支部的党日活动，还有威海、柳州市领导干部培训班来馆参加的临时党课活动。大学生杂志社专门编辑出版了“忆抗战 学党史 强党性”党课活动专刊，《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媒体多次报道党课活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培训部向抗战馆送来了写有“红色教育、深入人心，解说生动、耐心热情”的锦旗；国土资源部在发来的感谢信中感谢抗战馆为他们举办的党课活动专场，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董立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

——以无锡为例

王 玲

(张闻天旧居 江苏无锡 214001)

内容提要：名人故居作为纪念馆的一种类型，正点缀着历史文化街区串联起的城市文脉，展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人文图景。无锡市有档案可考和实地能查访到踪迹的名人故居有 71 处。总的来看，这些名人故居的保存和利用状况良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笔者认为，应通过全民参与保护、强化日常管理、发挥联动效应等举措来更好地保护利用这些名人故居，争取使每一处名人故居都能保下来、亮出来、用起来、串起来，使名人故居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高度统一。

关键词：无锡市 名人故居 保护利用

名人故居是纪念馆的一部分，是历史名人重要的活动舞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们历经岁月记录下了这些人物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人文价值，是传承民族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当前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加强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促进和提高名人故居的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名人故居保护利用现状

据 2011 年无锡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和无锡市房地产档案馆调查统计结果，无锡市 7 区（不包括江阴和宜兴）有档案可考和实地能查访到踪迹的名人故居共 71 处，基本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崇安区	滨湖区	锡山区	惠山区	新区	北塘区	南长区
28 处	18 处	9 处	7 处	4 处	3 处	2 处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无锡市的各区都分布有名人故居，其中以无锡老城区崇安区最多。

对于这些名人故居，无锡市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具体规定，按照每个故居的历史、文化、建筑等综合价值和实际保存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保护利用。大致分为以下五个类别：

第一类，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作为全国重点文物申报单位，报国务院核定公布。这些都属于十分重要的名人故居，因而对其是全力以赴，修复保护。此类有康熙、乾隆每次南巡必到的秦氏别墅——寄畅园，著名民间音乐家阿炳故居，博学鸿儒钱钟书故居等 10 处。

以薛福成故居——钦使第为例（见下页图），该故居位于学前街 152 号，为近代著名爱国思想家、外交家、政论家和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的故居，因薛福成曾被钦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所以其府第被称为“钦使第”。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建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原有 3 路 6 进 140 余间房子，占地 1.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至今仍保留原建筑 130 多间，建筑面积 5300 平方米，是江苏省内现存最大的近代官僚住宅建筑群。1983 年 11 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 年 4 月，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无锡市人民政府决定



全面修复薛福成故居，并将其列为全市文化建设方面的重点工程，先后拨款 7000 余万元，迁出了其中的一所小学和数十户居民。2001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元旦起对外开放。

第二类，也属于重要的名人故居，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一类故居，无锡市是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利用，并不断探索保护利用的新思路。此类故居有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旧居、近代数学家华蘅芳故居——行素轩、重要民族工商业者祝大椿故居等 17 处。

以陆定一故居为例，该建筑位于县前西街 8 号，由陆定一祖父于 1860 年购得，具有江南书香门第的典型风格，是一组规模较为宏大的晚清住宅建筑群，占地 2.367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1300 多平方米。后因旧城改造拆除了第一进，尚存 2 路 4 进房屋，建筑面积为 1110 平方米，另有 6 个天井，1 条备弄、5 个院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有关部门就曾多次拟议修复，但因故居历经变迁，产权性质多样，住户结构复杂，导致动迁难度较大。2013 年，故居因电器线路老化差点在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修复工作更成急不可待。经多方研究协商，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一种新的保护方式，即原住居民不搬离，由政府与原住居民共同出资修复，这成为无锡实行名人故居活态保护的首个案例。



薛福成故居建筑群

第三类，属于比较重要的名人故居，由市政府核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属地政府部门主导进行保护和利用。此类有民族工商业杨氏家族重要代表人物杨味云故居、宋代名医进士许叔微故居——梅梁小隐、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与徐建寅父子故居等 13 处。

以国画家钱松喈故居——芭庐为例，该宅位于南市桥巷 58 号，建成于 1940 年，建筑面积为 133 平方米。1987 年 1 月，钱松喈子女遵父遗愿，将房产赠予无锡市文化局。文化局将其整修后，辟为钱松喈藏书室、钱松喈艺术研究会。2001 年成立的方召麟艺术研究会也位于钱松喈故居内，方召麟为钱松喈学生、无锡籍画家。2003 年 6 月，钱松喈故居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类，属于有一定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确定为市级文物遗址控制保护单位，在建筑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与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此类有清代水利专家、文渊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和国史馆总裁嵇璜故居、重要民族工商业者荣瑞馨、唐星海故居等 5 处。

以荣福龄故居为例，该故居位于荣巷西浜 196 号，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者、慈善家荣福龄的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荣巷地区早期实业家较为典型的住宅建筑。共计 4 进，面阔 3 间，中间 2 进为 2 层矮脚楼，其两端高耸的风火山墙及墙上一排排“蚂蟥搭”，均显示着建造时的时代特征和江南民居的地方特色。2002 年，荣巷老街和沿街 157 座建筑作为“荣巷近代建筑群”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无锡市政府将近旁的荣福龄故居公布为市级文物遗址控制单位。

第五类，虽属于名人故居，但或因原建筑过于残缺，甚或仅剩遗址，故未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对这类故居的保护办法是尽可能保留有历史价值的部分建筑，其余部分则加以开发利用。





此类有元代画家倪瓒故居——清闷阁、近代数学家华世芳故居、重要革命烈士徐梦影故居等 26 处。

以高攀龙故居为例，位于无锡城中的明代思想家、政治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故居早已湮没，其在蠡湖东岸所建的“可楼”尚存遗址，他曾在其中静坐读书治学达 27 年之久，后人称之为“高子水居”。2005 年市政府在进行环蠡湖风光带建设时，在其旧址建了纪念性园林水居苑，将其中的五可楼作为高攀龙纪念馆，展出高攀龙的诗歌、楹联等作品，宣扬其“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任”的精神，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2008 年 6 月，无锡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名镇）保护的決定》，并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名镇）保护和利用的实施意见》，实行市区联动、以区为主的工作机制，建立了五大街区（名镇）保护性修复工程领导小组，明确用 3 年时间基本完成清名桥、惠山、荣巷、小娄巷等历史文化街区及荡口古镇的保护修复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五大街区（名镇）风貌得到显著改观。由历史文化街区串联起的无锡文脉，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数量众多的名人故居则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点缀其间，展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人文图景。

二、名人故居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无锡市名人故居的保存状态良好，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保护力度不够强

在处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时，有时往往会向建设需要倾斜，尤其在 20 世纪加速进行城市改造时，一些有价值的名人故居被拆除。例如，近代著名民族工商企业家杨宗瀚的故居保滋堂，匾额由李鸿章所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及 21 世纪初被陆续拆除。民族工商业家华绎之的故居爱日堂，系两幢典型的西式洋楼，抗战时，被日军占领，后由国民政府接收，汤恩伯等曾在此居住，新中国成

立后，先后由苏南人民广播电台、市广播电台和《无锡日报》社使用，1992 年后因道路拓宽，先后遭拆除。无锡地区民主革命的启蒙者、江苏近代教育的开拓者、我国近代爱国教育家侯鸿鉴的故居绍衣堂，在北禅寺巷东林中学分部内，后因新建教学楼需要遭拆除。至今无锡市还有 37% 的名人故居未列入保护级别，这使得较多的名人故居未得到规范化的保护。

2. 管理措施不够有力

无锡市的名人故居由于所有权属和使用单位（人）的不同，在管理水平上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一般来说，重要的、保护级别高的名人故居大都由市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效果就比较好，如秦金故居——寄畅园、薛福成故居等，不仅历史建筑保护得好，而且相关措施也比较严格周密。而有一些名人故居因产权属个人所有，或散落在边远地方，就往往处于无人或疏于管理的状态，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故居——端居堂、民族工商业家周舜卿故居——慎馀堂和荣月泉故居等。

3. 宣传教育面不够广

目前无锡市名人故居处于常年开放状态的不足 20 家。2008 年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组曾经做过“无锡市民对本地名人故居认知度的调查”，调查结果是许多本地居民对本土的名人故居不甚了解。这主要源于全社会对名人故居的宣传力度不够，名人故居的自我宣传力度也不够，加上大多数名人故居布展形式和手段单调、落后，文物征集不充分，场馆展示缺乏厚重感，因而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

4. 利用层次不够高

全市 71 处名人故居中，只有张闻天旧居和薛福成故居 2 处为省级爱国主义基地，秦邦宪故居、钱钟书故居、华蘅芳故居和泰伯故居 4 处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仅占总数的 5.63%；列入国家 A 级以上旅游景区的共有 12 处，仅占总数的 16.9%。



5. 财政经费普遍不足

由于一些名人故居资金缺乏,年久失修,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些经过认定的故居,无法实施有效保护;一些新发现的名人故居,难于进行修复,只得处于原始状态。同时,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不少名人故居的文物征集布展和正常开放运作都不能保证,更不要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了。

三、名人故居保护利用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对进一步加强无锡市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工作有以下几个建议:

1. “保”字当头,全民参与保护

名人故居是不可再生的文物,一旦破坏就难于恢复,毁掉一个就少一个,因此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全社会都要确立强烈的保护意识。保护工作应从源头抓起,即在制订、修订城市建设规划时,就应将名人故居保护纳入其中,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与名人故居保护的关系,为其安排合理的生存空间。尤其在研究实施城镇成片开发改造时,应吸收文保部门参加,以防止因不明情况而造成对名人故居的破坏。还要广泛征询社情民意,多方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尽量减少名人故居保护的盲区。除了名人故居本身外,科学合理地保护其周边环境也很重要,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优秀老建筑,要尽量保护好周边的原始风貌,或至少保留周边环境的缓冲地带,以确保故居建筑的整体价值。

2. 理顺体制,强化日常管理

对于名人故居,保护是前提,管理是关键,利用是目的。只有管理好,才能保护好、利用好。名人故居的管理,宜实行分级负责制,在市一级已设文管中心名人故居管理处之外,各区和镇、街道也应有相应的责任部门或责任人,从上至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分别负责各自范围内名人故居的调查发掘、申报认定和保护利用工作。现有的各个名人故居要加强日常管理,做到建章立制、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正常开放;要在各自实践中

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全市统一适用的名人故居管理条例,作为地方法规颁布实施,以推进名人故居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对新发掘的名人故居要及时建标立牌,明确管理主体,纳入保护利用。

3. 勇于探索,创新管理模式

以往对于名人故居一般都采用净态管理方式,即把原住户全部迁出,然后整修陈列、对外展出。这种方式在故居的保护管理方面有其方便之处,但往往也有一定的弊端,尤其是一些小型分散、地处偏僻、参观不便的故居,往往是开馆时热闹一下,之后就“铁将军”把门,常年无人问津,既是资源的浪费,也容易造成房屋、展品因不常通风而霉变破败。国外对一些名人故居采取活态管理的方式,即只在显著地方挂标志牌,或辟出部分面积进行陈列展出,其余部分则继续由原住户作正常生活之用。这既可节约搬迁整修费用,又提高故居的利用率,同时还可能因熟悉情况的老住户继续留居而保留下更多的人文信息和历史气息。这次无锡市对陆定一故居就借鉴了这一做法,一则因故居原住户中本就有一些是陆家亲属,二则因在惠山区已有一处陆定一祖居作为陈列展示,因此就对城区的陆定一故居采用了活态保护的方式,从现有初步效果看来,还是良好的,今后无锡市还应从实际出发,继续探索各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水平。

4. 拓展功能,扩大社会效益

名人故居的影响力、生命力是与它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社会功能发挥得好,就能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就能不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充满生命活力、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反之,就会默默无闻,可有可无,最终自然消亡。发挥名人故居的功能,最基本的就是要办好陈列布展,提高工作质量,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观学习、接受教育熏陶。为此就要改进工作作风,转变服务观念,摆正与观众的关系,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单一服务为多方位服务,尽可能为观



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使他们能有求而来,满载而归,不虚此行。但这还不够,因为大多名人故居毕竟场地有限、陈列内容有限、辐射范围有限,仅靠基本陈列等人上门参观,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各种方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扩展自己的社会教育功能。如举办流动展上门服务;与学校确立共建合作关系和招募“名人故居之友”志愿者;利用场馆资源,开办有关的培训、讲座,组织志愿服务;举行入党(团、队)仪式,在清明节等传统节日或重要纪念日开展祭扫仪式,举办各种读书会等;还可发挥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开办网上故居,设立公众号等,形成网上的展示、教育和服务平台,使活动、互动更为便捷、生动。张闻天旧居多年来就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先后与44家学校、单位和社区结成精神文明共建单位,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配合形势的主题教育活动,赴150余家单位举办流动展览,开馆20多年来,以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有限空间,取得了教育覆盖面达60多万人次的良好效果。从而被评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校优秀德育教育基地。实践证明:有活动,才有活力;有作为,才有地位。

5. 内联外协,发挥联动效应

无锡市虽有71处名人故居,但大小不一,情况各异,资源有限,如果只是单兵独斗,各自为战,不免势孤力单,难有大的作为,因此必须走联合发展之路,实现多方联动,以取得1+1>2的效应。所谓“独木不成林,成林鸟来勤”,通过各种联动,实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必将有利于名人故居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对无锡建设文化大市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是要实现内部联动,即各个名人故居之间,要紧密联系,加强合作,取长补短,联合作战。可以通过名人故居联谊会、协作会之类相对稳定的纽带组合起来,定期开展工作交流、业务研讨、人员

培训等活动,并可通过联合办展、交流办展、共同举办大型活动等,发挥群体优势,来取得更大的工作能量。

二是要争取外部联动,也就是依靠社会各方的支持,共同办好名人故居。当前正在升温的红色旅游和历史文化专线游为名人故居带来了极好的机遇,要以此为契机,寻求更好的发展。要加强和旅游部门的合作,争取纳入相关的旅游线路,并开发、销售具有实用和收藏价值、能彰显地方历史文化个性或自身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扩大品牌宣传,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还要与工会、团委、妇联、街道社区、学校、企业等社会各方加强联系,结合形势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各类活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强化名人故居的社会效应。特别应加强与周边环境之间的联动,例如王昆仑故居、唐文治茹经堂地处鼋头渚公园内,就可与鼋头渚公园加强联系,开展一些联合活动;张闻天旧居、钱钟书故居地处城中学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就可加强与周边学校的联合活动,这样便于形成区域效应。

当前,无锡市正在大力实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群的工作,这为全市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只要名人故居自身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同时,与社会各界携手努力,用发展的眼光、求实的精神,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一定能争取做到将每一处名人故居都保下来、亮出来、用起来、串起来,使名人故居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高度统一。

参考书目:

[1] 无锡市房屋产权监理处、无锡市房地产档案馆编:《无锡市名人故居》,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2] 杨洁:《近现代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以南京为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王玲:张闻天旧居主任、文博馆员)



遵义会议纪念馆践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

王志力

(遵义会议纪念馆 贵州遵义 563000)

内容提要：遵义会议纪念馆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注重研究工作，注重宣教工作，注重文物收集工作，注重免费开放后的优质服务工作，提高展陈水平，创新展陈方式；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建立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把遵义会议和长征精神的宣传走出去，探索讲解员星级讲解制度，建立官方网站，注重标准化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关键词：遵义会议纪念馆 践行 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和探索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而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 21 个革命纪念馆之一。1955 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1961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 年 11 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亲笔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1993 年，被国家文物局选定为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5 年，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1996 年被国家教委、团中央、国家文物局、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联合命名为全国百个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 年 6 月，被中宣部公布为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1 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单位先进集体”；2004 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2004 年 7 月被中宣部、民政部、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2007 年 9 月被授予中国十大经典红色旅游景区；2008 年 5 月被评为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2011 年 5 月被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授予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单位；2011 年 12 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建馆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 20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2008 年实行免费开放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以遵义会议为主题，以长征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设施，丰富基地内涵，提高展示水平，优化公共服务，加强以遵义会议会址为核心的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建设，积极实践和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凸显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

一、有效的实践

(一) 注重研究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厚重的题材

研究工作是立馆之本，对遵义会议和长征历史史实的挖掘、考证和研究，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和总结，是遵义会议纪念馆一项重要的工作。建馆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良好的研究工作机制，围绕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以及前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的活动，进行了考证、调研和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与遵义会



议相关的有价值的考证论文,形成了有价值的系统的史实文库。

良好的研究工作机制,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尚,老专家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鼓励中青年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以学习作为立身之本,树立以学习为荣的良好氛围,全馆形成了由6名文博研究馆员、4名文博副研究馆员、10多名文博馆员组成的研究团队,逐渐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人才合理的梯次结构。

定期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到革命纪念地学习,让大家增强历史的直观感,增加第一手资料,增加对历史知识的系统性。派出研究人员重走长征路,到红军生活过的瑞金、兴国、于都,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广西的兴安、全州、灌阳,云南的扎西、四川的古蔺、叙永、泸定、小金、松潘、诺尔盖班佑、巴西,甘肃省迭部县俄界、腊子口,宕昌县哈达铺等长征沿线进行实地考察,请专家讲解解读,进一步深化了对红军长征的理性认识。为了深化对遵义会议参加者的认识,先后组织研究人员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长沙花名楼镇刘少奇纪念馆、上海青浦陈云纪念馆、上海张闻天纪念馆、四川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等纪念馆参观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伟人的成长背景的考察。

充分利用资源,主动与贵州大学、遵义师范学院、遵义职业学院、遵义市委党校、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四渡赤水纪念馆、通道会议纪念馆、黎平纪念馆、猴场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整合资源,取长补短,合力攻关,在《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福建党史月刊》《理论当代》等国家、省、市刊物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纪实》《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遵义会议研究论稿》《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陈云与遵义会议》《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伟人毛泽东在这里崛起》《走进遵义会议会址》《长征中的李卓然》《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遵义会议前后国民党军事电文选编》《遵义会议100趣》《遵义会议资

料汇编》《遵义红军一条街》《遵义会议80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向胜利》等30多部专著,进一步佐证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进一步佐证了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二)注重宣教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强化学习,提升讲解员素质。宣教工作是我馆重要的一项工作,讲解员的讲解服务是对外展示遵义形象,传播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传播遵义会议相关史实的重要渠道,我馆现有50多名讲解员,我们一直注重加强他们对党史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对长征及遵义会议相关历史的学习,而且拓展视野延伸对时事政治、地方史、哲学、礼仪、党性教育、美学、伦理学等知识的学习,使讲解员从背诵讲解词到对所有的展陈资料能够运用自如、触类旁通、融会贯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的要求能够得心应手,从容应对。强化每周周一学习制度,请地方史专家讲解遵义的历史知识,请党史专家讲解红军苏区的历史、讲解遵义会议深层次的问题,帮助讲解员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派出讲解员外出学习,先后派出讲解员到西柏坡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国家博物馆等跟班学习,邀请兄弟馆的讲解员到我馆传授知识,积极派出讲解员参与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类活动,使讲解员在参与的各类活动中砥砺前行,不断进步,从而使不同的观众能够受到不同的视听效果。很多观众留言:听了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收获颇丰,感到言之有物,有血有肉,感到他们是用心在讲解,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死记硬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获得了很多的知识。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把革命知识、长征故事和红色精神生动地展现出来,使观众受到教育,转化为观众的一种精神力量。

主动作为,真诚服务社会。注重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自编自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走进社区、走进基层、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军营,宣教



队伍先后到桐梓县高桥镇、播州区鸭溪镇武警部队驻地、绥阳县宽阔镇、绥阳县茅垭镇、汇川区洗马社区、红花岗区丰乐社区、红花岗区新舟空军部队、红花岗区消防大队、湄潭县鱼泉办事处，走进文化小学、老城小学、丰乐小学、同济小学、万里小学、茅垭小学、宽阔小学、鱼泉小学等学校，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村寨、走进军营、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开展了 50 多场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学生、人民子弟兵送去了丰富的文化食粮。

（三）注重文物征集，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文物史料

认真做好革命文物资料抢救性征集工作，利用一切凡能利用的资源，深入到革命后代或民间收藏人士家中、相关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旧货市场等地，进行广泛的调查摸底、寻找线索和掌握情况。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动员捐赠、捐献或进行有偿收购、复制借用等手段，抢救性征集革命文物，馆里专门组织人员深入到红军驻守过的播州区枫香镇、平正乡、团溪镇、乌江镇等地征集文物，征集红军长征遗留下来的宣传标语，丰富了馆藏文物。

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80 周年之际，向贵州博物馆借展国家一级文物 9 件、其他文物 89 件，到国家博物馆复制了“聂荣臻长征时使用的左轮手枪”“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遵义城时的安民布告”等 63 件重要文物，到解放军博物馆、解放军档案馆高仿真复制了“毛泽东送给陈昌奉的银圆”“周恩来红星奖章”“中革军委钢印”等国家一级文物 12 件，到中央档案馆复制了红军长征中的军事电文等 179 件高仿真档案文件，征集到了“李卓然长征时使用过的驳壳枪”“刘伯承 1935 年 8 月 7 日致孙德操的信”等 38 件珍贵文物，同时，以遵义市委宣传部、遵义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遵义市文物局、遵义会议纪念馆名义，联合向社会公开征集了 54 件文物及历史资料。征集到国家一级文物“停留在杨尚昆体内 63 年的弹片”，讲述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遵义会议后在云南沾益负伤残留在体内带着弹片长征和革命的故事，这块弹片

无法取出，一直到 1998 年杨尚昆去世，遗体火化后才从骨灰里取出，残留在杨尚昆体内 63 年。征集到国家一级文物“怀念红军诗”稿本，讲述了侗族青年杨和钧于 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6 月撰写的怀念红军的诗词稿本，记述了侗族青年冒险救治红军伤员、歌颂红军革命的诗歌文本。与文物展品复制公司合作，复制文物展品 897 件，通过各种途径新征集革命文物及历史资料 2000 多件。

在借助高科技手段展陈的同时，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展示，展出文物 1200 多件、图表资料近 10000 件，其中原物 726 件，复制品 667 件，仿制品 158 件，展出了 1935 年 3 月 4 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朱德任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高仿真复制档案文件，大量原始、鲜活、生动、内涵丰富的红军长征文物和历史资料，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相关的史实，做到展览图文并茂，物文相衬，有史可讲，有物可见，让文物说话，让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生动和直观，充分展现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历史，提供了更多翔实的历史细节，使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更加丰富，更容易为广大观众接受和领会。

（四）搞好免费开放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质服务

围绕免费开放工作，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提升管理质量，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细则为指导，以创建旅游标准化试点为平台，以免费开放实施方案为准则，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提升员工素质，细化岗位职责，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加强思想认识，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紧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注重人性化管理，为观众着想，合理配置观众休息点，增设饮水点，合理设置无障碍通道，针对遵义会议纪念馆人流量大的特点，全年 365 天每天对观众开放。为了方便观众进一步了解遵义会议的相关史实，在遵义会议陈列馆设置了互动查询平台，观众从指尖就可以查询到遵义会议有关史实的



内容，巡回播放党和国家领导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情况视频，滚动播出遵义会议召开的实景模拟影片、四渡赤水实景片，让观众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视听效果。

积极配合开展纪念 80 周年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先后配合完成了“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走进遵义，“薪火相传再创辉煌”火炬传递活动，首届长征论坛及纪念遵义会议召开暨长征胜利 80 周年中国书画名家巡展等大型活动，配合中央电视台完成了《走遍中国》《筑梦路上》《美丽中国行》等栏目拍摄工作。积极配合遵义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教育提升全馆职工的精神文明素质，以微笑服务展现风貌，以真情服务展现素质，并在醒目的位置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成自身独特的红色文化，使广大观众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明的风尚。

（五）提升展陈水平，创新展陈方式，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

遵义会议纪念馆除了核心的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故居、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烈士陵园外，在中央、省、市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复原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博古李德住居、邓小平住居、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进一步延伸了遵义纪念体系，做大了体量，拓展了接待服务空间，提升了陈列展示水平，强化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

2016 年，与陕西省铜川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纪念馆联合举办了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照金精神”巡展走进遵义活动、与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举办了《开天辟地——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95 周年》巡展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活动、与杨尚昆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了《杨尚昆生平事迹展》走进遵义活动，还举办了《张闻天同志展》《长征中的李卓然》《陈云与遵义会议》《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彭雪枫将军展》《毛主席诗词展》《苏维埃货币展》等展览，丰

富了展出内容。

利用纪念遵义会议 80 周年的契机，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对遵义会议陈列馆进行了改扩建，使遵义会议陈列馆的面积由原来的 6400 平方米扩大到 19054 平方米，展陈面积由原来的 2000 多平方米扩大到 8000 多平方米，展线由原来的 500 多米扩大到 1200 多米。陈列馆充分利用室内空间布局、平面展示、模型展示、实物展示、多媒体展示、灯光辅助设计等目前国内高科技的展示手段，打破常规，运用三维空间立体展示文物、现代声光电照射、电子翻阅、电子查询、移动智能终端服务与微信等现代传媒手段。坚持“以人为本，资政育人、社会性、公益性、大众性、趣味性、开放性、传播性、启迪性”的原则，进行设计展览形式、配置展陈的文物。突出高科技的展示，制作了大型多媒体等身幻影成像剧《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以故事为主线来构建陈列文本的编撰、陈列空间的布置、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突破了以往遵义会议陈列按照历史教科书式的陈列布展方式，以文物和文献史料结合历史线性结构为依托的编排，通过综合运用文物、图片、模型、雕塑、景观等多种形式，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努力提升文物在陈列中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使观众深切体会到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大型实体剧《娄山关》和《四渡赤水》，通过鲜活的情景剧，通过体验性设计和情景规划，使参观者进一步了解遵义会议召开及其前后的全过程，感受到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感受到“坚定理想信念，勇于牺牲，百折不挠，自强不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和“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

二、有益的探索

（一）建立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遵义时做出的



“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根据遵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我馆承办组织了《长征与遵义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巡展活动，该展览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的基本内容《伟大转折，走向胜利》，以红军长征为主线，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创建黔北苏区”“红军长征在遵义”为重点，生动翔实地展现遵义会议伟大历史意义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二部分为“红色圣地，醉美遵义”，主要反映21世纪以来遵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展示革命老区遵义“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这次巡展活动，使观众在重温红军的光辉历程的同时，再次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2016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先后到清华大学、上海图书馆、同济大学、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浙江美术馆、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展出，与此同时，我馆也把巡展活动延伸到遵义较为偏远的正安县、道真县、务川县，把移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送进县城，方便基层群众参观，整个巡展活动参观的观众达100万人次以上。2017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拟在浙江大学，福建省宁德市、厦门市，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陕西省西安市、延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地举办《遵义会议永放光辉》巡回展出，建立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进一步拓展对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宣传。

（二）积极探索讲解员的星级讲解制度

讲解员是对外展示遵义形象，同时又是传播遵义会议历史知识、遵义会议精神、长征和长征精神的宣传员。近些年，我馆积极探索讲解员的星级讲解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面向社会招聘大专以上学历的学生，择优选拔素质优、学历高、形象好、能力强的讲解员。积极探索星级讲解制度，把讲解员的星级划分一至五星，根据工作实

绩、观众评价、学习考评、参与公益活动等标准进行评定提升星级，与工资收入挂钩，极大地提高讲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每年为观众讲解2万多批次，受到观众的称赞，同时，讲解员都主动参与到一些文化活动中来，进学校进课堂、进基层进社区、进军营进警营，把优秀的文娱活动带到广大群众、学生和子弟兵之中，获得了社会的好评。

（三）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官方网站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提出的“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永放光芒”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贵州省委、遵义市委“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要求，为了扩大对遵义会议的宣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馆建立了遵义会议官方网站，网站设置场馆介绍、工作动态、馆藏文物、研究成果、学术教育、部门简介、巡展活动、互动信息平台，网站的建立扩大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对外宣传的信息量，弘扬了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彰显了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的地位和作用，给广大观众增加了一个了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渠道。

（四）按旅游标准化的要求，严格向标准化看齐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又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馆严格按国家旅游局标准委的要求，制定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安保标准、财务管理标准、游客满意度调查标准、环境质量标准、旅游景区环境噪声标准等200余项标准和制度，完善了标识标牌、休憩设施、星级厕所、无障碍通道等设施，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梳理岗位职责，厘清责任清单，2014年6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红色旅游集团获得国家旅游局颁布的第二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称号，严格按标准来规范职工的行为，按制度程序办事，提升了软硬件设施建设，为观众参观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连续五年实现游客零投诉。同时，把文化文物和红色旅游有机结合起来，让观众



在红色旅游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在旅游中学习遵义会议知识和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知识和长征精神，同时把红色培训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让有需求的观众和企业单位能够在遵义通过红色文化的培训，享受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长征和长征精神的文化大餐，接受心灵的洗礼，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理想信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总之，遵义会议纪念馆自加压力、负重前行，着重于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建设，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不断拓展接待

服务空间，深入挖掘历史史实，既做好“规定动作”，又开拓创新搞好“自选动作”，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热忱为观众服务，游客逐年增加，2016年游客数量达到450万多人次，巡展活动参观观众达到100万人次，履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诲人不倦，资政育人”的职能，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

（王志力：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纪念馆管理模式创新

——以郑州二七纪念馆为例

邓学青

(郑州二七纪念馆 河南郑州 450000)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的纪念馆已经不只是收藏藏品的一个场所，它不仅具有收藏和观赏作用，还承担着社会教育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时期，传统的纪念馆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合新型纪念馆的发展，因此，积极探索纪念馆新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

关键词：纪念馆 管理模式 创新

目前，我国拥有着数量庞大的革命类、人物类纪念馆及名人故居，每一个城市也都会有展现自己历史发展和历代名人的纪念馆。随着 2008 年全国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的观众剧增，这也给纪念馆的正常秩序带来了一定冲击，改变着纪念馆传统的管理模式。

在传统的纪念馆管理模式中，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着馆藏藏品展开的。纪念馆的工作习惯于被概括为征集保管、保护研究、传播教育的当代纪念馆三大功能。现今我国纪念馆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国纪念馆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博物馆定位、建设和管理运营及时代要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有效地制作更多高品位的、受人欢迎的展览，或组织具有影响的社会活动，既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又能在服务之中对观众兴趣有所规范有所引导，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已经成为当今博物馆的管理工作的重要问题。

多年来，郑州二七纪念馆肩负使命、开拓创新，坚持以团队的和谐共进与发展的理念创新为主要工作，不断深入纪念馆制度改革，完善对外开放的组织与管理，深化相关历史文化藏品的征集与研究，保持着纪念馆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鲜活生命力，不断拓展着新时代、新的文化环境下郑州二七

纪念馆发展进步的新路径。

一、创新内部管理模式， 加强单位文明建设

郑州二七纪念馆历史沿革存在特殊性，单位自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纪念塔和纪念堂的合并、独立、再合并的过程，且因上级管理单位不同，导致两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与运作模式不尽相同。2008 年，两个文保单位最终合并为郑州二七纪念馆（简称“二七馆”）。

二七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将制度作为单位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根据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制定了 15 类 108 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实现了用制度管理，用制度约束，很大程度培养了职工工作自觉性。根据不同的岗位制定相应激励办法，提高各岗位工作者的积极性与业务能力，切实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的有效推进与圆满完成。

实行竞聘上岗，完善人员管理的竞争机制。为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二七馆自 2010 年起实行竞争上岗，按岗聘任，增强了职工们，尤其是干部岗位人员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为了使两个原本独立的单位相互融合渗透，团



结一心，二七馆多次通过组织运动会，研讨交流、参观学习，开展职工间帮、学、带活动等方式让大家相互了解熟识，建立起人际关系的信任与团结。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单位内部坚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文明礼仪教育、文明交通实践与卫生文明评比等多项工作，为郑州二七纪念馆争创省级文明单位夯实了基础，也为纪念馆的良性运转、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证。

二、创新统筹管理模式， 做好文博单位的保护与利用

郑州二七纪念馆管理着郑州二七罢工纪念塔、纪念堂，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及原铁路工人学校旧址四处不可移动文物。2006年，郑州二七罢工纪念塔、纪念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及原铁路工人学校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完善了四处文博单位的四有档案；做好了日常维护与保护修缮工作。

郑州二七纪念馆自1971年9月二七纪念塔建成以来，坚持常年对外开放，并于2008年3月成为全国第一批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之一。2012年郑州二七纪念馆对二七罢工纪念塔进行了全面修缮，并对内部的展览进行了提升，将原本陈列于二七纪念堂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迹陈列”展览与二七塔内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展览合并，称作“千秋二七”基本陈列展览。据统计，“千秋二七”展览面世以来，每个开放日的接待量平均在5000人次以上，节假日每天接待人次达8000以上。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满足市民文化需求，整合郑州二七纪念馆历史文化资源，2015年7月5日，郑州二七纪念馆对外开放了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旧址内展出“伟大贡献”图片展。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取得较好社会反响。

郑州二七纪念堂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原址，历史意义非凡，近年，我们对其进行了整修，在修复纪念堂原貌的基础上，对内部

功能进行了丰富。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顺应时代发展，具备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能力的演播厅。

此外，为充分发挥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吸引观众走进来，二七馆将二七塔地下室开辟为临时展览展厅，根据不同的宣传主题和需要在其中举办展览。

三、创新服务管理模式， 提高纪念馆的公益性与服务性

郑州二七纪念馆在总结多年对外开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与所处位置周边环境，建立起符合参观实际，可行性强的参观准入模式，并本着以人为本的方针路线，结合观众文化需求，为观众和参与纪念馆活动的群众提供多样性的文化服务。

合理便捷的准入模式，为前来二七馆参观的观众提供了便利与安全。在参观二七纪念塔中的基本陈列时，观众仅须凭本人身份证进行电子登记，经过安检后方可进入参观，这不仅是厉行节约的做法，也为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展出文物展品的安全及观众情况统计等工作提供了原始依据。展览举办在闻名遐迩的二七纪念塔内，虽然在空间上受到一定限制，但经过精心设计我们依然实现了出入口分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参观秩序。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对外开放与基本陈列不尽相同，根据旧址建筑情况，每个开放日准入观众100人次，分4个时段进行门票发放，领取门票依然须持本人身份证。经过3个多月的实践试运行，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对外开放工作有序开展，事实证明此种参观准入方式实用可行。

为彰显“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二七馆，所有展览根据不同年龄段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为观众提供不同的讲解服务，便于观众接受理解，最大限度地达到我们办馆做展的目的。同时推出提供自助语音导览和微信关注引导参观等服务，与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紧密结合。更全方位地满足不同观众的文化需求。展览服务设施齐全，开设无障碍通道，免费提供轮椅、雨具、应急医药用品等。展览出口处设置有留言本、意见箱，免费发



放宣传页,设有文化商品服务区与游客服务中心。

此外,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纪念馆的社会职能,二七馆多年坚持“走出去”的思想方针,植根于社会教育事业,每年坚持下社区、进学校、走单位深入到社会各基层做报告、办巡展不少于 70 场,将“河南籍感动中国人物图片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战场——中国力量”“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等真实生动的主题报告、巡展送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四、创新信息系统管理模式, 注重文物的征集与保护

随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郑州二七纪念馆全面开启馆藏文物清库建档及信息数字化录入工作。这标志着我们的文物藏品管理工作从传统登记模式向现代数字化迈进的第一步,是文物藏品管理工作中一次“质”的飞跃。我们以此为契机,规范了文物藏品及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电子录入工作,让二七馆文物藏品保护与文史资料的查阅利用更为快捷、高效。

结合筹办展览,开展文物征集与资料收集工作。郑州二七纪念馆计划于 2016 年推出“百年郑州”陈列展览。根据陈展大纲,征集有关郑州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资料、图片、实物等,比如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抗战时期的证章和军用物品等作为馆藏,再根据展览大纲及展厅环境,进行挑选展出。

五、创新人才引进的模式, 确保人才专业化与多元化

郑州二七纪念馆《馆刊》《我与二七塔的故事》《二七纪念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册》等“二七”丛书的相继出版,使二七馆学术研究工作日渐成熟。为确保学术研究工作的专业化,二七馆连续引进硕士研究生,组建了一支业务精湛、思想深邃、研究成果颇丰的研究型人才队伍,为二七馆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鼓励学术交流,召开学术研讨会。2013 年,二七馆联合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武汉江岸二七纪念馆和福建林祥谦纪念馆在郑州举办了纪念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标志着二七纪念馆的学术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聘请高校教授指导二七馆学术工作。多年来,二七馆与郑州大学历史文化传播学院等高校合作,聘请专家作为纪念馆的顾问,指导二七馆学术研究工作。为全馆职工普及近现代历史知识、文博知识及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等。

六、创新管理理念, 整合官方和民间文化资源

为实现纪念馆文博事业的长足发展,二七馆拟打造一个专业联盟,集郑州行政区域内党史类、档案类机构与社会具有丰富经验和技术的民办场馆和个体收藏于一体,创办一个以资源共享、技术交流为目的的联盟,创造一个业务交流平台,以研究会的形式组织,初步设想每两年举办一次交流活动,促进整个文博行业的壮大发展,同时为二七馆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和更多的社会资金,更有利于发展纪念馆事业。

七、小结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继承和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的重要机构,纪念馆的运营和管理意义重大。现代纪念馆事业亟待组织管理模式的转变,以推动纪念馆在思想观念、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管理模式与运营方式上不断创新,从而增强纪念馆自身活力,树立纪念馆的公益形象,提升纪念馆的社会影响力,并以此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郑州二七纪念馆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强化管理模式,积极开拓创新,在郑州市文化服务体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战线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邓学青:郑州二七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扬长避短 注重特色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公共教育浅析

邱晓云

（吴昌硕纪念馆 浙江安吉 313300）

内容提要：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教育已成为当今博物馆诸项职能中的首要职能，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组成部分，凸显其教育功能也不应例外。在公共教育方面，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有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不同的优势，如对某一具体名家的研究的精深化，但劣势也很明显，如资源的单一化。因此在公共教育方面，如何避免劣势，扬长避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拟以吴昌硕纪念馆等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为例分析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形式及存在的短板，并就如何发挥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自身特色，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方式做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书画名家纪念馆 公共教育

一、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现状

所谓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就是以某个书画名家的艺术品的收藏为基础，建立的以研究、陈列、传播馆主艺术道路和艺术成果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性艺术博物馆〔文化机构（场所）〕。全国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基本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陆续成立，发展到现在数量庞大，隶属于不同的体制，有政府主办的，有官办民营的，有独立民营的，有文博系统的，有美术系统的，有文联系统的，有隶属高校的，有隶属模糊的。在这之中，1994 年，潘天寿纪念馆、朱屺瞻艺术馆、黄宾虹纪念馆、吴弗之纪念馆四家书画名家纪念馆发起成立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从 1995 年的 15 家发展到 2015 年的 24 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近现代名家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等尽在其中。本文的纪念馆（艺术馆）主要以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的成员为分析对象。

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一样，书画名家纪念馆（艺

术馆）的职能也逐步从以前的以收藏、研究为中心转向以教育（公共教育）传播为中心，即“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中心”转变。在这过程中，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每个馆的体制、规模、运作模式、所处地域均大有差别，在实施社会公共教育方面表现参差不齐，有的可以与综合性博物馆、美术馆相媲美，有的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总体来说，目前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主要由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 长期教育

以馆主艺术人生轨迹、作品的阵地展示教育为主，长期向所有公众开放，教育手段主要采用讲解、导览、宣传册、作品集、视频拍摄等方式。

2. 阶段性教育

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开展馆主纪念活动，围绕馆主的艺术成果进行学术研讨活动，收集资料、研究新成果，征集藏品、出版文献等唤醒人们的记忆，弘扬名人为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以临时展览为媒介举办书画艺术展览和



交流,并举办配合展览的艺术教育活动,如讲座、研讨会、艺术课程、志愿者参与等,吸引公众走进纪念馆。

3. 推广教育

走出馆舍,走进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教育活动,设计教育项目,扩大馆主的对外影响力。

从教育方式来看,与目前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基本类似。

二、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短板及原因分析

虽然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在现有的教育方式上为扩大馆主影响,传承书画艺术和地域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照目前整个博物馆系统不断突出教育功能、加强公共教育的趋势,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特点,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教育还存在许多短板。

1. 教育资源的局限性

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一样,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资源同样立足于馆藏,以馆藏馆主的书画艺术作品(有的馆加上馆主收藏的艺术文物)为基础,辅之以生平研究文献资料等构成,名家馆一般是在书画名家的个人捐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美术馆),馆主生前捐赠或家属在其身后捐赠是主要藏品来源。如吴昌硕纪念馆以其后裔 1964 年捐赠的 70 余件吴昌硕作品及文房四宝、印拓、信札、出版物等为基础,湘潭齐白石纪念馆以齐白石家属捐赠的齐白石作品、画稿、印拓、图片、早期出版物几千件等为基础,潘天寿纪念馆是以 1984 年潘天寿家属捐赠的其 120 件作品为基础。它的特点鲜明,即可倚赖馆主的作品、文献资料做集中的、长期的书画名家个案研究,研究可体现连贯性和递进性。但与综合性的博物馆(美术馆)相比,其藏品数量少、结构单一,自身的研究不断遭遇材料资源短缺的瓶颈,加上经费和其他

条件的限制,对藏品展览和研究造成很大的制约。如笔者所在的吴昌硕纪念馆,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其后裔捐赠的一批文物及建馆征集的近现代名家的作品之外,50 年来没有增加一件馆主作品,直到 2013 年其后裔捐赠了 10 余件馆主作品及用品和出版物等文物资料。没有新作品,展厅里永远就以那么些作品示人,容易让观众产生疲倦心理。

2. 教育题材单一

相对于综合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来说,无论是馆藏资源的种类还是数量,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都无法与它们相比,触及的广度和深度也无法与它们相比,因此资源的单一导致教育题材相对单一,除宣传名人的艺术追求、成长足迹、作品研究外,施展的空间相对较少,不具有综合性的博物馆(美术馆)那样的广博和时代跨度。

3. 阵地教育形式陈旧

与其他博物馆一样,公共教育的主阵地是展厅的陈列展览。由于是单纯性的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在对社会公共展陈时,基本上由三个展厅组成,第一个是书画家生平陈列展(名称各异,内容相同),是面向观众的常年基本陈列;第二个是馆藏作品展,也基本上是常年陈列,定期或不定期更换作品;第三个是临时展厅,作短期书画交流展览时使用。由于基本陈列最体现纪念馆的研究陈列水平,所以大部分名家馆的基本陈列展线较长,以文字、图片、实物、情景模拟等体现,规模大、内容庞杂,展品介绍说明深奥、枯燥,参观时间长,观众容易疲倦,如吴昌硕纪念馆展线 470 米,完整参观至少一个小时,除少量专业和感兴趣的观众之外,其他观众都没有耐心坚持全程看完。

4. 临时展览的尴尬

通常临时展览是基本陈列的必要补充,通过临时展览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纪念馆,接受书画艺术熏陶。但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年的临时展览活动可谓不少,预期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除了开幕式时的一时轰动,人员聚集,平时基本门可



罗雀,除了旅行团队游客走马观花,很少有人安静地欣赏。如吴昌硕纪念馆2014—2015年共举办临时展览20次,有本地书画家、外地邀请、名家引进展、交流展等等,但每年只有6万~7万人走进纪念馆,观众总量偏少。

除了引进规格高一些的展览有配套讲座、研讨等教育形式,大部分临展没有策展思路,没有现场讲解,没有导览,质量参差不齐,类型单一(书画展览比重大)。

5. 对外教育难于延伸

由于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通常位于名人的出生地或常年居住地,于是便成了馆所在区域的公共文化机构,因此走进社区、企业、学校进行名人艺术成就宣传、名家作品介绍也成为对外教育的延伸。一般以讲座、流动展览、发放册子等形式进行宣教,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灌输式的教育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对已经形成稳定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成年人来说,一味地灌输似乎令人反感;而对于没有经过艺术史和审美训练的中小學生来说,又显得深奥、乏味、无趣。对书画类纪念馆(艺术馆)来说,目前体验式教育也只限于绘画临摹、儿童艺术鉴赏、儿童绘画创作等等,而这些适应低龄儿童的体验活动所在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各种课外培训机构更为系统和活跃,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优势并不明显。进社区主要以老年对象为主,缺少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

6. 空壳化现象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大多位于馆主的家乡,纪念馆往往成为地方文化品牌、地域文化实力的体现,因此,特别是由政府主办的纪念馆,往往被赋予了多种身份和功能:文化品牌、对外宣传的窗口、旅游文化景观、群众文化场所。往往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完成场馆建设之后,注重名人文化带来的边际效应,期望带来旅游和经济效益,重宣传大于教育,重建设轻研究,加上经费缺乏,专业人员配置不足,纪念馆教育和研究功能被忽视,纪念馆仅仅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休闲场所。

7. 大众艺术教育的公益与市场盈利的矛盾
有的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担负着地方美术普及教育的任务,利用自身馆藏资源的优势,对大众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但由于博物馆的“非营利性”性质,所以只能从事公益性的讲座、体验等短期的教育活动,以一次性的主题性的讲座为主,而不可能对观众进行系统的专业免费培训或训练,从而使得教育效果停留于表面甚至流于作秀的形式。

三、加强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 公共教育的思考

1.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需定位准确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既不同于博物馆、美术馆、画院及其他类型的纪念馆,但又兼具博物馆、美术馆、画院等多种功能,有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功能,又有美术馆的展览美育教育功能,同时又与其他类型纪念馆一样具有纪念功能,又具有地域文化特点,与各种商业性的美术馆、画廊相比,更注重文化的传承。所以,如果没有准确的定位,就会无所适从,左右不是,陷入发展的迷茫。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主要以保护、传承传统书画艺术为目的,馆主在其艺术道路上的成就是其在民族文化中定位的依据。所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对名家艺术成果的研究和传播,以客观、理性角度评价,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是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定位所在。坚守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地域文化是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职责所在。如潘天寿纪念馆的定位为“潘天寿研究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和集合者”,“发挥校园名家纪念馆的育人功能,促进高校文化建设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山东潍坊的郭味蕓美术馆“要为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一个展示、交流、学习和研究的平台,打造郭味蕓研究中心、潍坊画派研究中心”等等。



2.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需凸显特色

名家馆馆主既有共性的地方，即都是书画名家，但又各有所长，涉及民族艺术的多个方面（或书法，或绘画，或学识及著述，或几者兼备），因此在教育上发挥特色是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教育的优势。应该突出馆主个性、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家庭环境、所走人生道路对其成就的影响，艺术成就与时代的契合，展现每位馆主的精神风貌。如吴昌硕纪念馆，全国至少有四个纪念馆（室），而在吴昌硕家乡的吴昌硕纪念馆在教育上突出馆主与家乡、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对后来成就“诗书画印”熔于一炉的艺术成就的影响，揭示地域文化传统对个人成长的关系，并通过藏品研究、藏品及资料征集、文献收集等使吴昌硕纪念馆成为吴昌硕研究资料中心。

3.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需注重创新

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共存，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使得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画艺术越来越边缘化，看不懂、与现实生活不紧密等使得大众很少走进美术馆（艺术馆），或匆匆而过、走马观花，这就需要在教育方式上有所创新，创新是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教育的活力。人们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展陈方式、诠释方式同样需要与时俱进，要寻找与普通大众审美相契合、与时代变化相契合、与不同层次观众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不断挖掘新的素材，开辟新的视角，借助新型传播媒介（数字博物馆、网络课堂、通过互联网共享博物馆资源等）、衍生品开发进行推广活动和研究，才能使名家馆生机勃勃，逐渐形成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美术馆）。在展

陈方式上，寻找让普通观众接近大师、读懂大师的教育形式，教育的真正目的就达到了。

4. 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的教育需加强学术研究

藏品是基础，教育是灵魂，而学术研究是血液，是名家馆教育的支撑。只有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教育才能有新内容，才能绵延发展。要研究藏品、挖掘藏品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加强对馆主资料的收集、整理、评价和相关书籍的出版工作，只有持续不断地研究，才能不断充实馆主的文化形象及对后世的影响，促进大众对馆主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5. 发挥临时展览的作用是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教育的补充

临时展览的选择要有标准和门槛，不是眉毛胡须一把抓，只要是展览都往展厅里放。要不离馆的职能定位、围绕馆主精神的展览，才能起到传承作用。要研究观众的学习需求和心理，不能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展览内容和活动策划要能反映或联系当下社会现实，让公众通过艺术视角关注现实，为观众提供学习和体验的环境。

（邱晓云：吴昌硕纪念馆书记、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 [1] 中国书画名家馆联合会编、卢炘主编：《中国书画名家馆论坛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5 年版。
- [2] [英] 海茵著，李中、隋荷译：《学在博物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年版。
- [3] 胡清媛：《中国博物馆艺术教育现状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年。



浅谈博物馆讲解员能力结构

张 玲

(赵尚志纪念馆 辽宁朝阳 122000)

内容提要: 随着时代的转变、科技的发展,讲解员的能力结构也由单一的学历补偿型向能力本位型做出战略性的转移,讲解员能力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建构合理的、优化的讲解员能力结构,探讨其能力培养问题,已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以时代为背景,结合博物馆自身特色,建构了讲解员的能力结构,并结合当前博物馆讲解员现状,探索性地提出了提高讲解员能力的基本途径,希望有助于讲解员不断完善能力结构,加速自我成长的步伐。

关键词: 博物馆 讲解员 能力结构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作为宣传教育机构,博物馆必须发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负责讲解工作的讲解员是博物馆与观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博学多能的文化的传播者,因人施教教育的创造者,服务观众的使者,名副其实的博物馆的代言人,在博物馆与社会大众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讲解员的讲解是博物馆中一项特殊的工作,面对成千上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要求讲解人员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具有一般能力,而且要具备适应讲解需要的特殊能力,或叫基本能力,即讲解员的讲解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各种能力并非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一、博物馆讲解员应具备的能力

(一) 讲解员的讲解能力

讲解是以陈列为基础,运用科学的语言和其他辅助表达方式,将知识传递给观众的一种社会活动。可以说讲解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教育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观众对历史古迹及自

然奇观的了解和欣赏水平^①。讲解员则是博物馆和社会大众的灵魂联结者,是博物馆的一张活名片,讲解服务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参观群众的受教育和参观质量。因此,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影响着博物馆的窗口形象,甚至影响到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为了搞好讲解工作,提高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水平,必须培养一支专业化、具有广博的业务知识的讲解队伍。

讲解员的讲解能力主要包括注意力、解读能力、感知能力、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要善于激发观众的思维活动,诱导他们根据讲解的线索进行独立思考。讲解员应善于向观众提出各种问题,让他们把已有知识与讲解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讲解员的讲解要有说服力,使观众确信讲解内容的真实性。讲解还要有感染力,不仅要从事理智上影响观众,而且要从情感上感染观众。讲解时的语言要清晰、简练、准确、生动,既有严密的科学性、逻辑性,又要通俗易懂。讲解是通过言语行为实现的,因而对讲解员的讲解言语有较高的要求。讲解员必须用合乎语言规范、准确的词汇及清晰的发音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讲解过程中,使用悦耳的声音、通俗的语言、诚挚的感情、有针

① 隋然:《浅析博物馆讲解艺术》,载《赤子(上中旬)》2016年第18期,第171页。

对性的讲解来与观众交流、沟通，使观众得到知识的升华和审美愉悦的享受。

（二）讲解员的教育科研能力

教育科研能力是指把教育科学研究的知识运用于教育科学研究的情境，解决相应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是一种高级的、来源于讲解实践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进入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免费向世人开放，这是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机遇。各个博物馆应该大力提高讲解员的综合素质，努力扩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在提升讲解员业务素质同时，还要不断提升讲解员的教育科研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为自己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提升博物馆讲解员的教育科研水平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博物馆要发挥教育功能、提升竞争实力，就要及时正视讲解员队伍的建设，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充实讲解员队伍，不断提高讲解员学识素养，充分发挥讲解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讲解员的教育科研能力，更好地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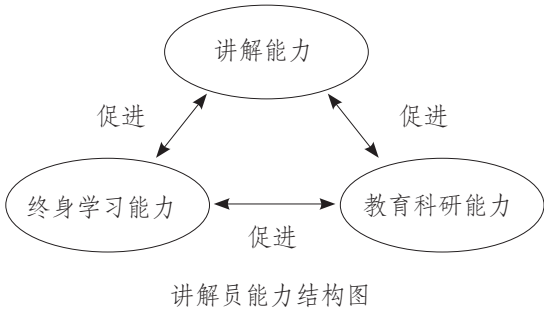
（三）讲解员的终身学习能力

“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和技能，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和任何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这一理念，受到全世界的广泛支持，终身教育是科技发展的需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前，博物馆发展形势非常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讲解员队伍，努力扩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终身教育思想是终身学习的理论源头。很多领域都将终身学习推入实践，成为未来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博物馆讲解员也要在职业生涯中，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与机会加强自我学习，实现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我素质，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

二、博物馆讲解员各种能力的互动
（能力结构）

系统论的整体原理认为：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各个作为系统子单元的要素一旦组成系统整体，就具有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系统的质的规定性，从而表现出整体的性质和功能。整体结构的作用不再等于部分相互作用的简单叠加，部分不可能在不对整体造成影响的情况下从整体之中分离出来，各个部分处于有机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每一个部分都影响着整体，反过来整体又制约着部分。

讲解员的能力结构是讲解员的各种能力按照一定的程序排列组合而成的。各要素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体现出讲解员的整体能力和应有的功能。讲解员能力结构各要素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个结构图说明了讲解员能力这个整体或系统是由讲解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三个要素（部分或子系统）构成的，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讲解员的能力结构中，各要素都具有各自特殊的功能，都是彼此可以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但它们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构成讲解员全面能力的统一整体。而各要素在讲解员的整个讲解活动中，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讲解员讲解活动的基本领域和基本模式。

一方面，各种能力之间彼此存在着交叉、渗透



和包容关系。例如，讲解员的科研需要在讲解过程中选题，如若想完成这一课题又需要不断地查阅资料、不断地学习，而科研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讲解，提升讲解员自身的讲解能力。各种能力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学习、讲解、科研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讲中有研、学，学中有讲、研，研中有讲、学，是讲解能力发挥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从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来看，彼此间又各有特点，各有区别。讲解员的讲解能力被放到最高的位置，是因为讲解员的讲解能力是讲解员能力结构的灵魂、核心，是讲解员能力的主体；终身学习能力是讲解能力的基础是基本条件；教育科研能力是讲解员必备的素质，是讲解员的高级能力，是展示讲解员能力的重要内容。讲解员的能力构成要素，是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内涵的对立统一体，只有达到辩证统一，才能实现讲解员能力结构的协调发展。讲解员的讲解能力有赖于讲解经验的积累，但是不能仅仅依靠经验的积累，而应该主动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自己的讲解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讲解员具备教育科研能力对促进讲解的科学化、提高讲解员的讲解能力和讲解质量有积极的意义。终身学习能力、教育科研能力是讲解员讲解能力的左膀右臂，为讲解能力提供能源及动力，是讲解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的能力，缺少了它们，讲解员的能力不但是残缺的，更会影响讲解员讲解能力的质量及其充分发挥。因此，终身学习能力、教育科研能力是具有时代特点的能力，它们和讲解能力共同构成讲解员能力的完美整体。

讲解员能力的育人功能是巨大的，要想使讲解能力在提高讲解质量方面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必须依靠讲解员主观能动性（自系统）和客观环境条件（他系统）两方面的积极支撑，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妨碍讲解员积极性的发挥。因此，研究讲解员能力，不得不研究讲解员能力发挥的主客观因素，不得不注意讲解员内因和外部环境的协调。

（一）讲解员能力发挥的内在因素（自系统） 要搞好讲解工作，关键在于讲解员内在因素的

发挥。而影响讲解员能力发挥的内在因素就是是否有稳定的自我观念及提高自身能力的意识。

稳定的自我观念，是指讲解员对其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具有正确、适度的认识。如若讲解员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他就能更好地且更有效地适应参观群众、同事、上级及社会对他的期望。对于讲解员，这种稳定的自我观念尤为重要。目前人们对讲解员普遍存在偏见，认为讲解工作就是要求长得漂亮，单纯地背讲解词而已，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予重视。这给讲解员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影响了他们的从业心态，久而久之使讲解员的自我发展的意识退化了。这样势必会引起讲解员的自暴自弃，随波逐流，放弃职责。因此，讲解员一定要有稳定的自我观念，即讲解员自身的努力，坚信讲解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要有坚持完成讲解任务而奋发进取的决心和行动，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对工作总是充满信心。而这种努力是植根于对讲解事业的忠诚，发源于对社会大众教育的高度责任心的心理品质基础上的。稳定的自我观念影响着讲解员能力的发挥，缺少这一条，讲解员就难以专心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讲解能力。

（二）讲解员能力发挥的外在因素（他系统）

讲解员的能力能否真正地发挥出来，这既取决于前面谈到的讲解员的内因，也取决于外因，即能力发挥的外在条件。历史和现实证明：成功者大都得到了一个好的机遇，是成长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的环境中的幸运者。因此，社会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讲解员，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1. 经济方面

讲解员能力的发挥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因为讲解员的状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讲解员很多都是外聘人员，就业得不到保障，很多人认为讲解员是吃青春饭的，把讲解这个职业当作跳板，留不住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单靠博物馆和讲解员个人是无法改变的，这需要国家加强投入，解



决讲解员的后顾之忧。

2. 社会方面

我们应该大力加强社会对讲解职业和讲解员的重视程度,提高全社会对讲解员的关注程度,从思想上、待遇上给讲解员以满足、支持。从而使讲解员从关注自身中脱离出来,转而关注参观群众、关注讲解,并不断改变和完善自身的教育思想和讲解的能力。

三、博物馆讲解员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一)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江泽民同志在 1997 年年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经验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多得很。无论是谁,只要停顿下来,不学习新东西,肯定是要落伍的。^①今天,世界演变如此迅速,以致讲解员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在学校所学的对他们的讲解工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整个在职期间更新知识。作为一名讲解员,需要改变传统的讲解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思想,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做终身学习的先行者。向书本学,向观众学,保持最佳的学习状态,学会多思多问,做到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每一位讲解员都必须具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不断提高自我素质,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术,更新自己的讲解观念、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使自己的讲解观念、知识体系和讲解方法跟上时代的变化。终身学习能力既是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对讲解员提出的要求。

(二) 集体讲研及讲解研究

博物馆自身的特色要求讲解员能够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合作来扩展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而新时代,对讲解员的合作与交流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长期以来,讲解员形成了单兵作战的特点,缺乏讲解员

之间的合作和应有的交流,这种状态不仅制约了讲解员的发展,也制约了博物馆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讲解员加强集体讲研活动,实现讲解员、馆际间紧密合作,通过讲解员之间的集体讲研活动提高讲解员的教育科研能力,同时带动讲解员讲解能力的提高与变化。

1. 新老互助式的集体讲研

在讲解员进行集体讲研的时候,可结成帮讲对子,进行新老搭配。新讲解员给讲解员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有旺盛的精力、先进的理念、活跃的思想、满腔的热忱和十足的干劲儿,可他们缺乏经验,能力有限,往往在讲解中急躁、焦虑不安。新老搭配这种集体讲研方式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老讲解员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给予耐心的指导和帮助,使得新进讲解员可以尽快地把握讲解的基本要领。新讲解员还可以通过听讲解、研讨等方式,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讲解特色。而那些老讲解员虽然经验丰富,但却缺乏创新,有一些讲解员还满足于自己的经验积累,他们可以通过新老互助式的集体讲研,学习新的讲解理念,更新自己的讲解思想。总之,通过新老互助式的集体讲研,讲解员们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以老带新、以新助老,新老共同进步、提高讲解能力。

2. 讲解研究

讲解员会在讲解过程中产生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讲解员进行教学研究的源泉。这些问题不但给讲解员研究提供了机会,也给讲解员自身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提供了空间。笔者认为,讲解研究应及时和自觉,只有这样才是有效的讲解研究。这一点对于从事讲解工作的讲解员来说更为重要,针对不断产生的问题,把握不断研究的机会,才能不断使自身的能力有效提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解员不但要反思自己在讲解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反思他人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讲解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对同

^① 《江泽民在 1997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施工企业管理》,1999(5): 39 ~ 40



一讲解内容，不同讲解员的讲解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也会产生不同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自身能力的提高往往会有很好的效果。

（三）在职学习与进修

所谓讲解员进修，从本质上说，就是以讲解员的经验、认识为媒介的“学会讲解”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讲解员进修不但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讲解任务，而且有助于讲解员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博物馆讲解员要在讲解观念、讲解内容、讲解形式、讲解手段和讲解方法等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跟上社会需求的步伐，就必须通过不断的进修，以使自己在上述方面不断更新，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提高讲解的质量。由此可见，讲解员的在职学习与进修是全面提高讲解员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职进修属于学历后的继续教育。它以深化历史专业水平、提高讲解员的讲解和研究能力为主要目的。这样的进修既要满足当前讲解的需要（如知识欠缺、更新等），更要着眼长远，从根本上提高讲解员的素质。讲解员进修的主要内容有：研读史学名著和史家学术论文；探讨优秀讲解员的讲解经验；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通过对以上内容的进修与学习，有助于丰富讲解员的专业学识；有助于提

高讲解员的讲解能力；有助于提高讲解员的教育科研能力。

博物馆讲解员的进修与提高是件长期乃至终身的任务，一般可采取在职提高和脱产进修两种途径。在职提高可充分利用讲解之余有针对性地查阅有关的历史资料，阅读反映博物馆及讲解最新科学理论的书籍，填补自己知识的空白点；脱产进修可以回到高等学校专门攻读某些课程，使自己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大量补充更新各种知识，全面提升自身素质。

博物馆讲解员还应定期参加培训，让自己成为一名具有较强能力的讲解员。在培训中系统学习讲解的新理念、目标、内容，提高自己驾驭讲解的能力；探索符合时代的讲解模式和方法。经常参加专家讲座、进行小组交流、合作研讨、现场观摩，为自己提供实践、研修、交流的机会。通过定期参加培训，广大讲解员的各项能力可以获得较大的提升，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综上所述，作为博物馆讲解员应该转变观念，不仅要注重包括业务知识在内的多方面能力素养，还要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工作与生活中，不断提升自我多种能力，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服务。

（张玲：赵尚志纪念馆副馆长、文博馆员）



新形势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实践与发展

——以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为例

贾洪瑜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 江西南昌 330046)

内容提要:烈士纪念设施承载着“褒扬先烈,教育群众”的社会责任,自2013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烈士纪念工作。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作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直接服务社会。在陈列布展、社会教育、人才培养、建章立制和志愿服务等方面率先进行创新实践,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全省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发展,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关键词:烈士纪念设施 实践 发展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始建于1952年,位于南昌市八一大道399号,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民政部、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5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文明抚恤事业先进单位”,在全国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单位中有影响、有特色,为深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基本陈列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形式丰富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坚持“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宗旨,定位于:纪念革命先烈的重要场所,收集、研究、保管革命烈士史料的重要机构,弘扬、深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已成为省市党政部门、驻昌部队、大中专院校、有关社会团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各种主题鲜明的纪念活动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已接待国内外观众共2000多万人次。

2006—2008年筹集资金1400万元,历时3年完成了基本陈列升级改造,陈展大楼建筑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内设序厅和8个展厅,展线长

1000余米,整个陈列按照革命历史时期顺序,分为6个部分18个专题,陈列了25万革命烈士的英名录,展示了赵醒侬、袁玉冰、曾延生、毛泽覃、方志敏等1642名著名烈士的英雄事迹,建立了目前全国烈士最多的资料查询网和触摸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展示了近现代江西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诗篇。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精神,无论是常设陈列还是临时展览在陈列方案的编写、形式设计到实物制作、展品布置等各个环节,都充分发挥“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服务功能,在主题创意、陈展设计上下功夫,使用吸引观众的展示方式和表现手法,增加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增强了陈列的可视性、教育性。做到人物与事件、专题紧密结合,陈列重点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内容编排上突出江西烈士大省、苏区大省的历史特点,使主题更加鲜明,线索更加清晰。在高科技手段、新的展示工艺运用上,因地制宜地选择现代科技加以运用,如运用幻影成像技术对五次“反围剿”进行情景再现,大型投影反映江西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诗篇,电视视频突出演示安源路矿运动、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红都瑞金、中央红军长征等重大事件,《十送红军》背



景音乐烘托出苏区人民母送子、妻送夫、父子争当红军的动人场景，方志敏塑像真实还原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英雄气概。基本陈列荣获江西省博物馆(2011—2013年度)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

文物保护工作以文物普查工作为契机，按规范要求基本到位。对建馆60年来1300多件馆藏藏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清点、大养护，为最终实现馆藏藏品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管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触摸屏烈士事迹查询系统拓宽了陈展空间，《红土魂——江西英烈网站》(www.hth.jx.com.cn)为社会公众开展网上交流、烈士查询、网上祭扫等活动提供了便利；建立微信公众号，引进微信语音导览服务，掌上纪念馆走进观众心中。

讲解工作坚持科学性、准确性和生动性的原则，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群体，对基本陈列设计编写多个版本的讲解词，认真解决好“因人施教”问题。尤其在编写未成年人讲解词时，避免单调的说教式，用故事性、趣味性、启发诱导式和问答式的语言增强学生理解和记忆，切实提高讲解的吸引力、感染力。

二、人才队伍建设目标明确， 培养机制灵活效果明显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2007年实行免费开放，不断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我们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力争中层管理人才“懂专业，会管理”，促进年轻人员脱颖而出，人才队伍形成梯度发展结构，培养机制灵活效果明显。

讲解员培养坚持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专业培训相结合。采取月度总结、季度考评、年终考核、笔试与观摩相结合，岗位练兵与外出培训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培养讲解员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工作习惯、学习氛围。在职业精神方面进行“四心”教育即要有一颗红心，培养讲解员喜爱红色文化，推崇革命烈士精神的政治品质；要有爱心，热爱烈士，热爱观众，乐于讲

解的情感品质；要有恒心，培养他们精进有恒、追求卓越的工作品质，鼓励养成一种干就要尽自己所能干得最好的心理惯性；要有耐心，对工作要能耐得住寂寞，对观众要能耐心做好说服工作，宣传好国家烈士褒扬政策。在职业技能方面通过普及业务基础知识、加强语言训练和礼仪礼节训练、参与讲解词写作、提高艺术修养、训练熟悉和处理突发疾病、突发事件等紧急事故的处理流程等方式，多途径全方位培养讲解员队伍的综合能力。积极引导、创造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机会，提高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2010年以来，先后派出专人对泰和、万载、吉安、永新、石城、兴国、赣州、抚州、南昌等地烈士陵园的更新改造和讲解员培训工作予以协助，既提供了相关技术支持，也锻炼了队伍。2014年以来连续三年配合江西省民政厅优抚处承办江西省英烈讲解员培训班和承担教学任务，从讲解礼仪、语言规范等方面对市、县讲解员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在江西省烈士纪念设施讲解员中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也很受欢迎，这支团队以其优异成绩荣获“三八红旗集体”光荣称号。2015年参加《全国英烈讲解员网络大赛》的四名选手分别荣获了江西赛区的一、二、三等奖，其中三名选手进入全国复赛获优秀奖。

在承担、协办《永保一湖清水——鄱阳湖图片展》《江西是个好地方》《江西方志展》《全国窃密泄密案例警示教育展》《江西省“三严三实”主题教育展》《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图片展》等专题展和江西省烈士公祭等大型活动中，单位的组织、讲解、服务工作均得到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编纂人员培养坚持知识培训、自主学习和相互交流有机结合。组织编纂人员参加全省民政系统烈士纪念设施单位编纂研究人员培训班学习，强化理论知识体系和业务技能；在日常工作中紧密结合编纂实际，边干边学，欠缺什么补什么，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同时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新四军纪念馆等同行单位观摩学习交流，到其他烈士纪念设施单位收集资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编纂人员积极开设专题展览，鼓励编纂人员开展专题调研。



充分挖掘、利用丰富的英烈资料和红色资源，狠抓“一个网站三本书”重点项目的实施。《红土魂——江西英烈网站》收录了 25 万余名烈士英名录资料和近 2000 名烈士事迹，提供在线参观服务，是目前全国展示烈士人数最多的烈士纪念网站；将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收集、整理、展出的同时，编辑出版《江西英烈谱》《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基本陈列画册》《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画册》，收录各类图片 2000 余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定期在“让烈士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报刊栏目上宣传烈士生平事迹，在实践中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三、落实免费开放政策， 主题教育活动精彩纷呈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学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再次成为党、政、军、学、社会各界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廉政教育的必选场所。2013 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8 号），社会各界纪念烈士的热情不断高涨，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氛围日益浓厚。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作为全国首批免费开放博物馆之一，坚决贯彻执行免费开放政策，在醒目位置做重点标示，无任何收费项目并保证服务质量。深入贯彻国办、中办及江西省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精神，加强组织领导，把社会课堂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与学校的走访与沟通，先后与南昌市第二中学、华东交通大学等多所学校签订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协议，共同拟订教学实践计划，协助共建单位落实教学计划，接待基地单位学员进行教学实践，与江西师范大学联合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井冈山精神》征文比赛。对未成年人实行了优先参观、优先讲解，提供适合未成年人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的展览导读，并从组织接待、讲解等方面作了相应的改进；连续三年以“走进无声世界，关爱聋哑儿童”为主题，走进南昌市启音学校，与聋

哑小朋友互动、交流，学习哑语，让他们在感受到社会温暖的同时，学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树立他们的自信心，真正把纪念馆办成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

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每年清明节“缅怀先烈 坚定信念”“五四成人宣誓仪式”“六一新世纪 我能行签名仪式”“七一重温入党誓词”“八一献身国防绿”“9·18 勿忘国耻签名仪式”“十一祖国，伟大的母亲，我爱您！”“12·5 法官宣誓日”等重大纪念日举行各种主题教育活动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在活动人员心间激荡。

2014 年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接待观众突破 5000 余人次，近几年参观观众年接待量达 60 万人次，与往年相比成倍增加，充分发挥了“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社会教育功能。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承办江西省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为了确保公祭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纪念馆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明确任务、合理分工、责任到人，精心组织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并做好应急预案。活动当天，全体人员提前到岗、备岗，检查落实公祭仪式各个环节到位情况，以一级接待标准，全力投入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各项工作中。烈士公祭活动开始后，按计划各就各位，分批次接待了江西省委四套班子成员、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少先队员和部队官兵等，讲解员根据成熟的讲解经验，能够较好地控制批次间距，做到互不干扰，以平等优质的服务接待每批观众，礼貌得体的接待安排，井然有序的瞻仰氛围，得到领导和来宾一致好评。公祭活动结束后，仍不懈怠，协力做好后续工作，为随后前来瞻仰烈士的观众提供洁净的参观环境，做好全天候讲解接待服务，全体职工毫无怨言，积极应对，服从工作安排，以实际行动践行“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工作宗旨。

四、建立志愿者队伍， 有序壮大健康成长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烈



士纪念工作的意见”精神，2014年江西团省委、少工委与烈士纪念堂共同协商如何在青少年中弘扬烈士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合作创办“红领巾讲解员”志愿者项目，专门编写适合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版讲解词，在南师附小试点，从小学四五年级学生中挑选讲解员，派人员进校园讲课培训、现场教学；培训合格的红领巾讲解员于每个周末下午在烈士纪念堂义务解说，孩子们绘声绘色的解说不仅锻炼了自己，也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小小讲解员实地讲解时，同学们不仅增强了自信心，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提高，社会、家长和孩子对这项活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每周末小小讲解员分批次来纪念堂进行义务讲解，如今已成为社会公益品牌项目。在2015年4月由团省委组织的以“点燃梦想·青春誓言”为主题的全省“00后”新团员集中入团宣誓仪式，6月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少工委、江西省民政厅、江西省科技厅、江西省科协、江西省文联、江西省知识产权局联合举办的“追逐新梦想，快乐共成长”——2014年江西少年儿童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等活动中，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活跃在红色文化体验现场，讲历史，忆先烈。10月12日，强卫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到革命烈士纪念堂来听孩子们的讲解，也是以这种形式，一起来庆祝少年先锋队成立65周年。强卫书记赞扬孩子们做了一件很有特色、很有创意、很有意义的事情，勉励同学们“坚定信念 树立理想 好好学习 脚踏实地”，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能为社会奉献的人，勇敢地担当起这一代人应有的责任与使命。这既是小小讲解员展示自己的机会，更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开展的“红领巾讲解员”志愿者活动的初衷就是“弘扬烈士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两年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见证了小小讲解员的成长，看到孩子们谈收获、讲体会更坚定了我们将持续开展的决心和信心。2016年进一步拓展与南大附小、《江西晨报》共建“红领巾讲解员”项目，举办英雄班集体开班仪式。校园培训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目前双休日全天候有“红领巾讲解员”活跃在讲解一线，孩子们绘声绘色的解说不仅锻炼

了自己，也促动了我们更好地实现社会教育辐射功能，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具体化、生动化。

五、不断完善规章制度， 努力争取资金支持

努力营造“制度高于一切”的管理氛围，进一步规范细化员工业绩量化考核、工作人员服务规范、工程及政府采购、专题展厅管理办法等单位规章。定期开展观众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对单位服务工作满意度调查。

对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办法完全依据财政资金使用规定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列支，纳入本单位部门预算全额统筹分配使用，并在每年年终结算中按功能分类科目以经济分类科目归类上报反映资金使用明细。

随着党和政府对烈士褒扬工作越来越重视，社会各界纪念革命烈士的热情不断高涨，前来参观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开展以来，观众量更是成倍增长，我堂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需要添置和增加许多项目资金的支出，我们努力争取上级部门支持，连续两年获得江西省民政厅优抚处专项资金支持。我们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程序和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做到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廉洁高效。先后完成病故老红军、老干部陈列室更新改造、配电房升级改造、增设全面布控监控设备、讲解语音导览设备、公厕装修改造等辅助工程，使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功能进一步完备。

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烈士精神，永远在路上！我们更应认识到在人才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文创产品研发、陈列展示更新等方面还要进一步努力。今后将坚定不移地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充分发挥纪念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出应有新贡献。

（贾洪瑜：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高金城舍身营救西路军有关情况探析

陈殿才 吴宏瑜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甘肃高台 734300)

内容提要: 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期间,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以在甘州开办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在险恶的环境里积极开展营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工作。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高金城和夫人牟玉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福音堂医院为据点,精心救治红军伤病员,千方百计营救被俘人员,先后有近300名红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得到营救收容和救治,在他的帮助下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关键词: 高金城 营救 西路军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他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医生,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共产党的事业,热诚地帮助共产党人。在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前往国民党马步芳军队血腥统治的甘肃河西后,他更是一名战士。在严酷的形势下,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采取各种方法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流落人员,为营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爱国志士的壮歌。本文拟就高金城先生舍身冒死营救红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的有关情况进行探析。

一、与河西人民的深厚情结

高金城曾先后两次来到甘肃河西行医布道,济世救人,深受河西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也与甘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17年高金城首次来到甘肃,先在兰州基督教内地会河北医院附属医学院行医、讲学,后遍游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行医布道,并在甘、肃两州开办了福音堂医院。他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由于常年接触群众,高金城对劳苦大众感情深厚,关怀备至,常常不收分文药费,

对远乡求医农民也常管吃管住。他不仅为城里人治病,还到乡间行医,并尽其所能为民行善。一次他到洞子渠、马子渠(现在龙渠乡一带)行医,看见农民用桶提水浇地,经了解,才知道地高渠道低,水灌不到地里,他当即给县长建议,动员群众修渠,县长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后修出一条数里长的水渠,龙渠从此而得名。高金城还派他的学徒到修渠工地给乡民看病,解决了农民的实际困难。当地群众为了感激他,给他送了两块匾,上面写着“济世救人”等赞词。高金城造福他人远近闻名,甘、凉、肃三州人民无不欢迎他,爱戴他。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经开封时,被留在当年学习过的医院帮助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正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战争,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金城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玉祥将军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病医院院长。战事结束后,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等与军阀马麟、马麒(马步芳之父)狼狈为奸,敲骨吸髓地奴役百姓,街头和狱中,伤毙者之众骇人听闻。高金城虽与那些上层人物相识,但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惩办肇事人,



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并以牧师身份到狱中为伤病者治疗。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吴桐仁等意欲镇压，高金城忍无可忍，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等人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还有一次，一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与道台齐连元合伙在上海做珠宝生意，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齐连元就依仗权势把马寿山押进狱中。马寿山借到福音堂听布道机会，向高金城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责问齐连元，要求恢复马寿山的自由。高金城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权贵们忌恨，他们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报甘肃督办刘郁芬和省长薛笃弼，意欲以死罪处之。后经友人营救，高金城获释，吴桐仁平素作恶多端，闻讯畏罪弃官逃往新疆。这个戏剧性事件，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佳话，“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群众中广为传颂。

高金城在河西大地的善行义举让河西人民对他有了深厚的感情，也正是基于他在河西大地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义无反顾地来到张掖开展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五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内在的、深刻的。同时，仁义之道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道德意识，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救死扶伤、济世活人，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高金城身上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护、收留、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原因之一。

1886年，高金城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忠厚侠义。少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房间，拾到一块金币，随即归还，高金城拾金不昧的美德受到赵立民的赏识。十三岁那年，高金城被

赵立民带到县城里的基督会学堂学习，并亲自教授英语。中学毕业后，又被送到开封英国人金存仁开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五年后，年轻的高金城学有所成，便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之后他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博德恩医院。他目睹了当地医疗条件的落后，巫神马脚利用迷信草菅人命，决意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和传教士，肩挑担子遍游河西走廊。

1933年冬，高金城再次来到兰州，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租赁了齐鲁会馆办起福陇医院。他医术精湛，思想开放，为人慷慨大度，很快博得各界赞誉。此时他思想激进，对宗教已表示淡漠，他提倡的“三自”（自立、自救、自养）创业精神，遇到基督教内一小撮人的反对，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代理人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串通一气，对高金城多方刁难，横加排挤，进而以“考核”“注册”为名，企图迫使高金城停业。1934年，曾在协和医院做护士长的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到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她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决心随丈夫造福甘肃人民。

在1937年营救失散红军的同时，高金城还配制了一些冻伤膏，派人走街串巷寻找冻伤红军，散发给他们，并购置许多布匹让人赶做一批衣服，发给收容的红军穿；来不及做就买些成衣。在甘州城里到处可见包括红军后代在内的孤儿浪迹街头，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十分可怜。出自寒门且仁义的高金城深感切肤之痛，他节衣缩食办起一所孤儿院，收容了三十多个孩子。

民族的气节、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情感、民族的愿望等组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们是民族的历史见证和发展脚步的痕迹。炎黄子孙在数千年的延续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熏陶。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文化才源远流长，才养育了像高金城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

三、对共产党人事业的敬仰和拥护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



解放这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吃苦在前，牺牲在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的这些优秀品质感染了高金城，使他义无反顾地拥护、爱戴共产党人，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

1927 年，高金城被省政府任命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 9 月，他随冯玉祥东征，为支持北伐战争，他把在甘州多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献给国民联军。1928 年，高金城随冯玉祥部到了郑州，在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仍任院长并兼孤儿院院长期间，他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人，并与吴波结成好友。他们的斗争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浦化人、余心清由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对高金城触动很深。他曾诚恳地问浦化人：“我听说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请你告诉我，共产党如何救国？”浦化人深感高金城爱憎分明，有民族气节，就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中国的前途讲给他听。后来朋友告诉浦化人：“高金城到处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好像拿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1930 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即赴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医生，潜心钻研医术。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略上海时，高金城参加了协和医院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在战火纷飞的上海，他遇到基督教中国内地会会长汤某（英籍），汤指责高金城：“你是以博爱为本的基督徒，不应该参加中日战争！”高金城怒斥汤某：“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抗击入侵者，你们与帝国主义一脉相通，侵略了中国，又互相袒护！”从此高金城认清了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上层人物，实际上是侵略者在中国的代言人。他决心做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但更要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国难当头，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作何选择？从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糊胡同 66 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反动军警搜查。

西安事变前后，高金城对吴波吐露了对时局看法：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十分不满，认为北伐以后蒋介石搞了十年内战，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暴政，镇压爱国运动。他希望主张抗日的将领冯玉祥等都能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如果这点不能做到，则希望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能和红军靠在一起，在西北创造一个新局面。他完全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而感到高兴。西安事变初期，他由于痛恨蒋介石，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以谢国人。后来听到我党为了团结抗日，主张和平解决，把蒋介石放回南京，他又十分激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这种高瞻远瞩、光明磊落的革命风度，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做到的，因此对我党更加敬佩。高金城常说，他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不反对共产党。他在冯玉祥部队工作时，曾认识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根据高金城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对时局的认识，说明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拥护和坚决支持的。

高金城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影响了他的家人。高金城的妻子牟玉光，协助高金城开展营救西路红军，为党做了不少贡献。牟玉光在高金城蒙难后，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对党的深厚感情，毅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觉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告诉她暂时留在党外继续为党工作更为有利。1980 年，已经 85 岁高龄的牟玉光再次申请，并经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刘亚哲是高金城的女婿，多年受到高金城的教诲和影响，高金城牺牲后他始终站在同情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给了我党和在新疆的革命志士及其亲属力所能及的帮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高金城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用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用他的生命和一腔热血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拥护和对共产党人的敬仰。



四、党的统一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典范

爱国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倡导、努力建成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达到了除汉奸以外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广大规模。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沿着蜿蜒的祁连山，向新疆远征。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浴血奋战半年之久，歼敌两万五千余人，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党中央及时通过外交、军事、统战等多种途径开展营救被俘和流落红西路军将士的工作。其中通过党建立的统一战线爱国民主人士营救被俘和流落红西路军将士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显著效果。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就地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南汉宸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甘肃河西和青海的西路军被俘人员。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回西安，同在西安负责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的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张文彬向吴波提出想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但因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外人进去站不住脚，必须找个理想的人完成这一任务。吴波当即推荐高金城。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政治上比较可靠；他是医院院长，又是基督教徒，在旧社会有较高的身份；河西走廊有他自己的医院，又是基督教堂，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高金城慨然允诺，接受党的委托。张文彬喜出望外，立即向周恩来、南汉宸做了详细汇报，得到同意。高金城深为这种信赖所感动。

随后，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与高金城晤面，进一步商讨来甘州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金城重新开设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并派红军老团长蔡光波协助，由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方便他来到河西营救红军。高金城诚恳地对谢觉哉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请您放心。”谢觉哉还叮嘱：“这是件困难而危险的事情，请你多加小心。如困难很大，就请撤回来，再做计划！”“谢先生，请不用为我担心，不把那边的事做完，我是不回来见你的！”高金城再次着重地表示接受委托。和谢觉哉会面后，高金城立即安置爱人牟玉光在兰州开设“牟玉光助产所”，作为西路军流落红军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联络点。这个联络点一再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提供信息，营救西路红军多人。

1937年8月13日，高金城和蔡光波沿着祁连山麓步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甘州。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们所闻，三州上下普遍敬重他，信任他，真诚地欢迎他的再次到来。高金城到达张掖后，立即以“河西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与国民党第一百师师长韩起功谈判，收回了他在张掖开办教会医院的房子，重新开办了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高金城还召集以前在这里培养的几个徒弟，以抗日救国大义动员他们回到了福音堂医院工作。

这时虽然已是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但是马步芳部队的反共气焰仍很嚣张，韩起功不久前还疯狂地屠杀了大批西路军被俘人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高金城在险恶的环境里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他通过看病联系被俘、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向他们传递消息，让他们设法去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以教会为掩护，收容、治疗失散的西路军伤病人员；积极配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上层展开营救工作。此外，高金城还凭着他在当地的声望，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同当地国民党、马步芳部政治官员及绅士接触的机会，赞扬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建议释放红军人员共同抗日，



争取更多的具有爱国良知的人救助或善待流落的西路军将士。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高金城和夫人牟玉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福音堂医院为据点，精心救治红军伤病员，千方百计营救被俘人员，先后有近300名红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得到营救收容和救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红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失踪”，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临时地下党支部决定分批撤离，刘德胜走时问高金城：对党有什么要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高金城被地方军阀韩起功残忍杀害，终年52岁。对于高金城营救西路军将士的义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同年年底，韩起功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受到了惩罚。1952年2月2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为高金城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高金城救助过的西路军人员从全国各地发来唁电，送来挽幛，共同缅怀这位爱国进步人士。革命烈士高金城的光辉事迹，就是党的统一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典范。

高金城和红西路军烈士虽已长眠地下，但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仍将影响并激励后人奋发图强。高金城的英雄行为，深刻体现着一切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崇高品德，体现

着中华文化最为优秀和最具刚性的血脉传承。他用宝贵的生命，写下了一部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给张掖人民留下了一座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敢于斗争的精神丰碑，将激励我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革命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勇往直前的气概、求真务实的作风，把革命先辈们历经千辛万苦缔造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奋力开创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陈殿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副馆长；
吴宏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1] 张秀玉：《我所知道的高金城一家》，见《祁连忠魂高金城》，高金城烈士纪念馆。

[2]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统战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郑仁泉、金士英：《为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献身的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见《祁连忠魂高金城》，高金城烈士纪念馆。

[4] 冯亚光：《西路军生死档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王劲、杨惠娟：《牧师医生战士——记为营救红军西路军英勇献身的高金城牧师》，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中）》。



纪念馆建设

纪念馆发展与管理创新

张 超

(郑州二七纪念馆 河南郑州 450000)

内容提要：纪念馆管理与发展联系密切，管理是方法，发展是目的。为研究纪念馆进步发展的方法路径，本文从明确纪念馆的发展方向目标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管理理念及思路创新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引导纪念馆探索适合自身文化资源特质，正确集约的发展方法与路径。本文以实际工作为出发点，创新联想，提出建立纪念馆发展评价体系，以学术研究促进纪念馆发展，纪念馆馆藏文物全民所有和建设纪念馆各项事务及对外服务标准化体系建立等观点，对当代纪念馆管理理念创新与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纪念馆 事业发展 管理理念 创新思路

把对纪念馆发展的认识与纪念馆管理创新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是因为笔者认为：纪念馆管理模式、方法与纪念馆主要工作板块的创新须为进步的，较之原来更优化的，而衡量其进步与否，很大程度上须权衡管理上的创新是否朝着纪念馆未来发展的远景目标迈进，有没有以纪念馆现实状况为出发点，以人们文化需求的变化为线索和指引，对纪念馆的体制与模式进行优化。管理创新的目的与纪念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方向、前景、目标保持一致，这类创新才是对纪念馆发展进步有价值的、有推动意义的创新。所以在对纪念馆管理进行研究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纪念馆的发展方向、目标及定位，客观科学认识纪念馆的发展，寻找适宜纪念馆发展的有效路径，建立纪念馆发展评价体系，引导纪念馆按照自身的文化资源特质构建适合个体发展的管理模式，理顺发展思路，从而建立起纪念馆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文化地位与自信。

一、纪念馆发展的思考

百度一下“纪念馆”，它的基本释义是：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机构。大多以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人物出生、工作、居住的地方为馆址……这个解释很简单，但传达出的信息既准确又

丰富。我国大多数纪念馆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是我党为记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凝聚炎黄后裔伟大精神力量而成立的文化集聚与传播领地。每个纪念馆都被赋予了保留、守护我国民族历史文化根脉，延续、发扬其内涵精神的历史使命。但目前，我国多数纪念馆过于程式化履行职责义务，主体工作缺乏关联延续，纪念馆事业缺乏长远规划，简单将纪念馆与博物馆事业混作一谈等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物质经济的富裕、信息资讯的革新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变，我们当前不得不正视纪念馆事业发展面临着尺度空前的转型。暂不谈国家从事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到文博事业强化发展的各类文件精神，当前我们最应该弄清楚的是要做什么样的纪念馆、纪念馆的文化定位在哪儿、发展资源怎样整合、路径如何选定等。这就要求纪念馆工作人员，思考纪念馆事业发展时必须具备前瞻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寻找适宜纪念馆本身发展的特色化方法和途径。

(一) 重视保护规划的编制和运用，是以历史建筑为实体的纪念馆对待事业发展的科学态度
纪念馆大多以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重要人物出生、工作、居住的地方为馆址，这些馆址大多属



于不可移动文物，已分别被各级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文保单位”概念的存在和纪念馆一样，是因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其重视而给予的称谓，成立的机构。国家和各级政府希望它们的保存都能启迪后人思想，激发后人民族情感，振作后人精神。那么以文物保护单位为场馆，或为纪念主体的纪念馆更应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

此类纪念馆（包含纪念性质的博物馆）在事业发展上，首先应以历史建筑（构筑物）的保护为己任，尤其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更应该科学地把当下的文物本体保护规划编制和使用放在文博事业发展进步的首要位置上，以其为指导、充分发挥它在纪念馆发展当中的权重地位，最大限度地保证规划的完整性与操控性，以此为基础，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是纪念馆在现代经济文化环境下赢得资源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每个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的编制都是以城市总体规划的下位规划——城市文化遗产遗迹保护规划为指导和依据的。而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台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识并利用这一点，发挥保护规划在此类纪念馆各项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对此类纪念馆发展认识的科学态度。

（二）明确纪念馆主要职能，逐步建立适宜我国纪念馆发展的评价体系

纪念馆（包括纪念类的博物馆）不同于地方博物馆，从字面意思上讲，纪念馆的职责是纪念，博物馆的职能是博物，我国多数纪念馆目前藏品状态不适应于我国现有博物馆的评价体系。虽然文物藏品是场馆各项工作的基础，但随着“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型概念的加入，纪念馆未来的发展逐步趋于多元化，衡量体系也应与时俱进，一味苛求藏品储量，单纯用博物馆定级标准作为发展目标的思路不可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文化的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纪念馆数量骤增，进一步明确“博物馆”与“纪念馆”的基本概念，研究其历史进程，总结发展规律，用以指导下一步工作亟待进行。伴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的下发，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征集被提到了文物行业的要冲位

置。而革命文物大多集中于纪念性场馆，无疑意味着纪念馆事业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机遇。当今，纪念馆应以场馆条件自身资源为出发点，趁势积极探索适应自己发展成长、成熟的道路。建立纪念馆自身发展进步量化考评标准，即纪念馆发展评价体系，对指导全国纪念馆事业朝阳、集约发展意义重大。

（三）创新思路构建体系，探索纪念馆事业发展路径

纪念馆事业发展评价体系的制定需要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里笔者仅对其谈几点认识。这里以当前纪念馆实际工作开展情况为基础，分三个层面构建纪念馆发展评价体系。

一是纪念馆应树立自身对纪念主题的权威性。包括纪念馆围绕纪念主题进行的馆藏、展示、社教及文化产品等各方面体现的全面性、翔实度、客观性等。

二是纪念馆围绕该纪念主题开展的研究深度广度与社会教育职能发挥程度。纪念馆较之博物馆更应深入对纪念主题的研究，因为纪念馆的主题是具象的、唯一的，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一座建筑、一种文化精神等。对这个纪念实体的深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一个地方博物馆对本地区文物的征集。纪念馆对主题研究得深、研究得透，研究得全国无馆、无人能及，可视同于地方博物馆文物藏品的最大化。因为地方博物馆做的是本土文化展示，而纪念馆在做展示、纪念的同时，将社会教育放在了整体工作的权重位置上。纪念馆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社教的基础资源。社教工作是纪念馆的重要板块，我们可从社教方式创新、成果展示、社会回馈、参与性活动组织等多个角度衡量。

三是纪念馆第三类文创产品研发工作在纪念馆整体事业发展进步中发挥的能效。通常在纪念馆中，我们认为展览是第一类产品；社教活动是第二类产品；文化衍生品为第三类产品。纪念馆文创产品即是文化衍生品，它将纪念馆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更多地转换为纪念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对其做评价更多的应关注市场，从受众的接受、喜好程度角度给出评价等。



二、纪念馆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首先要讲理念创新。转变办馆理念，从更有利于文物征集与保护、更有利于深度研究与创作、更有利于展陈与参观、更有利于社教与宣传等基本社会职能发挥的角度思考，在保持纪念馆纪念主体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举办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公益性，加大民众参与性，适应现代人民文化汲取与消费的纪念性场馆。这是新的经济文化环境中，我们纪念馆管理工作开展的宗旨与目的。

（一）求真务实，树立专业学术权威地位

纪念馆的纪念主题是纪念馆研究的直接对象，在此范围内或者以其为中心拓展出的更大领域，纪念馆的专业技术人员务必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不加保留地以展览、报告、学术论文、学术交流活动等形式展示出来，此举将是纪念馆扎实发展基础、夯筑纪念馆文化领地、获取业界发言权、赢得社会公共文化体系权威地位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以我国大多数纪念馆现状为基础，要想走上学术打根基、促发展的道路，首先我们应该踏踏实实讲学习，建立学习成绩、学术成果鼓励制。较之高校等研究机构，我国目前大多数纪念馆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平台与资源。线上我们应借助社会已有的信息传播技术，纪念馆自主获得知网、维普等大型学术期刊电子浏览权，广泛收集学习前沿科学技术；线下通过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形式联合相关机构与权威人士，通过定期的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纪念馆学术研究的发展。

纪念馆学术工作要讲联合。馆与馆之间要联合，工作人员尤其是技术人员也要联合，主张研究成果共分享，主动伸手帮学带。这里的“分享”与“帮学带”指的不仅仅是将成果简单共享，而主要是指思想层面的交流与探讨，每个人的岗位不同，受教育知识背景有差异，每个人要乐于将自身的想法观点表达交流出来，在纪念馆中建立公平和谐、相互促进的学习研究环境，彼此的交流与激励有助于纪念馆内部文化研究环境的形成和改善，这将会惠

及每位纪念馆工作人员，从而形成纪念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强化公益，倡导馆藏文物全民所有

纪念馆馆藏文物是纪念馆展览、研究工作开展的根基。随着文物价值观念在人们心里逐步被认可，文物或者老物件的市场价格在进入20世纪后飙升，纪念馆作为公益事业型单位，试图从文玩市场购买文物或是藏品等老物件困难重重。经费紧张、财政程序烦琐等，不利于有价值文物藏品的及时征集与保护。现状让我们认识到，除展出的小部分文物藏品外，纪念馆多数文物被收藏于大门紧锁的文物库房，不与人熟识，没有被二次发掘，没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文物本应有的观赏、艺术、历史、研究价值。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国民至今还未对纪念馆的公益属性产生科学全面的概念。纪念馆文物征集、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工作要发展进步，首先要呼吁建立纪念馆资源公众享有意识，文物保管人员即纪念馆工作人员要与全民之间建立起一种被认可、被信任的委托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要建立并不断提升文物藏品收藏保护的公信度，在整个社会形成与纪念馆相关的文物、藏品理应由纪念馆进行收藏，并且确保在纪念馆对文物收藏之后，全民公平享有文物的保护、欣赏、研究等多方面的权益，践行国有纪念馆内的文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应为全体国民，纪念馆工作人员仅为这些文物藏品资源的管理者这一科学态度。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纪念馆文物藏品征集、提高了公民参与纪念馆的程度，且更进一步使本行业的参与性、信誉、威望得到了最根本的提升。

（三）规范服务，构建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

纪念馆文化服务几乎囊括纪念馆对公众的所有服务，大致包括展览、讲解、接待、志愿者、咨询引导、文化衍生品等，还包括展厅环境、移动网络、基础设施、文化服务（交流活动）设施等。

建立纪念馆服务标准化体系。新的文化环境下，创新纪念馆管理，将企业中“标准化”管理概念引入纪念馆型的事业单位，建立起纪念馆文化服务标



标准化体系。体系对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出标准化指导。例如，讲解员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的穿戴、手势及必需的礼貌用语，反馈信息收集等；接待室每次执行接待任务应配备的所有物品器皿及摆放方式、数量等；还包括公共场所保洁工作标准、频率要求、检查机制等。各纪念馆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起适于纪念馆文化服务过程中使用的标准化体系，不仅有利于开展各项工作时对其进行指导，有利于纪念馆对外公益形象的建立，更有利于保持纪念馆文化服务的稳定性，有益于此项事业发展进步。

（四）科技融入，恰当运用信息传媒技术

纪念馆是社会文化的集聚地，它肩负着展示人类文明成果、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光荣使命。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人们的视、听、触、嗅等感官系统感受多样，甚至于已经疲于荧屏的闪烁与绚丽。在这种大文化氛围下，纪念馆要把握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与传媒技术运用的尺度，这是纪念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动作。

近年，纪念馆数字化建设发展如火如荼，面对社会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为纪念馆文化服务的形式比比皆是：网站、虚拟纪念馆、主题文娱游戏、视频宣传片等。在纪念馆文化服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斟酌通过网络给予公众的信息尺度，不仅要知晓纪念馆网络信息建设对文化服务的便捷，更要为纪念馆整体事业发展做考虑，认清网络技术在纪念馆文化服务中的作用。我们使用网络的目的是通过网络平台吸引更多的观众、网友走进纪念馆。在网络平台过于直接的展示将可能导致纪念馆实体观众量的减少。所以定位网络在纪念馆文化服务中的作用，大力宣传、适度展示，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纪念馆，身临其境感受纪念馆的文化魅力是我们使用网络的初衷，也是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纪念馆举办展览，运用媒体技术传播想要表达展示的内容时，也应根据展示内容和场

地环境需要，巧妙地与展览的艺术形式结合地去运用，摒弃场馆对屏幕、显示器的依赖，避免出现一个展览、一个展厅电子屏幕不分重点频繁出现，从头到尾全程互动的做法。全面了解现代科技发展，选择适合纪念馆运用的先进技术，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尝试，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使纪念馆文化产品科技融入宛若天成，恰到好处。

（五）多元发展，注重人才队伍专业结构

人才建设无疑是谈发展的关键。纪念馆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历史类、考古类、古建类、博物馆学、文物修复、展陈设计、文献资料、播音等专业学科人才均是纪念馆人才建设吸收新生力量的主流选择。多个学科人才共同合作，作为管理层应注重鼓励这些专业成果的获得，促进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融，在干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对这些高层次人才进行培养，建立“我为纪念馆，纪念馆为我”的互惠关系。

再者，纪念馆使用人才应倡导唯才是用。文化事业面临着空前的改革与机遇，人才的引进速度远不能满足事业进步与转型的要求。从事业发展角度考虑选人用人，在工作中培养人才是发展过程人力补给的重要渠道。在这里，纪念馆管理层要清楚地了解，谁适合干什么，谁喜欢干什么，根据职工特点培养愿意学知识、情愿贡献力量的干部职工。这些职工往往对纪念馆存有各种情结。其实纪念馆本可以视作是有历史有生命的“活物”，它纪念的主题与各类文物保护都有类似于生命开始、发育、兴盛到结束的过程，纪念馆内的一切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文物、文化工作者懂得其珍贵，很多人会对纪念馆、对纪念馆事业产生感情、情结，因此也会对纪念馆的发展贡献忠贞不渝，用这样的人，干他爱干的事，会赢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超：郑州二七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文博馆员）



名人故居类纪念馆的保护与利用

——以张学良将军公馆为例

邓普迎

(西安事变纪念馆 陕西西安 710001)

内容提要: 名人故居类纪念馆,就是以名人故居为位置载体,在名人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对与该名人相关的历史文物和其他事物资料进行收藏保管、陈列宣教和学术研究的机构。近些年,随着政府的重视,我国名人故居在保护利用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本文在简要分析我国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的现状的基础之上,以张学良将军公馆为例,阐述了张学良将军公馆保护利用的价值和意义,重点介绍了张学良将军公馆在故居保护利用方面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做法,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 名人故居 保护与利用 张学良将军公馆

近年来,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名人故居类旅游点逐渐兴起,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名人故居在现实中的保护利用也存在差异。以下,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以张学良将军公馆为例,简略分析当前名人故居类纪念馆的保护与利用情况。

狭义上的名人是指杰出的或引人注目的人物。一般来说,是指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医药等领域内,对人类及社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德高望重、享有很高知名度、深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缅怀和瞻仰,并以他们的事迹、成就和精神为动力,激励当代人们奋发前进的人才群体^①。名人故居,就是经过多方考证、证实在历史上文人墨客、政治家等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曾经生活过、工作过、居住过的地方。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各地的名人故居应该根据当地的特点来界定,名人一般是指已经故去的历史名人,名人故居则包括名人的出生地、祖居老屋以及名人长期生活居住过的地方。无论是后来借住、暂住、租住或购买、建造的房屋,只要在其人生经历中属于重要阶段的都可以被纳入到故

居的范畴之内。名人故居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名人故居和相应的古建筑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见证,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历史时期名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历经时间的洗刷依然记录并留下了这些人物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名人故居类纪念馆,就是以名人故居为位置载体,在名人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对与该名人相关的历史文物和其他事物资料进行收藏保管、陈列宣教和学术研究的机构。

一、国内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现状

名人故居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体现,保护好名人故居,充分利用名人故居这一历史文化资料对广大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人文教育,是我国文化文物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产权的混乱,致使部分名人故居在管理和使用上,引发了诸多矛盾。由于缺

^① 周振宇、周公宁:《杭州名人故居保护利用研究》,载《建筑学报》2003年第4期,第63~64页。



乏明确的法律、法规，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随意炒作以吸引眼球的所谓“名人故居”。现阶段我国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一般来说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利用，这一模式下的名人故居基本都保护状态良好。这些故居大都作为纪念馆、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让公众通过参观了解与故居内的名人以及故居建筑本身相关的历史文化，在开放利用中进行保护。第二种是作为办公用房，供机关、企事业单位使用，这种模式在国内很多大城市都存在，采取的是在利用中保护的方式。第三种是将名人故居开发成宾馆、饭店、游客接待中心等，这种模式目前比较受人推崇，可以为保护提供资金来源。第四种也是最不好的一种，就是处于无管理状态。这种模式应该是数量最多，很多名人故居因此变为居民住宅，生活气息浓郁，故居的原貌几乎消失殆尽。也有很多名人故居因此而惨遭破坏，荡然无存。相比较而言，第一种保护利用模式，不仅可以保护好名人故居原有的建筑风貌，还能不断扩展名人故居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名人故居的社会影响力，使名人故居在新时期的公众教育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下面，笔者以张学良将军公馆为例，浅谈名人故居的价值体现及对其进行合理保护利用的有效方式，不足之处，还望前辈同人批评指正。

二、张学良将军公馆保护利用的价值和意义

张学良将军公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5号，始建于1934年下半年，1935年秋竣工。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急调东北军入陕，10月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常驻西安”。张学良来到西安后，租用了通济信托公司刚刚竣工的金家巷5号。从1935年

9月租用到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在张学良将军公馆居住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却发生了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件——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公馆，恰在此时，由于张学良将军的居住，也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件的发生和解决。

（一）张学良将军公馆是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的见证地

张学良初到西安时，是坚决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战。”^①然而，就在张学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部队在和红军交战中，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东北军的失败让张学良“剿共”信心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蒋介石又趁机撤销其部队番号，减发抚恤金和军饷，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正如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所记：“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②张学良之前拥护的先“剿共”后抗日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当然，“剿共”战斗的失败并不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唯一原因。日寇对华北的步步紧逼、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呼声、中共的抗日政策的转变等都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而张学良将军公馆，正是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的见证地。

（二）张学良将军公馆是西安事变的部署地

1936年12月，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不满，张学良多次对蒋介石进行劝谏，都被蒋严词拒绝，在多次劝谏联共抗日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逼蒋抗日的共识，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就是在其公馆内，张学良分别召集东北军刘多荃、白凤翔、刘桂五等，向他们布置了“请

①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② 窦应泰：《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蒋”的任务。1936年12月11日晚11时以后，张学良在其金家巷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参加会议的东北军军政要员宣布了兵谏计划，几个小时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将军公馆，见证了张学良将军筹划、安排、布置东北军临潼扣蒋的全过程，见证了张学良向东北军各级军政人员发出扣蒋的命令，正是因为这些，使得张学良将军公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张学良将军公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谈判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国内外一片哗然。12月13日，宋美龄力排众议，致电张学良“端纳拟即日飞西安”。此后，端纳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挠，由南京飞往洛阳，次日由洛阳飞赴西安。端纳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在其公馆二楼的小办公室内接见了端纳。随后，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见到了蒋介石并且成功劝说蒋从新城迁到高桂滋公馆。12月19日，宋子文力排众议，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12月20日上午由洛阳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一行到达西安，在看望了蒋介石后，23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在张学良将军公馆西楼二楼会客厅进行了一次谈判。24日，谈判继续，并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在蒋介石被扣西安的十多天里，张学良将军公馆是张、杨、中共和南京方面的重要谈判地，正是在这里，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张学良将军公馆保护与利用的方法

保护，就是尽力照顾，使其不受损害；本文所谈的利用是指合理利用，就是使实物或人发挥效能。对名人故居进行保护利用，就是要使名人故居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不受到损害，使其发挥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张学良将军公馆，1982年，张学良将军公馆作为西安事变的重要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

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开始张学良将军公馆的调查、回收和保护维修工作，当年11月，张学良将军公馆正式移交西安事变纪念馆筹备处；1984年7月7日正式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负责管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和张学良将军公馆；1986年12月6日，在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将军公馆向社会开放，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馆名。1992年，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正式更名为西安事变纪念馆，所管辖范围仍然为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和张学良将军公馆；1997年，西安事变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4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张学良将军公馆在收归文物部门管理和使用后，在旧址的保护和利用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对张学良将军公馆进行全面维修，恢复公馆历史风貌，夯实保卫利用的基石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就再也没有返回过公馆。蒋鼎文到陕后，曾租用过张学良将军公馆居住。抗战中，张学良将军公馆又几易其主，主体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张学良将军公馆回收后，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即开始了对张学良将军公馆的调查和维修保护工作。通过深入调查，工作人员基本弄清了张学良将军公馆四周的情况，对张学良将军公馆周边的环境有了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依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张学良将军公馆进行了数次科学严谨的维修与保护。更换破损门窗、地板；加固墙体；揭瓦晾椽。根据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当时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尽量按照当时的风格对公馆进行布局，并邀请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张学良将军公馆”。经过几年的修整，公馆基本恢复了当年张学良将军在此居住时的布局。

2008年，在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中，又对张学良将军公馆院内北排平房进行了翻修，重新设计、建设了西大门，方便游客出入，同时对公馆内部环境进行了改造提升，使张学良将军



公馆作为文物主体的地位更加突出。

(二) 举办旧址复原陈列和主题突出的基本陈列, 丰富故居保护利用的内涵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纪念馆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名人故居类纪念馆建筑风格独特, 内涵丰富, 以此为依托举办复原陈列和基本陈列, 通过陈列将纪念馆的内涵传递给观众, 是名人故居类纪念馆的一大特色。早在 1983 年张学良将军公馆收归西安事变旧址筹备处管理后, 即搜集资料, 边维修边复原, 于 1986 年对外开放之际推出了“张学良将军公馆旧址复原陈列”和“西安事变史实展”, 由于当年的维修工作进度方面的原因, “西安事变史实展”开始安排在西安市东大街的美术家画廊, 第二年年年初迁至张学良将军公馆展出。此后, “西安事变史实展”经过多次调整充实完善, 一直作为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向公众开放。西安事变 60 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为纪念西安事变 60 周年题写了“西安事变”字幅, 并在调整后的陈列标题中使用。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纪念馆通过挖掘张学良将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及其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推出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该展览以 200 余张历史照片为主, 配以场景复原、历史影像资料、电子图表等多种陈列表现手法, 全面展示了张学良将军从主政东北的英雄少帅到西安事变兵谏救国再到之后的幽禁岁月的百年人生起伏, 讴歌了张学良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怀。此后, 该展览经过多次充实完善, 内容不断丰富, 一直作为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对外展出。这样就形成了旧址复原陈列、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和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陈列模式, 使旧址和图片、文物等达到较好的结合。

此后, 根据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 纪念馆对“西安事变史实展”进行了多次改陈, 改陈后的史实陈列, 在内容的翔实性、陈列布局的合理性、陈列手段的先进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提升, 并多次赴外地展出。2006 年, 西安事变 70 周年之际,

改陈后的史实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对外展出,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对基本陈列不断改进的基础上, 在场地有限、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纪念馆坚持举办各类型的优质临展, 根据不同的主题及时间节点, 举办相应的临时展览, 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1988 年, 纪念馆承办了“陕西省打击盗掘走私文物成果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 纪念馆一直坚持在办好基本陈列的基础上举办各类型临时展览, 丰富展出内容, 扩大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面。1996 年, 为纪念周恩来逝世 20 周年, 纪念馆举办了“人民的好总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大型图片展”, 还举办了“祖国的宝岛——台湾”展等。2014 年“七一”来临之际, 纪念馆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引进了“光辉典范——抗战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展”, 展出效果良好, 被西安市纪委、西安市监察院授予西安市廉政教育基地。

(三) 深入开展业务研究工作, 扩大故居保护利用的影响力

学术研究是纪念馆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性工作, 是衡量纪念馆知名度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开展业务研究工作, 对推进纪念馆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推动纪念馆各项工作的合理开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纪念馆从成立之初, 就十分重视研究工作, 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搜集研究, 为撰写陈列大纲提供历史素材。1990 年, 纪念馆组织业务人员赴北京、重庆等地征集资料照片 90 余份, 为基本陈列提供历史资料。此后, 又先后多次组织业务人员赴东北等地征集历史照片等资料。此外, 纪念馆业务人员还多次在各类型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出版专著, 对张学良、西安事变及张学良将军公馆进行相关研究, 为故居在保护利用方面提供学术方面的支撑, 扩大其影响力。1998 年, 纪念馆业务人员撰写的“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历史在这里转折——西安事变纪念馆》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此后, 又先后出版了《西安事变实录》《西安事变旧址研究》《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将领传略》及《走进西安事变纪念



馆——文物背后的故事》等专著。业务研究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故居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历史依据，为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物质和知识的材料，有利于故居的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扩大故居的影响力，使陈列有了历史依据，有利于深入挖掘陈列的历史内涵。

（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宣教工作，扩大故居保护利用的外延

收藏、研究和教育是公认的博物馆三大基本职能，宣传教育在当代社会中尤为突出，博物馆通过宣传教育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同时，也有效地展示了博物馆自身的魅力。

多年来，纪念馆一直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多次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对纪念馆进行宣传，扩大纪念馆的影响力。先后与多所大中小学签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议，成为共建单位。1997年6月10日，西安事变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14

年又被命名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近年来，纪念馆加大了与中小学互动的力度，连续多年坚持定期举办的“微讲座 巧动手 互动课堂”和“小小讲解员”夏令营，取得了良好的宣教效果。同时，还通过创建“流动博物馆”，深入到农村、社区、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宣教活动，拓宽宣教领域，提升宣教效果。

张学良将军公馆作为西安事变的酝酿及部署地、作为西安事变的重要谈判地，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标意义。今后，纪念馆将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搭乘我国红色旅游发展这一快车，加强对故居的保护和利用，致力于将张学良将军公馆打造成以展示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生平事迹为中心，集多种陈列展览和宣教活动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邓普迎：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文博馆员）



陈列设计

中山舰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实践与新思路

刘尔亮

(中山舰博物馆 湖北武汉 430208)

内容提要: 博物馆的展示分为陈列与展览,陈列是长期的,而展览大多为短期的。它们都是博物馆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当前陈列展览在内容与形式设计、社会推广方面遇到的问题,结合中山舰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的实践与经验,提出了相关的新思路。

关键词: 博物馆展示 社会推广 VR技术 众筹思路 社会贡献

一、陈列展览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博物馆陈列展览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笔者提出几点大家较少提及的问题。

一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内容与形式设计创新不足。策展人制度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布展环节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是学习西方博物馆的先进经验。另外在陈列展览中使用的声光电及场景复原等多种展示手段,也是照搬社会上成功的展示。由此可见,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一直处在学习的阶段,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二是博物馆陈列展览宣传推广能力不足。宣传推广是博物馆社会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物馆针对陈列展览的宣传推广极其有限,往往只是在开展时进行相关的宣传,缺乏博物馆宣传的长期方案。在宣传过程中,往往局限于信息的发布,新闻没有延续性及话题性,很难达到宣传目的。

三是缺乏多元化人才的引进意识。博物馆陈列展览从策划之初到成为实物展现在观众面前涉及许多行业。除了陈列展览中所需的展示规划、展示材料运用、空间与视觉的设计等方面的人才以外,还需要营销与公关、大众传播、文化创意、观众消费行为分析等方面的人才。目前博物馆有培养专业人才的能力,但很难吸引跨学科跨行业人才。

二、中山舰陈列展览的创新尝试

(一) 策展人的协调作用

陈列是长期的,陈列大纲及形式设计都要经过严肃的论证,而展览的内容与形式设计相对陈列而言更加灵活多变。在这里策展人制度就能够起到陈列设计的包容与协调的作用,有助于陈列展览的布展工作顺利进行。

中山舰博物馆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在2015年7月7日共同举办了《一个抗战老兵的百年故事——陈鸣铮将军文物图片展》。展览从筹备开始就成立了项目组,由拥有丰富陈列经验的专家担任策展人。项目组下辖多个小组,各小组分工协作,由策展人筹划组织协调展览的工作。为了方便日后展览的宣传推广,策展之初,我们就有了对展览的内容与形式的设计进行数字化处理的计划,同时利用720度高清全景、三维激光扫描、360度环拍等技术,将整个展厅制作成了数字虚拟展示场景。最后将虚拟场景上传到中山舰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在展览开幕时,数字虚拟展示同时上线网络,观众通过网络在线体验到整个临展。它实现了展览的永久展示,不会因为现场展厅的拆除而消失。陈鸣铮是一名抗战老兵,居住在台北市,曾在中山舰上参与了武汉会战。2013年10月26日,陈鸣铮与世长辞。中山舰博物馆在给陈老家人发去唁电的同时,向陈老的家人表达了征集陈鸣铮遗物



的意愿，得到了陈老家人的支持。这是中山舰博物馆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的抗战纪念物征集。1949年以后陈鸣铮在台湾当局工作，他的遗物有不少政治敏感信息。基于政治的考量，中山舰博物馆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系。经过了双方的磋商，我们对展览内容和展品的选择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策展人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个工作组通过策展人的协调，保证了展览如期开展。最后这次由中山舰博物馆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办的展览，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

（二）新颖的展示理念

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经达到4692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582家，非国有博物馆1110家。全国博物馆中有4013家向社会免费开放，每年举办陈列展览超过了2万个。博物馆陈列展览如何脱颖而出？这就需要展览的设计者的独具匠心的内容与形式的设计，能够配合日后的社会推广，同时社会推广要能够为广大观众展示出展览独特的设计，两者相辅相成才有机会让展览取得成功。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活动，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中山舰博物馆与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合作的《精神如见：中山舰出水文物》特展在新加坡举办。中山舰博物馆从打捞出水的文物中，选取了60余件（套）精品文物。展览以中山舰风雨历程为主线，介绍了中山舰百年来的传奇故事。展览主标题是“精神如见：中山舰出水文物”，寓意了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再现与传承。为了配合展览的宣传工作，展览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开幕式活动。新加坡文化部门官员、双方参展单位代表及社区观众出席了开幕式。纪念馆安排专题讲座，制订了周密的宣传计划推广展览，新加坡当地各大媒体和网络做了专题报道，展览在新加坡取得了成功。这次展览，让更多的新加坡观众了解了中山舰博物馆及中山舰出水文物，同时扩大了中山舰博物馆的影响力。在内容设计上，展览有明确的主题、清晰的条理。特别是在中山舰打捞出水的版面上，我们首次在临展中使用刻意放大数字的展示形式。中山舰的打捞工作历时

100天，工作组有潜水员8名，潜水水下工作时间1158小时，清除中山舰内的泥沙1500多吨。我们将这几组数据刻意地放大，在一巨幅版面上展示，通过数字最简单、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山舰打捞工作异常的艰苦困难。这种形式的设计，是美国苹果公司在新品发布会上经常使用的，后来国内电商纷纷效仿。这一设计体现了我们展览工作者海纳百川的学习态度与开放的互联网思维。

（三）新技术的使用

文物保护与文物展示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能够让来博物馆的观众拥有更好的展示体验，陈列设计者都会尽可能地把展品与观众的距离贴近。随着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来博物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博物馆参观的规定却知之甚少，经常出现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使用闪光灯拍摄文物、在展厅内喧哗、触摸破坏展品等现象在博物馆内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对文物势必产生损害。另外为了从侧面展示文物，在陈列的形式设计中运用了大量声光电等科技和场景复原手段，试图激发观众对文物的兴趣，但观众往往将焦点集中在科技上，忽略了文物本身。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展示体验，是摆在陈列工作者面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目前，中山舰博物馆对外开放了3个陈列，分别是中山舰舰体陈列、中山舰历史陈列与中山舰出水文物陈列。其中中山舰舰体陈列与中山舰出水文物陈列都采用了静态的展示形式。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中山舰舰体修复后，只能进行远距离参观，无法登舰，参观者只能通过观看影片和图片的方式了解舰体，而出水文物则是放在展柜中展示。2016年被很多媒体称为“虚拟现实元年”，虚拟现实技术就是人们口中常常提到的VR技术。这一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中山舰博物馆不能登舰和无法近距离地体验出水文物的难题。在2016年4月，中山舰博物馆与武汉光谷的一家虚拟现实科技公司达成了VR技术的开发协议，协议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我们选取了50件文物精品要求对其进行三维建模，并购买了5台头戴式VR眼镜，这样观众可以



通过佩戴 VR 眼镜对文物零距离地体验。该步骤预计在 2016 年年底完成。这项工作一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还原，二是为参观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在保护文物的同时，让参观者以重度沉浸式的体验来还原历史的厚重与真实，实现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展示教育的双重深刻意义。其次是在舰体陈列厅建一个中山舰 VR 体验中心，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震撼体验。最后是拍摄关于中山舰历史事件的 VR 技术影片，重现中山舰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成为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体验到中山舰的历史背景和时空的跨越。目前 VR 技术的硬件设施基本成熟，博物馆与高新企业合作开发相对应的软件，更好地为陈列展览服务。

三、陈列展览的新思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诸多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或是几点意见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文博工作者长期的努力。博物馆陈列展览如何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社会新环境中发展壮大，笔者厘清几点新的思路以供参考。

（一）陈列展览宣传的创新

过去的博物馆陈列展览推广，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上，即将陈列展览的相关信息通过报纸刊物向读者宣传。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自媒体的出现给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宣传带来了新的生机。许多博物馆都建立了网站，通过网站宣传博物馆；运用微信及时向观众推送信息；在微博上与博物馆爱好者互动。但是网络时代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是一个信息爆炸的领域，几万条信息往往仅一秒的时间就“石沉大海”。新的宣传概念与手段是在网络时代中保持博物馆展陈宣传推广生命的重要一环。

众筹在资本领域是一个较成功的模式，利用互联网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2015 年 9 月笔者受邀参加了在四川举办的博物馆论坛，在此期间参观了成都安仁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它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办博物馆。在当年的 8 月

15 日中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建川博物馆开放了侵华日军罪行馆。这个新馆采用的就是“众筹成馆”的概念，这个活动以预售建川博物馆纪念门票的方式筹集资金，大家参与共建侵华日军罪行馆。活动预售纪念门票款项全部用于侵华日军罪行馆陈列布展和补充文物。众筹模式，一方面筹措了部分博物馆布展经费，另一方面新兴的概念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给博物馆新馆展览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创新的宣传手段与新概念的运用，促进了展览的关注度，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观众心理的引导

在过去的研究中，不少的文博工作者普遍认为博物馆的营销是可行的。目前市场营销的理念已经从“以产品为中心”往“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交换是营销的中心概念，它要求给对方贡献出一定的价值，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价值。博物馆展示以不计成本的方式进行推广，显然是不符合营销的客观规律的。笔者认为通过社会推广让博物馆和参观者都有所得，这种双赢的局面是最稳定且长期的。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效用理论”。一般来说，物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而该理论认为，效用不同于物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物品所固有的属性，由其物理或化学性质决定，而效用则是消费者的满足感，是一个心理概念，具有主观性。物品之所以能成为用于交换的商品，原因在于商品恰好具有满足消费者某些方面欲望的能力，博物馆展览需要有满足观众欲望的能力。湖北省博物馆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湖北省博物馆注重博物馆展览的品牌建设，于是乎出现了在志愿讲解队伍中，有许多高学历的企业家、学者“倒贴钱”成为免费志愿讲解员。这说明湖北省博物馆的展览能够满足他们的某种心理需求，加深他们对博物馆的文化认同感，这在全省其他博物馆中是很难见到的。展览与博物馆品牌建设中，大部分的博物馆还停留在展览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时，而有实力的博物馆已经到了如何通过展览引导观众认知的阶段。笔者认为博物馆超前的引导可以为社会发展做出很好的铺垫。



（三）“最后一个展厅”的建设

在国外，博物馆商店被称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观众在参观结束后，在商店购买一些文化创意产品。既然博物馆商店被称为“最后一个展厅”，那么文博陈列工作者理应为博物馆文创事业出一份力，将心思放在如何更好地展示文创产品上，而不是置身事外。中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领域，国内除了北京、上海、台北等少数博物馆有很好的发展之外，其他博物馆皆处于起步与探索的阶段。笔者认为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目前大部分博物馆在开发文创产品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创意与设计人才的缺乏。以武汉市为例，50人以下规模的小型文创企业给创意与设计人才的月薪是8000~10000元，大中型文创企业所给的待遇更高。中小型博物馆所给的薪酬是无法吸引这方面人才的。自主培养人才周期太长、成本过高，可能会错过发展机遇。中小型博物馆应该与相关企业合作，以共赢的理念共同开发产品。上层设计者应通过减税等相关扶持政策，吸引文化创意企业参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同时博物馆应注重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是博物馆主导文创产品开发的先决条件。中山舰博物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工作的全职人员仅一人，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领域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博物馆通过社会公开征集“中山舰”商标设计，并在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45类“中山舰”商标，开发了100多种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产品具有一定的品牌溢价能力，产品的研发等费用基本达到收支平衡。中小型博物馆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利用企业力量进行合作，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

（四）不容小觑的社会贡献

一谈到博物馆陈列展览，往往都会想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先进文化的感染力等精神层面。笔者有理由相信博物馆陈列展览也可以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支持。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博物馆展览可以并且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产业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

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博物馆陈展事业的产业规模可能不会特别巨大，能够提供的创业机会不太多，但是博物馆展陈事业蓬勃发展，必将带动设计布展、设备租赁、保险运输、文化产品、旅游观光等周边一系列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1995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举办了莫奈作品展，在19周的时间里吸引了96万名观众。在此期间博物馆商店的盈利、租金费用等，都比以往有显著的增加；在税收和就业机会方面，它对芝加哥经济的贡献高达近3亿美元。1996年，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塞尚画展在展出的13周内，为城市创造了1万人的旅馆入住以及8650万美元的附加收入。将外地优秀的博物馆展览引进本地，将本地优秀展览输出到外地，其带动经济的规模是不容小觑的。展览行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束语

现在博物馆已经转变为以教育为中心，而博物馆陈列展览是实现教育职能的重要载体。博物馆陈列展览虽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但发展前景光明。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创新，博物馆陈列展览要主动融入社会，要参与到社会进步之中。博物馆陈列展览要善于创新，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

（刘尔亮：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 [1] [美] 尼尔·科特勒、菲利普·科特勒著，潘守永等译：《博物馆战略与市场营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 [2]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3] 王名编著：《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4] 高平：《“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纪念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20日9版。

浅谈如何做好纪念馆的陈列档案管理工作

刘 燕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陕西西安 710004)

内容提要: 陈列档案是陈列展览工作的真实记录,是研究纪念馆展览和馆史的重要资料。做好陈列档案的规范化收集及管理,既可以为纪念馆以后的陈列布展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为纪念馆的考核评定等提供印证材料,还能对纪念馆的知识产权进行确认。本文在厘清陈列档案的含义和具体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对陈列档案的特征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探究,以期对今后陈列档案的管理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陈列档案 四个阶段 八项要素

博物馆陈列作为博物馆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博物馆进行社会教育、传播信息、提供审美欣赏和为科学研究提供参考服务的主要工作方式,也是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特殊精神产品。也可以说,博物馆陈列是检验博物馆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①。而陈列档案作为纪念馆在从事展览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记录了纪念馆展陈工作的发展历程,是纪念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基石。因此,如何管理好展览档案是纪念馆档案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的问题。

一、陈列档案的具体内容

陈列展览档案是否齐全完整,是检验和衡量陈列展览档案归档质量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做好陈列展览档案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归档后的档案要能够展示展览的历史全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全面、系统、可靠的信息资源。因此,要做好陈列档案,首先要明确陈列展览工作的具体步骤。一般而言,

陈列展览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策划→申报立项→组建项目组→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制作施工→布展→展览开幕→宣传推广→审计与评估→撤展→总结建档。最后的总结建档工作即“撰写总结报告,并收集、整理展览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立、健全档案”^②。结合工作实际,笔者对陈列档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将其概括为“四个阶段、八项要素”。

所谓“四个阶段”,是对陈列展览流程的简单概括,即立项、实施、展出、总结四个阶段。一般而言,陈列展览从确定举办展览初期的选题、立项、论证,直到展出后相关的各项重要事项、重要活动中形成的文字、图片、声像及电子文档等档案资料,都应列入收集归档范围。比如在立项阶段,要清晰记录陈列选题的确定过程和行政审批程序,具体包括不同的陈列草案、修改方案、讨论记录、专家意见、会议纪要等,还包括立项书、项目申请、上级批复等行政手续。实施阶段要全面细致地记录展览设计、施工流程,包括展览制作合同、设计图、效果图、竣工图、专家论证会议、文物出库等相关资

① 文化部文物局主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② 刘超英、崔学谕主编:《博物馆工作规范(试行)》,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料。对于按法律规定的、必须经过招投标形式确定设计制作及施工单位的重大陈列展览工程，还应将招标文件、委托监理合同、监理竣工报告等收录其中。展出阶段就要注意搜集与开幕式相关活动资料，包括媒体报道、嘉宾来访、重要接待、观众反馈等。每一项陈列展览结束后，就进入总结阶段。总结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要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归档。目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以展览陈列的八项要素为纲进行总结。

所谓“八项要素”，是陈列展览涉及的八项基本内容。具体包括：陈列室（地址、建筑结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平面示意图、照片）；陈列柜（结构、规格、平面图、剖面图、照片）；陈列内容（展览名称、内容设计者、陈列方案审定者、陈列大纲、方案、讲解词）；陈列形式（总体设计者、形式设计平面图绘制者、效果图绘制者、制作图绘制者、形式设计方案审定者、形式设计说明、展出面积、展线、使用光源、陈列制作者、陈列效果系列照片、形式设计平面图、形式设计效果图、形式设计制作图）；陈列特点与综合评价；陈列品（文物总数、展品密度、级别、类别、辅助展品、展品详目、重要展品简介）；其他与备注（陈列经费总支出、陈列室启闭时间、陈列室安全设施、门票、陈列室值班制度）；附录（展览的请示、批复、展览制作合同、邀请函、图册、出版物、邀请函、签到表、电视纪录片、媒体报道、观众反应、相关的活动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第八项附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以“八项要素”归档，突出了陈列工作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流程。近年来，有些纪念馆规定：凡是展览项目都必须引入第三方评审机制对项目竣工决算进行评审。评审资料包括成交结果通知书、开工报审表、工作联系单、合同书、工程决算书、委托监理合同、布展设计、工程竣工报审表、项目竣工图、验收资料汇编、监理竣工报告等，这一套完整严密的资料其实就是对项目实施阶段的

总结，待项目评审结束后，可连同决算评审报告一同归档到第八项附录中。

二、陈列档案的特征

（一）共性中有个性

纪念馆陈列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传播文化科学信息和提供审美欣赏的展品群体。根据展期及展览主题、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展览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两大类。临时展览又可细分自办展览、合作展览和交流展览。一般而言，基本陈列主题稳定，艺术形式比较完美，有特定的陈列内容和展品（主要是馆藏文物标本）。反之，临时展览一般小型多样，经常更换，展品的选择较为自由，陈列内容结构和艺术形式也比较灵活。认识到不同陈列展览的共性和差异之后，陈列展览档案的归档既要遵循档案管理的共性要求，也要兼顾陈列展览档案的个性需要。比如交流展览，既包括行政审批文件、活动盛况、媒体报道、观众反应等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双方人员交流互访等资料。

（二）及时性和延续性

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①。档案与实物具有同等地位，它们都可以被认作社会文化的“文本”，人们可以直观地利用档案还原作品生成的原始环境。因此，任何一个展览结束后，都需要工作人员及时建档，倘若不及时，可能会遗漏很多重要资料，从而造成原始记录的失真。长期展览如基本陈列，时间跨度大，在展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修改、补充的持续性工作，这些都需要记录在案。基于展览时间的不确定性，档案管理者要注意展览实施的连续性、动态性特点，既要及时还要兼顾完整性。

①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三）广泛性和专业性

陈列展览档案来源的多元性，要求档案搜集要尽可能广泛。一个展览需要各个业务部门的配合、相互协商并且要经过特定的程序才能很好地完成，陈列档案就是不同的业务部门在实施展览过程中直接形成的。除来源于策展展览部门外，还可能来源于保管、保卫、后勤、办公室及与展览密切联系的外单位，因而，收集归档工作需要十分细致认真。完整细致的展览档案是对某项展览工作的原始记录，它突出地记载了“一项展览活动的主题思想、设计水平和社会反响”^①。实践中，每个展览的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相似性，突出地表现出展览档案的特定性和专业性。在建档过程中，既要注意展览与展览之间的差别性，又要时刻注意展览档案的专业性和内在统一性。

三、陈列档案的重要性

陈列展览作为纪念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档案的管理意识和使用意识决定了博物馆的开放态度和参与当代文化的能力。因此，陈列展览档案是否完整和规范，是做好纪念馆工作的时代要求，也是促进纪念馆各项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为纪念馆的陈列布展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档案是事实、知识和经验的记录，它的这种可靠的广泛的可资参考的特征，启发和指导“当今的现实生活”^②。工作人员求助于档案，就能得到“一些具体事情以及博物馆连续性历经数十年变化所具有的更普遍意义的相关信息”^③。特别是举办策划

同类展览时，为策划人汲取有益的设计和宣传经验，不仅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对新陈列展览全面设计的工作量，也可促进和提升陈列展览水平。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近几年推出的《理想之路》专题展，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理想之路》专题展的基础上不断充实、修订完成的。

（二）为纪念馆的考核评定等提供原始印证材料

档案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事态的真相，现在不可能提出文件来作证据。只有在事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出现。”^④2008年起，我国启动了全国博物馆评估定级工作，涉及“博物馆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三大块”^⑤，具体包括历年的陈列展览活动是否有健全的文字、图片、影像展览资料等考评内容。另外，博物馆的精品展览申报等更是与陈列档案休戚相关。

（三）作为纪念馆知识产权的确认凭证

档案是对历史的建立、方针与问题的自生记录，拥有它们是“机构身份认证的基础”^⑥，可以成为“查考、研究、争辩和处理问题的依凭，认定法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证据，以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教育人民的工具”^⑦。每一个展览都是工作人员的智力成果，是纪念馆独有的文化资源，享有“智力成果权”。同时，陈列档案记录了每个展览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人员的名单，这也是体现设计者工作成绩的一种凭证。

① 孟梅：《博物馆展览档案管理之我见》，载《齐鲁档案论坛》，山东省档案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会刊。

② 《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③ [美]珍妮特·马斯汀编著，钱春霞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72页。

⑤ 国家文物局编著：《博物馆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⑥ [美]珍妮特·马斯汀编著，钱春霞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⑦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四、陈列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对于很多中小型纪念馆而言，陈列档案普遍存在着不规范、不完整等问题，据笔者所知，某些纪念馆的陈列档案竟然有长达十多年的空白。究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

（一）缺乏专业知识

对很多纪念馆管理者来说，关注更多的是陈列展览、藏品保管和社会教育等主要业务工作，从而淡化了纪念馆的档案管理工作，认为这项工作可有可无。对于小馆而言，不可能配备专业的档案人员，大都是兼职做档案，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工作人员兼职做档案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积累扎实的档案管理的理论知识、科技知识，因而工作存在缺位现象，导致博物馆档案管理工作在管理方式新旧交替的进程中遇到障碍。倘若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缺乏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陈列档案工作根本无法科学、规范地开展。

（二）缺少时间

工作人员兼职做档案这个现象就充分说明时间不够用。陈列档案的广泛性和延时性，必然要求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展览过程中，争取将与展览有关的资料信息“一网打尽”。由于一个人身兼数职，精力不够，难免会有疏忽。

（三）缺少资金

这里主要指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尤其是针对早期形成的纸质展览文件。早期的档案管理者并未实现声像档案与文书档案分开整理保管，20世纪，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照片资料大多以照片形式粘贴在文书档案中，这些照片有的相互粘连，有的已泛黄，给日后的保管利用带来极大隐患。因此，现在急需对早期的陈列档案进行全文扫描，既能保持展览档案的原貌，也能使日后的查找更为方便快捷。

针对以上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作为一名兼职档案工作者，笔者觉得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加

以努力：

一是要提高职业道德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档案管理人员必备的重要素质。由于档案工作工作量大、周期长，且不被人重视，很容易使档案工作人员心生厌烦，从而影响档案工作的质量。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国际档案理事会1996年通过的《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精神，档案管理人员一定要具备以下道德素养，即“忠于职守、爱岗敬业；遵纪守法、严守机密；博学求进、公正服务”。

二是要提高业务素养。陈列档案不是堆砌材料，而要保证其系统性和成套性。系统化的展览档案是经过一定的程序、方法，按照一定的要求整理归档后的文件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档案人员一定要熟悉展览业务的整个流程，掌握展览档案的各个环节，从业务上把握展览档案的来源规律，按照展览时间划分、形成部门等对展览档案进行科学的分类，建立科学易用的文件目录或检索体系，方便展览档案的保管、查找利用。

三是要利用现有条件做好陈列档案的数字化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展览设计制作基本都是在数字环境下进行的，设计图、制作图、效果图、剖面图、立面图、竣工图等电子档案越来越多。电子化资料的普及，为档案的电子化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档案管理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做好电子档案的归档。

档案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苏东海教授曾说，一个优秀的综合性博物馆必须具备三大建设：人才建设、藏品建设和资料建设。陈列档案是博物馆资料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陈列档案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完善的陈列档案管理制度和规范，对今后纪念馆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燕：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文博馆员）



浅谈革命类纪念馆临时展览的策划与实施

——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为例

王莹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湖北武汉 430010)

内容提要：革命类纪念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博物馆，主要是以宣传教育为主要功能，它肩负着思想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任。临时展览是纪念馆陈列展览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是对基本陈列的补充，也是丰富纪念馆教育内容的有效途径。因此，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策划出主题新颖的临时展览，对于丰富革命类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意义重大。本文根据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的办展经验，从“选题”“办展”“服务”三个方面重点探讨革命类纪念馆策划和实施临时展览的成功做法。

关键词：革命 纪念馆 临时展览

革命类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是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由此可见，收藏、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是革命类纪念馆的三个重要功能，而无论是文物收藏还是科学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②。为此，如何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是革命类纪念馆亟须思考的重要课题。目前，全国大部分的革命类纪念馆都是通过陈列展览来实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这一职能的。陈列展览按时间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基本陈列一般由比较稳定的主题、内容、展品组成，持续时间较长，因此也被称为固定陈列。它往往是各个纪念馆倾一馆之力，花费较多时间、精力及较高成本布置和举办的，因此它是每个纪念馆的精华和根本所在，更是将纪念

馆本身所承载的精神信息展现给观众的重要窗口。但同时，正是由于定期改革基本陈列的成本过大，基本陈列具有相对固定性，当一个馆的基本陈列推出数年后，观众容易产生陈旧感，长此以往会影响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与之相反，作为常办常新、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举办地点、周期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它既是对基本陈列的补充，也是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有效途径。为此，在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挖掘出主题新颖的临时展览，对于丰富革命类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意义重大。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八办”纪念馆），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建馆近40年，始终紧紧围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三大主题，先后举办近40个专题展览，展出近500场。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一条以时事热点为切入点、以核心价值观为主旋律、“走出去”与

① 《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文化部1985年1月9日颁布。

② 同上。



“请进来”相结合，通过灵活举办临时展览，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质量，从而发挥爱国主义教育职能的新路子。

一、抓住时效性，精心选题

陈列展览的主题是整个展览的灵魂，是成功举办展览的重要前提。只有确定了一个优秀的主题才能为撰写条理清晰、中心突出的陈列大纲奠定基础，才能为成功举办一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展览埋下伏笔。“八办”纪念馆在举办临时展览时，往往都会以弘扬爱国主旋律、紧扣时代脉搏、找准观众需求、传播正能量为切入点精心选题。

（一）把握重要节点

根据“八办”纪念馆过去的办展经验发现，临时展览的选题如果与重要节庆、纪念日、重要历史人物诞辰相结合，尤其是遇到逢五、逢十的纪念日时，能够增加展览的时效性、针对性和纪念性，展览所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度会更高，爱国主义宣传效果更好。例如，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和辛亥百年，推出了《伟大的旗帜，光辉的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图片展；2013年，在周恩来诞辰115周年，推出了《人民公仆——周恩来》生平展；2014年，邓颖超诞辰110周年，推出了《伟大的女性 非凡的人生——纪念邓颖超诞辰110周年展》；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了《铭记历史 警示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铭记历史 警示未来——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两个展览；2016年，为纪念建党95周年，推出了《风雨兼程 党旗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图片展。这些展览在重要节点推出后，既受到各级领导和党政机关的欢迎和支持，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与各大主流媒体的宣传思路相吻合，因此受到电台、报刊、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起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

（二）聚焦时政热点

纪念馆还发现，临时展览的选题，如果能够与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大政文化方针及当前社会大众所关注的热点事件、焦点问题相结合，就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更能让爱国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例如，2011年推出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展》、2012年推出的《光影的记忆——红色经典影片剧照展》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共产党员“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与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非常紧密，开展以来深受市民及企事业单位的欢迎；再如，2014年推出的《追逐中国梦 复兴大中华》图片展、2016年推出的《德耀荆楚——湖北省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展》等都紧密配合了当前全国上下学习道德模范、追逐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热潮，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党员、团员、职工争先参观学习，既发挥了纪念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又扩大了纪念馆的社会影响力。

（三）挖掘自身亮点

作为革命类纪念馆，临时展览还可以依托自身的馆藏文物和资料、红色旧址、历史作用、重要人物等方面选题，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将本馆的文化优势发挥到极致。例如，2013年推出的《抗战中的一朵奇葩——孩子剧团展》；2015年推出的《永远的丰碑——全国八路军办事处史实展》；2016年推出的《武汉革命胜迹展》《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展》等都是围绕“八办”这一历史脉络展开的，但是又赋予了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和现实意义，遵循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原则，因此也起到了相当的宣传教育作用。

二、形式多样化，灵活办展

革命类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责任、有义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有意识地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光靠一成不变的基本陈列是无法完成的。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临时展览，在增强纪念馆对观众的吸引力、发挥纪念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升纪念馆的品位和形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观众需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这一点，“八办”纪念馆采取了寓教于乐、宣展结合、灵活多变的办展方式。

（一）展览与青少年教育活动相结合

由于革命类纪念馆的特殊性，在办展过程中，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将临时展览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相结合，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纪念馆第二课堂的作用，还能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例如，2013 年暑期，“八办”纪念馆特别组织社区流动人口子女来馆开展名为“关爱流动花朵”的红色夏令营活动，带着这些流动的花朵们观看了临时展览《抗战中的一朵奇葩——孩子剧团展》，用孩子剧团的动人事迹鼓舞这些流动花朵们奋发向上，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此次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被中国文明网报道；2015 年，纪念馆组织武汉市《现代少年报》的 60 余名小记者到馆开展了“小时候·寻找我身边的抗战遗迹”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带领小记者们观看了《铭记历史 警示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图片展，孩子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明白了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意义所在，就是要教育青少年们勿忘历史，振兴中华；2016 年，纪念馆与团区委、区教育局联合开展了“小小讲解员”活动，面向社会招募了百余名小小志愿者，他们利用周末为社会观众介绍展览内容、讲解革命历史、传递红色正能量。

（二）展览与专家讲座相结合

临时展览的举办不仅要有“广度”，还应当有“深度”。这个“深度”，指的是观众对展览内容

的理解程度，这直接影响到纪念馆传播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为了加深观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和认识，纪念馆一方面应该不断更新临时展览的题材，丰富展览细节；另一方面还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对临时展览作有力注释。“八办”纪念馆就经常邀请资深的党史专家、军事专家、大学教授到馆开展沙龙讲座活动，题目涉及有《八办与武汉抗战》《江岸革命史迹寻踪》《铭记历史 殷忧启圣》《中国共产党与抗战》《信仰引领我们前行》等，这些讲座紧密联系武汉地区革命史这个中心，又进行了必要的延伸与扩展，形式亲民、内容接地气，使观众对纪念馆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都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之后再观看陈列展览时，思路更加连贯，情感更加流畅，印象更加深刻，这对于爱国主义情感的传递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展览与馆际交流相结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将更加迅猛，革命类纪念馆应主动参与到这种文化和文物信息交流之中，加强与兄弟省份和地方纪念馆的联系，不定期交换展品，进行广泛交流。近年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与全国多家“八办”、周恩来纪念地、地方革命纪念馆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多次联合办展，既向全国各地宣传了“武汉抗战”历史，也使本地民众了解到不同地域的革命历史。例如，2010 年参与了全国八办联展活动和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办的《追寻伟人足迹——全国周恩来纪念地联展》活动；2015 年与西安八办联合举办了《永远的丰碑——全国八路军办事处史实展》；2016 年“八办”自己设计制作的《风雨兼程党旗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图片展被江苏省连云港革命博物馆引进，并在 7 月 1 日首展。这些展览交流活动既是一个展示平台，又是一个交流平台、学习平台，双方工作人员就在这种交流中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经验。



三、发挥能动性，优化服务

随着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博物馆加快了融入社会的步伐，与社会各阶层建立起更加广泛的联系，与此同时，观众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尽可能地满足不同观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成为革命类纪念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内在动力。而观众在参观临时展览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服务有两种，即硬件服务和软件服务。

（一）提升硬件服务

“八办”纪念馆在完善展厅服务硬件设施上，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在纪念馆显著位置设置中英文展览介绍、导览牌和参观须知，使观众对展览的内容和服务功能一目了然；完善游客服务设施，增设了物品寄存、医护服务、轮椅、雨伞借用等设施；印制了展览折页等精美宣传资料，并向观众免费发放等。此外，纪念馆按照“三贴近”原则，不仅面向阵地观众，还充分利用流动展板、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形式，尽可能地将最新的临时展览呈现在不同观众面前。例如，纪念馆每年都会精选出1~2个临时展览制作成活动的版面，免费送往学校、社区、机关、农村、部队、公园等地展出，摆脱传统展览的场地、时空限制，促进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亲密互动，推动文化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二）提升软件服务

所谓软件服务，就是通过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工作，让观众感受到文博人的敬业精神、精心服务和所营造的和谐环境。“八办”纪念馆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带给每个观众热情、坦诚的关爱，让观众感受到文博人和蔼可亲、宾至如归的态度。尤其是讲解员岗位，每天都会迎来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专业领域的观众群体，这就需要讲解人员以更加通俗、生动的语言，更加平等、耐心的态度，主动与之交流沟通。同时，针对一些观众在展厅内大声喧哗、乱扔废弃物等不经意地暴露出来的不良习惯，作为工作人员也应该妥善加以劝阻和引导，避免影响参观讲解的环境和效果。

四、结束语

革命类纪念馆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传播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文化的重任，只有通过举办不断更新临时性的专题展览，才能保持革命类纪念馆的活力，才能不断刺激着社会文化的脉搏，满足社会文化的需求。作为纪念馆工作者，我们应进一步按照时代要求、深入挖掘史料、扩大文化交流、关注民众需求，推陈出新，办出更多、更好的临时展览，发挥出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王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助理馆员）



浅谈革命类纪念馆陈列设计

李 健

(平津战役纪念馆 天津 300131)

内容提要: 传播红色文化、让纪念馆中的文物“活起来”是革命类纪念馆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利用好红色文化遗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于革命类纪念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革命类纪念馆 红色遗产 展陈设计

近年来,新的陈列理念、展示手段和材料不断被运用到陈列展览中,纪念馆在陈列研究和组织实施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地纷纷把纪念馆建设与城市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赋予城市新的内涵与生命,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带动城市旅游及相关的服务行业发展,提升了城市历史人文内涵。其中革命类纪念馆主要依托于革命遗址、历史发生地而建,作为纪念性建筑其主要目的是纪念近现代民族历史文化和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但是由于此类纪念馆题材严肃、教育性强,陈列方式相对于博物馆比较单调、缺乏新材料新科技的应用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得此类纪念馆展陈设计不吸引观众。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红色文化遗产加强保护和宣传,革命类纪念馆也同时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革命类纪念馆在近几年中提升改造本馆陈列展示设计,在展陈设计中大量运用高科技展示手段,陈列设计上加强与观众之间互动,吸引观众走进纪念馆,对于发挥红色文化遗产价值与功能,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近几年的设计工作中,纪念馆陈列设计人员不断加强对革命类纪念馆陈列展览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入考察与仔细研究,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尝试,为纪念馆陈列找出一条特色之路。现将革命类纪念馆现阶段展陈设计思路与方式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在整体设计思路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烘托内容

革命类纪念馆展览内容形式目的主要为宣扬红色文化遗产,使红色文化遗产价值在展示和传播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平等进行研究,对史料和文物进行收集和梳理,然后确定好需要展示的物品和相关内容。对于革命历史重要事件,找出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核。

1. 在内容设计中,展陈要根据展示物品、收集信息、研究成果构建出整体展览大纲

展览大纲需要脉络清晰,必须有主要线索将所有发生的事件和展示内容连在一起。如平津战役纪念馆建馆初期就将平津战役纪念馆定位于传播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位置,“让红色文化遗产成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让红色文化遗产成为红色历史的见证、让红色文化遗产成为展示兵学文化的符号、让红色文化遗产成为联结观众和历史的桥梁”是其独具特色的陈列展示传播机制。平津战役纪念馆展览陈列大纲根据收集的资料并以时间为序,构建了序厅、战役决策、战役实施、人民支前、伟大胜利、英烈业绩几部分。利用一些多媒体手段来烘托一些展品和事件的重要性。平津战役纪念馆将收藏的近4000件珍贵的红色文物都建立了详尽



的藏品档案，使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有故事讲、都有情可述。陈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收集的这些文物故事来完善增加展陈内容。

2. 在空间设计上，要注重内容和空间形式的和谐统一

有的设计人员在空间设计中注重造型漂亮或更有视觉冲击力，却忽视了展览内容，导致内容和空间不能对话。其实展品本身才是展示传播信息和实现展览目标的载体，是空间的主角。一个成功的展陈设计必须要凸显展品及其自身传达的信息。

3. 在陈列设计上，设计手法应与展品的性质和特点密切相关

根据展品的平面或立体确定选用展柜的形式，根据展品大小确定展架尺寸，根据教育性、欣赏性选择采用静态陈列还是动态演示，以此来确定展品的基本陈列形式。如果设计人员不仔细研究展览内容，就不能够体会到展品所传达的精神内容，做出来的造型也就没有支撑和依托，经不起推敲和考验。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新的改陈设计中，展陈形式突出语言的生动、直观与“诗化”创意。创造性地调动“空间语言”，运用图片、文物、背景墙、雕塑、绘画等多种展陈形式进行有机组合，达到了最佳展示效果。整个展厅展柜及展台设计简单大气，展台摆放整体上感觉有一些俄罗斯战争的纪念馆的展示形式理念融入其中，展台摆放错落有致。为了更好地体现文物特性，设计方分别设计了不同的展台，或摆或挂，千余件文物展台每个都是“私人定制”，能将展柜中的文物更好地展示给观众。

二、环境为根基，空间为灵魂

革命类纪念馆一般都建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因此事件发生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等因素有本质的联系，所以设计者在设计前要仔细研究这些外部环境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在展陈设计中准确定位。

1. 展示陈列空间要与建筑形式协调统一

革命类纪念馆一般都屹立在城市之中，整体建筑要表达一种思想与性格，传承一种文化与信息，其精髓关键在于内部展陈空间与整体设计理念的贯通。尤其是革命类纪念馆，要主题明确，是能够体现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弘扬军事文化特色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要利用建筑赋予展示空间的个性化语言，减少装饰，简洁大气，回归本质空间，创造内外统一。

人们参观革命类纪念馆一般会先接触到外部环境再到建筑造型，然后是进入内部展示空间，再到外部建筑空间的一个完整的动态视觉欣赏过程。这就需要内部展览陈列空间与外部建筑形式和空间环境产生关联，这样才能在整个空间设计中完整统一，让参观观众能够享受到完美的视觉享受。如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红桥区，占地 4.7 万平方米，整体建筑由胜利广场、主展馆、多维演示馆和军威园四部分组成。胜利广场其环境艺术以胜利为主题，属于开放式前广场设计，呈半圆形，红色连锁砖铺地，中央伫立着高 15 米的国旗旗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反映两军欢庆胜利和军民共庆胜利的两壁弧形花岗岩浮雕分列前广场两侧，由两根高 12 米、5 种红色花岗岩砌成的圆柱构成胜利门，柱顶分别伫立着两尊高 4.7 米的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战士鸣枪欢庆胜利的锻铜塑像，象征着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携手并肩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通过胜利门进入占地 8800 平方米花岗岩铺地的主广场，东西两侧有各宽 20 米、高 11 米，象征两支大军勇往直前的《并肩作战》和象征军民鱼水情深的《人民支前》两组大型锻铜群雕及火炮、坦克、装甲车等大型兵器布列。观众一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就能通过展馆外的建筑及雕塑感受到平津战役纪念馆作为军事类、革命类纪念馆不同于其他纪念馆和博物馆的整体氛围。胜利广场中心屹立着象征着军民奋战 64 天取得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高 64 米、三棱枪刺造型的胜利纪念碑，直插云霄，枪刺柄是长城造型，“枪刺”与“柄”交接处的上下各 3 个巨型钢环，象征着在平津战役中产生的 3 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这种设



计方式和展馆内部陈列主题思想紧紧相扣。纪念碑下面是能变换多种造型的大型喷泉，在彩灯的照射下，水花随着雄壮的军乐多姿多彩地喷向空中。纪念馆主展馆为三层建筑，雄伟挺拔，暖灰色花岗岩饰面，造型简洁，古朴庄重，既蕴含中国传统韵味，又富有现代审美风格。在展馆巨大牌楼式眉额上镶嵌着聂荣臻元帅生前题写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七个镏金大字，右下方为聂帅签名。40多米宽的花岗岩台阶引导观众进入展厅。主展馆陈列序厅、战役决策、战役实施、人民支前、伟大胜利、英烈业绩六个部分，序厅大厅正中央的铸铜雕像《走向胜利》，表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的领袖风采；墙屏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浮雕手迹熠熠生辉；环周巨幅壁画《胜利交响诗》反映了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英勇奋战、夺取战役胜利的宏大场面。展馆内部展览陈列空间与外部建筑形式和空间环境在这个设计中产生关联，设计思路紧扣中心思想与展览主题，让参观观众无论是在纪念馆外面还是里面都能够享受到完美的视觉享受，感受到通过这些空间设计所营造出来的革命氛围及展览主题。

2. 合理策划空间序列，掌握重要节点

在展厅空间组合中，需要强化的要强化，不需要强化的要弱化，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这样才能在展示陈列中准确地突出重点，使设计获得内在逻辑。如革命类纪念馆的序厅是整个陈列展示设计的灵魂，奠定展厅整体艺术基调的空间，这就需要在设计中强化。西柏坡纪念馆在新的改陈中十分注重对展览整体节奏的研究和安排。界定各个部分在整个展览中分量的轻重再进行分别设计。在序厅的设计上采用了极富表现力的浮雕，正面是一组新中国缔造者的巨型群雕，两侧是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浅浮雕，与“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雄浑有力的大字浑然一体，准确地传达并强化了陈列主题，营造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艺术空间。

把握重要空间的同时也要重视对过渡空间的处理。过渡空间是连接展厅之间的灰色空间，它的展示内容较少，往往会被人们忽视，但是它对调节空

间节奏和观众情绪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面著名的“电报墙”，设计者利用展厅与展厅之间相连的走道空间，以当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为指挥“三大战役”发出了电报原文笔迹为设计理念，将走道两面墙设计成错落有致、立体的造型，不同电报内容形式的“电报墙”与在走道中配上的“嗒嗒”的急促富于节奏的电报声，让从这里走过的观众像进入了半个世纪以前那种战时特有的紧张状态，让从这里走过的人对这些电报印象深刻，同时给观众视觉和心灵上一种冲击。

三、展览陈列形式灵活多变， 设计形式以人为本

革命类纪念馆由于题材严肃、教育性强，陈列方式相对于博物馆比较单调、缺乏多变性。作为展陈设计人员要将新材料、新科技灵活多变地运用到展览陈列中，增加展览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喜欢走进革命类纪念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革命类纪念馆的功能。

首先，在展览内容上多变，打破展览题材单一性。革命类纪念馆需要定期推出临时展览，临时展览在当下纪念馆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及影响力，能够满足公众对信息、知识的摄取欲，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观、消费观，能够迎合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承担社会责任。临时展览由于陈列手段比较灵活，展览内容相对专一，展期较短更换容易，正好补充和辅助了革命类纪念馆基本陈列的单一性。

其次，在展览形式上增加互动性。动态展示系统在现代展示活动中越来越受到青睐。如 3D/4D 多媒体演示、VR 幻影成像、电子屏查询等高科技产品都是丰富互动性的展示手段。它能调动观众的参与意识，吸引年轻人参与其中，使展示活动更富情趣。它使观众能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全方位地感知展品，更能深刻地理解展品传达的信息，同时弥补了革命类展品没有博物馆展品有吸引力的缺憾。观众能在好奇和发现中获得知识和乐趣。

最后，设计形式以人为本。当下有的设计师



在展览形式中过分注重一些浮夸的陈列形式，使得有的陈列形式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一种享受。如在展柜设计中过大过高的展柜放在展厅中陈列，在摆放形式上看上去大气漂亮，可是并不利于观众的参观，将文物展品摆放过高，观众无法观看细节，不能将文物展品本身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有效传达出来，展柜展角没有配备防撞角，也给参观观众带来安全隐患。另外，有的革命类纪念馆展示信息量过大，内容过于平均，缺乏精彩之处；或说明文字过长，超出人的正常阅读和正常视阈，这些都是设计人员没有考虑人的因素。有的大型革命类纪念馆在残疾人通道、安全疏散口的合理设置及休息座椅、餐饮服务设施上都缺乏宜人性。展陈设计中必须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设计人员必须依据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和背景的人群特点，设计出来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的展览陈列。

革命类纪念馆在当下飞速发展的情况下，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进空间。创新发展是一个博物馆生存壮大的生命和希望，革命类纪念馆也不例

外。革命类纪念馆及其展陈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相比，在其历史、主题、体系、内容、文物、形式、环境等方面，均存在着自身的特点及特殊性。革命类纪念馆想在现状中改变和提升，就必须大胆引进创新机制，借鉴和更新设计理念。用先进的现代的设计思想和理念武装革命类纪念馆陈列策展人的头脑，从而指导陈列设计者的实际行动。找出适宜于其生存、发展的展示理念与手法。打破一些被时代淘汰掉的传统设计模式，打破过去单一呆板的设计模式，走出发展瓶颈。丰富展示内容，突出重点亮点，大量引进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展示手段，最大限度地采用多种现代新颖的展示方式。真正做到形式设计为内容设计服务，使革命类纪念馆的陈列设计工作充满生机，充满活力。

（李健：平津战役纪念馆文博馆员）



解放战争时期纪念章、奖章等研究

——以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为例

宋晓蕊

(平津战役纪念馆 天津 300131)

内容提要：平津战役纪念馆从1997年开馆至今，馆藏的文物类纪念章、奖章等共计247枚。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和资料搜集，笔者将馆藏纪念章、奖章等划分为11大类、26小类。本文以解放战役、解放区域为主，浅谈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中的纪念章、奖章。

关键词：解放战争 纪念章 奖章 研究

平津战役纪念馆从1997年开馆至今，馆藏的文物类纪念章、奖章等共计247枚，作为库房与文物保管员，知情与了解每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是应该有的最起码的职责。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和资料搜集，笔者将馆藏纪念章、奖章等划分为11大类、26小类。每类纪念章、奖章等都是在特定的时期，为了纪念特定的事件而颁发给特定的人的，意义非同。下面以解放战役、区域为主，简单谈一下平津战役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纪念章、奖章等，为更好地做好文博工作做铺垫。

一、解放东北纪念章、纪念卡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党为了表达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终于在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于是在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到1948年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计百万余人，在锦州、沈阳和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了战略性决战。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由此，解放战争获得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极大地振奋了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信心。为了表达对可爱的人民解放军的感激之情，“1950年2月15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共同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呈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艰苦奋斗，解放全东北，拟赠四野全体指战员解放东北纪念章百万枚，兹检同纪念章初棣，请审核指示”^①。

东北人民政府的这份请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极大重视，周恩来批示“照准”。这次颁发的纪念章对象为全体东北野战军的全体指战员，共计约150万枚。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的解放东北纪念章共6枚，解放全东北纪念卡3张，来源方式主要为捐赠。

① 黄唯敏：《不朽的红星——解放东北纪念章颁发始末》，载《党史纵横》1998年第9期，第42页。



此纪念章为别针悬挂式，铜质，该章体为圆形，最长处直径4.6厘米，有绶带，左右各有一展开的红色翅膀，象征我军将展翅高飞；章外围由代表我军的八一军旗、代表工农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齿轮、麦穗；章体下方有红色五角星；章体中心为东北三省的地图，上有“解放东北纪念1948”字样（见图1）。



图1 解放东北纪念章

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的解放全东北纪念卡共3张，是在东北全境解放后发给个人的，长12.9厘米，宽9.4厘米，色泽鲜艳，整个图片为大半个中国地图，该卡印有东北华北地图及东北人民欢送入关战士解放全中国的场面。从左下角至中部右上角印有“解放全东北纪念”几个墨体字（见图2）。纪念卡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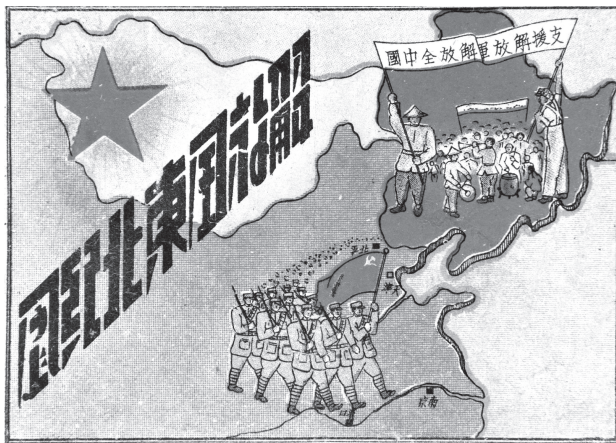


图2 解放全东北纪念卡

面印有红色字体的“致入关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书”，落款为“东北党政军民各界同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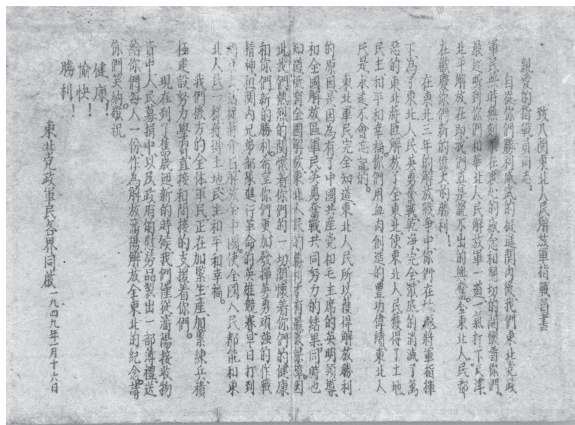


图3 解放全东北纪念卡（背面）

解放全东北纪念卡背面的文字，大体意思为：在辞旧迎新的时刻，送给解放东北指战员一份礼物，是从沈阳发出的。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关于类似纪念卡共计发送了多少张，无从得知。

二、淮海战役纪念章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为了加快胜利的步伐，配合平津战役胜利的开展，1948年11月6日，也就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4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书记邓小平，常委刘伯承、陈毅，委员粟裕、谭震林的领导下，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①。这次战役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历时66天，全歼国民党军55.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中原地区。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淮海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纪念这次伟大战役的胜利，鼓舞和激励广大指战员，这次颁发的纪念章共有90万枚，并且

^① 关于淮海战役，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一般记载为“徐蚌会战”。

由两个军区分别发放。

（一）由华东军区制作、颁发的纪念章

“1949年，华东军区给参加淮海战役的华野各纵队和华东军区地方部队的指战员、战役期间支前的华东军区专职支前人员、民兵和民工，参加淮海战役的华东军区其他有功人员”^①颁发了60万枚淮海战役纪念章。这些纪念章为圆形、铜质，直径2.7厘米，此纪念章上方有红色五角星，中间有两支交叉放置的长枪，下有“淮海战役纪念”字样，背面刻有文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发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见图4）。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仅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是由战斗英雄吕顺保获得的，建馆之后捐于平津战役纪念馆。



图4 淮海战役纪念章

（二）由中原军区制作、颁发的纪念章

“1949年，中原军区给参加淮海战役的中野各纵队和中原军区地方部队的指战员、战役期间支前的中原军区专职支前人员、民兵和民工，参加淮海战役的中原军区其他有功人员”^②颁发了30万枚纪念章。



图5 支前光荣纪念章

2016年5月份，天津市民王文忠先生联系到平津战役纪念馆相关部门，说有意向捐赠其爷爷王东昇在淮海战役支前中获得和使用的物品，“支前光荣”纪念章就是其中一件。这枚关于淮海战役支前的奖章是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唯一的一枚（见图5）。这枚珍贵的纪念章是由二野^③办事处颁发的，在这枚纪念章的最上方是徐州汽车大队字样，中间为镰刀斧头图案，两边为“支前光荣”四个大字，纪念章背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为了了解到这枚“支前光荣”纪念章更多信息，我们联系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文保工作的相关人员，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并且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当时支前的一些情况。据淮海战役纪念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徐州解放后，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任的徐州军管会，下设17个部，大规模组织运输力量，加紧生产，恢复交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不足400万人口的徐州，共出动37万民工，2.4万副担架，6.45万辆大小车，提供粮食1724万公斤，为支援淮海战役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徐州作为淮海战役的中心地区、支援阵地之一，徐州汽车大队作为支前队伍，其隶属于徐州汽车大队的人员能获得这样珍贵的纪念章就不足为奇。

① 徐宁：《功勋的足迹：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枚纪念章》，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2期，第22页。

② 同上。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因为该部队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所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1946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组成。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刘邓野战军挺进中原，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1948年5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三、华北解放纪念章、纪念卡

华北^①解放区经过两年的发展，已将华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沿北宁路、平绥路长达 500 公里的战线上，以及归绥、大同、太原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上。为了彻底打倒华北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百万余人，于 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与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战略性决战。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 52 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为了表彰参加解放华北地区参战人员和纪念华北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请示颁发华北解放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是 1950 年颁发给参加过平津战役和华北解放战斗人员的，为铜制奖章，章面图为“嘉禾”图案簇围着一名持枪守卫着“万里长城”和“八一军旗”的解放军战士，奖章下方刻有“华北解放纪念”六个大字；奖章最上部分由红面黄杠的绶带组成，与章面连成一体；奖章背面刻有“1950”字样（见图 6）。

“华北解放纪念章”的名称，与解放战争其他的地区解放纪念章有区别，其他纪念章名称多为“解放某某地区纪念章”，即“解放”二字在前面，地区在后。而“华北解放纪念章”则是“地区”在前面，“解放”在后，原因在于强调在华北地区的解放过程中，爱国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华北解放纪念章”的设计者，是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两名原日军反战人士小野泽亘和森茂，二人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这两位穿解放军军装的日本画家，还设计了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的宫灯。

华北解放纪念章“从 1950 年 8 月开始到 1952 年 10 月底，送发和收回颁发登记表共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涉及本区及外区的部队、工厂、学校、农村、各级机关、医院等”^②，共计发送纪念章 260 万枚。由华北军区政治部颁发，此类纪念章也是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最多的纪念章类之一。



图 6 华北解放纪念章

华北解放纪念卡是在 1949 年 4 月发放的（见图 7），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数量 6 枚，因资料较少，所以当时颁发涉及的人员、数量等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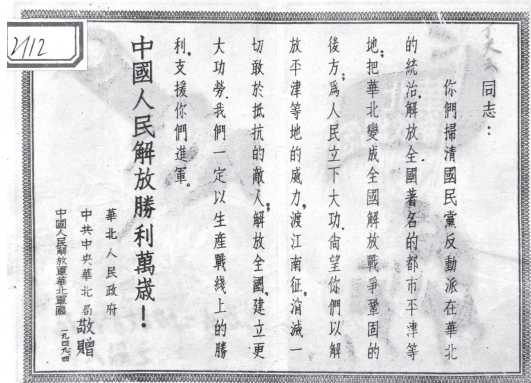


图 7 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的华北解放纪念卡

① 华北地区是指秦岭淮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由于民国时期省域区划不同，1948 年的华北，则包括北平、天津、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这几个省份。1949 年 1 月，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成为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地区人民政府，辖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等 5 个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共 26 个专区，334 个县市。

② 任哮岗、高巍：《华北解放纪念章的颁发》，载《档案天地》2001 年第 1 期，第 30 页。

四、与朝鲜相关的纪念章

（一）抗美援朝纪念章

抗美援朝纪念章通径 3.6 厘米（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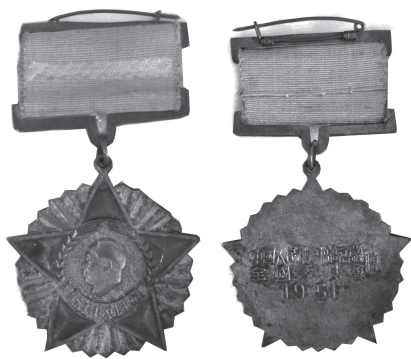


图 8 抗美援朝纪念章正背

（二）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纪念章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是 1953 年 10 月在北京组建的，慰问团编为八个分团，计 4000 余人。这支慰问团是由贺龙将军率领，在朝鲜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之前，于抗美援朝战争三周年之际离京赴朝的。出国前还以名画家毕加索 1952 年为世界和平大会绘制的宣传画“和平鸽”为图案，制作了精美的慰问纪念章，上面有“和平万岁”四个字，中间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纪念章背面有“抗美援朝纪念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 1953.10.25”字样。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还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并向我志愿军战士，干部颁发了抗美援朝和平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的这枚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纪念章通径 3.6 厘米，质地铜质，章体背面有“1953 年 10 月 25 日”与“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字样（见图 9）。



图 9 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的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纪念章正背

五、其他纪念章

这类纪念章是因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数量极少，所以集中简单介绍。

1949 年 4 月 20 日，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国共谈判宣告破裂。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大进军的命令当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规模巨大的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历时 42 天，使国民党苦心经营 3 个半月的所谓“长江立体防线”顷刻瓦解。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各省大进军。

仅用了 3 天，我军便占领南京总统府，宣告国民党蒋介石长达 22 年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也是开始全国大进军、大解放的开始。1949 年 7 月至 1950 年 5 月，第三野战军解放了福建省和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岛屿，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上厦门岛；1949 年 6 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1950 年 4 月解放了海南岛；1949 年 9 月至 1950 年 10 月，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诸省，并和平解放西藏；1949 年 10 月，第一野战军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因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存的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和解放西藏纪念章数量较少，下面简要介绍。

（一）渡江胜利纪念章

渡江胜利纪念章是 1949 年华东军区颁发给参加渡江作战的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等全体人员，支前人员、随军工作的人员，在长江对岸接应渡江大军的敌后部队人员以及参加渡江作战的其他有功人员的，共 120 万枚。渡江胜利纪念章为铜质，直径 3.2 厘米，章体图案为波涛汹涌滚滚的长江水，江面上有排排扬帆的战船，炮弹在四周激起水柱，解放军战士手握刀枪冲锋，争先恐后准备登陆作战；章体正面下方为“渡江胜利纪念”（见图 10）。



图 10 渡江胜利纪念章正面

（二）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渡江战役后，1949年4月解放军进军中南，至9月上旬解放鄂西、湘北、赣西北、赣南广大地区。为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了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约200万枚，主要颁发给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指战员及有关人员。这种纪念章通径3.5厘米，金属制成，章体中央有战士舞动红旗图案，红旗上有黄色八一军徽及“解放华中南纪念章”字样，左侧边缘为齿轮图案，中圈有麦穗图形，底部有1950字样，背部有“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字样（见图11）。



图 11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正面

（三）解放西北纪念章

1949年5月，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军西北，5月20日解放西安，7月解放兰州、西宁，9月解放宁夏。同月25、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解放了西北全境。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了表彰奖励在解放大西北中做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决定颁发人民

功臣奖章，并制定公布了《解放大西北人民功臣奖章条例》，宣布于当年8月3日开始施行。

解放西北纪念章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颁发给参加西北解放战争的第一野战军指战员、支前民工等的，共颁发50万枚。该纪念章为圆形，通径3.5厘米，铜质，章体上方图案是一面飘展开来的五星红旗，中间是中国西北五省区版图（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下端有两行规整的黑体字——“解放西北纪念章”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颁”；背面有“1950”及“上海五合制”字样（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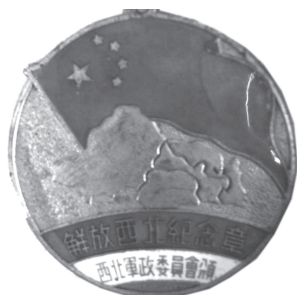


图 12 解放西北纪念章正面

（四）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

1949年12月11日长江重镇宜宾和平解放。而早在12月10日，蒋介石已经仓皇逃离成都前往台北。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至大邑、新津，致使胡宗南逃离成都，于是在12月30日，贺龙率第一野战军解放成都，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进驻昆明，并相继解放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至此西南地区除去西藏，全部解放。

为了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1950年西南军区为参加作战的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参加解放西南的第四野战军38军、42军、47军、50军指战员，支前民工，随军参战的工作人员及地方工作人员，颁发纪念章70万枚。

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圆形，直径3.7厘米，金属材质，章体上方有4面“八一军旗”，中间有中国地图图形，下方有“解放西南胜利纪念”字样，左半部呈齿轮状，右半部为黄色麦穗图案；背面有一别针，下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和“1949-11-1-12-27”字样（见图13）。



图 13 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正面

（五）解放海南岛纪念章

中南地区解放后，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企图凭借琼州海峡反攻大陆。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发起了攻击海南岛的任务，并于5月解放海南岛。为了纪念这一胜利，1950年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给参加海南岛战役的指战员等，共计15万枚纪念章。

解放海南岛纪念章是用银合金制作的，圆形，直径3厘米，章体正面的图案是蔚蓝的天空，宽阔的大海，大海上有飘扬着八一军旗、准备出发的战船，章体上有分两行排列的“解放海南岛纪念章”8个字；在背面，上部有一别针，下部有“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字样（见图14）。



图 14 解放海南岛纪念章正面

（六）解放西藏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和平解决西

藏问题达成协议，并且我第二野战军于1952年10月顺利进驻西藏拉萨。

解放西藏纪念章是西南军区于1952年8月1日颁发给参加西藏和平解放的第二野战军18军、14军126团等全部参战人员、政工人员、后勤人员及地方工作人员的，共计15万枚。

解放西藏纪念章是铜质镀金，不规则形状的，高4厘米，宽3.2厘米，章体上方为一面有毛主席头像的红旗，稻穗与红旗相接，章体正面有“解放西藏纪念”字样，最下方为藏文；章体背面有“西南军区颁发，1952.8.1”字样（见图15）。



图 15 解放西藏纪念章正面

（宋晓蕊：平津战役纪念馆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1] 杜忠明、陆君祥：《共和国勋章》，大连出版社2009年版。

[2] 任哮岗、高巍：《华北解放纪念章的颁发》，载《档案天地》2001年第1期。

[3] 徐宁：《功勋的足迹：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枚纪念章》，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2期。

[4] 黄唯敏：《不朽的红星——解放东北纪念章颁发始末》，载《党史纵横》1998年第9期。



试论武汉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的特点及其保护

邓艳梅

(武汉革命博物馆 湖北武汉 430060)

内容提要：文化景观是一种与地域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遗产类型，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构成特点。在中国近代以来围绕着的民族和民主革命而产生的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不仅见证了重要历史事件、记录了相关的历史信息，更是纪念、旅游和教育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传承民族希望和革命精神的重任。红色文化景观作为传统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其社会文化意义更重于其艺术成就和功能价值。武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优良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红色文化景观是武汉历史文化精华凝聚之地，历史信息的物质载体，更是武汉城市个性魅力之所在。保护好、传承好、宣传好这一宝贵资源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红色文化景观 武汉 保护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代表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由于文化景观是一种与地域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遗产类型，所以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构成特点。因此，其分类必须基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的地域特性，我国的文化景观可以分为设计景观、遗址景观、场所景观、聚落景观、区域景观等五种类型。遗址类景观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活动遗迹。红色文化景观即是遗址类文化景观中的一种。它特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存在、产生和建造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兼具人文与自然特性的建筑遗址或地段遗址，其见证了重要历史事件或记录了相关的历史信息，承担纪念、旅游和教育，传承民族希望和革命精神的重任。红色文化景观是传统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作为历史见证，其社会文化意义更重于其艺术成就和功能价值。

武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优良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均发生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

命斗争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数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块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同时也给这座英雄的城市留下丰厚的文化遗址。这些红色遗迹、遗址是武汉历史文化精华凝聚之地，历史信息的物质载体，更是武汉城市个性魅力之所在。保护好、传承好、宣传好这一宝贵资源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目前，在武汉市域范围之内，分布着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旧址、文化遗址和纪念建筑近百余处，其中有近六十处被国务院或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受到妥善地保护管理，有的还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可以说，武汉的红色文化景观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级别上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一、武汉革命遗址类文化景观的特点

1. 革命遗址类文化景观内容丰富

如前所述，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其红色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0 年董必武在武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创办的武汉中学旧址；大革命及前后时期的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旧居、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转折会议——八七会议旧址、湖北全省总工会旧址、刘少奇故居、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暨湖北省委办公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处、向警予故居及陵墓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周恩来故居、《新华日报》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解放战争时期民主爱国学生为争取民主运动而发起的“六一运动”纪念亭旧址等。可以说武汉的革命遗址类文化历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时期。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

2. 多与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有着紧密的联系

“武汉的文化遗迹、革命遗址有近百余处”^①，其中与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有着紧密联系的就多达六十余处。

例如，1911 年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它始建于 1900 年，本是清末湖北咨议局所在地，由于是一幢红砖砌成的现代建筑，因此，武汉人称之为红楼。百年以前，就是在这里，湖北的革命党在武昌首义后齐聚于此，宣布成立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华民国政权，并颁布了近代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鄂州临时约法》。因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被称为“民国之门”。中国的民主共和从这里发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顺应时代的潮流，在荆楚大地上坚定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大罢

工在此爆发，中国的工人阶级在武汉上演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把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顶点。今天，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是经过时光积淀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旧址却更加高大。

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一批著名领袖云聚江城，指导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他们的足迹遍布长江南北两岸。例如，毛泽东 1927 年在武昌的旧居。这里不仅是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家人最后团聚之所，同时也是在这里，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本光辉著作，为其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光辉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 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的重要论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由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3. 集群效应突出

武汉的遗址类文化景观不仅数量众多遍布武汉三镇，而且分布集中，相互毗邻。它们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串起一个个文化景观群，起到了集群效应，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例如：

（1）都府堤红巷历史名街区的红色文化景观。

在武昌有一条号称“中国第一街”的都府堤，这条街全长 413 米，宽 15 米。从这条街上从南至北依次分布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毛泽东旧居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三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每一幢老建筑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平凡的故事。像这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三个红色旧址同在同一条街上的分布格局在全国大城市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2）汉口沿江租界区内的红色文化景观。

自 1861 年英国在汉口设立了第一个租界起，

① 郑自来、郝钢以：《武汉革命胜迹》，武汉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7 页。



西方列强开始在汉口沿江地带纷纷设立租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有英、俄、德、法、日五国先后在汉口设立了自己的租界”^①，租界是西方列强建立国中之国的场所，在租界内享有独立的税务、警务、交通、卫生、教育等独立的行政权，为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因此租界成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众多的红色革命活动就发生在当时的租界之内。

例如，在俄租界里有辛亥革命前的秘密团体湖北共进会旧址、八七会议旧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英租界里有一三惨案旧址、中共中央领导人住地——德林公寓（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以及中央秘书邓小平的秘密住地）；日租界里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法租界里有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向警予旧居，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等。

历史硝烟散去，革命遗址唤起了人们珍贵的记忆。分布在租界区内的这些遗址今天依然保存完好，成为武汉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二、武汉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的保护

21世纪以来，随着武汉城市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红色文化景观的利用、保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革命遗址类文化景观保护的现状

一是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武汉在全国，尤其是华中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近现代许多重大事件发生于此，众多政治、文化精英际会于斯，不断累积了武汉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这些历史文化的革命遗迹、遗址也留存了下来。在遗留下来的革命遗迹、遗址中有近六十处被国务院或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受到妥善保护管理，有的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人民群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场所。

二是不断开辟具有武汉地域特色的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例如，建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胜利街185号、187号的2栋3层楼房是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势力迅速由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继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中共中央机关亦陆续由上海迁来武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以及彭述之、蔡和森、李维汉等领导人均在此工作生活。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历史价值得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高度肯定，原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称其为武汉的中南海，并多次建议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将其辟为纪念馆。其对研究中共中央在武汉这一段党的历史显得非常有意义。

三是近几年随着武汉市旧城改造工作的不断推进，武汉市政府也在加大对革命遗迹、遗址的规划和控制工作。例如，在《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纳入规划控制的革命遗迹、遗址包括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遗址、中共五大遗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故居、汉口八七会议旧址等几十处。近几年在政府的主导下，规划部门采纳各方面的意见，编制一系列的保护条例和办法，并相继颁布实施，对保护这些红色遗迹和遗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针对武汉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的保护的几点建议

目前，虽然武汉人民对于这些见证历史的红色遗迹、遗址倍加珍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武汉人民政府也对这些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进行了修葺与保护。但是由于革命遗迹、遗址众多，大小不下百余处且遍布于武汉三镇；同时，这些遗迹与旧址多建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多为砖木结构，且大多处于闹市之中，甚至有些旧址目前还在为一些居民所居住，这为我们进行系统的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

^① 袁继成：《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几点建议：

1. 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协调

红色遗址类文化景观的保护、整治与修复，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内容包括居民动迁、无保留价值建筑的拆除、道路的改造、保留建筑的修缮、现代城市功能的完善等各个方面，涉及面广，利益交织，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以便统筹协调各方面问题。同时各相关部门参与，制定工作制度，明确责任，各司其职，以便此项工作有序开展，高效进行。

2. 多方筹资，持续推进

除市、区两级财政给予支持外，还应争取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如旅游、文物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园林绿化、安防消防等多方面的资金补助。同时，应广开渠道，吸纳社会资金，调动社会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参与到此项工程中来，以保证有充足的财力支撑这项系统工程的持续实施，并形成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

3. 注重效益，重点推进，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
加大对具有武汉地域特色的红色遗址类文化景

观的修缮保护。例如对抗日战争烈士祠的修缮。在抗战的初期，武汉是战时陪都，是全国抗战的中心。1938年6月至10月，国民政府在武汉组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会战。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官兵浴血奋战，为保卫武汉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今天为了缅怀血洒疆场的抗日英雄们，我们修缮了抗日战争烈士祠，以供后人瞻仰、凭吊。

武汉是一片革命的热土。遍布全市的旧址、遗迹已经成为我们荆楚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谱写着红色文化的华彩乐章。今天，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景观这种文化遗产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未来的发展征程中，让我们始终秉持着红色文化这份坚定的精神食粮，永远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壤，永远捍卫五星红旗夺目的鲜艳。

（邓艳梅：武汉革命博物馆文博馆员）



武汉红十字会碑座价值考释

郑 卉

(辛亥革命博物馆 湖北武汉 430014)

内容提要：武汉红十字会碑座修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记述了辛亥革命汉口战役后，为纪念辛亥烈士、弘扬辛亥精神，鄂军都督府及红十字会、赤十字会共同修建了辛亥革命烈士碑及陵园的概况。该碑座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本文对其修建背景、碑文及与武汉红十字会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考释。

关键词：红十字会 辛亥革命碑座 考释

2012年，武汉市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正式启动武汉市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2013年，经过长达半年的分区摸底调查，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的文物普查小组通过上千家国有关单位走访调查后，整理出了12家非武汉市直属博物馆的文物国有关单位，其中就包括武汉市红十字会。2014年，武汉市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进入文物鉴定阶段，武汉市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普查办）对全市150家有文物的非直属博物馆的国有关单位，组织专家进行了文物鉴定，武汉市红十字会作为本次普查纳入的国有关单位，按照市普查办的安排进行了文物普查。6月20日，市普查办组织专家进行了文物认定。

武汉市红十字会在本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填报的是一个红十字会的纪念碑座。该碑座是1997年在汉口黄埔路上滑坡路74号古德寺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因上刻有“中华民国元年五月驻汉红十字会武汉赤十字会同立”等字样，施工方就把碑座移送至武汉市红十字会保存。该碑座为石质，无碑身。碑座通长、通宽均为0.7米，通高0.31米，重约2吨。碑座四面均刻有篆体文字。由于碑座常埋于地下，碑文又是篆体，部分字迹难以辨识。经过对碑座进行拓印，得知碑座每面有十二行，总约240字左右。碑文尾行刻有“中华民国元年五月驻汉红十字会武汉赤十字会同立”字样，得知该碑立

于辛亥革命时期，也就是1912年5月。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它与辛亥革命有什么联系？武汉红十字会又与该碑座到底是什么关系？笔者带着以上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考证，结合相关档案资料和所能辨识的碑文内容，对该碑座进行了考释。

一、红十字会碑座的历史考证

据武汉市档案馆馆藏辛亥革命档案资料中的相关记载，汉口黄埔路上滑坡路古德寺附近，在辛亥革命之后曾经修建过一个辛亥革命烈士公墓。笔者在武汉市档案馆查到的一份名为“古德寺前之巨塚”的档案资料，详细地写明了古德寺旁的公墓情况。

古德寺前之巨塚

汉口战争，揭幕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敌人由豫【豫】调来一混成营，由岳州调来一巡防营暨萧安国所部之辎重第八营残部，拒【拒】刘家庙布防待援。我军由林翼支率混成部队约三千人，自清晨接触。迄下午三四时顷，我炮兵遥见刘家庙开到火车一列，知系敌之援军，即集中火力发射，车倒兵溃，伤亡甚多。我督战队即乘势冲锋，全线猛扑，杀声震天。敌仓皇北退，我乘胜追击至三道桥始止。是役我军营长赵承武阵亡，士兵死伤三百余人。先时萧国宾、姚斌奉



命赴萧安国营劝降，被交豫军执行枪杀，姚殉，国宾身中四弹，忍痛佯死，及敌溃，始匍匐回军政分府，被护送渡江医治。三十日（21日），敌在三道桥北及漫口仍取守势。我军续行进攻，敢死队长徐少斌任尖兵，孙鸿斌任前卫，谢元恺领本队，马荣领预备队。徐身先领尖兵由桥南直冲桥北，行至中间，敌猛发几【机】枪扫射，遂中弹坠殉焉，随同阵亡者十余人。我军暂守造纸厂。时任指挥者为何锡蕃同志，多责不占领三道桥北端，致遭此失。至使张景良忽告奋勇，原【愿】于前线效劳，军政府遂派张继何为指挥官，又遭败挫，以致刘家庙不守，酿成颓势，不可复振，终启汉口失陷之端，张亦伏法。古德寺前之长塚，即此役殉义之忠骨侠魂也。塚南尚有赤十字会与红十字会同建之纪念碑。碑座方形，四周刻有纪念国殇之文字，已漫漫墓碑，其上方圆柱，尖端已毁矣。塚之附近，新坟罗列，荒烟蔓草，惨目伤心。所望后死同人，幸勿数典而忘。

中华民国卅六年（1947年）十月

此份档案中的“塚南尚有赤十字会与红十字会同建之纪念碑”，吻合了石碑上刻的“中华民国元年五月驻汉红十字会武汉赤十字会同立”内容。后文对碑座的具体描述中提到“碑座方形，四周刻有纪念国殇之文字，已漫漫墓碑，其上方圆柱，尖端已毁矣”，与现存的碑座外形大体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古德寺前巨塚上的石碑，应该就是1997年在汉口黄埔路上滑坡路古德寺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碑座（见图一）。

另据武汉市档案馆“汉口市政府训令市总字第



图1 纪念碑座

413号”档案文件中的相关记录，有看管辛亥革命烈士义塚人黄栋臣呈报武汉市政府关于流氓摧毁墓地的详细内容。

为据看管辛亥革命烈士义塚人黄栋臣呈报流氓摧毁墓地一案仰遵照牌示禁止由汉口市政府训令，市总字第413号。

（1）据看管辛亥革命烈士义塚人黄栋臣呈报称：“窃看管人黄栋臣继承先父黄家兴看管汉口古德寺侧边之辛亥革命烈士义塚以来，先后三十余年，毫无变异。惟至武汉沦陷后，有敌商汉口牧场牛奶房在该义塚内牧放牛群，并有流氓秦长伢等，借靠敌伪海军农场势力，强行将烈士纪念碑座下之基石盗去，万霜等将墓棺拆毁，开作菜园，墓塌碑陷，白骨暴露，惨不忍睹。目下国军光复，重现天日，看管人不敢隐昧，除分呈市党部外，里合检同略图呈报钧府鉴核，恳祈以保护辛亥革命先烈义塚之仁心，派员调查并令警察局牌示禁止流氓扰害，牧放牲畜，以免群起效尤，而安辛亥革命先烈之英灵。”等情况。

（2）合行抄发略图一份，令仰派员查勘修复，并转飭该管分局厉行查禁，妥加保护为要。

右令 警察局 附略图一份（见图2）。

市长徐会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十八日

（汉口市政府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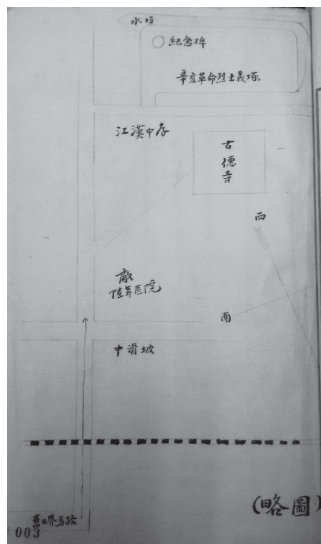


图2 警察局抄发略图



从这份 1945 年的请示中可以看出，古德寺旁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一直是由黄栋臣家世代看管，直到 1937 年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后，敌商强行霸占墓地，毁碑拆墓，白骨暴露，惨不忍睹。

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六月二十七日呈报给市长徐会之的“奉武汉行营代电以古德寺烈士公墓年久失修飭由本府拨款培修一案仰仍遵前令并案办理具报由”中可以得知，1946 年武汉市政府对古德寺烈士公墓进行了拨款修整。具体内容

为：“查汉口古德寺侧辛亥革命烈士公墓及纪念碑，经赤、红十字会及都督府于民国初年先后分别建修以来，年久失培，树草丛生，碑石倾斜，且常有牲畜践踏，尸骨外露，实不忍睹【睹】。复以武汉沦陷后为敌伪任意摧毁，竟将碑下墓石盗走，将墓地开作菜园，以致墓塌碑毁，墓界模糊。国军光复后，看管人不敢隐情，已分别据实呈报市府及市党部。当蒙市党部批复，并蒙市府飭令警察十三分局查办在卷。近阅报载钧营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飭令市府拨款五百万元修建上智中学侧之六个公墓，以召永垂万世。看管人秉承先父黄家兴看管汉口古德寺侧公墓三十余年之遗志，理应代为地下无名烈士英灵请命，恳请援例飭令拨款培修，并指定墓界，转飭墓附近警局及区保甲协力保护，不得损害。以上所请是否有当，恳祈鉴核并乞批飭指遵。”

从多份当时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古德寺旁的辛亥义塚墓碑就是武汉市红十字会收藏的墓碑，只不过经过战乱和城市建设，碑身早已经丢失，只剩下残缺不堪的碑座。这座碑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辛亥革命汉口战役的“见证者”，更是辛亥精神的“传承者”。它身负千万辛亥英魂，不该长埋于地下，应该高立于祭台之上，接受后人的祭奠与缅怀。

二、红十字会碑座碑文考证

1997 年发现碑座并移交给武汉市红十字会后，武汉市红十字会立即找专业人员拓印了碑座四面的篆文并翻译成了白话文。碑座表面有多处坑洼，碑座内镶碑身的方形孔的边长为 29 厘米 × 29 厘米，

碑座四面的碑文连接成文如下：

惟我民国肇基之元祀，海宇奠定，政成民和。江汉为义旅，奋迹之坠，奏功最高而纓创尤烈。南北激战，绵延五旬，断脰洞腹方瞑不复者，不可以亿计。迄今抚创痍之迹，思怀泽之谊，未有不愀然心伤者。爰哀集忠骸，筑塚树石，遍于江汉左右者不下数百区，而兆域以此为昶广。乃建纪功之幢，系以招魂之曲。辞曰：天牖民知，还我汉京。桓有众奋起楚荆，江涛千泳，风云万状。鼙鼓一声，为天下唱。伏剑身漆化土，血碧合无量心，铸此瑰绩。嫠妻遗胤，啼痕在裾。春秋来型，聊减欢戏。宰树箫，灵旗霍，魂兮归来，祚我民约。中华民国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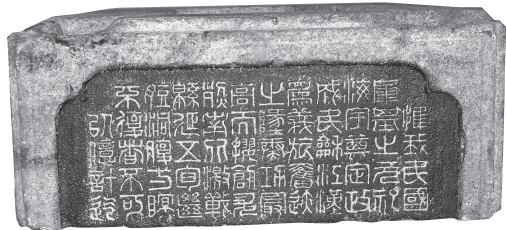


图3 碑座碑文（1）



图4 碑座碑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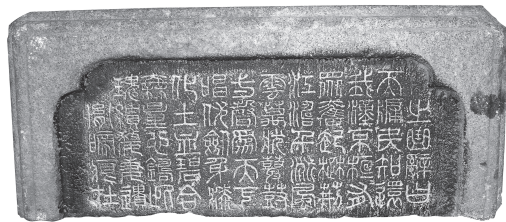


图5 碑座碑文（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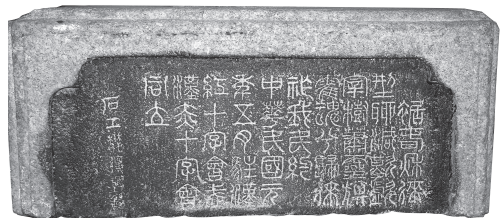


图6 碑座碑文（4）



五月驻汉红十字会、武汉赤十字会同立，石工樊复兴镌（见图3、图4、图5、图6）。

碑文大意讲的是中华民国开国后的首次祭祀活动，武汉作为首义之区，革命成功的功绩，激烈的战事大多发生在此地，战争创伤尤为严重。众多革命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献出了生命，民国政府决定将烈士的遗骸都聚集起来，修建来祭祀他们。最后是立碑时间、立碑的组织和石工姓名。

从碑文内容来看，古德寺旁的辛亥烈士义塚是武汉几个较大的辛亥革命烈士义塚之一，它是武昌首义汉口战役牺牲的辛亥烈士的公墓，是由当时的鄂军都督府和红十字会、赤十字会为纪念辛亥先烈合修的，并且一直有专门的人员看守护理该公墓，市政府还拨款修缮过。在辛亥革命阳夏保卫战中，起义军阵亡将士4200人，当时由红十字会及社会其他组织共同处理善后事宜，牺牲的战士大多就地集中掩埋，分布于汉口、汉阳，共有29处。解放后仅存4处，后合并为3处，但对于古德寺旁的这座辛亥革命公墓，人们却知之甚少。

三、碑座与武汉红十字会渊源

谈到碑座与武汉红十字会的渊源，首先不得不提到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建立。

1904年2月（清光绪三十年），在我国旅顺口爆发了日俄战争，数十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宣布中立的清政府派船接运中国同胞，但遭到俄国的拒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为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携徐宗汉北上。因清朝关卡检查严密，无法到达武汉，夫妇俩绕道来到了上海。徐宗汉找到了张竹君，张竹君答应将他夫妇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

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于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张竹君创办的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身先士卒驰赴战地救死扶伤。24日，张竹君帮助黄兴夫妇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登上“瑞和”号前往武汉。

张竹君（1876—1964年），民国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先驱，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她是中国赤十字会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女界梁启超”。

1911年清政府推翻后，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由此得出1911年在武昌首义后，武汉同时存在两个救死扶伤的组织，即中国红十字会和赤十字会。红十字会碑座上所刻“中华民国元年五月驻汉红十字会武汉赤十字会同立”等文字是符合历史记载的。中国红十字会驻汉红十字会和武汉赤十字会很有可能就是武汉红十字会的前身。

据民国时期《夏口建置志》记载：“民国四年冬，汉口各团联合会会长王琴甫因南北兵争未已，拟照万国赤十字救人之义，组织红十字分会，推行慈善事。商会赞成者三十人。五年三月遂设临时干事部与联合会工程处，以王琴甫为干事长，筹备经费均由琴甫任之。既而赞成者踵起，内容亦就绪，共议速觅基址，及时举办。适琴甫新第落成，乃假此第为会所，遂于五月迁入，六月正式成立。派王琴甫赴上海中国红十字总会考察成绩，以资借鉴，由总会赞助进行，于是定名曰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八月举行选举，推刘子敬为正会长，王琴甫为副会长，权景泉为理事长，王民仆为文牒长。旋设议事会，推周韵宣为议长，杨贞生为副议长，惟常年经费尚付阙如。斯时王琴甫建议，谓此会为国家法定机关，应有当轴提倡始能发达。众以为然，遂为九月公推琴甫赴都，以汤济武、胡子笏、舒湜生三人之力，得大总统黎公之赞助，捐银一万元，并题颁‘心存博爱’匾额……”

1916年6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正式成立。当时，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在军阀混战、陕甘旱灾、沙宜防疫、武昌围城、汉口大水灾等重大事件中开展救护兵丁、收埋遗体、



协助防疫等公益救济工作。

四、后记

武汉市红十字会收藏的这件碑座，让我们又重温了百年辛亥那段历史。在档案史料和实物的共同见证下，再一次增添了辛亥铁血精神新的历史佐证，

再一次告诫后人勿忘先辈精神。同时，受武汉市红十字会嘱托，笔者考证了武汉市红十字会与该碑座的历史渊源，希望对武汉市红十字会的文化发展有所帮助。

（郑卉：武汉市辛亥革命博物馆文博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珍贵抗战图书简述

张胜磊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北京 100007)

内容提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品丰富,中心收藏了一批珍贵的民国图书,这些珍贵的民国图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版本多样,其中有很多珍稀版本。本文选取其中一些珍贵的抗战图书,分三个类别对其版本及图书信息进行评述,以使我们的珍贵资料为学界所知,为抗战的研究提供更多资料的支持。

关键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抗战图书 评述

一、中心总体概况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品丰富,中心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古籍、拓本、民国图书等文献,是北京地区文物、考古、博物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典藏资料较丰富、权威的档案图书资料单位。它通过对古籍、文献、文物及文物档案的收藏、研究和综合利用,服务文博行业发展。在2015年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进程中,我们对馆藏民国文献进行普查登记,共登记民国图书14000余种,其中珍贵的民国善本图书747种、794册。这些珍贵的民国图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版本多样。其中有很多珍稀版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伪装书《大东亚战争下的国际形势》《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多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录》和1919年出版的《五四》等。

二、珍贵抗战图书述评

本文的抗战图书是指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出版的图书。我中心的珍贵抗战图书文献有

240余种,包括中国共产党人重要著作、共产党人的纲领文件、对日斗争军事经验总结等,下面就其中的重要图书做一简要评述。

(一) 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

1. 《论持久战》

毛泽东著,1938年7月解放出版社初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103页。书长18厘米,宽12.7厘米。封面右侧竖排《论持久战》书名,为毛泽东手迹,左为双行对书名的释读“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么争取最后胜利”。封面左上方注有“抗日战争研究会编抗日战争丛书2”,左下两行注明出版社为“解放出版社”和出版年代“1938”。扉页背面为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民国廿年七月初版”。目录页排列二十一篇文献,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

《论持久战》一文最早发表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第44两期合刊上。上述这本《论持久战》未标明出版的具体日期,但应晚于《解放》杂志刊登时间,应该是出版时间较早的单行本。《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04997著录^①。该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为我中心馆藏二级新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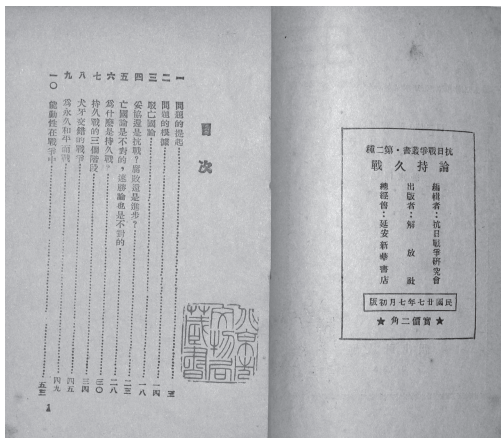


图1 《论持久战》

2.《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著，1945年5月新华书店初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61页。书长17.5厘米，宽12.5厘米。封面为橙色，上白框内横列书名《论联合政府》，下署“毛泽东著”。封面下部两行注明出版社为“新华书店发行”和出版年代“1945.5”。扉页背面为版权页，注明书名、著者、出版者、发行者、价格及出版时间。后附毛泽东肖像，目录页排列五篇文献，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01202著录^①。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于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经验，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该书出版印刷版本众多，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一书统计，仅1945年出版的版本就达16种之多。但我单位此书保存完整，且历史价值较高，也是我中心的珍贵民国文献。

3.《论新阶段》

毛泽东著，1939年1月译报国书部再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103页。书长18.7厘米，宽12.8厘米。封面为橘红色，左侧竖排书名《论新阶段》，毛泽东手迹，下署“毛泽东著”，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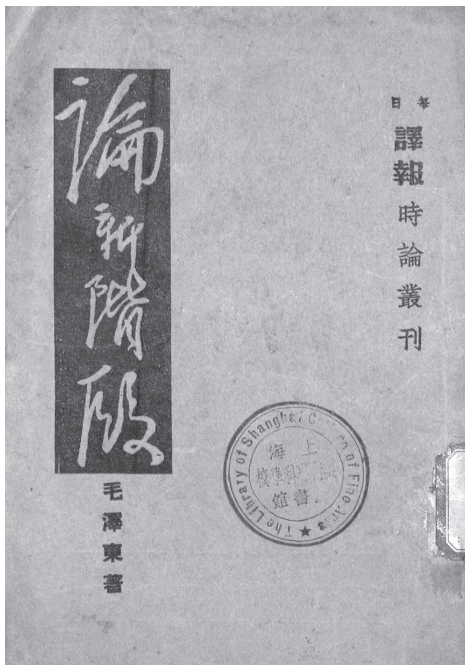


图2 《论新阶段》

竖排“每日译报时论丛刊”。目录页排列八篇文献，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封三版权页有书名、出版时间、著者、发行和定价。《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没有著录此版本。

《论新阶段》是1938年9月在延安举行的扩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做的《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中国人民正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决死的斗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做出的，在华的外国人也密切关注国内的军事时局和政治变化，才有了此书的出版发行。

4.《毛泽东选集》

存三卷（三至五），毛泽东著，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初版，繁体竖排铅印3册，卷三正文174页，卷四正文221页，卷五正文128页。书长18.5厘米，宽12.3厘米。封面横排红色书名《毛泽东选集》，下为其卷数。扉页后有毛泽东半身像，下署“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志”，背面为版权页，上有书名、编印单位、发行单位、定价、出版时间和印刷数量。每卷有单独目录。目录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后附勘误表。第四卷收2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四卷收4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第五卷收7篇：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第三卷附录：《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01118 著录^①。

《毛泽东选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于1945年前后出版，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从发展到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日渐牢固，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期，因此，《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5.《论解放区战场》

朱德著，1945年5月联政初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65页。书长17.8厘米，宽12.8厘米。该书为铅印土纸印造，封面正中竖排红色书名《论解放区战场》，右上方红色字体署“朱德著”，左下方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第二页为书名页，双黑线框内署：“论解放区战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内容分五部分：“①抗战八年；②论解放区战场；③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④今后的军事任务；⑤结束语。”扉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该书版本较多，《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3831 著录24种之多^②，但不见我单位版本著录。并且该版本在1945年5月出版，出版时间较早，属于我单位的珍贵抗战文献。

朱德同志的这篇军事报告最初发表在1954年5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5月包括解放社在内的多家出版地出版该著作。朱德的军事报告的出版

发行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指出了新阶段的军事方针，为抗战军事的全局胜利做了明确的军事路线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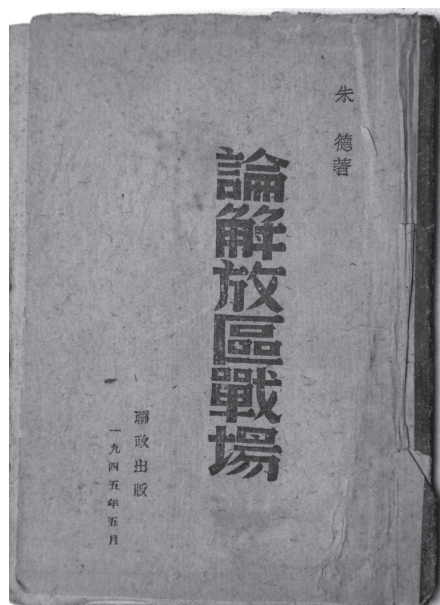


图3 《论解放区战场》

（二）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我军将领的重要著作

1.《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李放、李华春等人编译，1937年上海丁丑编译社初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294页。书长18.5厘米，宽13厘米。该书封面上部横排黑色书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下饰“统一战线舞”图片，封背是对封面图片的解读。扉页记书名、出版社、价格及出版时间，并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背面说明本书收录的内容“……由散见于英美报章和杂志的文章合译而成，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施乐及韩蔚尔的作品……”在编译者之一的李放写的序言中，介绍了书的内容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统一得以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内容分七部分：“①毛施会见记；②红党与西北；③红旗下的中国；④中国红军；⑤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⑥在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②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中国红区里；⑦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前三篇为美国记者施乐的文章，第四至第六篇为美国记者诺尔曼·韩蔚尔的文章，第七篇为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韩蔚尔的文章是在他对四川红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写出来的，是客观反映中共苏区的真实史料。毛泽东同志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的出版，也使国内外真实地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了解了共产党希望国共合作的诚心。另外，本书还有陈云化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成为了后来介绍长征的第一手史料。《民国时期总书目·世界文学》未见著录。因为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属于我单位的一级善本。



图4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2.《第八路军行军记——进展时代》

黄峰编，1938年3月光明书局初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174页。书长18.6厘米，宽13厘米。该书封面上部为“八路军行军图”，下横排黑色文字“第八路军行军记”，下为红色数字“3”。左边竖排红色书名《进展时代》，封面下部注明作者“黄峰编”。扉页记书名、著者及出版时间，并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第一页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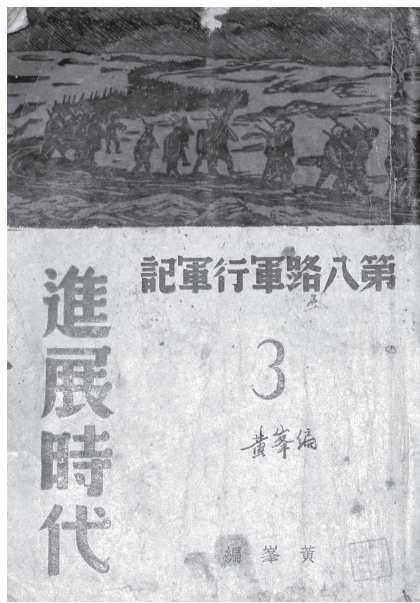


图5 《第八路军行军记——进展时代》

“编者小记”，描述了作者对当前抗战形势的分析“……从局部的抗战走向全民族的抗战”。本书的主要内容“……由一些战斗实录汇编而成，这里保留着从平型关战役以后的每一步进展的足迹”；本书内容分六部分：“①八路军是怎么战斗着的；②战场片段；③一条战线上的两种战士；④白杨林中和五台山下；⑤没有汉奸，只有民众；⑥战地总动员与八路军。”后有版权页记书名、作者、出版时间、价格等信息。《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3839著录^①。

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是对日抗战期间太原会战中的一场重要战役。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伏击日军辎重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高涨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是怎么与日军作战，怎么进行敌后工作，本书都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

3.《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廿八年至三十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编，1941年7月边区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政府秘书处发行，繁体竖排铅印 1 册，正文 118 页。书长 17.8 厘米，宽 12.8 厘米。该书封面三边为红边框，上部横排红色文字“边政丛书之二”，下双行横排黑色文字书名《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下注明报告的年代，红色文字“廿八年至三十年”。封面下部为书名的中文拼音。扉页为版权页，记书名、编者和出版时间，扉页后记详细的版权信息。目录页用蓝色文字印刷，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目录页后为林主席半身像和陕甘宁边区简图及编者“写在前面的话”，记述印刷此书的目的。封底有本书定价“\$3.00”。本书的主要内容为林祖涵主席做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政府的报告及五篇附录文章。附录文章包含“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边区工作经验”等文，使边区之外的友党和友军及广大人民能够了解边区政府的工作。《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12141 著录^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7 年 9 月在延安宣布成立，林伯渠任主席。边区面积 12.9 万平方千米，人口 200 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国家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详细

介绍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和司法等方面工作的建设情况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边区的多方面政策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4.《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张寒青编译，1938 年 4 月大时代书局初版，繁体竖排铅印 1 册，正文 124 页。书长 18.6 厘米，宽 13 厘米。该书封面上部横排黑色文字《西战场的主将》，下为红色文字“朱德”，中间是朱德像，封面下部注明作者和出版地。第三页黑线框内记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目次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本书的主要内容为记述朱德的童年、从军、德国留学、南昌起义、会师井冈山、长征、卢沟桥事变、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指挥，以及有关朱德的传说、逸话、朱德夫人康克清的介绍等内容，应该是朱德的一部人生自传。后有张寒青写的后记，说明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此书的目的，并对朱德同志有着高度的评价“……但这些朴素的文句，是许多不能想象的最生动的人生经历之辉煌纪录。这是一个无比英勇和大公无私的故事，是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是一个几乎难以使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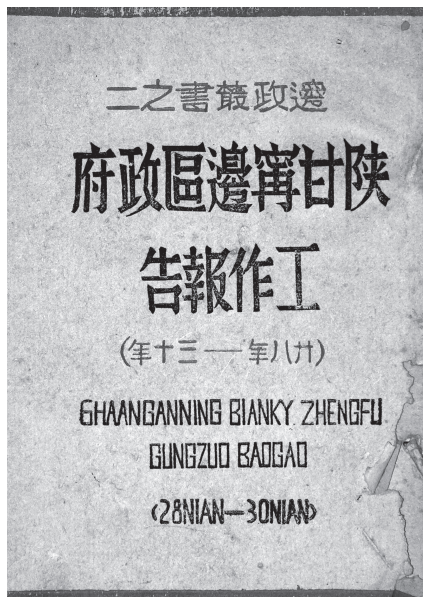


图 6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



图 7 《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46 页。



信的苦难的故事，是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伟大的主义——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主义——而丢弃了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版权页记录书名、作者、发行者、出版时间、价格等信息。

《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6710 著录^①。

作为中国十大元首的朱德总司令，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本书作为了解朱总司令的一部重要著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中心二级新善本。

5.《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

新华书店印行，繁体竖排铅印 1 册，正文 94 页。书长 16.8 厘米，宽 12.5 厘米。该书封面正中竖排黑色文字“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左下注明出版社“新华书店印行”。目录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本书主要内容分七个部分：“①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②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③战斗中成长的晋绥边区；④新山东的成长；⑤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⑥屹立在南海上的东江与琼崖抗日根据地；⑦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图。”我单位藏此本封底缺失。《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12104 著录^②。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立的反抗日军的统治而建立的根据地。1937 年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这些抗日根据地很快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到抗战后期，主要抗日根据地有 19 块之多，人口达 1 亿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达 120 多万人。这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对我军的 6 个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做了详细的叙述，肯定了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属于我中心馆藏珍贵的革命史料。

（三）抗战经验与史料著作

1.《九一八后国难痛史》

陈觉著，1932 年 9 月东北问题研究会出版，繁体竖排铅印 4 册，正文 1910 余页。书长 24 厘米，宽 15.5 厘米。该书第一卷封面为浅绿色，其他三卷为土黄色。封面右侧竖排黑色文字“东北问题研究会丛书之一”，中间竖排黑色文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其中“九一八后”为双行竖排，下横排“资料、第一卷”。左侧为“张学良题”。扉页为里外双黑线框，内黑框内竖排“国难痛史”，框外为著者。后为编者序。后为目录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每一卷卷首都有版权页，记书名、著者、校对者、定价、出版发行者等信息。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暴行，揭露了各界人士抗日的坚强决心，也涵盖了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分析、日本侵占东北前的酝酿、日军铁骑下之东北现状和日本人在东北的掠夺等。《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02768 著录^③。

本书的内容都是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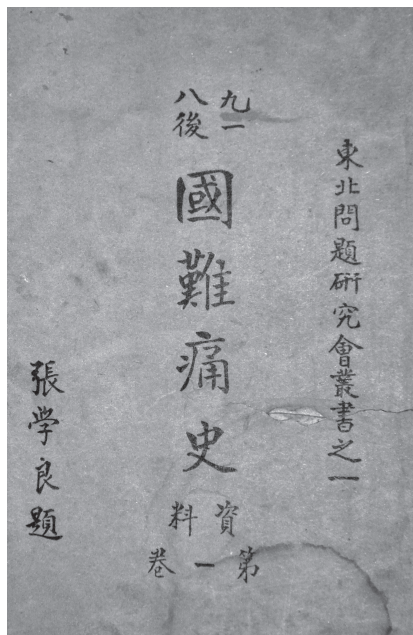


图 8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7 页。

②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44 页。

③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 页。

极高。这是陈觉先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激于爱国热情，愤于日寇暴行，在搜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有关资料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的编著工作。该书因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属于我中心的二级新善本。

2.《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抗日战争纪》

未注编者及出版年代，漳州三川印书馆印行，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56页。书长22厘米，宽15厘米。该书封面为蓝色，上部横排两行不同字体的书名《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抗日战争纪》，下面绘战斗场面图。扉页为孙中山遗像及总理遗嘱，后附九位抗战将领像。后有目次四页。正文页钤“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阳文方章。正文之后附表格若干，计50页，后附勘误表。本书的主要内容为说明抗日战争的意义及介绍淞沪抗战的战斗历程。《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未著录。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支部队，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30年番号改为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本书是对这次抗战史实详细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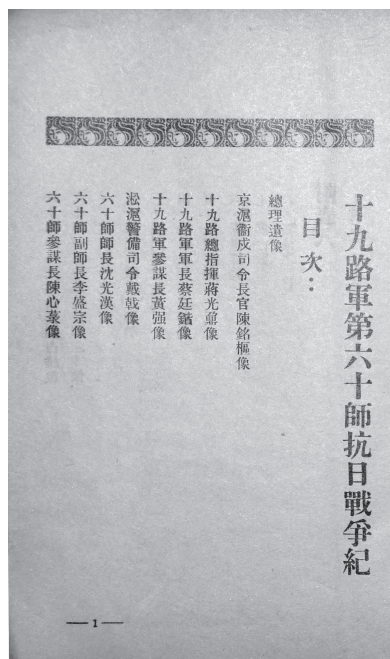


图9 《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抗日战争纪》

还包括多名抗日将领的照片和战斗经过图，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

3.《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

车向忱编，1932年7月萃斌阁军学书局再版，繁体竖排铅印1册，正文94页。书长18.5厘米，宽12.8厘米。封面右侧双行竖排黑色文字“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左侧竖排黑色文字“车庆和题”。后为苏安人写的序，介绍编辑此书的目的与意义。正文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阳文方章。封三为版权页，记再版日期、编者、出版发行者等信息。《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未著录。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车向忱先生搜集东北义军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材料，给抗日的同志们做参考。该书的出版印行，在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存亡时刻，为抗日的武装同志们提供了军事经验的参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积极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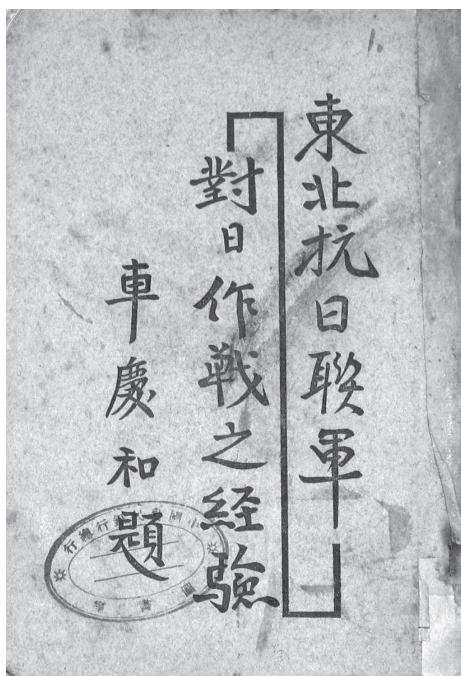


图10 《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

三、小结

我中心所藏抗战文献种类多，内容丰富，版本价值较高，除以上所详述之外，还有很多珍贵的版



本需要慢慢去进行整理和研究。之前我单位孔繁云老师和宋婷老师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孔繁云老师借助“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项目”，对我单位藏珍贵革命文献做了分析，详细介绍了16种革命文献的版本信息及其价值^①。宋婷老师列举了单位藏7种民国文献，分析了其历史价值^②。本文站在抗战文献的角度，简略地叙述了一些珍贵文献的

版本信息，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我单位的抗战文献提供一扇小的窗口，为我单位藏品的整理和研究做出积极的努力。

（张胜磊：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典藏部
保管员）

① 孔繁云：《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藏珍贵革命文献述要》，《北京文博》2011年第2期。

② 宋婷：《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民国版革命文献的历史价值》，《北京文博》2007年第1期。



浅析番禺学宫“庙学合一”

杨琳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广东广州 510000)

内容提要: 庙学合一是全国各地文庙(学宫)的共性。番禺学宫是明清番禺县的县学,作为广州现存唯一文庙建筑,番禺学宫既有文庙的共性即兼具祭祀与育才,又保留了独具特色的岭南风格。对番禺学宫的历史及“庙”“学”建制及其功能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关键词: 文庙 番禺学宫 祭祀 科举

中国文庙按性质可分为家庙、国庙和学庙三大类。家庙即孔氏宗庙;国庙则为封建帝王祭祀孔子的专用场所;学庙则是以兴学为宗旨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庙宇相结合的场所,“庙学合一”是其主要特征。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文庙都属于第三种性质。通常“庙”指祭祀孔子的建筑大成殿及附属建筑如泮池、大成门、崇圣祠等,侧重于祭祀、仪式上的功能。“学”即讲学的场所,侧重于培育人才的作用,一般指明伦堂,以及有藏书功能的尊经阁、魁星阁等。

番禺学宫是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庙建筑,是广州现存的唯一学宫。作为独具岭南特色的学宫建筑,番禺学宫既在建筑上体现孔庙建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又在功能上兼具祭祀与育才,细微方面还充分体现岭南风格。因此,对番禺学宫进行研究,发掘蕴含在传统建筑中的观念根源和文化特色,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理解儒家思想体系与科举制度,为我们的继承与创新进行一些探索。

一、番禺学宫“庙”“学”建制的发展脉络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

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一生著书立说,泽被后世。公元前479年,孔子卒于鲁,享年73岁。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三间故居立为庙,是最早祭拜孔子的庙宇。两汉以后,孔子的地位与日俱增。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亲临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公元72年,汉明帝东巡回朝时,“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此举首开孔庙讲学之先河。自此,孔庙又增学校的职能。公元153年,汉桓帝下诏修建孔庙,设守庙官,立碑刻记,这是国家设立孔庙的开端。公元630年,唐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以尊崇孔子,促进教化。“庙学合一”成为定制,世代沿袭。学庙(学宫)成为传播儒家思想,培养学子的重要场所。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谕中书省:“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①1370年,新上任的番禺知县吴忠、训导李昕在广州东城外建造学宫。洪武十三年(1380年),驻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下令扩建广州城,把宋代中城、东城、西城三城合一,辟东北越秀山麓扩建城墙800余丈,番禺学宫被纳入广州城内。从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

① [清]张廷玉:《明史》。



置略三》记载“(洪武)二十五年,知县高鸾、教谕张敬增修之,辟‘射圃’^①于学右,建‘先贤祠’于戟门左”推测,初建的番禺学宫建筑格局应该是有庙有学。

由于学宫本身是木构建筑,易受风雨和蛀虫摧蚀,同时出于完善规制的需要,番禺学宫在明代进行过大小修缮十多次,特别是万历年间五次增修,到明朝末年番禺学宫的规模“自文庙棂星门、戟门、启圣祠、明伦堂及两庑而止,而犹阁有尊经祠、有文昌、有先贤楼、有聚英亭、有敬一、有射圃、有会膳、有号舍数十间。……”^②,已经建设得十分壮观宏伟。

明末清初,广州连年兵乱,番禺学宫遭毁坏。清朝统治者在接受了儒家文化后,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开始重修。清朝前期基本是在明代所修文庙的结构基础上进行修葺,或修,或补,或添,没有大变。

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番禺学宫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耗资万金,历时十年,经数任知县。此次重修拆去明代大成殿,重新营建;将原本在东北隅的崇圣祠改建在大成殿与明伦堂之间;将名宦祠和乡贤祠分布其左右,使建筑更加规整;殿宇堂庑及内外围墙都改用砖石;在明伦堂后面创建尊经阁。此时,代表学宫建筑“学”的组成部分明伦堂,位处“庙”的组成部分大成殿之后,说明直到此时,番禺学宫的庙学建制仍然是“前庙后学”。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番禺知县张锡蕃主持重修学宫。此次重修对番禺学宫的布局进行了重大改动,在大成殿的东侧创建明伦堂,明伦堂后面建光霁堂。至此,番禺学宫布局改为明清地方庙学的正规布局——左庙右学。经过重修后的番禺学宫格局分为左中右三路建筑。中路建筑包括棂星门、

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庑、西庑、崇圣祠、尊经阁等,右路建筑包括明伦堂、光霁堂、名宦祠等,左路建筑包括节孝祠、忠义孝悌祠、乡贤祠等。同治三年(1864)左路建筑增建射圃。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废科举、兴学校的需要,在番禺学宫北部及西北部设立了第一间番禺中学堂——八桂中学。为了配合学校的建设,拆除尊经阁、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建课室和办公室,又将射圃改建为学生宿舍和操场。于是,左路建筑大部分和右路建筑的名宦祠以及中路建筑的尊经阁遭到破坏,并且此后再也未能重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番禺著名士绅丁仁长的倡议下,番禺学宫进行了史籍记载的清代最后一次重修。此次重修主要针对文庙区,“若戟门,若碑亭,若更衣之室,倾败之形皆具。事无偏废,而施工有叙……经始于光绪丁未二月,落成于其年十月……”^③。同时由于当时孔庙与皇宫等级相同,在重修时“覆屋之瓦,悉数以黄而威神”^④,即把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瓦顶全部改成黄琉璃瓦。

辛亥革命以后,广东军阀政权更迭,战火纷飞,学宫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滇桂联军盘踞广州期间,巍巍殿宇沦为驻兵场所。只要营房需要,即可拆祠毁殿,甚至劈神牌为柴火,无所顾忌。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番禺学宫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宫成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

滇桂军阀混战期间,番禺学宫沦为伤兵后方疗养院,再度遭到破坏。

陈济棠治粤期间,倡导读经,恢复祭孔,番禺学宫重竖孔子和先贤先哲的牌位,学宫兴盛一时。期间番禺县长严博球收回番禺学宫的管理权,将正座前部进行了装修粉饰,作为番禺县银行的办公场

① 明代学宫多设射圃,供生员练习弓矢之用。

② [清]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县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四》,清·同治十年(1871年)广州光霁堂刻本。

③ [清]梁鼎芬修,丁仁长、吴道镕等纂:《番禺县续志》,卷十《学校志一》,民国二十年(1931年)年重印本。

④ 同上。



所；光霁堂作为县参议会的办公地点；名宦祠充作禺北学会；东邻芳草街的东路建筑全部借给中山大学辟为预科学生宿舍。

1953年，为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革命圣地，政府对番禺学宫进行大规模整修，按当年农民讲习所的布置原样复原，将学宫开辟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番禺学宫目前右路建筑尚存头门、明伦堂、光霁堂和石板路，左路仅剩头门，而中路建筑尚有棂星门、泮池拱桥、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东西庑廊等，虽历经沧桑，却斗拱飞檐，风采依旧。

二、番禺学宫“崇祀育才”的作用

在庙学时代，其校园是由列为祀典活动的祭孔庙宇（大成殿）与官学教化之所（明伦堂）合而为一，其目的是利用儒学来强调亲亲之仁及君臣父子间等级差别以建立起社会秩序，并通过“释奠礼”这种常行于学校中的“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而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学宫是孔庙的存在依据。

1. 祭孔圣地

文庙的祭祀功能通过既定的建筑形制来体现，包括祭祀孔子的建筑大成殿及附属建筑如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崇圣祠、东西两庑等。整个建筑群遵循突出中心，然后设一中轴线，两旁协调相配的原则。大成殿是整个主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也是文庙建筑的精髓所在。殿内供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或木主，孔子端坐正中，四配、十二哲两两相对。番禺学宫亦遵从孔庙建筑的主体格调，同时运用砖雕、石雕、陶塑、灰塑等建筑艺术突出岭南地方特色。

文庙最重要的作用是祭祀孔子，每年2月和8月的上丁日是祭孔日。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称为“释奠礼”。文庙的祭祀有严格的程序，整个过程由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赐福

胙、撤饌和送神八部分组成。参祭人员的称呼由承祭官、陪祀官、分献官、赞引官、读祝生、乐舞生等组成。

根据同治《番禺县志》记载，番禺学宫的祭祀程序大致如下^①：

一、祭祀前两天，承祭、分献各官用白纸将祭祀祝文糊好，送至文庙神库黄案上安设。

二、祭祀前一天，承祭官身穿官服到孔庙上香并监视牲畜宰杀情况。

三、正祭日，分献、陪祀各官入两门序立。承祭官在赞引官的引导下洗手后站在台阶下。乐舞生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分献官、陪祀官就位。

四、赞引官赞：“就位。”承祭官站在祭拜队伍的最前面，陪祀、分献各官随后。开始迎神。

五、典仪官唱：“举迎神乐，奏昭平之章。”典礼正式开始。赞引官赞：“跪叩兴。”承祭官、陪祀官、分献官全都行三跪九叩礼。

六、奠帛，行初献礼，奏宣平之章。赞引官引导承祭官从东面台阶上由左门进殿，来到孔子位前跪奠帛、献爵。

七、赞引官赞：“赴读祝位。”引导承祭官就读祝位。读祝生读完先师的文辞，捧祝文放置祝案前的帛匣内。各官行三叩头礼。

八、承祭官给四配奠帛、献爵，跪拜、上香仪式均与祭拜先师相同。四配祭奠完毕，分献官祭拜十二哲、两庑，仪式与四配相同。

九、赞引官赞：“复位。”并引导承祭官、分献官退出大成殿，回到原来的位置。音乐停止。

十、典仪官唱：“行亚献礼！”奏秩平之章，承祭官、分献官献爵于左如初献仪式。复位。

十一、典仪官唱：“行终献礼！”奏叙平之章，承祭官、分献官献爵于右如亚献仪式。复位。

十二、典仪官唱：“赐福胙（肉食）！”赞引官引导承祭官行至殿内受福胙位。承祭官跪下受爵、受胙，行三叩礼后复位，行谢福胙礼。

^① 根据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置略三》整理。释奠先师的仪程从献牲进香，礼仪的增减，到六佾八佾，舞乐安排，再到拜礼占位的仪式细节，都根据历代对孔子的尊号变更，而有所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改变，迎神奠帛，三献读祝，撤饌，送神的基本礼仪形式，却是几千年来一脉相承。



十三、典仪官唱：“撤饌！”奏懿平之章。撤饌完毕，音乐停止。

十四、典仪官唱：“送神。”奏德平之章，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同时行三跪九叩礼。

十五、典仪官唱：“捧祝、帛、饌香，恭送燎位！”祝在前，其次是帛，捧饌香官在后。一行依次由大成殿中门，沿中路出，送至燎位。承祭官，退向西侧站立。

十六、典仪官唱：“望燎！”赞引官引导承祭官至望燎位。祝帛焚完，音乐停止，官员人等退下，祭祀典礼结束。

从上述祭祀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出，祭奠先师孔子、四配时，是由承祭官担任献礼，而十二哲、两庑则是由分献官献礼。祭祀程序、等级也有严格的制度。如官员释奠先师，只能从大成殿的东台阶上，由左门进入大殿祭拜，但如果由皇帝亲自释奠先师，则是从大成门中门，沿中轴路直行，由中门进入大成殿祭拜。

2. 育才之所

文庙建筑的另一组成部分“学”，即讲学明伦的场所，侧重培育人才的作用，一般指明伦堂，以及有藏书功能的尊经阁、魁星阁等。明伦堂面阔有三间、五间、七间不等，主要依据古代行政级别高低来划分。县学的明伦堂为三间，如番禺学宫明伦堂。

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作为广州官方教育重要场所的番禺学宫，是学子入仕的晋升之阶。清代岭南一些名儒如陈衍虞^①、莫元伯^②等都在番

禺学宫担任过学官，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番禺学宫的入学条件有严格的门槛：只有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道考试取得生员资格才可入读学宫。番禺学宫的生员属县学生员。各县学程序一样，分大、中、小学三种规模取进生员。番禺学宫为大学，取生员40名。新生入学须绕泮池一圈，即“游泮”，之后到大成殿祭孔，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到明伦堂向老师行一跪四叩礼。

学宫生员有文武之分，文武生员课业不同。西路建筑的射圃是武生员习武之所。除骑射外，教以五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文生员课程有《御纂经解》《性理》《诗经》《古文诗》、“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生员有月考和季考，除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每月还集诸生于明伦堂，诵政府颁布的卧碑文及训饬士子文^③，谓之月课。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上课三次的给予警告，终年无故不上课的即取消秀才资格。

番禺学宫生员走上仕途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参加乡、会试中举人、进士，这是主要出路；另一种是通过贡举成贡生入读国子监，肄业再酌情授官。

据统计^④，番禺学宫生员中举人的有一千四百多人，被授予县官、学宫教官等职（含进士入仕者）的有九百多人，出仕率60%左右。如果举人参加会试几次不中，则可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途径入仕，人数有六百多人，入仕率40%左右。

乡试第二年，各地举人到京师应进士之试，称会试、殿试。会试是集中会考之意，中试者为贡士。

① 陈衍虞（1603—1688年），字伯宗，号园公，广东海阳（今潮安）人。1655年出任番禺学宫教谕（即“正式教师”，宋代开始设置，负责教育生员）。在任学官八年期间，向他求学的士子众多，并著有《禺山草》。该诗文集不仅记录他在学官任上的心情意志、学问交游，还保留了清初广州风情风貌的宝贵资料。

② 莫元伯（1753—1815年），字台可，号善斋，广东高要人。嘉庆年间，担任番禺学宫学官八年，热心教学，推行各项教化措施。慕名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官舍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很多学生就在学宫旁租赁房屋，比邻而居。1815年，病逝于家乡，谥号“孝文先生”。

③ 顺治九年，礼部奉旨规定八条规则，刻立于学宫，令全国士子诵习奉行，谓之“卧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四十一年颁“训饬士子文”。雍正年间，更把康熙时十六条“圣谕”大为发展，演化为“圣谕广训”，并且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1740年），又有《钦颁训饬士子文》。这些，都是生员所必须尊奉，也是经常进行考课的内容。

④ 梁惠彤：《试论番禺学宫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载《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论丛》第一辑。

取得贡士资格后，方能参加殿试。明清科举殿试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明代番禺学宫约有94人中进士，清代番禺学宫约有115人中进士。现列表如下^①：

表1 明番禺学宫进士人数表

年号	名次	人数
洪武	三甲	3
永乐	二甲	2
	三甲	5
景泰	三甲	3
天顺	二甲	2
	三甲	2
成化	探花	1
	二甲	1
	三甲	8
弘治	二甲	2
	三甲	4
正德	二甲	2
	三甲	2
嘉靖	二甲	4
	三甲	17
隆庆	三甲	1
万历	探花	1
	二甲	4
	三甲	16
天启	三甲	1
崇祯	二甲	1
	三甲	5
	特用进士	6

表2 清番禺学宫进士人数表

年号	名次	人数
顺治	三甲	1
康熙	二甲	3
	三甲	3
雍正	二甲	2
	三甲	4
乾隆	状元	1
	二甲	2
	三甲	12
嘉庆	二甲	4
	三甲	7
道光	榜眼	1
	二甲	15
	三甲	1
咸丰	二甲	5
同治	二甲	10
	三甲	2
光绪	二甲	31
	三甲	11

根据表1和表2，可以看出：

（1）每一个朝代的初期，番禺学宫生员中进士者都较少，到中期人数渐渐增多，后期中进士人数最多，都能占50%以上。一方面说明政治、经济的稳定对人才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侧面反映随着王朝的稳定、教学的兴起，番禺学宫的教育制度也日趋完善，教育质量也逐步提高。

（2）清代番禺学宫中进士人数多于明，而且清进士中二甲居多，明进士则主要集中在三甲，说明清番禺学宫的规模、教学质量都要高于明。此外，番禺学宫的进士人数主要集中在清道光、光绪年间，说明这段时间是番禺学宫的全盛时期。

（3）明清两代，番禺学宫出过一名状元^②，一

① [清]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县志》，卷十一《选举二》编制。

② 即清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状元庄有恭。庄有恭（1713—1767年），字容可，号滋圃，广东番禺人。以番禺学宫拔贡生的身份考授宗人府教习。清乾隆四年（1739年）成为己未科状元。累官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湖北巡抚、浙江巡抚、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等职。他任封疆大吏十余年，以救灾抚恤和兴修水利著称于世。1753年曾撰写《重修番禺县学碑记》。



名榜眼^①，两名探花^②，而当时整个广东只有六名状元，六名榜眼，七名探花，可见当时番禺学宫在广东影响力甚大。

清代后期，以礼乐等为核心的教学内容缺少实用价值，逐渐消亡，学宫的教学只剩考课，实际上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科举经广学校”，番禺学宫的教育职能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八桂中学，但春秋祭孔活动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滇桂联军盘踞广州期间，在学宫驻兵，番禺学宫被拆祠毁殿，甚至所有神牌被劈为柴火，祭孔活动亦无可能。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下令恢复对孔子的祭祀。随着陈济棠下台，祭孔活动也随之冷却。

三、结语

文庙，最初是用以祭祀孔子的纪念性建筑。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演变为因文庙而设立学校或因学校设立文庙的“庙学合一”制度，背后折射的是孔子和儒家学说地位的不断上升，凝聚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上层统治者对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认同、推崇和褒扬。各地的文庙也因传播“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而超越时空的变化，保持建筑规制千年不变。

正是因为文庙是传播儒家精神信仰的重要场所，在促进儒家思想的深入和普及、促进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庙得以与历代封建王朝所实施的正统儒学教育紧密结合，成为古代各级官学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地方各府、州、县施行礼乐教化的重心。车腾芳在《重修番禺学宫碑记》中也明确指出学宫的价值核心是“以崇先圣、以育人材、以昭化治”^③。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科举与学校融为一体，文庙作为教化和培育士子的场所，是士子入仕的必经途径。番禺学宫作为明清时期番禺县的县学，不可避免成为科举的附庸。番禺学宫的生员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有的在文化传播、培养人才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但在科举制度的成熟发展的明清时期，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僵化，官本位主义也日益严重化，尤其是八股取士，形成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在这个大环境下，番禺学宫的生员也无外乎每天死啃四书五经，整日沉醉于揣摩八股文，片面追求八股入仕，忽略了在其他文化领域上的研究，没有创新精神，最终被历史的浪潮所淹没。

（杨琳：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文博馆员）

①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一甲榜眼许其光。许其光（1827—？），字懋昭，号涑文，广东番禺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乡试副考官、福建道监察御史，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编纂咸丰皇帝《圣训实录》有功，加四品。编纂《皇清奏议》，加三品顶戴。后任广西思恩府知府、直隶候补道，深得李鸿章器重。因病请假回乡医治，适士绅筹设“册金局”为新进邑学各生印卷之资，许其光为其奔走出力，举为学海堂学长。假满旋津，病卒。

②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科探花涂瑞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探花陈子壮。涂瑞（1447—1493年），字邦祥，广东番禺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涂瑞为文汪洋宏放，性格豪宕不羁，顷刻数千言；书法道丽，为一时之冠。陈子壮（1595—1647年），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人。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等职。永历元年（1647年），广州被清军攻陷，陈子壮临危不惧，坚持抗击清军，殉国于广州东郊。后被追奉太师上国柱，特进光禄大夫，中极殿大学士和吏、兵二部尚书忠烈侯。有《礼部存稿》存世。后人立有宗祠纪念。

③ [清]车腾芳：《重修番禺学宫碑记》，梁鼎芬修，丁仁长、吴道镕等纂：《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六《金石志四》。



社会教育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潘黎黎

(陈云纪念馆 上海 201799)

内容提要：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的物质与文化载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当代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积极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对在校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 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的物质与文化载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因此，如何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当代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发挥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的作用。红色资源作为优质高等的教育资源，其丰富的含义和内容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一致，其中所蕴含的

爱国主义内涵和精神及其在新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素材，具有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将红色资源渗透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一) 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并且要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赋予我们的重要战略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核

^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1版。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广泛普及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充分发挥其功能效用的有效途径与关键环节。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宝贵财富，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核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体现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革命精神；体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体现了共产党人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学校应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激情，把校园建成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强阵地。

（二）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当代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红色文化象征着先辈们在革命中的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创新素质、健康情感等，这些都说明红色文化自产生那天起，就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这种功能为学校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发展方向。红色文化就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渊源、精神纽带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是一脉相承的，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对红色文化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和弘扬。

博物馆、纪念馆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展示人类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近年来，各大博物馆和纪念馆，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一方面通过改进展示方式，为学生提

供良好的育人阵地，吸引广大学生走进纪念馆；另一方面不断拓宽思路，拓展教育空间，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探索适合学生特点的教育形式，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坚持搞好阵地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巡回展览等系列活动，构建爱国主义教育新平台。

（三）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迅速传入我国，一些消极观念和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使得正在形成个人三观过程中的学生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的人生价值观的出现，使部分学生的三观越来越偏离科学的轨道，所以，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通过开展红色资源教育这一重要渠道，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三观将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和利益观，与红色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本源优质资源和优秀文化根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爱国主义教育是所有国家和政府都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不同。革命的历史风云已远去，但那些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却永不过时，在当今社会仍需发扬光大。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在



新的历史时期,博物馆、纪念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立足阵地,积极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为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贡献力量,是各大博物馆、纪念馆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 “请进来送出去”模式

这是大部分纪念馆都会运用的方式,在做好阵地宣传的同时,不断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推出切合时代主题、平实生动的展览大纲和鲜活的图片资料,这种以展览来推进的模式,摆脱了以往的课堂式理论灌输形式,可以极大地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吸引他们自发地前往观看。为配合专题巡展,纪念馆还积极整合现有社会教育资源,将纪念馆特有的精神文化产品以菜单式配套服务向学校推广。譬如,陈云纪念馆自 2012 年以来,相继在上海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 32 所高校推出了“学党史、讲陈云、迎接党的十八大——《陈云与中国共产党》”“为民、务实、清廉——《陈云生平业绩展》和《陈云文物展》”。由于纪念馆在专题展览策划时,就将主题与宣传时势相结合,十分“应景”式的主题宣传受到了所在高校师生们的欢迎,也成为该校形势宣传的抓手和载体。为配合专题巡展,纪念馆还积极整合现有社会教育资源,将纪念馆特有的精神文化产品以菜单式配套服务向学校推广。例如,讲座是展览讲解的扩展和深化,具有主题性、互动化的特点。纪念馆的讲课队伍也顺势走进了高校、走进了课堂。近年来,配合展览,举办了多层次的专题讲座已经多达几百场,在深入宣传陈云的求真务实、信念坚定等高尚品格和陈云的党建思想、经济思想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推出一堂陈云生平业绩思想的党课报告,纪念馆还设计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一部电影《风起云涌》展映(DVD)、一次纪念陈云诞辰 110 周年诗词楹联书画征集活动、一次赴陈云纪念地考察、赠送一套有关陈云的书籍活动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 建设“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模式

纪念馆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天然的教学实践课堂,它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实践能力。所以,一些纪念馆和当地的中小学、大中专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将自己也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去,努力开辟学生第二课堂,启发他们的兴趣和思考。梅园新村纪念馆通过与学校结成对子,创建“周恩来班”拓展教育阵地,使“周恩来精神”在学生中深入人心。每年在周恩来的诞辰及忌日,都会邀请“周恩来班”代表来馆举办纪念活动。每逢重大节假日、党的生日等重要日子,会以举办特色展览、策划专题活动等方式,举行纪念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经常不定期举办中小學生红色之旅夏令营,活动主题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题材直接挂钩,让学生们在玩乐中直接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滋润。此外,陈云纪念馆联合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教育电视台于每年的下半年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举行一场红色经典诵读活动。通过诵读伟人们的事迹,师生共同参与,体验“伟人精神进高校”主题活动的成果,不断延伸专题展览成效,进一步凸显巡展的效果,使“伟人精神进高校”主题活动充分发挥红色经典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和激励人的作用。还从学校招募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参与日常讲解导览,为观众答疑解惑,使学生们在为观众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三) 运用“文艺宣传”模式

除了传统的阵地宣传,近年来许多纪念馆采用多种文艺形式宣传红色文化资源,寓教于乐,将宣传触角无限延伸,适应了学生多元化的要求,一些富有感染力的文艺作品和活动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好评和欢迎,也体现了纪念馆工作的鲜活力和创新力。鲁迅纪念馆组织学生观赏学习历年鲁迅课本剧,孩子们还可以现场自由组队,自编自导自演鲁迅作品或其他经典作品课本剧(片段),加深对课本作品的历史背景及人物性格的了解;陈云纪念馆近年来拓展宣传样式,如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认识水



平，联合上海木偶剧团共同创排了情景木偶剧《童年的足迹》，通过立体互动的表现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台词、色彩绚烂的舞台背景，生动地展现了陈云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该剧于2009年11月荣获金玉兰“优秀剧目奖”；于2010年5月获“第八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活动特别纪念奖。此外，与上海市话剧中心共同创作了大型话剧《共和国掌柜》。木偶剧和话剧这两种演绎形式，也成为纪念馆重要的宣传载体。另外，曲艺党课《陈云的故事》由上海曲艺家协会创作，纪念馆将这些文艺节目送进各个学校，以这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将红色资源送到学生身边，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四）建立“合作科研机制”模式

纪念馆加强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注重纪念馆与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互动作用，建立馆校合作科研机制，整合文化研究资源，实现纪念馆文化发展与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共赢战略，这也是当下实现纪念馆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与吉林大学博物馆学系合作，编写了《2002 博物馆公众研究——以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为例》一书，该书是当时国内对博物馆公众研究进行得最全面、最系统、成果最显著的理论著作。这就充分体现了馆校合作的资源优势，从而深入地挖掘了博物馆的文化内涵。2007年10月，该馆又同大连大学韩国学研究院协商，双方决定互设合作科研基地，使双方在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成为东北乃至全国的一个重要基地，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再如，陈云纪念馆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陈云研究基地，通过课题合作、学术活动、出版刊物、人才培养、师资交流等形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陈云生平思想的宣传研究搭建完美的共享平台；陈云纪念馆还与周边的社区学院对接，共同开发体验式课程；邀请全国各地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从而凝聚了一支稳定的陈云思想研究队伍。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结与思考

红色文化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和努力而形成的产物。纪念馆作为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在应对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宣传上，要积极把握机遇，立足实际，挖掘教育资源，开创红色文化进校园新模式，在增强学生思想信念教育方面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探索。

第一，要树立服务理念，完善服务体系。

首先，应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为纪念馆教育的重点，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其次，可以成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班子，由馆领导牵头，研究人员与纪念馆教育工作者参与，根据青少年群体的需要，专门策划展览与活动。如宋庆龄陵园，根据青少年的参观特点，陈列展览变原来的编年体式展览为现在的专题式的生平事迹展，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精练。幻影成像《广州脱险》采用最为先进的电机转盘系统，还原了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和历史事件全过程，深受广大学生观众欢迎，高新科技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展览的形式，也增强了展览的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使学生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体会到宋庆龄的崇高品质和深邃思想，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同时，领导可以定期去当地教委或教育局、学校走访或者邀请他们来馆召开座谈会，了解青少年的知识结构、文化需求、价值取向和素质状况等问题及纪念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学校对纪念馆的企盼等，对如何拓展纪念馆与学校的互动氛围，如何向学生提供更广、更深的红色文化资源等问题进行研讨，并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第二，要因人施教，增强教育效果。

据陈云纪念馆2015年观众调查问卷分析观众构成——年龄在16周岁以下占3.3%，16~34岁占37.2%，35~59岁占48%，60周岁及以上占11.5%。要吸引青少年自觉走进纪念馆，接受红色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纪念馆就必须关注和研究他们的喜好和需要，主动为他们服务。可以



聘请专家或者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开展讲座，组织纪念馆教育人员学习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学、青少年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分析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全面了解青少年群体，才能实现因人施教，增强教育效果，充分发挥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如陈云纪念馆实现了由原先的“千人一面”，到如今的“因人施讲，分众讲解”，根据参观对象不同，专门撰写了通用版、未成年人版及领导接待版三篇不同类型的讲解词。并且，设计讲解服务菜单，推出菜单式讲解服务，形成了由陈云生平业绩展、文物馆、碑廊、故居、长春园、纪念馆文化创意街等十二个场景组成的多线路组合套餐供观众选择。

同时，也应当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他们向青少年传授红色文化教育的具体内容。纪念馆可以组织面向教师的培训活动，提高教师对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纪念馆工作的认知程度，主动提供纪念馆陈列展览中与课堂教育相关的资料，作为教师的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要与时俱进，构建青少年参与机制。

应将纪念馆传统办展、讲解—青少年参观、倾听的静止模式，与时代结合，全面更新为鼓励青少年体验、参与的动态教育，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完善和拓展青少年积极参与、表达意愿渠道。围绕各年龄段孩子最关心、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精心策划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网络宣传活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探索以微博、微信、微

聊、YY 聊天室等新媒体为载体，吸引青少年广泛参与知识问答、问卷调查、征文比赛及各类线上游戏等，既体现经济、环保，又可以让大家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看到，受众面广。目前，一些纪念馆开展实施的志愿者招募、培训，参与讲解也是成功的案例之一。陈云纪念馆还向青浦区的中小學生发放了开放式研究课题，积极鼓励青少年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纪念馆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来，并且，积极开创新的共建模式，促进与共建单位的共赢发展。探索出送展览、送课程、培训学生讲解员、仪式教育、主题活动、学生义务劳动、研究微课题七位一体相结合的馆校合作新模式，使广大青少年学生更能够深入走近陈云、了解陈云、学习陈云，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其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纪念馆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当今社会形势、当代青少年自身的特点及纪念馆自身的优势资源出发，开动脑筋，寻找最合适的方式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纪念馆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重新定位当今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策划适合他们的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启发他们灵魂深处的共情，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潘黎黎：上海陈云纪念馆文博馆员）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王春山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 400043)

内容提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是博物馆教育的主要方面与重要环节，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提升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的重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青少年教育方面起步较早，在青少年教育的组织机制建设、能力水平建设和教育项目凝练与标准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对革命遗址类博物馆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方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红岩 革命博物馆 革命遗址 青少年教育 实践

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专题调研工作，明确了进一步完善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国民素质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的方针，但由于缺乏指导性文件，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直到2015年，国家文物局与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文物博发〔2015〕9号），第一次明确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主要任务与保障措施等，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方向，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也越来越凸显。在此过程中，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早在国家文物局启动调研工作时，就立足革命遗址类博物馆自身的资源特色与资源禀赋，在青少年教育功能提升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了自身的独特之路。

一、注重协调机制建设，确保青少年教育工作有效开展

革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一直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着力探索的方向，为确保青少年教育工作扎实、有序推进，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列为专项工作，成立了馆领导挂帅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提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落实和承办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具体事务。办公室内设教育资源调研及项目策划组、教育项目试点工作组、教育制度机制建设组及青少年教育文创产品开发组等，确保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提升工作的有序实施。同时，馆内相关部门全员动员，由社会教育工作部牵头，科研处、研究部、参观接待部、特展馆、产业集团全面参与，争取在青少年教育项目凝练、项目打造、项目实施、体制机制研究及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都能出精品、出效益、出成果，建立起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全员参与新模式。另外，为确保青少年教育的科学实效性，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主动出击，争取同有关教委、学校、街道、社区等单位的联动配合，特别是加强了与重庆市内革命遗址资源丰富的区县联动配合，建立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的联席配合机制，与重庆市渝中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合川区、江津区、开州区、武隆区、秀山县等区县纪念馆、革命遗址联动配合，探索革命遗址类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方式、方法与路径。



二、立足资源特色，提升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能力

（一）以红色资源为依托，加强青少年教育活动的组织与策划

革命遗址类博物馆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德育教育中的引领作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依托自身的红色文化资源特质，加强了青少年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把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作为社会教育工作的重点工作，并把博物馆教育与学校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校外活动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举办各类教育活动，自 2015 年以来，开展了《革命烈士在我心中》《学先烈、讲传统、树理想》《讲红色故事》等红色文化征文活动，开展了《红岩精神伴我成长》等青少年演讲比赛，策划组织了重庆通信学院毕业生宣誓大会、重庆大学青年团万人主题会、重庆市大中小学生“读好书、强信念、跟党走”主题活动等青少年教育活动和青少年研学活动。通过活动的组织开展，达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目的，有力提升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能力。

（二）以国家 AAAAA 旅游景区、研学旅游基地建设为契机，推动青少年研学旅游发展

2014 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首次在国家层面倡导富有中国特色的研学旅行，并将研学旅游看作我国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顺时而动，积极申报“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的试点单位，在建立“革命遗址类博物馆教育活动项目库”和“加强馆校合作机制”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与探索，以此为基础，并以创建国家 AAAAA 旅游景区、研学旅游基地为契机，积极推动青少年研学旅游发展。一方面，依据资源特色，积极设计研学旅游项目，凝练打造了“红岩小小导游员”研学项目、“红色小记者研学体验营”

项目、“小萝卜头和我”游学体验项目、“红岩宣讲团”教育项目、“红岩读书月”青少年教育项目等一批青少年研学旅游精品项目；另一方面，加强研学活动的宣传推广，组织编制《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青少年研学接待手册》，手册中对红岩文化、青少年研学项目做了翔实的介绍，并采取主动走出去的策略，与学校、部队、社区、军营等青少年集中场所加强联系互动，共建教育项目、推介研学活动；另外，为提升青少年研学旅游成效，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加强了各项保障措施。例如，安全问题上除了加强常规安全保障外，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在研学场地区域划分、疏散通道设置、救护医疗甚至研学活动区厕所蹲位配比等方面做了预防准备工作。另外，为了不因为人数增加而降低研学活动质量，实施精细化管理，确保青少年研学旅游的体验度，博物馆依据教育活动对象的年龄结构，实施分众管理，保障了研学旅游的体验效果。

（三）以红色展教资源开发为抓手，加强青少年教育产品的研发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博物馆文化的浓缩与延伸，是博物馆青少年科普教育的重要手段，本着让文物、文献“活”起来，“将博物馆带回家”的理念，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把青少年科普文创产品的研发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强研发力度。

一方面，重点开发三大文创产品。老照片讲故事系列产品、智慧读本系列产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动漫故事绘本产品是重点开发的三大文创产品。智慧读本系列产品以笔记本的形式，利用二维码技术，将用户与红村现有的数据库相联系，让笔记本成为可以进行记录、收藏、查询、分享、互动的智能产品；老照片讲故事系列产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动漫故事绘本产品，利用老照片、漫画讲述历史故事，通过看老照片、画漫画、讲故事、记笔记，寓教于乐，让青少年儿童愉快、互动、有效地吸收红色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着力打造 7D 互动影院和中国红村游手机 APP。在红岩文化景区建设 7D 互动影院，让青少年能够成为电影中的角色，介入影片事先设



置的环境与剧情,可以让青少年身临其境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中国红村游手机APP(IOS版APP和Android版APP),利用新科技技术,通过手机网络,将语音导览与微博微信等媒体链接,让青少年在参观的同时能更深入、更广泛地感悟红色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另外,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在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科普展教品方面下大力气,着力推动博物馆与科技、教育、传媒合作。与教育部门合作编制青少年教育展览提纲、青少年教育读本。与科技部门合作制作科技含量高的青少年教育产品,把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传播技术有效结合。与传媒合作开发红岩系列图书、红岩系列影音、光盘文创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青少年的文化需求。

三、结合研学旅游,积极凝练与打造青少年教育项目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载体,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经过充分的调研与论证,结合青少年研学旅游,着力凝练与打造“红岩文化特色班队”馆校共建项目、“革命故事宣讲团”红色文化宣讲项目、“红岩文化室”红色文化阵地项目、“小小讲解员研学班”游学项目、“红色小记者研学体验营”游学项目等青少年教育项目,并进行标准化与品牌化的建设。

(一)“红岩文化特色班队”馆校共建项目

“红岩文化特色班队”馆校共建项目旨在充分利用革命文化资源,在重庆市中小学深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自1992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重庆通信学院建立第一个“红岩班”以来,红岩文化特色班队已经历了24年的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功能,是目前革命遗址类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效益最好的青少年教育项目。

红岩文化特色班队主要以“红岩班”和“周恩来班”为主要形式。“红岩班”自创建以来就在重庆市和全国部分省市的大中小学连续不断地开展争

创“红岩班”的活动,“红岩班”的学生读“红岩”书、写“红岩”日记,参加博物馆的义务劳动,担任博物馆的义务解说员,目前后勤工程学院、重庆通信学院、三医大、重庆大学、重庆医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二十九中、长寿中学、人民小学、谢家湾小学、烈士墓小学等“红岩班”创建学校已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建立了长期的馆校共建关系。

“周恩来班”的创建,是在“红岩班”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和补充,旨在以丰富多彩的体验教育活动,展现周恩来同志独特的人格魅力,以此感染影响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红岩精神融入青少年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去,形成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带动和影响大批青少年群体。

为进一步将红岩文化特色班队建成标准化的青少年教育项目,2015年以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主题班队中着重理顺特色班队管理,建立、完善了《红岩班队、周恩来班管理评价制度》,并在“红岩班”“周恩来班”中培养创建领航员和志愿者,同时加强了“红岩班”“周恩来班”教育内容的标准化建设,有效开展了“六个一”系列教育活动,即每周开展一次红岩早读,每年阅读一本红岩好书,每年组织一次红岩主题演讲,每年召开一次主题班队课,每年组织一次红岩主题活动,每年办一次红岩主题墙报。通过“六个一”系列教育活动,将红岩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增强了红岩精神的教育意义,扩大了红岩精神的教育范围,感染影响了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红岩班”和“周恩来班”通过组织“争当红岩解说员”“讲红岩故事”“红岩诗歌朗诵”等主题活动,把红岩精神融入自身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小事中去,在中小学校形成了较为良好的班风和学风,起到了以点带面、扩大影响的作用,增强了红色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和灵魂塑造性。

(二)“革命故事宣讲团”红色文化宣讲项目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故事宣讲团”于2013年组建,宣讲团以讲述故事、情景诗颂、知识问答等方式,进社区、进军营、进学校,为群众、



为官兵、为师生讲红岩史，传红岩情，播红岩魂，社会反响热烈。为加强与探索革命遗址类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能力，从 2014 年开始，结合青少年教育的特点，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故事宣讲团”逐渐增强了主要针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宣讲探索，逐渐走出了一条革命故事进校园的青少年教育路径。革命故事进校园青少年宣讲教育活动主要包括红岩诗歌故事会、红岩知识问答两个主要环节。其中，红岩诗歌故事会以讲述红岩故事及朗诵红岩经典诗歌为主，故事内容短小精悍，情节跌宕起伏。《狱中绣红旗》《用生命拉响的警报》《百万富翁的无产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在理想与金钱的天平上》《新中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等对青少年具有浓烈革命传统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的红岩革命故事，不仅让青少年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险和困难，也让他们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情怀，感受到青少年的责任、使命与人生价值。

“革命故事宣讲团”在对青少年的宣讲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在宣讲内容与宣讲形式上力争找到青少年容易接受的最佳方式，并在宣讲过程中逐步加强对革命故事宣讲的标准化建设。2016 年，“革命故事宣讲团”对故事内容、诗歌朗诵的形式重新做了编排，增加了红岩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及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形式，深受青少年喜爱。目前，“革命故事宣讲团”已先后走进重庆市的社区、军营、学校开展了 80 多场宣讲，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既丰富了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又有效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红岩文化室”——红色文化阵地建设与教育项目

如何将红色文化延伸到社区、军营、学校，如何渗透到边远地区、偏远山区，一直是革命遗址类博物馆不断探索与解决的问题。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的“红岩文化室”红色文化阵地建设与教育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红岩文化室”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着重打造的红色文化传播阵地，目的是充

分运用红岩文化史料，有效拓展红岩文化的宣传教育延伸平台，特别是可以将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到边远地区、偏远山区，增强红岩文化的辐射能力。截至 2016 年 9 月，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投入 200 多万元资金，先后在重庆市的璧山、江津、涪陵、武隆、铜梁、城口、石柱、秀山、万盛、万州、綦江及西藏昌都等地建立了 25 个“红岩文化室”，在重庆市的覆盖区县达到 60% 以上，实现了小规模、广覆盖、深传播，将固定的博物馆变成了一个个流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将红岩精神和红岩文化送到偏僻山区，为贫穷地区的青少年了解红岩、走进红岩提供了便捷的平台。“红岩文化室”自创建以来，通过开展“红岩杯·红岩文化室青少年演讲比赛”“山里娃娃看红岩”等一系列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改变了传统革命教育过于严肃、单调的宣传模式，使红岩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截至 2016 年年底，红岩文化室每年平均接待观众量达到 50 余万人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200 余场，有效发挥了红色文化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成为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点打造的红岩文化教育基地。

（四）“小萝卜头和我”体验营——青少年游学体验项目

充分利用革命领袖、革命烈士、革命人物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革命遗址类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途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红岩烈士为素材，开发了一系列的青少年教育项目。其中“小萝卜头和我”青少年游学体验营，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青少年教育项目。

“小萝卜头”是《红岩》小说中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是最小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据此，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2016 年策划设计了“小萝卜头和我”游学体验营青少年教育项目。活动主要通过组织青少年学生到红岩景区实地参观学习，通过参观、聆听红岩故事、观看情景剧表演、参加互动游戏等方式，



让青少年学生在实际参与中感悟爱国主义和革命优秀传统文化及革命烈士的理想情怀。

活动设计于每年暑期举行，每次活动时间为3天，每期组织青少年学员30~50人，学员年龄以8~14岁为主，活动以小萝卜头狱中生活为背景，小萝卜头的故事为素材，通过实地游历、学习研讨，达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目前，体验营共开营8期，社会反响热烈。

（五）“红色小记者研学体验营”——青少年游学项目

“红色小记者研学体验营”青少年教育项目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充分利用红岩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红村网全媒体，整合重庆主流媒体资源，打造的又一项重要的青少年研学教育项目。体验营会集重庆地区的名师、名记、名编、名导，以“小记者，大世界，小角色，大作为”为教学宗旨，旨在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供一个圆“记者梦”的平台。体验营学员经过系统的培训与体验，可以掌握新闻采访、写作、摄影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开阔视野、拓展知识、增长才干、提升自信，全面提高参

与对象的媒介素养能力。

“红色小记者研学体验营”分为基础营和提升营。基础营只参加基本课程的培训，每期营期为2天，每月开一期，采取课堂教学、社会调查、模拟“新闻发布会”等形式，结合重庆革命历史文化，组织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采访企业家、政府官员、社会名人等。提升营是在基础培训的基础上，再将体验与学习相结合，一年内组织小记者走访10个红色旅游景点，包括陈列馆、纪念馆、革命遗址和历史名人故居等，以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为目标，“在玩耍中学习、在学习中玩耍”，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成长所需的营养，增强青少年对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认知，引导青少年学生爱国爱校爱家庭，助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通过青少年教育的组织建设、能力建设和教育项目的品牌化打造，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能力大幅提高，在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春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特色宣教活动的实践探微

——以南京孙中山纪念馆的宣教活动为例

夏 影

(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 江苏南京 210014)

内容提要：孙中山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宣教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发挥基地的社会教育功能给予更高期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文献资料法、经验总结法，对“特色”社教活动进行了相关理论梳理，结合孙中山纪念馆的宣教创新实践活动，综合阐述了开发特色宣教活动的五大策略。

关键词：特色活动 社教活动 孙中山纪念馆

2008 年 1 月 23 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各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革命类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革命类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该政策的颁布，进一步拉近公众与相关场所的距离，对传统宣教方式提出改革要求，对相关场所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给予更高期待。笔者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孙中山纪念馆社教部的一员，将结合本馆自 2008 年至今的宣教创新实践活动，综合阐述开发特色宣教活动的相关策略。

一、“特色”社教活动之我见

纪念馆本身就是一个具备极强社会教育功能的场所，国内许多文件或论文中都有表述。例如，1985 年 1 月 9 日，文化部颁布的《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中指出，“各类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是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作为英文讲解员，

在讲解交流工作中亦发现，英文中“museum”不仅仅有纪念馆、博物馆的意思，在外国友人的概念中，也指能够发挥教育功能的场所。

不论哪种定义或认知，对纪念馆宣传教育、社会教育的功能都有明确指出或强调。可见，这是纪念馆一重要社会功能。

何谓“社会教育”？广义上来说，社会教育是一种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延续和补充。就纪念馆、博物馆的社教功能而言，我国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认为：“博物馆教育以其巨大的实物教育资源为依托，有条件发展为学校教育以外的第二个教育系统。”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体现社教工作的“特色”二字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分析。

(一) 横向比较传统学校教育，形式灵活多样，元素丰富多彩

传统学校教育在内容、体系、模式乃至场地上有严格限定。纪念场馆作为旅游体系的一部分，本身并没有严格的“教”“学”系统，也没有传统意义的“老师”“学生”角色，更多体现的是旅游六要素中的“游”和“娱”。对此，“特色”的体现就在于充分把握场馆自



身特点，向“游”“娱”方向挖掘，呈现出内容上更丰富、体系上更开放、模式上更多元化的面貌，真正发挥场馆优势，寓教于乐。

（二）纵向比较传统社会教育，宣传分类分层，表现个性现代

传统社会教育活动依然沿袭“课堂”模式，“传道”“授业”“解惑”的顺序虽然也能很好地发挥纪念馆教育功能，但就受众多样性而言，单一的模式、程式化的传播，在需求越发个性化多样化的今天，略显力不从心。“特色”的体现就需要从中寻求突破。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社会职业的人群，分析寻找不同的诉求点，归纳汇总，做好分类，并设计对应的社教活动，方能在普遍中彰显“特色”。同时，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大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新技术在社教活动中的作用，让社教活动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也将是“特色”二字的体现。

二、开发“特色”社教活动的策略

（一）打造优秀的社教团队，为“特色”社教活动固基

作为社教工作的主要承载者，讲解员全方位的知识体系、良好的素养、综合的能力是出品特色社教活动的重要基石。

要培养出优秀的社教工作者，首先，在人员招聘任用环节需要高标准、严要求。例如，孙中山纪念馆在招聘讲解员时，设置多层考评测试，包括常规中英文面试问答，朗读既定故事，即兴话题演讲，才艺展示，参观纪念馆，以口头表达方式交流观后感，以通信方式撰写观后感等众多环节，力求挖掘相关人才，要求其不仅在讲解能力方面有突出表现，在文字撰写、才艺表演、活动策划等方面，也能有所侧重，更好地服务社教活动。

其次，在人员日常管理考核方面，将社教工作立项纳入考评体系，鼓励创新实践。社教工作形式多样，内容繁杂，每个讲解员的责任分工也不尽相

同，考评存在难度。为此，可将社教活动逐项纳入其中，作为加分项目。由讲解员自行整理所参与主导的社教活动材料，包括前期策划书、涉及人员、活动照片、相关文字宣传报道等，形成完整申报材料。考评时，由申报人阐述活动亮点或创新点以及反响等，由考评人员判定是否给相关人员加分。

最后，全方位培训。遵循“走出去”“请进来”原则，规划针对性培训章程。由于社教工作内容涉及领域的多样性，要求相关人员建立全方位的知识体系，故规划针对性的培训很有必要。例如，社教工作需要“教育”有所了解，可安排学校老师到馆讲授把握学生心理的相关知识。又如，社教工作需要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一并宣传发扬光大，要求工作者本身对该类文化有一定了解。为此，除了自我提高，可安排相关人员定期外出培训学习，再将学习成果带回消化，融入社教活动。

（二）依托传统资源优势，给“特色”社教活动供氧

一个有特色的社教活动，是能在宣传本场馆知识理念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向社会大众传播更丰富的信息。为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结合场馆信息相互融合，是创新社教内容和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

孙中山纪念馆社教部结合传统文化，打造了一系列社教活动，如“黑白记忆”。请专业老师讲授中国传统工艺“拓片”，并带领大家用这种工艺拓制刻有孙中山手书“博爱”“天下为公”等字样的碑刻。拓片是中国一种古老的艺术，可以将碑文、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出来，科学记录各种图文信息。从“备纸”“清理”“上纸”“敲打”“上墨”“拍打”到最终取拓片晾干，每道工序都有其特有的工具和独特的操作。制作拓片需要耐心和细心，正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内敛、沉静的特点。用这种工艺拓制孙中山手书的文字，在中国文化的悠远绵长之中，细细体味其中的思想精神，别有一番韵味。这样的社教活动，在传播场馆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别具特色，一举两得。



（三）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展“特色” 社教活动亮点

套用一句话：“不论你问与不问，历史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历史尘埃落定，无法改变。让大家在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下，更好地了解、感受，甚至是体验历史，是社教工作取得突破的又一个方向：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

首先，寻找时间的契合点。“历史上的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还原、模拟当天发生的事情，是让人们更好感受历史、缅怀历史的重要方法。孙中山纪念馆是以孙中山为主题的人物类纪念场馆。2016 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为此，社教部结合孙中山生平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联合共建学校，设计了缅怀伟人的系列活动。如 3 月 12 日，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审学院，共同开展了“缅怀孙中山，向伟人致敬”的缅怀仪式。仪式上最生动的环节，是由学生身着各行各业的职业服装，象征社会各界，传递模拟火炬，向孙中山铜像敬献花束，并宣读孙中山一生伟大革命事业成果，共同在回顾中瞻仰这位世纪伟人。这样的活动很好地融入史实，让人们铭记历史，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提升对历史的认知度。

其次，寻找地点的契合点。对于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通过切身体验，感受曾经发生的事情。例如，孙中山纪念馆每年都会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参与体验“重走中山线”。所谓“中山线”，即当年孙中山灵柩抵达南京浦口火车站，最后运至中山陵所经过的线路。这条路是当年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其道路两旁的民国建筑也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南京作为民国政府所在地的辉煌，以及那个新旧时代交替在建筑上的印证。在社教部工作人员的讲解带领下，重走这条道路，是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探寻了解当年发生的事件，“重读”南京，对话历史。这样的社教活动每次都能引发共鸣。

最后，寻找思想的契合点。如何将前人的智慧结晶融入现有思想加以宣传，也是社教工作可以寻求的突破口之一。2016 年，孙中山纪念馆社教部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系列活动中，特地将孙中山的“博爱”思想与“雷锋月”结合，组织共建学校的学生，在景区担当志愿者，担任讲解和引导工作。这样的社教活动，在锻炼参与者社交能力的同时，很好地将孙中山的“博爱”思想与“雷锋”精神融为一体，既通过志愿工作发扬体验了雷锋精神，又通过宣传内容，进一步体会孙中山“博爱”精神，从思想和实践角度，做到合而为一。

（四）科学利用新媒体，探“特色”社教活动途径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通过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新媒体的崛起，让许多传统宣传方式亟待改变、革新。据 2015 年数据统计，在我国，手机已经超过电脑，成为最大的网络终端。这说明，新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广泛。如何把握这一时事新动态，更好地服务于社教活动，将成为打开社教活动新天地的“解锁码”。

一方面，运用新媒体设计互动类社教活动。为此，可开设论坛、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定期编辑相关知识的图文视频信息，并设置有奖知识竞猜，与大家互动留言，答疑解惑。例如，纪念馆所属的钟山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定期上传钟山景点的视频简介，并设置有奖竞答，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支持，积极参与互动。这种方式，不但很好地开展了社教工作，也广而告之了钟山文化，提升了其知名度。

另一方面，运用新媒体做好宣传工作，促进社教工作的推进。一个社教活动的成功开展，需要有一定的参与度。而参与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宣传力度，为此，把握好新媒体，做好社教宣传工作显得尤为必要。首先，在活动开始前，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如孙中山纪念馆社教部今年暑期开展的“钟山夏令营——玩转纪念馆”活动，运用“互动吧”平台、中山陵官方微信、中山陵官方微博、纪念馆官方网站等多个渠道，进行宣传报名，仅几个小时就爆满，效果不同凡响。其次，在活动结束



后，应做好整理工作，将活动情况形成生动报道，再次反馈到相应平台，广而告之，为日后活动的开展做铺垫。

（五）合理归类受众群体，促“特色”社教活动高效

纪念馆是一个开放式公共场所，所接待面对的是各年龄段、各职业的多样化人群。做好人群分类，并针对对应人群，分析其受教需求，分别设计适合的社教活动。比如，孙中山纪念馆按照年龄层次将受众人群分为少年儿童、中青年、老年。

少年儿童年龄段大致在 6~18 岁，其心理、行为特征可显示为“猎奇”“接受力强”。故而，探寻类的、互动参与性强的社教活动往往更受欢迎。例如，孙中山纪念馆每年夏天会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有一项非常受欢迎——“解码纪念馆”：参与者可在纪念馆内搜索信封，信封内设置各类与纪念馆相关的问题，找到问题后，参与者自行在纪念馆的展览中寻找答案，并可根据找到答案的数量兑换相应奖品。这样的活动既激发了参与者的求知欲，也恰到好处地将游戏与知识传播融为一体，寓教于乐，迎合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理需求。

中青年的年龄段大致在 18~50 岁，其心理、行为特征可显示为“成熟稳定”“渴望深层知识挖掘”。在这一阶段的人群，知识存储量大，接受能力强，对于表象后的深层探索更感兴趣。对此，安排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类似《百家讲坛》一样的讲座是不错的社教活动。例如，孙中山纪念馆每个月都会安排主题不一的专家讲座：《首都计划》《民国建

筑》《民国掠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等。每场讲座后，都留有时间互动交流，答疑解惑。这类活动对于生活、工作、学习在南京的人而言，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对了解这个城市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对提升个人人文内涵有很大的帮助。

老年人的年龄段大致在 50 岁以上，其心理、行为特征可显示为“非常稳定”。这一阶段大部分人群的生活重心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嫁到下一代，对信息的接收处理趋向“简易”化。对此，设置一些简单易懂的故事类宣教内容，辅以相对应的知识问答，调动其积极性，是较为适合的社教活动选择。例如，孙中山纪念馆会不定期到各个社区，联系社区服务中心，由讲解员讲座授课，例如《少年孙中山》《求学檀香山》等，并设置互动有奖问答，调动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听课参与的同时，了解孙中山的早年学习生活。

三、结束语

纪念馆作为联系历史与现实纽带的重要场所，肩负社教工作。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做好社教工作，创新社教工作，让社教工作永葆活力是每一个纪念馆人、博物馆人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通过几年的工作经历，总结了以上五点创新方向，望对社教工作的创新、推进尽到绵薄之力，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夏影：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社教部讲解员）



工作论坛

博物馆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研究

魏 鹏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辽宁沈阳 110044)

内容提要:在博物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人们对以博物馆为依托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如何满足公众对博物馆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加强公众与博物馆间的互动交流,如何引导公众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实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摆在博物馆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实现途径着手,进而探究文化传播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并将深入研究博物馆文化传播与实现社会价值的关系作为本文的重点,以实现二者的统一作为当下推动博物馆发展前行的关键。

关键词:博物馆 文化传播 社会价值 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传播则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纵向传递和空间上的横向扩散。毫无疑问,博物馆作为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物证的机构,当然具有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众所周知,博物馆具有实物收藏、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三大基本社会功能,而文化传播的功能就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基本功能的一种扩展和外延。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我国《博物馆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博物馆应当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播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2015年我国以立法形式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也指出:本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教育职能显然摆在了博物馆三大职能的首位。这些充分说明,多年来博物馆所传承的三大功能即收藏、研究、教育需要不断扩大覆盖面、创新载体,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更为凸显,而文化传播正是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扩展与延伸。因此,发挥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功能,传播先进文化已经是我国博物馆的首要职责,其社会影响愈加深远。

一、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实现基础与途径

首先,藏品是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是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陈列展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等博物馆一切业务工作的开展,都要受到藏品的制约,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也不能例外。我们知道,藏品就是指博物馆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的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既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见证物,它决定着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内容。如果没有藏品,如果没有对藏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和挖掘,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活动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博物馆应该努力加强藏品的征集、保护及研究工作,只有藏品多了、保护好了、研究透了,才能为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陈列、讲解是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得以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博物馆陈列展览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和传播信息的展品群体。它是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特殊精神产品,



是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最主要的途径。如果一个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内容单调,展示手段陈旧落后,甚至十几年一副老面孔,就不会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就势必会影响到博物馆文化传播作用的发挥。因此,博物馆应该把握时代脉搏,强化精品意识,在陈列展览的大纲撰写、形式设计、实物制作、展品布置等细节上加强研究,并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博物馆的布展经验和展出方式,通过实物、照片、图表、模型、绘画、雕塑、景观等多种形式以及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不断改进和提高陈列展览水平,增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从而实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语言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的开端,是一种应用最便捷、最普遍、覆盖面最广的文化传播方式。博物馆的讲解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是博物馆陈列为依据,由讲解员进行提炼、选择,并通过与观众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直接向观众传播知识和信息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是博物馆辅助人们参观陈列展览的重要手段,也是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有研究表明,人们从听觉获得的知识只能记忆 15%,从视觉获得的知识只能记忆 25%,而如果视听结合起来,就能够记忆 65%。因此,博物馆必须高度重视讲解工作,加强博物馆讲解员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讲解服务质量。一要因人施讲,增强讲解的针对性,切忌千人一词、千篇一律;二要在深刻理解陈列展览主题和内涵的基础上,适当增减内容,避免简单重复的背诵式讲解;三要注意加强与讲解对象的交流与互动,避免灌输式的讲解;四要充分运用语言、表情、动作等讲解技巧,增强讲解的感染力;五是培养外语讲解人才,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需要。

二、文化传播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

不可否认,陈列和讲解是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的两种有效途径。但陈列和讲解只是针对进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扩大博物

馆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创新各类社教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教职能是博物馆必须认真面对和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趋势下,博物馆社会效益的不断提升、软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成为博物馆发展前行的着力点。那么如何实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并不断扩大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呢?实践证明,文化传播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载体。

首先,博物馆通过流动展览、讲座等形式进行文化传播以发挥宣教职能。博物馆可以根据本馆的性质、任务及藏品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确定合适的选题,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藏品和资料,举办主题多样、形式新颖、规模适度的具有本馆特色的流动展览。流动展览可以深入博物馆所在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街头广场以及偏僻农村等地方举行,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巡回展览,有条件的甚至还可以到国外去办展。博物馆还可以从馆内藏品和陈列的内容出发,结合群众的需要,举办相关内容的讲座。举办讲座有多种形式,可以定期,也可以不定期;可以在博物馆内举办,也可以在馆外举办;可以博物馆自己举办,也可以联合其他单位共同举办;可以一个人主讲,也可以是多人演讲;可以举办现场讲座,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博物馆举办讲座都应该注意既要有一定的专业性,也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必要时还可利用博物馆的藏品、图片资料等进行辅助。这些无疑都是发挥博物馆宣教职能的最佳形式,也是扩大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实现博物馆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

其次,利用网络、微信等多种形式扩大文化传播的覆盖面。网络传播是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主要形态,它真正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具有方便快捷、覆盖面广等特点。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已经开始认识到利用网络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建立起博物馆网站,把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展览等通过网络进行展示和传播,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覆盖面。此外,近年来,微信导览成为博物馆与社会各界交流的一种新形式,观众



们可以关注博物馆微信平台，时时关注博物馆的发展动态，也可以通过微信自助导览了解博物馆的陈列内容。

最后，科普读物的出版是连接博物馆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的有效手段。博物馆编辑出版具有本馆特色的科普读物，既是博物馆科学研究工作成果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博物馆扩大文化传播覆盖面的一种有效手段。博物馆可以在本馆藏品、陈列及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博物馆简介、导引手册、藏品图录、陈列展览图集、各种学术专著、幻灯片、明信片、光盘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不能来博物馆参观的人，间接地了解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同样的道理，开发具有博物馆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旅游购物的需求，为博物馆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使博物馆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播得更广泛、更持久、更深入。

三、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目标的一致性是推动博物馆前行的关键

博物馆根据不同受众来策划与设计各类活动对公众进行文化传播，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受众了解历史、感悟历史，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能满足其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恰恰是通过文化传播，个体需求的满足，来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同时，文化传播与博物馆社会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博物馆前行的动力与关键。

首先，志愿者服务于博物馆就是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目标一致性的最佳典范。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志愿者无偿服务博物馆已经成为各大博物馆的普遍现象。志愿者是连接博物馆与社会的最佳平台，志愿者在博物馆中的作用愈加突出。志愿者立足于博物馆，通过开放展区看护、咨询、讲解等日常性工作为公众服务。志愿者还通过参加博物馆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或者以多种形式为博物馆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志愿者参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正是对公众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志愿者面向

公众进行讲解，虽不如博物馆讲解员那般专业，但是志愿者们的讲解同样声情并茂，同样引人入胜，同样使受众从中有所收获而达到博物馆发挥教育职能的目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回归社会后，这种文化传播的延续性依然存在，志愿者将在博物馆中获取的知识传播到社会。因此，志愿者在博物馆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志愿者服务博物馆不仅是博物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集中体现。博物馆通过志愿者进行文化传播的宗旨与博物馆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目标是吻合的、一致的。

其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实现一致性的长远目标。未成年人教育始终是博物馆发挥教育职能的重要内容，博物馆为青少年量体裁衣设计主题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编撰及出版青少年版讲解词或科普读物等。学生们参观博物馆，在青少年版讲解词的演讲中，对蕴含于博物馆陈列中所要突显的内容、精神而印象深刻。博物馆课堂走进学校，使学生获取了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学生们从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正是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的主旨所在，也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真正体现。对于博物馆而言，未成年人教育应是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着力点，更是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群体，树立未成年人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应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目标。二者的紧密融合与统一才是博物馆前行的巨大动力与关键。

总之，随着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日益变化，博物馆在文化传播中必将大有作为。博物馆通过文化传播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必将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传播是博物馆社会价值的最佳载体，将文化传播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进行融合与统一是博物馆未来发展的趋势与必然。

（魏鹏：“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文博馆员）



博物馆在数字化时代下的发展与探索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新媒体建设为例

赵迪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 100165)

内容提要：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以往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和摄取模式，同时也给博物馆这一文化宣传媒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改变传统的被动文化映射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媒体来展示自我，成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积极探索新媒体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利用新媒体手段来扩大文化宣传，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网络与现实相结合的立体化信息辐射模式，给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思路。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 新媒体建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传播理念的嬗变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微信、微博等正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也改变着各行业的传统经营模式，加速着社会发展的步伐，数字化时代已悄然无息地来临。数字化时代下，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和摄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博物馆、纪念馆触网和数字化建设，给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①。若想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弘扬历史、传承文化、熏陶大众、服务社会的宗旨，必然要“运用各种大众传播手段来传播历史常识，引导大众塑造正确的历史观”^②。而“传统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必须打破以往‘被

动’等待参观者‘走进来’的习惯，积极探索新的传播途径，为博物馆‘走出去’寻找新路径”^③。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走在了前列，虽然我国博物馆的新媒体建设起步比较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快速发展起来，而国家对信息产业的支持和业内关于博物馆数字化的规划，也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中国的博物馆相较于欧美国家的博物馆更侧重传统和专门性较强的特点，更注重它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宣传教育功能”^④。

国内各主要博物馆、纪念馆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网站，这种实体与互联网结合的双重信息传播模式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在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同时，也为人们摄取信息、接受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遍览各大博物馆和纪念馆。而“纪念馆的网站建设，是以纪念馆的文物文献资源、人力资源为基础，以网络资源为依托，

① 肖炳龙：《纪念馆网站建设若干问题的初探》，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第101页。

② 张献忠：《国家公祭日与公共史学》，载《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14版。

③ 唐开文：《博物馆的数字化探索——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10期，第43页。

④ 杨光玉：《浅析公共纪念馆宣传教育功能发挥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3年第1辑，第19页。



把成熟的、通用的高新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运用于纪念馆网络的建设和运作中”^①。博物馆的新媒体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②为此，必须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而“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我国网民有近6亿人，手机网民有4.6亿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3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③。本文试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新媒体建设为例，简述博物馆在数字化时代下的发展过程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新媒体建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简称“抗战馆”，建成于1987年7月，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纪念日当天正式对外开放的，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大型的全方位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是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建馆以来，抗战馆秉承中央赋予的三大任务，也就是：力争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抗日战争史料收集和研究中心、对外民间交流的窗口和联系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桥梁。在大力完善实体展览、讲解服务的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数字化进程，相继

创建了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和网上纪念馆、网上商店等新媒体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来进行网上展示和宣传。

首先是大力促进官方网站和微博建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官方网站和微博始建于2003年。其中，官网共分为9大板块，分别是走进本馆、新闻聚焦、陈列展览、文物收藏、抗战历史、学术研究、专题关注、社团管理、党的建设等^④，以专题形式对抗战馆的历史、时事动态、主题专题展览、文物收藏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网站还兼有日语、英语、俄语等外语介绍，这也是践行中央赋予抗战馆三大任务的现实需要。2003—2012年期间，抗战馆官网每年点击量在20万左右，2012年官网改版后，每年点击量在30万左右，累计点击量达300多万，在广大网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抗战馆官网点击量115万人次。官网点击量比2013年提高300%，代表性互动活动主要有网民优秀资料评选颁奖和网上邮局上线、抗战胜利日标志设计大赛、中小学生网络知识大赛、网络民意调查、“我的抗战”寄语等。2015年全年共更新官网新闻1775条、图片1210幅；手机APP内容655条；网民晒抗战内容1380条，微博更新1578条。2015年官网点击量全年达136万人次。各网合计展示历史照片、文物图片各11400多张，抗战人物故事、历史事件资料6600多份。另外，抗战馆官方微博从2003年开通至今，由于互动性、平民化的便利，吸引了大批关注者，截至2016年，微博粉丝量已达到98175人，微博目前共发布4652条内容，阅读总数达102287次。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抗战馆官方微博在数字化时代应起的宣传和互动作用还有待加强，以便使更多的网民来关注并展开互动。

① 肖炳龙：《纪念馆网站建设若干问题的初探》，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第10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1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载《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④ <http://www.1937china.com/>。



其次是网上纪念馆和微信公众号的建设。2014年3月2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在多家网络媒体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官网同步上线。网上纪念馆的推出,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关注。上线3周时间内,各网站专题独立访客量累计达40多万人,点击量累计达78万多次,并获得网民的积极评价与高度赞誉。到2014年12月份,网上纪念馆总点击量为2767万次,专题点击量为1017万次。境外网民点击量超47万人次。网民留言达20万多条。至2015年年底,网上纪念馆总点击量达2.52亿次,更新专题90个。网上纪念馆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今年主推的专题活动——“网民晒抗战”构成,特色是联合主流门户网站同时发起和强调网民线上线下参与互动,网民通过晒有关抗战时期的文物、故事、图片等内容,实现网民的互动性参与。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网上纪念馆突破了时空限制,网民能够随时随地看到与抗战历史相关的文物、图片等,通过互动获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网上纪念馆的设立还存在两个可取之处:一是关注公众的主体性。“网民晒抗战”的内容主要依靠网民提供有关抗战时期的文物等,贴近公众,强调公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主体性,再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为网上纪念馆共同的筹办者、建设者。二是通过历史回顾,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表示了关切。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往往集中反映历史变迁,对当前现状和未来发展涉及不多。网上纪念馆建立的目的是提醒中国人民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战馆微信公众号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关注人数达16483人,其中取消关注2754人,净增关注人数13729人,

累计最终粉丝13768人。图文阅读人数共9575人,文章阅读次数15370次。从公众号打开文章7737次,从朋友圈打开文章2248次,文章被分享转发557次。抗战馆微信公众号相继开展了助力抗战、我要留言、知识竞赛等三项活动。其中仅抗战助力活动就累计参与1703855人次,至今仍有活动人数转发。微官网发布资讯、展览信息156条次,累计访问人数139184人次。其中访问人数最多内容如下:每日图文数据请求约27次,截至2016年7月主动阅读量约4762人,形成约7737次阅读,朋友圈转发2248次,浏览以往历史信息2138人,3888次;好友间推荐转发818次。

最后是抗战馆与主流网络媒体之间的合作互建。“博物馆对于资源的数字化转换能够吸引和面向更多公众,但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新媒体的海量性、便捷性、易联合性等特征并未被博物馆完全利用”^①。另外,抗战馆的独特定位和宣传功效也使得其内容导向存在着固定性和专一性,“每个纪念馆由于纪念对象不同,它们的性质和任务、业务的范围和内容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构建个性特色的纪念馆网站中,如何在网络功能和网络服务中体现本馆的业务特色,展示有别于他者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网络形象,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②。为此,抗战馆积极与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强强联合,与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媒体密切配合,在共享信息和资源的同时,扩大自身的宣传范围和拓展宣传渠道,最大限度地传播抗战精神和弘扬民族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网上纪念馆信息的基础,植根于纪念馆传统的日常业务”^③。没有自身基础的巩固和内容的不断丰富,片面地追求社会影响力和舆论话语权,也不过是缘木求鱼。因此,“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公共纪念馆致力于完善自身建设、开展特色活动、创新活动载体,利用现代化传媒技术手段彰显宣传教育

① 唐开文:《博物馆的数字化探索——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10期,第45页。

② 肖炳龙:《纪念馆网站建设若干问题的初探》,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第104页。

③ 同上,第105页。



功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①。抗战馆地处首都北京这个信息汇通枢纽,更位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地——卢沟桥宛平城内,因此,抗战馆利用有利的地缘优势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展开全方位的合作。近年来,抗战馆与俄罗斯、意大利、德国、韩国、美国、我国台湾等主流网络媒体加强交流,在对外巡展、联展及馆内主题展、专题展的宣传上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例如,与俄罗斯媒体共同宣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协会 2016 年年会暨“《二战抗日战场》国际展览群”,与我国台湾媒体策划宣传在台湾新北市、台中市和屏东县三地同时举办的《烈日忠魂——台湾光复 71 周年纪念特展》等,通过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网络媒体强强联合,抗战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三、对博物馆新媒体建设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针对不同网络的群体来改进服务。数量急剧上升的网络群体已经成为博物馆不可忽视的服务对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人数规模已达到 6.88 亿人次,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中国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其中,2015 年新增网民 3951 万人,增长率为 6.1%,较 2014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网民规模增速有所提升。这些数据对于博物馆的新媒体建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博物馆能够多大程度地取得网民的关注。网民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文化程度及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面对这种状况,博物馆应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听取他们对博物馆的评价和建议。对于大多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人而言,他们未必都想通过网络接受博物馆的教育,或是为欣赏博物馆藏品,或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抑或是闲暇

之余随意浏览。要吸引网民对博物馆的关注和加强印象,细节的人性化设计必不可少。例如,针对网民低龄化的趋势,博物馆应该加强对儿童版面的设计。罗浮宫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网站就为儿童设计了专项板块,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既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又使之学习了知识,反观我国的博物馆、纪念馆,诸如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大型网上博物馆都没有提供此类网络服务。

其次是博物馆的网站开发及后期维护。博物馆在网站开发方面多采用与专业网站制作公司合作的模式,也有博物馆是内部技术人员自行开发的。国内外大多数著名博物馆基本是前一种模式,如巴黎罗浮宫博物馆网站是与 Blue Martini 公司合作开发的,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虚拟故宫”是与 IBM 公司合作开发的。专业软件公司实力雄厚,拥有构架师、软件设计师、美工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开发周期短且完成效果较为理想;而后者由于基础设施、信息化人才方面的缺陷,所开发网站周期长、内容匮乏、形式单一,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与专业网站制作公司合作是非常有利的,不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一次性投资、签订合同后,其他工作都由网站制作公司负责,无须再次投入资金。此外,博物馆的新媒体建成后也必须不断维护和完善,否则,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站将会无人问津、形同虚设。具体是要对网络内容进行完善、补充和信息更新,如添加藏品、文物的展览信息,更新相关重大新闻要事等。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公众对网上博物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博物馆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步发展。

再次是加强网上商店的建设。提起网上博物馆的纪念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不过是文化衫、宣传册之类的“大路货”,实际上,现在一些博物馆的网售产品早已不像以往的那么单调。彰显博物馆特色和特征、让更多人记住博物馆的纪念品,成为现在很多博物馆主打的品牌。同时,在如今多数博物

^① 杨光玉:《浅析公共纪念馆宣传教育功能发挥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3 年第 1 辑,第 23 页。



馆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设网络商店,销售具有本馆特色的纪念品,不失为解决博物馆资金困难的良策,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网上购物系统就是美国最大最成功的博物馆网上购物系统。中国的博物馆、纪念馆在这方面发展缓慢,不仅规模小、种类少,而且价格昂贵。因此,博物馆网上商店的建设,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博物馆商店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开发其产品,既要针对不同的客户群研发不同类型的商品扩展市场,又不能脱离其展示的主题和性质。另外,扩大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采取诸如在博物馆首页公告栏发出网上商店举行有奖问答、礼品赠送等活动的公告,吸引观众参观网上商店,而且,网上商店的宣传做得好,也为实体博物馆商店做了广告,能够为其吸引更多的顾客。

最后是博物馆应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博物馆的新媒体建设给其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何保护这些成果的版权、信息安全、数据认证及访问控制等就变得日益重要。1993年3月,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了《关于文物信息上网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文物信息上网工作中……要树立主权、所有权、知识产权意识和保密意识”。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一些经过三维扫描的文物在网上观赏起来有时比实物还要逼真,并且可以对藏品进行细微观看,这样就有可能为文物造假提供方便。还有一些网民任意下载、盗用博物馆网络上的成果并从事牟利活动,这些行为触犯了博物馆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因此,既要通过网络展示、提供资料信息,

又要避免被人非法利用。例如数字水印技术,数字水印技术就是将数字、文字、图像标志、序列号等版权信息嵌入到多媒体数据中,以起到版权保护的作用,中山大学数字博物馆在新媒体建设中就采用了这一技术。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性质决定了其网络资源必须是对外开放的,但同时又必须保护其知识产权。但是,如果仅仅为了保护其知识产权而限制其开放性,那么博物馆的数字化也就偏离了初衷,因此,我们要寻求一个平衡,在向公众开放的同时,又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某些恶意、非法行为,保证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健康茁壮成长。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给博物馆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机,但是“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博物馆同样面临着娱乐化的威胁……若在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对于新媒体的这些特征不引起重视,忽视舆论阵地建设和主流媒体引导作用,博物馆将会面临文化价值的降低和消解的困境”^①。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博物馆的职能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新职能、新形态、新方法、新收藏对象不断地出现”^②。因此,在新媒体建设过程当中,博物馆既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又要防微杜渐,避免过于娱乐化和利益化,同时还要与时代接轨,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动态和人民大众需求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共享数字化带来的福利,促进自身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宣传民族历史、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

(赵迪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接待管理中心主任、文博馆员)

① 唐开文:《博物馆的数字化探索——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10期,第46页。

② 杨光玉:《浅析公共纪念馆宣传教育功能发挥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3年第1辑,第19页。



“博物馆+”发展模式下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责任、角色

——能量主导 思想引领 形式迎合

张 琴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 400043)

内容提要: 博物馆作为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人文自然遗产等的文化教育机构,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怎么来,又将要到哪儿去。所以博物馆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通过博物馆社会价值的输出来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正能量,来点燃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人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正确思想,但同时博物馆也需要与时俱进,不能仅等待人们主动走进博物馆,展览形式一成不变,要有创造和发现,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方式方法,去迎合当代人们所喜欢的形式。

关键词: 正能量 思想 形式多样化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变革,博物馆的概念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从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至今,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长时间,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于1989年9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6届全体大会通过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第2条再次修改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大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这是较为适当的一个定义,是各国都能接受的国际间一般性定义,同时各国仍需按自己的国情、认识和理解去对待博物馆。

中国对于博物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其定义也有过多次修改。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是以实物的论证而做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和修改,

直到1979年,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才明确规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博物馆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演变当然是与社会同步的,任何时期的博物馆一定是与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相协调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博物馆的呈现也完全不同,其社会价值、责任、角色都不一样,从一定程度上讲,博物馆的历史就是博物馆不断完善、丰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和国内社会发展的加速和变革的加剧,中国博物馆也进入了快速发展和剧烈转型时期,馆舍数量的增长、



国家免费参观政策的出台、观众数量的递增和观众素质的提升等相互联动，共同推动了博物馆社会价值、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关注博物馆纷繁现象背后更为本质的问题，潜心探索其发展规律和方向，可以看出博物馆是不同世代之间的联系纽带，保存的是历史，立足的是现在，通向的是未来。

一、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与能量主导

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从最初作为古物收藏宝库发展到后来贵族们的专利，曾有那么一段时期博物馆一直被贴上“高大上”的标签，普通民众望而却步，未能感受到它的温度。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进入博物馆繁荣时代，真正的公众博物馆概念才逐渐明晰，其工作重心逐步向社会服务倾斜，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私藏到开放的过程，其服务意识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伴随着博物馆确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博物馆服务社会的理念在不断加深加固，甚至深入骨髓，能感受到博物馆与广大民众的距离被慢慢拉近，其文化力量得以空前释放，在社会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博物馆越来越深入地融入社会，在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人文自然遗产的同时，更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公益性机构，其自身价值是通过社会价值体现的，其社会价值又是通过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体现的。博物馆的发展历史证明，从古典形态历经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博物馆的每一步演进都是在为不断适应社会需求而改变自身，博物馆未来的发展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会对博物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博物馆既要保存、传承文化遗产，又要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扩展自己的服务功能，开拓新的领域服务于社会。

博物馆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将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其社会价值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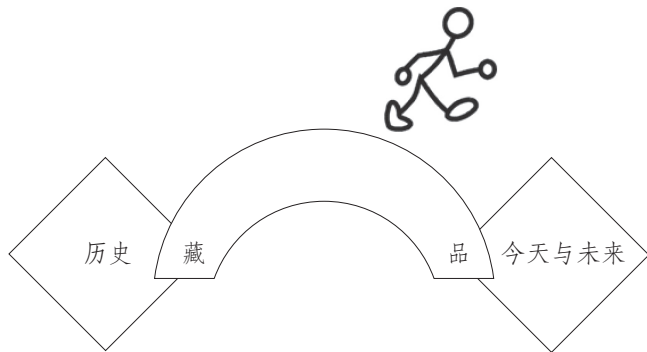
1. 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和发展

中文的博大精深，往往体现在它的形式精简与意蕴深邃上，“博物馆”三个字仅从字面意思层面

出发，所谓博，大也、广也，博大精深，博古通今；物，即指物质与非物质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馆，房舍。其中，“博”作为形容词，修饰“物”，“物”之所在所处于“馆”中，“博物馆”一词核心在“物”，对于博物馆来说，“物”——藏品、文化遗产是它的基础，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必需有，同时在业界，一个博物馆的藏品多少与等级是衡量该博物馆的重要标尺，离开藏品，博物馆就不称其为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要发挥它的作用，实现其社会价值，履行其社会责任，扮演好社会角色，都是围绕在藏品的前提下进行的，任何技术、任何方法都是在藏品之上进行的，藏品就如同博物馆这座建筑的“地基”，没有地基或地基不牢的建筑，只能大而空又摇摇欲坠，所以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还是要从藏品、文化遗产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出发。

毋庸置疑，博物馆作为一个保存和呈现历史的机构，它立足于现在，通向的是未来。从本质上讲，博物馆是不同时代之间的联系纽带，能够帮助当前和未来的时代更好地了解它们的渊源，世界各族人民都走进这里寻找自我身份、归属感，追溯自己完整的历史和遗产，2014 年博物馆主题是“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藏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珍藏着过去的人、事、物，今天以及未来的人们通过知晓、了解久远的历史与过去，积淀知识、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掌握当前、把握未来，人们通过博物馆里的藏品与历史“对话”，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怎么来，又将要到哪儿去。

藏品能够如下图所示在世界范围内为不同观众、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





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具有广泛性,有多方面,但其藏品、文化遗产是其基石,文化遗产在这里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通过相应的文化活动得到良好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它可以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化;社会大众在此精神享受和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情操得到了陶冶,文化修养得到了提高,进而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2. 以人为本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人为本,讲的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最终落到实处是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回答了博物馆为什么发展、“为了谁”发展的问题,同时,人更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动力,解释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和“依靠谁”是分不开的,人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一构成博物馆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

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时代,博物馆的发展出现转机,2008 年通过实施全国博物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政策,博物馆从以往的“以物为中心”开始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否定博物馆“物”的重要性,随着免费开放的落实,博物馆正在成为与公众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紧密、影响最广泛的平台,所以博物馆也应以此为契机,重视观众的反应和需求,提高自己社会服务水平,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逐渐将参观博物馆作为社会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习俗、一种休闲娱乐习惯,使博物馆成为培养公民文化素养的沃土。时代需要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从保护文化遗产向服务社会延伸,的确“以物为中心”是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基础,但“以人为本”是博物馆社会价值的未来。

可能会有人说,任何博物馆都在提“以人为本”,关键是具体措施、做法,如何“以人为本”?

其实各大博物馆“以人为本”一直在路上,只是这段路程还很长。例如,各博物馆都有讲解岗位,博物馆讲解通过语言的表述来向观众介绍藏品的基本信息,揭示藏品背后的故事、内容及相关知识,阐释藏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内涵与外延价值,并与观众就展览及相关内容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帮助观众全面深入地享受博物馆展览的知识、信息、休闲和娱乐服务。所以博物馆讲解就是博物馆“以人为本”的最直观方式,通过讲解岗位的努力,将藏品桥梁这种静态的沟通方式以一种鲜活而动态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以观众更熟悉、更贴切的方式、方法去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做到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只是需要明确的是,任何博物馆都设置有讲解岗位,但绝大部分博物馆还停留在讲解有偿服务的阶段,当然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也在这方面做努力、做尝试,比如相关节假日、大型活动日推出免费讲解、义务解说等,先不论这些免费讲解的质量,总体来讲,影响的面还很微弱、很局限,为社会发展服务最终会迫使所有博物馆提供高质量的免费讲解,国博的志愿者义务解说在这方面首屈一指,未来博物馆的研究、文物征管等人员最终带着研究成果走出办公室,走进展厅,把他们以往停留在书刊、停留在业界的功绩直接与社会大众交流将是一大趋势,当然这本身将是一次系统且复杂的改革。

3. 公益性

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我国政府自博物馆传入国内就将博物馆事业明确定位成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将其纳入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体系当中,这有力地推进了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力度。一方面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度不断扩大,越来越走近公众,在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指导下,博物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从对部分特殊群体免费、优惠开放到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费,再到如今的对公众全部免费开放,使得人人有机会参与到博物馆中来,这种推进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力度,在全世界



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另一方面博物馆多元化及类型多样化发展，社会共同参与博物馆建设发展，博物馆借助社会力量发展自身事业，如私人博物馆、企业博物馆、公私合营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不断落成，形成了如今博物馆融入社会、社会共同参与博物馆的一种状态或趋势。博物馆的公益性，是博物馆深入社会中去，社会公众参与到博物馆中来的一种状态和结果，这既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互动，也是博物馆践行社会发展服务宗旨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近些年，全国各地再次兴起了建设博物馆的热潮，博物馆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大，一批批新馆拔地而起，一座座旧馆不断翻新、扩建，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在社会中的分布已较为普遍，在公众的活动领域日程安排里也渐渐明显起来，最直观的感受是我们每到一个陌生的地域，绝大部分人行程安排中都有选择去当地的博物馆了解学习一睹风采，同时博物馆也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如免费开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博物馆的诞生、推行流动博物馆、博物馆代表团进社会学校部队等单位，说明博物馆的业务活动也在日益深入社会，贴近现实生活，真正做到“博物馆社会化”在路上的发展状态。博物馆的发展，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和社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对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博物馆公益性的具体落实促进了博物馆按照社会需求做积极地调整与转型。但在大力开展博物馆建设的形势下，在博物馆社会化的进程中，也应思考博物馆落成之后如何能更好地被充分利用，它的社会责任和价值怎样才能得到良好的履行与实现，也就是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影响社会、引导社会发展。作为公益性的常设机构，如果远离社会，博物馆将是孤芳自赏，所以博物馆要走进公众，公益性理念要先行，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关注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社会对博物馆投入的增加，博物馆也要努力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在博物馆深入社会、服务公

众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免费开放带来的数量上的增长促进质量上的飞跃，发挥专业优势，创出特色，通过公益、专业两张王牌赢得社会公众认可，培养博物馆意识，养成参观博物馆的习惯，让社会公众与博物馆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互利互惠的交融。

4. 教育性

前面曾提到，博物馆在创立之初只是珍宝储存库及为满足上层社会和少数知识精英的需求而建立的场所，并不对大众开放，因而与一般民众并无大的干系，更谈不上为社会服务，是随着社会发展博物馆才被赋予征集、典藏、陈列、研究、传承、公益、教育等这些新的职能。

作为一个基于“物证”的社会教育机构，教育成为博物馆的核心理念，是博物馆的灵魂所在，如果说收藏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其自身独特的“实物”特点和形式多样的展陈手段，通过一定的主题和艺术形式，直接给予观众一种最为真实和直观的印象，这种教育的效果不同于教科书、文字或者插图等其他的教育方式或者艺术创作形式，而是以最符合历史原貌的形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表现历史和传递历史。

博物馆教育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将博物馆形象地比喻为没有围墙的学校、一本立体的百科全书、校园之外的第二课堂、社会大众的终身教育场所，与传统学校教育相比较，丰富的藏品超越了学校教育资源的局限，当然这并不否定传统学校教育的主体性，在社会教育中，博物馆可以很好地起到传统学校的补充作用，这里以“教”为中心在向以“学”为中心转变，观众的主动参与性更强、群体互动性更明显，被动接受教诲的现象更弱化，社会大众通过与博物馆藏品（文化遗产）的知识（信息）主动相互作用，去体验、发现、欣赏、深化对自然和文化的理解，通过兴趣使然抑或群体带动去了解来龙去脉、总结经验教训到独立思考，实现主动学习。博物馆教育使许多人受益终身，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认识甚至价值观会发生某种改

变，最终转化为他们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表现多方面，各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环环相扣，并随着社会进程的洪流还将不断扩展，正如西方博物馆的那句名言——博物馆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拥有的资源做了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社会公众的态度和需求在影响着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博物馆倡导的价值取向无不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所以，在物欲不断得到满足和膨胀的今天，博物馆还应该有一份能量的担当，一种社会正能量的主导。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一个社会可以不完美，但绝不可以没有正能量，博物馆作为主流文化宣传阵地，这种能量主导性一直有，但传递性还有待加强。绝大部分博物馆做到了精于“授业”“解惑”，但还需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通过博物馆社会价值的输出来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正能量，来点燃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人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用人性的本能和爱心的接力让当代与未来的社会公众能够站在已逝的一代代肩膀之上更好地看世界、改造世界。

对社会大众而言，博物馆就是那个在你的人生路上你应该拥有并值得拥有的正能量朋友，陪伴你、鼓励你，每每走进它，你能找到自我、走过泥泞、拨开迷雾、重塑信心。

二、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思想引领

通过整理近些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见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日益加强。

近年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年份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
1992	博物馆与环境 (Museums and Environment)
1993	博物馆与土著居民 (Museum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1994	博物馆展示的背后 (指博物馆的组织管理等内容) (Behind the Scenes in Museums)
1995	反应与责任 (Response and Responsibility)
1996	收集今天，为了明天 (Collecting Today for Tomorrow)
1997、1998	与文物的非法贩运和交易行为进行斗争 (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f Cultural Property)
1999	发现的快乐 (Pleasures of Discovery)
2000	致力于社会和平和睦的博物馆 (Museums for Peace and Harmony in Society)
2001	博物馆与建设社区 (Museums : Building Community)
2002	博物馆与全球化 (Museums and Globalisation)
2003	博物馆和朋友 (Museums and Friends)
2004	博物馆与无形遗产 (Museum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2005	博物馆——沟通文化的桥梁 (Museums Bridging Culture)
2006	博物馆与青少年 (Museums and Young)
2007	博物馆与共同遗产 (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
2008	博物馆：促进社会变化的力量 (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2009	博物馆与旅游 (Museums and Tourism)
2010	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 (Museums for Social Harmony)
2011	博物馆与记忆 (Museums and Memory)
2012	处于变革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 (International 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Challenges, New Inspirations)
2013	博物馆 (记忆 + 创造力) = 社会变革 (Museums (Memory + Creativity) = Social Change)
2014	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 (Museums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
2015	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Museums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2016	博物馆与文化景观 (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从上表中可以明确这一系列的主体都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能够感受到博物馆在努力地去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服务做努力，同时博物馆也在以它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领社会的思潮。

博物馆是汇聚历史精华的宝库，也应是新思想的摇篮，“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从本质上说，任何教育都是为了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可以说博物馆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博物馆如何为社会发展服务？对未来负什么责任？答案应该是思想上的引领。未来的博物馆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内，它已变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全方位、整体性、开放式的观点洞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这里不仅仅是社会的“风向标”，更应是社会的“发动机”，这里应该超越经济上出口的成衣和电器，更应引领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而出口最有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目前中国博物馆对社会的思想引领作用尚不明显，但博物馆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是不可忽略不计的。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形态的经验总结以及未来会产生什么变化？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走向，未来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从世界文化中吸取什么营养，能否展现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多产生于思想的碰撞中，而博物馆就是保存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接纳思想碰撞的最好场所。

当然，可能又有人会问——博物馆如何引领思想？这种引领表现在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等多方面。开放社会大众对不同思潮的话语权，甚至对异质思维采取包容的措施，让专家与公众都参与进来，让思想面对质疑与批判，允许多种声音的出现，并创造机会让多种声音得以表达，理解文化、思维、思想的多样性。

有思想才能引领未来！博物馆不仅要提供过去的思想，还要给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向它的社会大众提供面向未来的思想，博物馆应该承担起新时代赋予它的这份责任，履行好这份责任。

三、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形式迎合

在日常的工作中有个小小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于博物馆是充满感动与怀恋，中年人对博物馆更多是感慨，而年轻人对这里有向往、有畅游也有无趣，他们当中有人觉得博物馆太端正，不够时尚、不够潮流，在这里是“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对他们年轻人吸引力不够，当然这当中不排除有年轻人自身的原因，但博物馆确实存在缺乏辐射更广泛的生活领域、缺乏及时呼应社会活动与事件的事实，让很多人得出博物馆去一次就好的结论。所以博物馆以往那种只求在行业内孤芳自赏的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博物馆在实行免费开放后却因自己古板、落伍、一成不变的形式而门庭冷落，那它将断失国家的财政拨款，断送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它的未来。

当今社会，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就是一个“服务者”，为社会发展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如何扮演好“服务者”？以什么方式服务社会？如何解决“一次就好”的问题？还是只有依靠藏品，依靠陈列展览，依靠讲中国故事，依靠“请进来”，依靠“走出去”，依靠物联网，依靠大数据，依靠智能化，等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位“服务者”需要不断获得新的技能来迎合它的受众，甚至占领高地去引领潮流，让无论是老年、中年抑或者是青年迷倒在自己的多样形式下备受追捧也并非不可能。

笔者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一线讲解岗位坚守讲解近10年的一位普通而平凡的讲解员。2013年冬天，重庆的冬季属于旅游淡季，博物馆门庭冷落，出于无奈被迫解决这种困境，讲解员成立“故事宣讲团”，通过一人一个小故事（有关古代或者社会热点），再集演、诵、唱、跳等多样化形式免费走进社区、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部队、监狱、企事业单位等，从最初的“免费推销”发展为后来的各单位主动提出1000元、2000元、3000元最高15000元要求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故事宣讲团”抽出时间有偿服务为他们送去精神领地



的洗礼，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表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社会角色扮演中的成功，而是因为笔者是“故事宣讲团”的一员，能够切身体会宣讲团严格把控质量，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让“走出去”不停留于口号，不终结于一次两次，形式多样化的迎合不流于形式。

希望有那么一天，无论是你走进博物馆还是我带着“博物馆”走向你，它最为古朴素雅的样子，能像一位朴实安详的老人，怀揣着无尽的故事，只等着对你将这陈年往事一一诉说，让你感受到它的素雅、古朴、宁静和厚重。一件件藏品，是遥远年代里的守望者，承载着太多的人文情怀，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记忆，只待你从中领略宝物的珍贵和对溯源的那份深深依恋以及盛放灵魂的安心之所。

（张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1] 苏东海：《博物馆的深思——苏东海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 甄朔南：《博物馆学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3] 马自树：《关于博物馆社会服务问题》，载《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

[4] 宋向光：《博物馆进入服务时代》，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7月7日6版。

[5] 黄春雨：《博物馆的社会化与专业化思考》，载《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

[6] 苏东海：《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载《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9日6版。

[7] 单霁翔：《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载《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



试析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杨晓慧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江苏南京 210018)

内容提要：南京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文化历史资源的城市。位于长江路东段的梅园新村旧址，是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驻地。在这里，孕育并传播了梅园红色文化，培育并教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本文从梅园红色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开始解读，试析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以及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红色文化 核心价值观 共产主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南京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雨花台烈士陵园到渡江胜利纪念馆，再到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浓缩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光辉历程，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付出的英勇牺牲与不懈努力，成为南京这个城市弥足珍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笔者在本文中将从记录国共南京谈判历史的梅园红色文化中，探究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一、梅园红色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梅园红色文化的产生，是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中，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团结、民主，在争取和平统一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文化成果。

(一)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与国共内战一触即发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洗雪中华百年屈辱而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

大民族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倡导实现和始终坚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绝地迈向独立解放的坦途，取得了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虽然，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但是，在怎样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两党却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而此时的国民党却依靠美国的援助，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内战一触即发。

(二) 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一行前往南京，入驻梅园新村，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梅园红色文化就此孕育而生。

在国共南京谈判的10个月零4天里，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胆略智慧，顶住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



与坚持独裁、内战立场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美蒋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暴露无遗^①。同时，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的真实意图，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国政府援蒋内战对华政策的实质，争取了中间势力的支持，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为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赢得了时间，也为后来打败国民党奠定了政治和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展示了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作风。梅园红色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中蓬勃诞生，它是我党的精神财富，沛然充盈于中华民族的肌体，激励我们将它进一步研究和发扬光大。

二、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在梅园新村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身居虎穴，与国民党进行铿锵有力的谈判斗争。他们保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有理有节，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简朴的生活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真和平、真民主而不懈努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共代表团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无私忘我的崇高革命精神。

（一）崇高的思想境界

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特殊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谈判条件而达成的生命整体状态。梅园红

色文化中所展现的崇高思想境界，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武装。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在生母、乳母和养母的悉心照料下，深受古代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到南开中学后，针对当时日益衰微的国民之风，他在《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一文中发出“纵察往事，而返观吾千钧一发之神州，四千年之文明已失其旧，思想日趋卑鄙，民气日渐消磨”的感叹。由此可见，深受中华儒家思想影响的周恩来，在树立人生志向时追求崇高思想境界的抱负，这说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探索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始终把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作为同步推进的目标。

此外，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梅园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共代表团成员心系国家，胸怀世界，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虽不能致，心向往之”，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艰难时期，在四处理伏的梅园新村驻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和平统一与国民政府继续和平谈判。这是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诠释，这一切也充分融入了梅园红色文化中。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梅园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忠贞，对共产主义事业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入驻梅园新村。在代表团驻地周围，被安插了数个国民党特务监视站以及伪装成各种行业的流动特务。郭沫若曾在《南京印象》一书中这样写道：“仿佛在周围的空气里，四处都闪烁着狼犬一样的眼睛、眼睛、眼

^① 颜鸣、许清主编：《中共代表团在梅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睛……”^①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代表团成员始终坚定争取和平、民主的信念，通过坚持不懈的谈判以及各种渠道对外及时发布谈判进展，尽可能地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新中国而做到了仁至义尽，终于赢得了人心。

正是因为梅园新村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在谈判取得进展时不骄不傲，遇到阻挠时不懈不弃，他们所传达的理想信念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遗产。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气节教育，以未来的前景相互激励，使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梅园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

（三）巨大的人格力量

巨大的人格力量，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特定环境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外化，它是梅园红色文化的精神体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员所体现出的巨大人格力量，来自于不断的修身磨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引导。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追求人格完善的自觉意识。儒学创始人孔子推崇的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逐渐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成为塑造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动力。

追求人格的完善，青年周恩来也如是。在南开中学的新式教学中，周恩来通过修身继承了民族优秀传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格观。面对社会独立后，生活的艰辛和磨砺，使他在接受社会教化中逐渐养成了健康的人格。因而，周恩来在中学毕业时得到了“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有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②的评价。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在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前，委托秘书王炳南将一只五彩人物敞口瓶赠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虽然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与美方代表针锋相对，但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人品一向赞赏。收到礼物后，他非常感动，携带回美国，一直悉心珍藏。美国特使马歇尔对周恩来的人格非常敬佩，称“周恩来将军不愧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为了表示对周恩来的敬意，他特地送给周恩来一只手提式公文包，皮包表面有烫金英文：“马歇尔将军赠周恩来将军”。

（四）朴素的生活态度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成员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是梅园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南京梅园新村，代表团所处的政治环境比重庆时更加严峻和险恶，生活也更加艰苦。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体成员都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吃的依然是每天每人二两肉、二钱油、一斤蔬菜的家常便饭；住的方面，通常几个人住一间屋，即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只能在一个套间，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③。他们认为，在自己身上节约，就可以给党、给人民军队多增加些经费，解放区军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周恩来、董必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美方谈判，另一方面又要与第三方会见协商，还要不断接见中外记者，经常晚上开会、审稿，甚至亲自起草电报，睡眠时间很少，有时一边吃饭，一边与工作人员研究工作，甚至饭没有吃完，就被喊走了。

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于工作需要，给他做了套藏青色西服。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常穿着这套西服，外出谈判或接见客人。他深知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所以特别爱惜，每当办公时总要戴上护袖，唯恐磨损。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

① 周校水主编：《梅园故事》，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③ 肖振才主编：《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放区人民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党中央给他买了一个公文包装文件。会上，他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成就。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外出谈判时董必武依然带着这个公文包，装一些机要文件，后来皮包带磨坏了，他就把自己的皮鞋带解下来绑在皮包上继续使用，解放后依旧在使用。这些艰苦朴素的生活细节，已深深印入梅园的历史，凝结在梅园红色文化中。

三、弘扬梅园红色文化的实践价值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及“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对弘扬梅园红色文化的实践价值做如下诠释。

（一）弘扬梅园红色文化 有利于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红色文化是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培育形成的红色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和风采，更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特点。正是如此，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就要持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梅园新村纪念馆自建馆以来，馆内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专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深入研究和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价值，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譬如：自 1985 年以来，梅园新村纪念馆在全国多个城市包括西藏、宁夏等边远地区创办近百个“周恩来班”，以伟人精神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每年暑期举办“红色文化主题夏令营”，讲述梅园故事、传播梅园精神，在全省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级领导对梅园红色文化的关心指导下，作为研究人员，需要重新审视发掘红色文化，更好地发挥其对爱国主义精神和价值的推进作用。

（二）弘扬梅园红色文化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

梅园红色文化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不懈追求，爱国主义情怀贯串国共南京谈判的整个过程。正是由于梅园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特性，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必然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弘扬梅园红色文化 有利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 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指的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梅园红色文化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代表团成员严格执行并遵守中共七大上确定的党章。七大党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还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如今，我们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正是在梅园红色文化一脉相承的基础上重温并深入学习党的发展历史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因而，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有着深远的意义。

历史总是在百折千回中迤迤前进，作为在红色



文化场馆工作的工作者，我们应协力同心、勇挑重担，在建设新南京的征程中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把先辈们留下的红色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让红色文化始终与美丽南京交相辉映。

（杨晓慧：南京市博物总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文博馆员）

参考书目：

[1] 颜鸣、许清主编：《中共代表团在梅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2] 周校水主编：《梅园故事》，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3] 肖振才主编：《大智大勇——周恩来在 194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4] 王化许主编：《梅园华章——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建馆三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浅析红色基因的提炼与弘扬

——以渡江战役红色基因为例

王 高

(渡江战役纪念馆 安徽合肥 230091)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兼程中凝聚了许多伟大的红色文化基因,如古田会议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但遗憾的是,依然有很多独有的红色文化基因没有得到重视和总结,同时如何根据时代需要,赋予红色基因以新的内涵,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笔者将以渡江战役为例,简要分析如何从红色历史中寻求着力点,提炼出其独有的红色文化基因。文章还将以渡江战役纪念馆为例,从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出发,探寻弘扬红色文化基因的新思路、新方法。

关键词: 红色文化 渡江战役 提炼

在提炼红色文化基因时,我们都无法脱离它所承载的红色历史和所处时代的红色背景。提炼渡江战役的红色基因,我们首先要全面了解渡江战役,特别是把握党在这一阶段前后已经凸显的红色精神。

一、基本情况

(一) 渡江战役基本情况

1. 基本史实

1949年4月,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到江苏江阴的千里长江上,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立体防线,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迷梦,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2. “独特”之处

除了基本史实,我们更应把握渡江战役中的独特之处。“紫石英号”事件和人民解放军夜宿上海南京路这两件事例,不管是当时或是现在,都足以震惊中外。

(1) “紫石英号”事件。

“紫石英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前与西方列强第一次公开武力对抗,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主权坚强的决心。

1949年4月,正在我军准备发起渡江作战时,“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无视我军早已发出的,外国舰船于11月20日前撤离长江的公告。警告无效后,我军予以炮击,此后火力冲突持续2天,地面谈判持续了100天之久。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也正是在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下,该事件最终以英舰逃逸而结束。

“紫石英号”事件引发的军事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9年,英国学者发表文章称,30年前有人认为“英国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应发展为“列强的炮舰政策在中国



的终结”^①，对于中国而言，则象征着即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勇气，也昭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忍受屈辱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人民解放军夜宿上海南京路情况。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上海战役之前，总前委制定了《入城守则》，最重要的有两条，一不准在市区使用重武器作战，二是部队不准入民宅。对不入民宅，有的干部想不通，问：“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1949年5月27日子夜，第三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第27军、第23军及第20军，攻入上海市城区，十万大军就地露宿上海街头。第二天清晨，整个上海市民乃至全世界为之震惊，与费正清齐名的美国一位中美问题史学家鲍大可，谈及此事时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英军名帅蒙哥马利也曾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你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当然这仅仅是上海接管工作中的一个缩影，以自己的模范纪律来对待接管工作，“它象征着新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头彻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②。

我们在提炼渡江精神时，只要将其独有的内涵予以挖掘，才能更好地总结和提炼。

（二）红色时代背景

渡江战役自1949年4月20日到6月2日，历时43天。但是渡江红色文化基因所蕴含的时间，肯定是要超过这43天的。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乃至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同样解放战争期间凝聚的红色精神，对渡江战役而言显然

是有参照意义的。结合党中央对渡江战役的决策和1948年、1949年的革命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为民创业和守业的西柏坡精神恰恰符合这一条件。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在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而且形成了渡江战役的战略决策。1948年12月12日渡江战役首次被系统地提出，整个战役前的运筹帷幄都是在西柏坡完成的。在1949年3月份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讨论的首要问题就是关于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问题。而这无疑也明确和坚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向全国进军的信念。所以在提炼渡江精神时必须融入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内涵。

二、渡江战役红色基因的提炼

厘清了渡江战役涉及的范畴后，笔者将试图从精神基石、核心、时代旋律三方面来对渡江战役红色基因进行提炼。

（一）精神基石——人民

淮海战役后，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同样，人民解放军成功渡江，也始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刘伯承曾这样评价：“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前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③

广大民工在船工的征调中也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渡江战役时无数船工更是贡献了自己唯一的财产船和生命，不求任何回报。“年轻的小伙、姑娘，主动推迟婚期，报名充当船工，连60多岁的老船工，50多岁的老大娘都不甘落后”^④。仅安徽无为地区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773页。

②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③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451页。

④ 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就有 3400 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更是涌现出特等英雄车胜科、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一大批渡江功臣。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在父亲参加渡江作战牺牲后，忍着极大的悲痛，子顶父职，同其弟一道，继续完成了渡江任务；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年仅 14 岁，她主动要求参加渡江先遣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把第一批渡江勇士送上南岸，返回途中，又抢救翻在江面上的我军两条沉船上的 16 名战士。在渡江战役中，无为船工、水手中涌现一等功臣 296 名、二等功臣 429 名、三等功臣 973 名、四等功臣 499 名^①。

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物资保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苏北、皖北动员的临时民工就达 320 万人，组建了几十个民工随军服务团，确保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②；苏北、皖北筹集与运送前线的粮食达 3.4 亿多斤；山东的妇女广泛开展了“每人做双过江鞋”活动，赶制的布鞋有 200 多万双。

人民的无私支持和付出，正是我们无往不胜的坚强基石。而西柏坡精神也同样提到了依靠群众这四个字。所以，军民团结，一往无前。这也正是渡江战役红色文化基因所在。

（二）核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 年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全国的决定性胜利，并在西柏坡描绘出新中国的蓝图。

下面将以华东野战军为例，展现人民解放军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迈之情。1947 年孟良崮之战，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转变了华东战局；1948 年浴血豫东，在敌重兵云集的中原

地区，战斗 5 昼夜攻克了河南省会开封，在军事和心理上重创国民党军；决战淮海更是战功赫赫，为我军渡江和解放江南大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49 年 2 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3 月中旬，又根据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进至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和如皋一带，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4 月 23 日解放了国民党 22 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更是开创了用轻武器解放大城市这绝无仅有的奇迹。

即使是渡江战役后，第三野战军的步伐也没有丝毫停滞。该部第 7 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与华东军区一部的配合下，解放了浙江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第 10 兵团于 7 月上旬由苏州地区南下，向福建进军，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市，至 10 月中旬，解放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华东野战军作为我党、我军的一个缩影，始终秉承一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南征北战。

同样为了捍卫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该部 20 军、21 军、23 军、24 军、26 军、27 军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在长津湖之战中，还创造了中国军队歼灭美军团级战斗单位的唯一战例。结合西柏坡精神中提到的敢于胜利的内容，渡江战役充分彰显了我党、我军为了人民独立、富强，不畏艰难的顽强精神。

“将革命进行到底”既是口号也是信念，所以将红色基因浓缩为：坚定信念，革命到底。

（三）时代旋律——爱国

红色基因必须要结合、涵盖时代的主旋律才能焕发不变的生命力。回望百年，从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秉承对“国家”的责任，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与富强的道路。

① 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巢湖地方史》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1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 页。

③ 《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渡江战役时，我军以单一兵种对付陆海空立体防线、以小木船来对抗军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渡江老兵刘文天回忆道：“1949年4月20日，我所在的第三野战军接到命令，当晚要强渡长江！当时，我们每个排乘一只小船，大家拿铁锹当桨，不停用劲划。渡江途中，枪弹如雨，不少战友牺牲，江水都被染红了……”南京军区原司令员，时任第二野战军44师师长兼政委向守志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敌人的枪弹、炮弹掠空飞舞，构成拦截火网，3连2排的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纷纷挺身为船工水手遮挡子弹，奋勇前进！负伤的班长一面奋勇划桨，一面高喊：“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战斗到底！”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对国家的热爱。

综合以上分析，渡江战役所体现的红色文化基因为：军民团结，一往无前；坚定信念，革命到底；勇于担当，振兴中华。

三、红色文化基因的弘扬

红色文化基因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根基、精神之源，血脉永续。作为红色纪念地、纪念馆如何更好地去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呢？笔者将以渡江战役纪念馆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一）多渠道扩大红色影响力

首先，将日常的讲解更加精细化。根据参观者不同的年龄、知识层次制作针对性的讲解词，使讲解更具有吸引力，扩大红色讲解效果。其次，加大“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加深与同类场馆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渡江战役纪念馆

发起成立的渡江研究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将在巡展、讲解员培训、史料研究方面加深与渡江战役有关的纪念馆、旧址的合作，从多角度来挖掘亮点增强红色文化吸引力。最后，积极开发具有意义的文创产品。如何让参观的游客产生共鸣，文创产品恰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将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故事蕴含到其中，让红色基因的宣扬更具有持久性。

（二）发挥红色基地优势

纪念馆要利用多种渠道，发挥红色基地优势。在清明节时，可以举办与互联网相结合的祭奠活动。抓住“七一”“八一”等特殊纪念日，组织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让更多的人缅怀革命先烈、回顾光辉历史的过程中，加深对红色文化基因的认知。

针对青少年，则开发与其身心相符的红色体验活动。组织学生亲身体验纺线、打靶、医护包扎、划船等活动，让红色历史以体验的方式传送给孩子。渡江战役纪念馆已开发的“我是小战士”特色品牌活动，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对于红色纪念地、纪念馆而言，准确地提炼出其包含的红色基因，采取鲜活的形式加以弘扬，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才能真正为孕育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脉源泉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王高：渡江战役纪念馆研究保管部主任、文博馆员）



“互联网 + 协作” 在文博领域的应用

——以大英博物馆“众包模式”完成藏品数字化工作为例

刘文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山东威海 264200)

内容提要: 在文博工作中引入“互联网 + 协作”的方式,即基于互联网平台众包的协作模式——众包模式,通过网络汇集大规模人力以并行“运算”的方式处理相关数据,进行考古研究,运用得当能够大幅度节约经费,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研究进度。众包模式在数字化考古、文物古籍数字化、藏品征集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工作方面,将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成为推动文博事业向前发展的又一助力,成为拓宽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另一种特殊渠道,成为加速博物馆建设的又一重要手段。

关键词: 众包模式 博物馆 藏品数字化 MicroPasts

博物馆作为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在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智慧博物馆概念的提出,一些新兴技术的出现,对博物馆业务开展的模式、方法,文化传播的途径,受众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藏品作为博物馆一切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数字化工作在三维建模、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虚拟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等新概念面前,有了更新的、更多层次的、更高标准的要求。鉴于此,博物馆面对大规模馆藏物品数字化这一繁重任务,如何在有限的经费、人力条件下,行之有效地完成工作,成为时下每个博物馆都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大英博物馆利用众包平台进行藏品数字化工作的成功经验为例,探讨互联网众包模式在博物馆考古研究及数字化工作中的应用。

2013 年,大英博物馆联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英国国家人文艺术研究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发起了 MicroPasts 项目——一个基于互联网众包模式的,将专职研究人员、志愿者、历史(研究)社团(Historical society)以及所有感兴趣的公众方、个人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通过分布式协作的方式进行考古研究、历史和遗产研究的试验项目。通过 MicroPasts 项目,大英博物馆将全球范围的数千名志愿者通过网络“集结”在一起,对馆藏“青铜时代”系列文物相关数据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对文物所属的 30000 张制成于 20 世纪初期的手写藏品索引卡进行了数字化转录;对 5787 张文物照片进行了数字化 3D 建模前预处理工作(勾勒轮廓线并数字化)^①。这一带有试验性质的课题研究,打破了以往参与者

^① Maeve Kennedy: Volunteers help British Museum in crowdsourcing archeology project, <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4/aug/18/volunteers-british-museum-crowdsourcing-archeology>, 2014-08-18/2015-10-11。



在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方面的种种限制，通过线下与线上、专业人员与志愿者共同努力与通力协作，完成了以往需要大量专业人员长期努力，甚至需要商业解决方案才能完成的任务，可谓在文博领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

一、众包模式发展现状

众包(crowd-sourcing)一词,最早由美国《连线》杂志撰稿人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提出。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①。从某种角度通俗地讲,众包就是将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型任务分解成许多简单的小块任务,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这些小块任务分配给千万网民,最终通过众人通力协作的方式完成大型任务的做法。

众包概念从提出发展至今,已在国内外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从全球范围来看,拥有超过5000万用户的维基百科,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众包项目。截至2015年8月,由全世界的志愿者们共同完成的词条已达3585万条,总编辑次数超过20亿次,共有超过5700万人志愿为之服务,并乐此不疲。维基百科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可谓是群策群力,众包模式最成功的一个典范。随着技术和理念的进步,近年来,众包模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科研、考古、商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涌现出众多成功案例。

在科研领域,由牛津大学、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阿德勒天文馆等机构研究者参与并发起的,成立于2009年年底(原型可溯源至2007年)的Zooniverse的网上研究平台及其科研成果,可谓是

天文学研究领域应用众包模式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以Zooniverse的子项目Galaxy Zoo为例,这一邀请大众参与,通过人工鉴别图像来帮助分类超过100万星系的天文学研究项目,自2007年发起以来,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万名志愿者通过互联网投入这一浩大的工程,使此项天文研究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并发现了职业天文学家也未能发现的一种全新的星系^②。迄今为止,科学家利用Zooniverse平台研究数据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已达89篇^③。来自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Galaxy Zoo的管理员马斯特斯这样评价:“‘星系动物园’的参与者花了两年时间把斯隆数字巡天的星系做完了分类,如果仅靠我们这些职业天文学家来做,大概需要4000年时间才能做完^④。”

在考古领域,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于2010年6月10日推出的“虚拟考古”网络平台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平台,网络志愿者仅需通过分辨并标记高清晰度卫星照片这样的简单操作,就能够亲身参与到“发现”成吉思汗陵的考古研究工作中去。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众包模式能够极大地促进专业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虚拟考古”平台发布后,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收集了1万名参与者贡献的超过230万条元数据,这相当于一名专业考古工作者3万小时的工作量。虽然该平台至今仍未发现成吉思汗陵的确切位置,但通过该项目科研人员已经发现了55处具有重大考古意义的遗址^⑤。此外,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学院、日本奈良大学等机构也在MicroPasts.org众包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科研项目,在全世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92个有关手稿识别、勾勒图像轮廓线任务的项目,共计27620个任务得以完成^⑥。

在商业领域,有用众包模式进行产品研发

① 张晓霞:《众包与外包商业模式比较及其启示》,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16期,第19页。

② BBC: How Science Changed Our World, BBC One, 2010—12—23。

③ Zooniverse: About-All Publications, <https://www.zooniverse.org/#/about/publications>, 2015-9-30。

④ 黄永明:《星系动物园》,载《南方周末》,2012年8月30日。

⑤ Albert Yu-Min Lin, Andrew Huynh, Gert Lanckriet, Luke Barrington: Crowdsourcing the Unknown: The Satellit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4046>, 2014—11—30。

⑥ MicroPasts.org 网站, 2015年10月17日。



的 InnoCentive 网站平台、众包网络地图应用 Waze、鸟类观察资料库网站 eBird 以及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等等。

在国内, 创建于 2007 年的中国自然标本馆 (CFH) 公共科学平台, 在平台 8000 多位志愿者的协作下, 在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监测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随着志愿者不定期地把拍摄到的植物、鸟类、菌类照片上传, 平台每天都有 2000 ~ 3000 张照片入库, 目前图片总数已超过 400 万张^①。此外, 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的搜狗输入法, 其词库更新则是众包应用的一个很好体现, 截至 2015 年 9 月共有 19520 个网友创建了 27695 个词库, 超过 4848 万个词条。

大量具有众包性质的公众科学项目和公共科学平台的启动实施, 为科学研究、考古研究、环境保护、商业经营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的应用

(一) 应用众包模式的范围

众包模式应用的首要条件是其事务的运转需要借助大众的力量。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 即众包模式较为擅长解决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事务, 更适合诸如动员大众采集信息、提供大规模作业、筹募资金等人力密集型业务。下面我们就几种典型案例, 对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应用范围简单归类如下。

1. 海量数据收集、处理方面

无论国内外博物馆, 在 IT 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 对馆藏品进行数字化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动辄十万级, 甚至百万级数量的海量馆藏面对数字化的迫切需求, 给博物馆行业工作者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前文提到的大英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工作, 较于传统方式无疑是另辟蹊径。据资料统计, 我国

拥有博物馆总数达 4510 家^②, 藏品总量之和超过 1600 万件。在海量文物数字化处理等工作面前, 大英博物馆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2. 征集物品、创意、建议方面

藏品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 是博物馆开展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 也是博物馆存在与发展的命脉^③。文物征集, 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除征集文物, 各博物馆还会从自身需要出发, 征集 Logo、宣传语等。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特性, 国内外博物馆业者早已将征集渠道拓展至网络。开启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 “博物馆、征集、logo、口号”, 我们可以轻易查询到超过 250000 条结果, 如《世博会博物馆标志征集——征集大赛》《中国港口博物馆 LOGO 征集大赛结果揭晓》《甘肃省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全省博物馆 logo》《征集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口号启事》等。在国外, 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于 2014 年 10 月发起了 American Air Museum In Britain 项目, 并建立专门网站 www.americanairmuseum.com, 旨在向全世界网友征集战时在英国本土服役的美国空军相关二战老照片, 截至 2015 年 9 月共收集老照片达 28 万张; 2013 年, 美国芝加哥历史博物馆采用众包模式, 向市民征集他们对未来博物馆展览主题的提议; 美国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使用 FromThePage 开源软件, 通过互联网平台邀请志愿者转录名人手稿。上述案例, 毫无例外都采用了众包模式, 并最终获得成功。

3. 筹集资金方面

我国国有博物馆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 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是博物馆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对于欧美博物馆而言, 其资金来源包括社会赞助、政府资助、博物馆自身营业收入和投资收入四大块^④。社会赞助作为欧美博物馆筹集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互联网时代也有了新的做法。2015 年 7 月, 美国史密森尼森博物馆

① 李瑜:《2014, 启蒙“公民科学”》,《中国科学报》,2014年1月3日1版。

②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dfwhy/2015-05-19/content_13715109.html, 2015—09—30。

③ 李军:《博物馆征集工作的思考》,载《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3期,第61页。

④ 唐泽慧:《美国博物馆的公众定位与筹资模式》,载《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10期,第113页。



(Smithsonian) (这里指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 在 Kickstarter 平台上发起了一场名为“Reboot the Suit”的众筹活动,旨在筹集资金修复馆藏阿姆斯特朗宇航服,并为 2019 年庆祝人类成功登月 50 周年纪念日做好准备。最终,项目仅用短短 5 天时间就筹集到用于修复的 50 万美元资金。得益于众筹平台,博物馆的一些特殊项目可因此获得大量小额捐助,以支持一些大型的、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捐助,这些项目可能难以展开^①。

(二) 应用众包模式的方法

众包模式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众”的概念,其所对应的项目往往涉及大规模人员的调度使用。在互联网时代,依靠 IT 技术将众包平台的易用性做到最好,行之有效地做好发起、宣传工作,耐心细致地做好参与者的指导、帮助工作,都是众包项目成败的关键。我们看看大英博物馆是如何做好这些工作的。

1. 大英博物馆“青铜时代”藏品数字化工作

这一工作由文博工作者、IT 工程师、网络志愿者三方人员共同完成,是专业人员与网络大众通力合作的结果。第一步,由 IT 工程师分析博物馆实际需求,在开源软件 PyBossa 和 Discourse 的基础上,经过 6 个月的独立研发定制开发了“青铜时代”所需的全部功能,并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以网站的形式正式交付使用,作为整个项目工作和交流的平台;同时,由馆内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进行 360 度拍摄,将青铜器所属的 14571 张索引卡也进行翻拍,并将最终形成的 3 万余张数码照片编为 56 个分项后,上传至 MicroPasts 平台。第二步,通过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宣传渠

道广泛宣传,吸引大众关注。待志愿者注册并登录 MicroPasts 平台后,完成两种很简单的任务:一边对照着手写卡片的照片,一边在网站格式化的表单里记录下照片上的手写文字信息;拿起鼠标,把照片上文物的轮廓线勾勒下来,生成 3D 建模所需的控制点数据。这一看似“无趣”的项目,却吸引了很多网友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位名叫 Joellen mcGann 的美国网友,项目发起的第一天就注册了账号,并在日后完成了 13417 个^②任务,而每一个任务都代表着一次卡片文字转录或者文物图片勾勒轮廓线工作。

在转录或者勾勒工作中,每一张卡片或者文物的照片都以随机任务的形式,发放给不同的志愿者。每一个任务都会交由不同的志愿者执行多次,以此产生冗余数据,由系统自动比对、校验后生成分析报告,供项目组评估数据准确性。

这项工作最终形成的数据,大英博物馆以开放授权(采用知识共享协议)的形式向公众开放下载。其自身也利用这些数据对文物进行 3D 建模,借助虚拟现实设备进行展示。

2. 众包模式应用所需要的 IT 技术

众包模式能够走出实验环境,真正应用于实际生产,离不开 IT 技术的支撑。以大英博物馆“青铜时代”藏品数字化工作为例,其所用 MicroPasts 平台采用了 PyBossa、Discourse 开源软件、亚马逊云计算平台、Flickr 免费公众服务平台等资源,并使用了 Structure-from-Motion^③技术用于文物的 3D 建模。

(1) 开源软件 MicroPasts 平台采用 Ubuntu Linux 作为服务器操作系统,使用 Apache、Python、Ruby 等软件作为运行环境,使用了同样免费的开源软件 PyBossa、Discourse。众包平台软件

① 皓岳译:《美国博物馆借助众筹来修复阿姆斯特朗登月宇航服》, <http://techcrunch.cn/2015/07/28/smithsonians-giant-leap-into-kickstarter-pays-off/>, 2015—09—30。

② MicroPasts.org 网站, 2015 年 10 月 17 日。

③ 维基百科指出, Structure from Motion 为一种 3D 建模技术,其研究目标是从二维的图像或者视频序列中恢复出相应的三维信息,其中包括成像摄像机的运动参数以及场景的结构信息。通俗来讲,就是基于多张 2D 照片进行 3D 建模。



PyBossa 用来创建图片分类、转录、地理位置标识等用途的众包项目，让科研人员通过互联网与全世界网友联系在一起，共同协作，以极高的效率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论坛软件 Discourse 用来搭建供用户在线交流的平台，包括项目组成员、志愿者，以及感兴趣的网友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其内发言，或答疑解惑，或分享心得体会。

(2) 云计算平台 MicroPasts 项目采用了亚马逊云服务 (AWS) 来存储图片。相较于使用传统服务器网络和托管技术自主搭建的存储平台，云计算平台在便利性、节约硬件成本、数据安全等多个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3) 免费公众服务在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同时，MicroPasts 项目还充分利用免费公众服务，如采用 Flickr 进行图片存储，同时向公众公开、分享这些图片，以扩大项目及博物馆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4) 3D 建模技术详尽的数据，为 3D 建模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MicroPasts 项目组采用 Agisoft 公司的 PhotoScan Pro 软件，使用文物照片及众包所产生的轮廓线数据进行 3D 建模工作。其中，大英博物馆将“青铜时代”系列文物所产生的 3D 数字模型，用于虚拟现实展览。观众来到博物馆，只要头戴虚拟现实设备就能“身临其境”，一睹“青铜时代”原住民房屋及其所使用的青铜器械的风采^①。

(三) 众包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众包模式这一概念自 2006 年被提出后，经过近 10 年时间的发展，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公益领域，都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商业众包相比，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商业众包通常有着明显的，具有“赏金”性质的激励机制，而文博领域众包则普

遍具有公益性质，志愿者精神贯穿众包工作全程。与商业众包相比，文博领域的众包工作通常从博物馆的声望，所研究课题的科学趣味性，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与兴趣点出发，很少有物质奖励或报酬出现，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奖励。

从前文提到的诸多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博领域的众包工作，其参与者多由自身兴趣或者对科学公益事业的“价值认同”“参与感”“荣誉感”出发，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取决于大众的兴趣、爱好、业余时间的多寡、自身精力等多个方面因素，因此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众包项目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众包项目实施过程中，合理安排，制定合适的推广策略、实施步骤，决定着众包项目的成败。文博领域应用众包模式，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最大程度降低众包任务的难度

将劳动分解成小零件，或者单元，这是众包的特征之一^②。志愿者参与众包工作，往往利用的是个人短暂的空闲时间，且绝大多数人缺乏文博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发包方必须致力于降低任务的复杂度，将任务分解至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以降低公众参与众包的难度和门槛。以上文提到的 MicroPasts 和 Galaxy Zoo 项目为例，这两个成功的项目都有着非常简单的任务，志愿者只需花数分钟甚至数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为进一步降低参与难度，这两个项目还专门制作了向导式培训页面，MicroPasts 项目组甚至撰写了完备的操作文档，以让初学者能快速掌握相关技巧，达到了“零难度、无障碍”式的操作效果。正因为简单，普通人也能参与到非凡的科学中来^③。与此相反，如果难度过大，公众参与门槛就会相应地提高，参与热情也会降低，从而影响到项目的进展，甚至导致项目失败。以荷兰国家军事博物馆于 2013

① Maev Kennedy: British Museum uses virtual reality to transport visitors to the bronze age,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5/aug/04/british-museum-virtual-reality-weekend-bronze-age>, 2015—09—30。

② [美] 杰夫·豪著，牛文静译：《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年发起的，转录 1811—1940 年军官日记众包项目为例，因其专业性过强，参与者过少，导致项目至今仅有 544 名参与者，完成比例仅达到 12.9%，且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认定该项目已失败。因此，尽可能地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至关重要。

2. 推广宣传工作要做好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何吸引、邀请大众来参与一项与文博工作有关的科研项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相应的推广宣传策略。从大英博物馆等国外知名博物馆实施众包项目的做法我们可以得知：广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渠道，除新闻媒体等传统渠道外，还广泛、着重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如官方博客、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渠道，与广大参与者建立起多种渠道、方式的互动与沟通，让更多大众认识、了解项目的价值、意义及最新进展，进而吸引大众参与到项目中去。唯有解决了人力资源问题，众包项目才能得以实施。由此可见，推广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3. 做好调度、支持工作

成千上万人共同完成一项伟大的壮举，这是众包工作的终极目标。如同军队的训练、部署、调度和后勤保障，众包项目的指挥、调度与支持工作也是项目成败的关键。有研究表明，享受乐趣、能力提升、虚拟社区以及自我肯定是影响众包用户行为的重要内部动机^①。在 MicroPasts 项目中，其网站醒目位置上设有志愿者贡献排行榜，并向所有参与者致谢，以激励广大参与者。同时，在 MicroPasts.org 网站上搭建论坛作为众多志愿者问询、求助、讨论心得的一个平台。项目组可从论坛上及时获得志愿者反馈的信息，并及时解答志愿者的问题，同时将项目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公开，积极有效地引导整个众包项目向前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众多的志愿者将无处答疑解惑，无法互相交流并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将导致志愿者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自身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进而认为项目组对自己的付出不闻不问，这无疑将严重打击志愿者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很有可能使其终止贡献行为。如果这种负面情绪在网络上发酵，蔓延至整个志愿者队伍，这对项目进展无疑是一种灾难。

三、众包模式对文博工作的推动作用

众包模式因其高效率而备受世人青睐，在其巨大潜能的号召下，当今世界各国文博领域纷纷推出自己的众包项目，用世界的力量推动自身发展。众包，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科研院所解决一些“超大规模简单问题”的锦囊妙计。

在辅助博物馆文博研究方面，一些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的项目，如果符合基本原则，众包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应用众包模式运作，往往能带来较于传统方法数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在扩大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方面，博物馆可借助众包项目本身，让万千参与者自动成为博物馆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随着自身的参与感日渐增加，又将自发成为项目及博物馆的义务宣传员及相关历史、文化的传播者，进而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此外，众包也给了广大青少年一种选择——一个不用耗费多大的代价，就能亲身参与文博研究的可能，一种更好地，能与博物馆互动地，更生动地接受历史、文化知识的方式。这对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观众走进博物馆，对博物馆更好地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大有裨益。

纵观众包模式及其理念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看出，对众包模式的善于运用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小到简单的创意、口号、意见征集工作，大至复杂的、需通过大量人员通力协作

^① 仲秋雁、王彦杰、裴江南：《众包社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实证研究》，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2 页。



的文博研究助力工作，从单纯的工作效率提升至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延展，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的应用，都发挥着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国外文博领域对于众包模式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大英博物馆采用众包模式进行馆藏文物数字化工作的试验，其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众包模式因其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

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推出自己的众包应用。这对于加快我国智慧博物馆建设，将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成为推动文博事业向前发展的一大助力。

（刘文杰：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陈列部、助理馆员）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品编目工作实践的体会与思考

桂星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 100165)

内容提要：藏品编目是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基础性环节。为了藏品的有效管理和研究利用，必须对藏品进行科学编目。各个博物馆的性质、类型、藏品数量和特点不同，应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应的藏品编目制度。本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目工作流程、工作方法、操作规范等进行了总结归纳，对进一步提高编目工作效率和科学化水平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抗战 纪念馆 藏品编目 实践 建议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是博物馆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为了藏品的科学管理和研究利用，必须对藏品进行科学编目。科学的藏品编目，对内能为保管人员查询、提用文物提供方便，能为展陈大纲编写人员提供内容依据，还能为陈列设计人员提供形式设计所需数据；对外能为前来博物馆参观学习、调查研究的观众提供方便。可见，藏品编目工作是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

藏品编目，即编制藏品目录，是将数量众多的藏品，按照一定办法进行综合和专题分类，按一定次序排号，根据藏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及其外观与实质，加以概述，写出卡片，编制成不同类型的目录。藏品目录可分为公用目录和工作目录，其内容、功用和使用人员均不同。藏品编目过程包括撰写卡片和编制目录，编目卡片按内容可分为基本项目、鉴定项目。基本项目包括藏品总登记号、分类号、原始号、数量、来源、入藏日期、附件等；鉴定项目包括藏品的定名、时代、质地、尺寸、重量、现状、评价等。

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学科分类、藏品数量和特点不同，编目制度与方法也不尽相同。如何将本馆实际与博物馆界业务工作的

一般规律和经验相结合，提高藏品编目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仍然是很多博物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任务。

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就十分重视藏品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努力。现结合近几年工作实践，谈几点体会与思考。

一、建立了一套符合本馆实际的藏品编目工作流程体系与工作方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中国唯一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担负着向世人展示这段历史的神圣使命。经过多年积累，馆藏文物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初成体系。与之紧密相关的藏品编目工作也在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单位专家的帮助与前人的努力下，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我馆馆情的道路。

(一) 藏品编目工作流程

通过多年工作实践与总结，抗战馆藏品编目工作流程大致为：总账和编目交接文物——文物杀虫与消毒——查找文献资料进行定名——填写藏品登

记草卡——领导审核——给文物标号并包装——填写藏品档案——填写库房点收单和库房交接。每一批文物到编目之后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工作流程进行的。这样的程序，权责明确，既保证了文物安全，也确保了藏品编目工作的科学严肃性。

(二) 草卡内容及具体项目的说明

藏品登记草卡的内容主要包括：总登记号、入馆凭证号、名称、年代、数量、单位、实际数量、尺寸、现状、质地、来源、征集人、征集日期、入藏日期、库房位次、说明、审核人等具体项目。这些项目，能简要地反映藏品蕴含的价值及外在特征，并能使检索者通过此卡对藏品有个大概的了解，为使用者提供选择依据。

所以，藏品草卡的项目编写，要科学、客观、如实，这样藏品草卡才能全面反映藏品内含的信息与价值。从总登记号项目，可以反映出藏品的分类情况，如基本藏品、参考品、复制品、艺术品、资料、纪念品、临时品等类别。从入馆凭证号，可以体现该藏品的征集方式，如捐赠、购买和借展。从现状描述，可以了解藏品的完残情况及修复情况。而从说明项目，则能获得藏品的题跋及藏品的补充情况，这些藏品的补充情况一般是对该文物研究之后的整理与总结，这对于以后的文物利用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例如，2014 年抗战馆征集到一批青岛日本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的有关档案。这一批档案的时间从 1938 年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较为系统完整地反映了这家日本纺织公司从抗战时期的建立

到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的相关情况，也深刻地体现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了更加突出文物的历史价值，笔者在对这一批藏品编目时，首先按照档案的时间顺序，在每一件档案的藏品草卡说明栏叙述了该日本纺织公司的历史沿革，并备注了该批档案包含的主要内容，使检索者在查看文物信息时能第一时间了解该公司的历史情况并对这批档案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为使用者在藏品提用时提供方便与帮助。其次，对每一件档案进行了挖掘与研究，并在说明栏备注了该件档案包含的具体历史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使用者对这批档案既有宏观的了解，也有微观细致的认识。

二、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编目要求

(一) 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文物定名标准，规范藏品定名工作

国家文物局 1986 年公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规定了博物馆藏品的定名标准，其中关于历史文物定名，规定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类别、器形或用途。结合这项标准与工作实际，笔者概括出馆藏文物定名的一些标准及具体文物的定名方式。

1. 定名标准

文物定名应科学、准确、简明扼要，达到“观其名而知其貌”，但同时应尽可能将藏品所含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名称中加以体现，便于查询和利用。近现代文物应用物主、地点、事件、用途表述藏品的主要内容、特征。其他需要注意的是：民国纪年或其他纪年后应加公元纪年，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纸质文物原名应用书名号，书名号内的文字需按原件书写；标点符号应使用规范，如“国立”要加引号、一·二八等。

2. 定名的基本要素

文物定名的基本要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年代、特征、通称。年代是指文物产生的具体年代；特征是指反映文物特性的项目，一般包含物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品草卡

总登记号			入馆凭证号			
名 称						
年 代		数 量		单 位		实际数量
尺 寸				现 状		
质 地						
来 源				征集人		
征集日期			入藏日期		库房位次	
说 明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填卡人		填卡日期



地点、事件、用途等项目；通称一般指文物的形制和用途。

近现代文物定名方式如下：

(1) 纸质文献定名，以“年代、主要内容、通称”定名。

例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4月11日金仲华编辑上海永生周刊社发行的《永生》第1卷第6期；[日]昭和13年（1938）10月27日刊载有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报道的《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2) 货币邮品：以“年代、发行单位、通称”定名。

例如：1945年中央印制厂上海印制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壹百圆 MD149171；昭和五年（1930）10月1日日本发行的第2回国势调查壹钱五厘纪念邮票。

(3) 徽章证件：以“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形制”定名。

例如：1937年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训团颁发给学员赵振标的“北平南苑抗日纪念章”。

(4) 音像制品：以“年代、主要内容、形制”定名。

例如：1941年由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起来（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5) 书画：以“创作年代（事由）、作者、形式、意境（内容）”定名。

例如：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创作的篆书“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书法作品。

(6) 武器：以“国别、式、型号、通称”来定名。

例如：苏联 M1939 式 37mm 高射炮；日本 8mm 南部十四年式半自动步枪。

（二）项目内容要完整、准确

近现代文物的编目除编写名称外，其他基本项目和鉴定项目都必须填写齐全。更为重要的是要写明每件文物的来源、流传经历、历史背景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等内容，如此才能全面揭示藏品内涵和价值。做到准确，就是编目的各项内容必须客

观真实地反映藏品的基本情况，基于文物实际情况，不能独自臆断，任意增减。没有考证清楚的情况，只能存疑，以待进一步认识与研究。

三、思考与建议

（一）建设藏品编目工作电子化平台，进一步提升文物管理工作水平

多年来，我馆藏品征集、编目、建档、入库、库房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流程，均是按照传统的手工操作管理模式，以纸质为媒介载体进行的。从第一步文物征集入馆开始，即要填写藏品档案、征集收据等纸质表格；征集人员将整理好的文物、档案及收据交给总账人员后，总账根据文物收据信息打印馆藏文物入藏单；之后点交给编目人员后，编目须要填写藏品编目草卡中的各项文物信息，打印出草卡并交领导审核，然后继续填写完善藏品档案及文物收据；编目人员将文物、档案及收据点交给库房后，库房人员在有了固定排架后在藏品草卡中填写入藏日期和库房位次，最后库房将藏品草卡交给总账，总账人员再重新录入草卡中的各项文物信息至藏品查询软件，提供使用者进行藏品信息检索，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才暂时告一段落。

在传统的藏品信息管理模式下，藏品的征集、编目、建档、入库工作要经过多道程序，费事费力，重复劳动，而且随意性强，造成信息不规范，容易出现误差，更存在着档案、资料保存不善，查找使用不便等问题。其中，尤其藏品编目工作程序较多、内容较为烦琐，如何提高藏品编目工作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的文物管理工作水平。而随着馆藏文物征集量的逐年增加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藏品编目工作由传统型的手工操作模式向电子化、网络化发展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

建设藏品编目工作的电子化平台，是在设计的藏品管理软件基础之上进行的，该软件会模拟现有的藏品编目工作流程与整套文物管理模式。首先，编目人员通过计算机即能完成电子录入藏品草卡，并将草卡以网络化的方式发送给领导审核，同时，相关的藏品档案也能实行电子录入。其次，当藏品



编目工作环节结束后,编目人员可以通过该软件将所编辑的信息传递给下一环节。

藏品编目工作的电子化,它以计算机软件管理方式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会将编目人员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提高藏品编目的工作效率,并能进一步提升文物管理工作的水平。

(二) 培育专业人才体系,提高文物研究能力

在入藏的近现代文物中,包含大量日文书籍、期刊、报纸、信件、日记、地图等,由于受语言限制,笔者在藏品编目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如日文文献的书名、标题如何翻译;信件、日记叙述了哪些主要内容;报纸刊载了哪些具体报道等,这些问题无不与藏品编目息息相关。培养日语专业人才,训练其历史素养,培育专业人才体系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途径与方式。利用专业人才的优势,深入挖掘与研究抗战时期日本各式文献的主要内容,推动对相关文物的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侵华的历史与史实。

(三) 构建文物工具书库,提高藏品编目工作的质量

藏品编目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疑难复杂藏品的定名问题。如日本军装各时期的款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制式武器装备、日本军事地图的一些地名名称等,这些问题较为细致、专业,通过网上查阅资料,较难获得科学、全面、准确的信息,这势必会影响藏品编目工作的效率和完整性、准确性。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应努力在平时工作中

搜集购置一些相关专业书籍,形成某一系列、某一方面的文物参考书系,在此基础上构建文物工具书库,做到藏品定名时参考的资料有来源、出处和根据,保证藏品定名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这对于提高藏品编目工作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藏品编目是藏品保管、陈列、研究、宣传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藏品编目研究的深入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藏品编目卡片、藏品目录、藏品档案的完善程度。藏品编目工作的愈加完善,是保证使用者迅速、准确选择反映展陈内容的代表性藏品、确保研究者能否出成果的关键。可见,藏品编目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直接影响到藏品的研究与利用,影响到文物管理工作的水平,影响到博物馆工作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书目:

1.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2. 王立根:《近现代文物编目的几点体会》,载《中国博物馆》1995 年第 3 期。
 3. 安莉:《关于博物馆藏品信息管理模式转型的思考》,载《继承 发展 保护 管理——北京博物馆学会保管专业十年学术研讨纪念集》,2010 年 10 月。
 4. 王秀艳:《浅谈藏品登记中的近现代文物定名》,载《春草集(二)——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 年 8 月。
- (桂星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保管部助理馆员)



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浅谈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

张媛媛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 400043)

内容提要：博物馆是公益性文化机构，不追求营利，但随着文化兴国战略的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博物馆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同时博物馆通过文创产品的销售既能延续博物馆的宣教职能，其经济效益又可以为收藏、展示、教育等功能所用，更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随着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博物馆藏品、古建筑、展览、商标等无形财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渐凸显，侵权案件也时有发生，为此博物馆应当重视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本文结合当前博物馆知识产权研究资料与相关博物馆的现实案例，对博物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博物馆 知识产权 保护

博物馆是人类收藏历史记忆凭证和人类终身教育的课堂，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启发民智的重要载体。随着文化兴国战略的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深化，作为其主力军的博物馆有了快速的发展，文创产业的大力发展，使博物馆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物质文化产品，同时其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得到了千姿百态的再现。但由于博物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往往不愿意去强调其经济效益，更不愿意大规模地挖掘其商业价值，而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更多是运用在商业领域，为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博物馆行业不愿提及或浅尝辄止。由于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淡薄，博物馆文化资源被盗用、滥用、商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保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说到博物馆的保护，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对博物馆的藏品、文化遗址等有形资产的保护，而很少会想到对博物馆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随着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日渐重要及

文创产品开发的力度加强，博物馆藏品、展览、文创产品、商标等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渐凸显，侵权事件时有发生。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屡屡卷入知识产权纠纷当中，为此博物馆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将知识产权纳入日常的保护中。

一、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一) 博物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且维权难

1981年，四川广汉一家企业为其产品注册了“三星堆”商标，该商标直指三星堆博物馆的字号，迄今为止“三星堆”商标已涵盖了国家允许注册的大部分领域，其中广汉一名叫胡启忠的民企老板拥有最多。2003年，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向工商部门申请商标注册时，发现该商标已被抢注，申请注册失败。^①2009年，藏于中国国家博

① 徐玲、李云鹏：《近十余年博物馆知识产权研究》，载《中国文物报》，2013年11月3日6版。



物馆的一级文物击鼓说唱俑的形象，被四川省成都市一民营企业成功注册商标，国家博物馆同样失去对该件文物形象申请商标的权利。^①2010年9月，“明孝陵”等商标被杭州一家制造公司注册并拍卖。^②由此可见，你不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那么有人就会帮你重视，等你开始了解其重要性的时候，为时已晚，等待的是艰难的维权路以及经济上的损失。所有博物馆必须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遇到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应对，同时，有条件的博物馆，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商标、著作权等方面的监控。

（二）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创开发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保护的就是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及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不论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社会认知的角度，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能激发博物馆人的创造力，促进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与此同时，博物馆人自身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也能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健全。博物馆中大多数属于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习惯了“大锅饭”，缺少创新意识、忧患意识，而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博物馆也必须在“双创”工作中有所作为，才能让文化的传承永葆生机。

（三）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与经济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文化的经济价值来看，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原始性、真实性，并与新兴事物合理融合，能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永久的魅力，也能以文养文、以文补文。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的集

散地及展示窗口，兼具了教育、收藏、研究、旅游等功能。为此博物馆要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文化演出、文创开发相结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让沉寂的文物遗址活动起来，以“文化+”的思维，注重跨界融合，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提高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的生命体。

（四）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博物馆里蕴含了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文化历史传统及资源，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历史、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往往让人觉得空洞，而博物馆文化资源集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诠释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友善、什么是诚实……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博物馆的藏品通过再创造，能让博物馆打破时间空间的距离，使博物馆更具民族性和大众性，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产生

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须要通过市场的转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能在价值实现的背后再来反哺于知识产权的发展。《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出资范围；重庆出台了《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并探索组建知识产权创新基金，从这些制度中我们能看到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对于博物馆而言，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出资、特许经营、授权经营等模式来让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进入市场，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在促进自身文博事业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合理利用将成为文博行业解决资金难题的一个突破口。

① 徐玲、李云鹏：《近十余年博物馆知识产权研究》，载《中国文物报》，2013年11月3日6版。

② 同上。

③ 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六）国内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缺失

在国际上，对于博物馆知识产权进行立法已经较为普遍。^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7年正式发布了《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指南指明知识产权在藏品获取以及藏品中珍贵作品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点明博物馆的知识产权有版权、商标权、专利权、网络域名和工业设计5种。^②而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博物馆日常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也仅仅对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提出规定，几乎没有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2012年深圳市版权协会联合雅昌艺术馆、华·美术馆等发布国内首份《博物馆、美术馆版权管理工作指南》，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所涉及的领域

（一）著作权

著作权亦称版权，是法律赋予创作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享有的某些专有权利。在我国著作权的取得不须要注册，自作品完成之日自动取得，如今为了保证著作权也开始进行版权登记，但采取的是自愿原则。著作权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者在保护期限是有所区别的。这当中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人身权是不受期限限制的；而财产权根据主体和性质不同有所区别，自然人的发表权和财产权，作者终身加50年，其中合作作者按最后去世的时间计算；法人和其他组织，发表后50年；电影作品、摄影作品，发表后50年。

知识产权中与博物馆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著作

权。在日常中须要注意的是博物馆虽然拥有物权，但不等于拥有著作权，然而不拥有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失去价值。博物馆著作权的保护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有藏品的著作权保护，另一类是原有藏品衍生品的著作权保护，后一类直接体现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因为著作权的保护有时间效应，因此博物馆很多藏品已经过了保护期，为此对于原有藏品的著作权，博物馆更重要的是保护其精神权。原有藏品衍生品，是指在原有藏品的基础上，进行复制、拍摄等使用行为，产生新的制品。^③该类制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衍生品是否进行了再创造，增加了新的主观意识。例如文物的复制与仿制就不享有著作权，而制作成图片、图书、实用的艺术品等，虽然是以文物为基础，但形式和内容都与文物有了较大差异，属于在文物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新作品，就享用著作权。例如博物馆实施的数字化保护就属于再创造，它把文物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和三维模型的形式展现出来，就符合《著作权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享有著作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为了成为著作权人，而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例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宣传海报，作者原本以为自己选用的是古人的画作，而实际上选用的是许钦松的《岭南带雨》，这就构成了侵权。

这里笔者要强调一个概念，著作权资产，即版权资产，是指权利人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著作权的财产权益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④博物馆通过对于著作权资产的管理，首先能降低博物馆的运用风险，避免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过程中遭受经济损失。例如国家博物馆将其收藏的油画《开国大典》原作，许可给上海广元公司制作成金箔画销售发行。

① 韩续峰：《有关博物馆知识产权问题的探析》，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12期。

② 韩纛：《时代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WIPO〈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简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12月。

③ 孙昊亮：《博物馆知识产权法律问题探析》，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12月。

④ 《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第二条，中评协〔2010〕215号文。



这一行为就发生了侵权纠纷，最终对簿公堂，法院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张林英、董沙贝、董沙雷、董一沙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判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增加博物馆无形资产的总额，并增加经济收入，例如影像、图片、档案等的许可使用，文创产品的销售。

（二）商标权

商标权是商标专用权的简称，是指商标主管机关依法授予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专有权利。^①根据商标法我们可以看到，商标是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②在我国要取得商标权必须注册，只有经过核准注册的商标才能享受法律的保护。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商品上标注有“®”或者“TM”的标志，其中“®”是 Register 的缩写，代表注册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TM”是 Trade Mark 的缩写，代表作为商标使用，只是普通商标，通常不受保护。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 10 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③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须要继续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在期满前 12 个月内按照规定办理续展手续；在此期间未能办理的，可以给予 6 个月的宽展期。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 10 年，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期满未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注册商标。^④可见商标权是具有永续性的，但前提是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续展手续。

随着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日渐火热，博物馆

不但能通过商标保护自身的利益。更能通过商标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规定：以下有形和无形资产可以通过商标权的形式进行保护和利用：博物馆名、标识语（Logo），标识图；著名艺术家的名字和签名；博物馆建筑名字（例如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展览或项目的名称；博物馆售卖商品的包装和色彩；与博物馆有内在联系并成为其标志性展物的艺术品名，等等^⑤。博物馆应当积极将名称、标识、代表性藏品注册为商标，防止被他人抢注。像故宫博物院就把“故宫”“紫禁城”等注册成商标，而且还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涉及观光旅游、组织和安排文化教育展览、艺术品鉴定等服务，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首例旅游类驰名商标。广州博物馆也以博物馆馆址镇海楼为造型，融合中英文名的形式，成功申请商标注册。三星堆博物馆也在遭遇商标抢注后吸取经验，启动了全域保护措施，并将申请国际注册。在商标注册上博物馆不要仅仅局限于“地名+馆名”或“人名+馆名”或“地名+事件+馆名”等模式，要善于把特色文物的名字及图案转化成注册商标。

（三）专利权

专利权，是指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⑥专利又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 10 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⑦博物馆除了是参观学习的场所，也是很重要的科研机构，其在文物修复、复仿制、数字化等过程中产生的技术，以及文物展品保存、展品管理、日常的运营中的技术创

① <http://baike.baidu.com/itm/> 商标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八条，2013 年修正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九条，2013 年修正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条，2013 年修正版。

⑤ 高明：《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研究》，郑州大学论文，2013 年。

⑥ <http://baike.baidu.com/item/> 专利权。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二条，2008 年修正版。



新,有符合专利申请条件的都应该申请专利进行保护。^①由现在的一级博物馆评估运行机制也可以看出,专利技术也是考察的指标之一。但是专利权不同于商标权,它不能进行续展,所以专利权的保护是具有时效性的。

借专利权笔者要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职务作品,这一问题在著作权和专利权中尤为常见。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②是否为职务作品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是在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中产生的作品。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对职务作品都有相关的规定,博物馆要做好对职务作品的管理,与相关权利人签订协议约定好权利的归属,并给予权利人一定的奖励。

(四) 技术秘密

技术秘密,主要是指凭借经验或技能产生的,在工业化生产中适用的技术情报、数据或知识,包括产品配方、工艺流程、技术秘诀、设计、图纸(含草图)、试验数据和记录、计算机程序等,而且这些技术信息尚未获得专利等其他知识产权法的保护。^③技术秘密对于博物馆这样的科研机构而言,应该是大量存在的,例如文物的修复技艺、藏品的保存方法、陈列布展的措施等等。但很多博物馆没有意识到,或者与专利没有很好地区别。技术秘密与专利都属于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属于精神创作活动,都有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两者都有技术性、秘密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但在法律上它们有很大区别。首先,技术秘密既可以用书面表达的技术,也可以是不用书面表达的实际经验和技巧。而专利必须是书面表达的技术。其次,技术秘密是不公开的,具有保密性,一旦丧失秘密性,通常就得不到保护。而专利是半公开的,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时必

须在专利申请书中披露且要公布于众,通常情况下发明人只将核心技术保密。再次,技术秘密的保护期限一般都是通过合同进行约定,只要严格保密,不对外泄露,就可长期持有,而专利的保护期一般为10~20年。最后,技术秘密的法律性质尚不确定,通常根据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规取得法律上的保护,其法律地位较弱。而专利受到国家专利法保护,有较强的法律地位。

在现实操作中,对于技术秘密特别要在《劳动法》下思考。一是依据《劳动法》的保密协议,即与本单位或者与本单位合作的涉及技术秘密的相关人员方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劳动(聘用)合同中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主要包括:保密的对象和范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密期限;违约责任;其他须要约定的事项。二是依据《劳动法》的敬业禁止协议,即与相关人员签订敬业禁止协议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敬业禁止条款,内容包括敬业禁止的范围、补偿费、期限、违约责任等,这当中期限不能超过3年。

(五) 域名权

域名权,通常也称为网址权。是链接到互联网上计算机的数字化地址,代表着入网申请者的身份,代表一个单位形象的标志,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④域名权跟商标权一样不是自然取得,须要通过注册。同时域名具有专有性,且在全球范围都是唯一的;但域名具有时间性,须要定期进行年检,不然就会被取消(具体要求详见《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第19条)。博物馆进行域名注册时,要注意创意与策划,而且要浅显易懂,便于记忆,最好选择能被观众接受和记忆的字眼去注册。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域名同商标具有相等的价值功能,就博物馆而言,利用网站可以发布消息、

① 李乘:《博物馆艺术授权策略研究——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2010年修正版。

③ <http://baike.baidu.com/item/技术秘密>。

④ <http://baike.baidu.com/item/域名权>。



查询信息、沟通观众、展示形象等,为此对域名的申请、保护也必须引起博物馆的重视。例如国家博物馆早在2004年就注册了自己的域名,主域名为:www.chnmuseum.cn,中文域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公益。2010年,国家博物馆还制定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互联网网站域名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域名使用的范围、场所、方法,以及申请注册域名和使用二级域名的手续方法等。^①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将网站注册为www.hongyan.info。

三、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 国家立法的完善

在国外,博物馆知识产权的立法有较长的历史,早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之时,纽约州就制定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章程》;早在1753年大英博物馆成立之时,就由英国议会颁布了《大英博物馆法案》,该法案历史上修订过17次;我国的台湾地区甚至为保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知识产权进行专门立法。^②2014年10月,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博物馆与法律”学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2015年8月,由文化部人事司举办的“文博单位知识产权高级研修班”,在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举行,由此能看出国家对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

当前国内专属于博物馆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③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多依据现有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这些法律在立法时多是从工商业企业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博物馆在实际的应用中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国家在立法时要注意结合现有法律法规,并借鉴西方已有的与博物馆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足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制定出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博物馆实际情况的

知识产权法律,并在日后逐步完善。

(二) 鼓励文创产品的开发,从中获得知识产权

对于博物馆而言,文创产品是连接博物馆与观众的纽带,更能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博物馆丰富的藏品资源、文化资源,为文化创意提供了良好的基石。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创产品研发,将历史文化、典藏文物,用不同的介质再现,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恰恰是智力劳动成果。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创产品还是知识产权有个很核心的要素就是人的思维,通过文创产品的开发博物馆能获得全新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创新性与故事性、实用性与趣味性是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所要注重的要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新不单局限于样式、种类,更要提炼出最能代表博物馆特点的文化符号或者标识,还要融入现代、新颖的审美取向,更要强调文创产品的内涵,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样文创产品的研发才能生机勃勃,无形资产的体量才能逐步增大。

(三) 博物馆自身须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机构,可单独设立一个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例如故宫设立法务处;也可以将该部门职能赋予单位内法律主管部门行使;还可以将极为专业的工作,委托专业的机构管理,例如故宫就委托万慧达知识产权公司进行商标监控。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职责上主要负责知识产权内部的日常管理,譬如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对外授权、日常侵权事务处理等。在人员配备上需要熟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熟悉单位历史文化资源的人员;在财务上要设立知识产权预算科目,建立媒资系统,并对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分析加工;还必须建章立制,形成一套兼顾博物馆公益性与商业运营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例如国家博物馆于2009年制定了

① 李云鹏:《博物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李乘:《博物馆艺术授权策略研究——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③ 赵丰:《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亟须建立》,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30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化产业管理办法（试行）》《中国国家博物馆著作权管理办法（试行）》《中国国家博物馆商标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故宫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诉讼案例选编》《故宫博物院合同示范文本汇编》，我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制定了《图像授权利用办法》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博物馆提高管理效率、服务水平，减少各种侵权风险，更有益于提升博物馆的美誉度和公众形象。

“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给未来、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①。做好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但能有效地提升博物馆的研究能力，激发资源活力；还能博物馆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更是构建历史文化资源传承与发扬的保护屏障。

（张媛媛：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① 《文化遗产亟须知识产权保护》，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2月30日6版。



志愿者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载体

金恒薇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辽宁沈阳 110044)

内容提要：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实现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引领公众的思想审美与价值取向的航标，更是博物馆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宗旨与目标所在；而影响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志愿者在博物馆中作用的发挥及社会影响力的广泛性，足以成为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载体。志愿者是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是从博物馆伸向社会的触角；更是将志愿者精神与博物馆社会价值融合与统一的最佳载体。

关键词：志愿者 博物馆 社会价值 载体

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其社会价值的实现尤显重要。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大趋势下，各类博物馆经过“适应期”后，都在潜心思考博物馆发展的定位与方向。如何发挥博物馆的三大职能且不断满足受众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才是博物馆发展与壮大的根本。那么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实现的途径是什么？这些是须厘清的关键概念。根据博物馆服务的价值主体的不同，博物馆的价值可分为博物馆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类价值三个维度。博物馆的个体价值在于博物馆能促进、引导、规范观众个体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在于博物馆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团结的纽带、社会进步的桥梁。博物馆的人类价值在于博物馆是唤醒人类意识的场所、增进人类理解的工具、培育人类共同体的力量。博物馆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人类价值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而其中，社会价值的实现更为重要。博物馆可以通过展览、藏品、教育来实现社会价值。在新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中，将教育职能放在首位，足以见得博物馆通过发挥教育职能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性。那么在博物馆中，能较好地在博物馆与社会间搭建桥梁，能够积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能够在社会上产生积极有益影响的，志愿者应是满足这些条件的“不二人选”。因此，志愿者是博物馆实现

社会价值的最佳载体。

一、志愿者是搭建博物馆与社会的最佳平台

博物馆与社会各界交流沟通的形式有很多种。博物馆通过与社会各界建立共建关系、开展共建活动；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走进社区、学校、单位进行宣讲；立足于博物馆提供各项服务，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各界受众接触与交流。上述这些形式中，往往会因活动内容、时间的局限或是形式载体的局限而使得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不够具体与深入。同时，随着各大博物馆中志愿者群体的出现，志愿者服务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志愿者成为搭建博物馆与社会的最佳平台。

志愿者也叫义工，是指无偿地、自愿地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而博物馆志愿者从广义上来讲，指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热爱文博事业的各界人士，愿意不计报酬地为博物馆公众进行服务。志愿者的年龄跨度大，一般来说，65周岁以下，8岁以上，成为志愿者年龄范围的两端。这就意味着志愿者中年长的都已经退休，而年龄最小的则是刚刚迈入校园的一年级学生。这种年龄上的大跨度也使得志愿者队伍的职业构成多样化，学生、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个体人员、退休人员等。同时，各大



博物馆也会根据志愿者的实际情况而以团队、个人、小小志愿者等形式来管理志愿者队伍。因此，招募与吸纳志愿者是博物馆与社会融合的第一步。

志愿者群体的广泛性与多样性为博物馆与社会更好地融合提供了最佳平台。志愿者来自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从事的职业及人生经历与文化积累均不相同。这种广泛性赋予了志愿者在博物馆与社会之间扮演重要角色的特点。他们在博物馆为公众服务，就是一种对博物馆与社会的衔接。志愿者离开博物馆回归社会，这个过程好比是把志愿者们在博物馆中凝聚成圆点，再一一向社会折射出色彩艳丽的射线，构成了一幅幅志愿者服务博物馆，在社会传递正能量的美好画面。志愿者像一只只触角，伸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播历史。志愿者所具备的特长也不同，博物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特长服务公众，参与博物馆建设，使志愿者们以不同的视角诠释这段历史，更好地担负起传承社会文明的责任与使命。除在日常工作中承担重要任务，辅助博物馆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外，志愿者为博物馆发展建设提供良策，全力推进博物馆发展。博物馆通过召开志愿者总结表彰会、志愿者工作交流大会、邀请志愿者参加博物馆工作会议等形式，极好地听取了志愿者对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建议与意见。志愿者的视角更贴近受众，最能代表受众的想法，这样也为调整博物馆工作提供了最好的依据与参考。博物馆及时将志愿者所反馈与提出的建议进行整理与采纳，有针对性地调整，那么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会呈现出人性化的设计与服务，创新式的特点与理念，社会化的融会与体现。这种良好的融合是博物馆发展与前行的巨大动力源泉。对志愿者的诠释不单单停留于服务公众，更多的是应让志愿者参与博物馆的整体工作中。志愿者的多重身份，使其能够从观众的角度向博物馆反馈与评价博物馆开展的各项活动效果；同时，志愿者因参与博物馆各项工作中，又能以博物馆一员的角度来思考与策划什么样的活动会得到受众的认可与肯定。因此，博物馆的发展建设绝不能忽视志愿者作用，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与志愿者息息相关。对于博物馆与社会的更好融合与发展，志愿者的平台作用屈指可数。

博物馆志愿者为进一步把博物馆与社会衔接起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志愿者以第三方的角度极好地将博物馆与社会这两大互相依存的主体紧密融合。一方面，志愿者将博物馆面向公众所传达的主旨与博物馆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传播到位，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志愿者同样将来自于社会对博物馆的良好建议与美好愿景及时表述，使博物馆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显然，志愿者是搭建博物馆与社会之间桥梁的最佳平台与载体。

二、志愿者与博物馆的互相融合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形式

如何实现社会价值是当下博物馆发展前行的着力点。那么博物馆是否实现社会价值应从哪些方面来衡量呢？从抗战类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应是满足了不同公众的参观需求，应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应是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发挥博物馆作用，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类发展。博物馆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除自身的强化与提升外，应充分重视志愿者的作用。同时志愿者与博物馆的紧密融合才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形式。

“因人设岗”是志愿者与博物馆融合的第一步。为了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博物馆根据志愿者的特长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服务岗位。通常博物馆都会设有开放展区看护工作、讲解、社会教育活动策划、咨询导览、讲解词编撰等岗位。这些岗位的设置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年龄较大的志愿者，责任心较强，因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阅历，他们更为稳重，他们能够较快地掌握开放展区的看护重点及对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二是青年大学生等群体，思维较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安排青年学生们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往往会在创新中收获更多的肯定与赞誉。博物馆的社教活动是实现博物馆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有针对性地设计与策划活动，并在原有的模式中不断创新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使活动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而青年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大的，他



们往往会跳出博物馆固有的圈子，以全新的切入点与视角，为不同受众量体裁衣，活动主题鲜明，针对性强，效果显著。三是挑选语言表达能力及组织能力较强的志愿者从事志愿讲解工作。这些志愿者们的讲解风格独特，驾驭能力强，深受观众喜爱。与专业讲解员不同的是，志愿讲解者更会拉近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更平易近人，更接“地气”。观众们也往往不会以专业讲解的标准去要求志愿者们，而更会从志愿者的服务中，感受到一种力量的传递。

志愿者成为博物馆的“代言人”是志愿者与博物馆融合的关键。志愿者与博物馆的紧密融合还体现在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首先是这座博物馆的名片与代言人。首先，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讲述者、服务的传递者，更是博物馆形象的塑造者。志愿者讲述历史的形式也是不断丰富的，可以通过展厅日常讲解、送展大篷车讲解、抗战大讲堂讲座等，来面向社会的不同群体讲述历史，让更多的受众通过志愿者的讲述了解历史，并能从历史中有所收获和感悟。其次，志愿者是正能量的传播者，不计较报酬，无偿服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感召与力量，延伸到社会，汇聚成强烈的正能量，给人以振奋。最后，志愿者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标志，博物馆中的志愿者，凝聚在其身上的志愿者精神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通过志愿者讲解而提炼出的抗战精神更需要大力弘扬，志愿者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精神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社会文明这个角度来看，志愿者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角色，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在志愿服务中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推动博物馆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文明建设。

归根结底来说，博物馆要实现它的社会价值，除了要拥有具有广泛性与多样性的志愿者群体外，还要较好地 将志愿者融入其中，使志愿者与博物馆紧密融合才能为博物馆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博物馆各项工作如展陈、讲解、服务、各类活动等，如能从受众的角度来考虑，那么观众参观博物馆所体验到的及收获的都应 是愉悦与丰富的。志愿者与博物馆互相融合后，博物馆充分发挥宣传教

育职能，大力弘扬志愿者精神并传递正能量，以此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这恰好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佳形式。

三、志愿者服务博物馆所产生的双赢是博物馆社会价值的真正实现与提升

志愿者与博物馆的互相融合，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群体的融合，更是社会与博物馆的融合。博物馆将志愿者融入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得博物馆与志愿者双方都受益。因此，“双赢”是志愿者服务博物馆的最明显的标签，也是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不断提升的保证。

第一，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融入博物馆工作中的收获与提升是多方面的。志愿者在博物馆这个平台，收获了认同感。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人们所追求的更高境界是一种社会的认同感。当志愿者服务于博物馆的过程中，得到博物馆的认可，得到公众的肯定，这种认同感的收获极大地满足了自身价值的追求。此外，志愿者个体实现了自我价值。志愿者在博物馆的平台上，充分展现了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小小志愿者，他们虽然年龄小，但是自我提升的速度却是十分明显的。小小志愿者初来博物馆时大多是青涩与紧张的，语言表述不完整，主要来自于面对观众时的紧张与胆怯。而通过博物馆组织的培训、背稿及实地讲解，小小志愿者表现淡定，开始具有自信，语言表达能力与观众组织能力都大幅提升。关于这些，家长们的反馈是最直接的，他们所见证的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是最明显的。这些小小志愿者返回到学校后，来自于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也是非常多的，可见小小志愿者在服务博物馆中收获最大，进步最明显。

第二，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志愿者服务极大地促进博物馆工作的提升。博物馆通过志愿者的服务工作，极大地缓解了博物馆的接待压力。随着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接待量明显增加。而志愿者的加入，尤其是节假日期间的加入，成为缓解接待压力的重要力量。志愿者的疏导工作为观众创造了一个



安静有序的参观环境；志愿者的讲解工作更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而连贯的介绍。同时，志愿者服务提升了博物馆整体的服务水平。志愿者对观众的引导及对各类咨询的解答，志愿者在展区内细致入微的服务，志愿者声情并茂的讲解都构成了博物馆独特的风景。志愿者服务与博物馆服务良好地结合，使得博物馆整体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其中志愿者讲解与博物馆专业讲解的配合就是最佳的体现。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在参观旺季或是节假日期间，有时会难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如果较好地将志愿者讲解引入其中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没能听到专业讲解的观众在志愿者的讲解与引导下，同样达到参观博物馆的目的。由此，博物馆的参观环境井然有序，观众对博物馆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升，这正是博物馆吸纳志愿者的收获所在。再如，把志愿者吸纳到博物馆的各项活动中，也是提升活动影响力的最好

载体。志愿者参加博物馆的大型活动，尤其是一些为重要时间节点而策划的活动，如清明节的铭记活动是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将大量志愿者融入此次铭记活动中。活动不仅给观众提供一个祭奠先烈、缅怀先辈、继承民族传统的良好活动平台，也通过志愿者的引领与服务，充分地发挥博物馆在传统节日中的教育功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所以，志愿者服务博物馆，给博物馆带来的社会反响及在社会教育中的影响是极其广泛与深远的。

（金恒薇：“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周恩来对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贡献

刘媛之

(南京市博物总馆 江苏南京 210018)

内容提要: 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依托于1937年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而建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党我军在国民政府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抗战初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7年,周恩来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建立的前前后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竭力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改编红军的共识,促成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在南京建立;他艰难争取尽早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国民党相关谈话,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他重视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战斗捷报,促使我党我军的声誉在全国大大提高;他领导营救接待政治犯工作,促使我党我军的优秀骨干迅速为抗战发挥重要作用;他领导隐蔽战线屡建奇功,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杰出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国共合作 贡献

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依托于1937年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而建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党我军在国民政府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它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却在宣传抗日主张,壮大我党我军的力量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南京鼓楼的东北角,一条幽静的小巷尽头,有一处小巧玲珑而环境清幽的庭院,院内有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早年是南开大学原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公馆,因为周恩来的关系,后来租借成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始终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为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他率领中共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以民族大义为重,广泛团结各方面抗日爱国力量,团结争取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等,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全国政治生活的中流砥柱,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1937年“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建立的前前后后,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

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竭力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改编红军的共识,促成“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在南京建立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我军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早在1936年春,我党已应张学良将军的要求,派有代表常驻西安,与东北军联络。1937年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之间进行了十年的内战得以停止。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迅速准备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针定为国策。中共中央表示,如果国民政府确定这个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实施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四项保



证。同时，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进行谈判，经国民政府同意，在西安设立了“红军联络处”。

从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共进行了四次谈判，内容主要为两党合作抗日，我党及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红军改编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红军改编后设统一的指挥机关、红军改编建制与人数、争取我党及陕甘宁边区的公开合法地位、组建新四军、争取出席国防会议等诸多问题，原先国共双方分歧都很大，最后经过周恩来等人数月的努力，最后才一一达成共识。

“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平、津和大片国土，还准备向上海进攻。由于形势危急、我党力促，蒋介石决定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本来，蒋介石于8月1日曾密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参加南京的国防会议，毛泽东未能前来。193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受邀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其间，国共双方达成了协议，准备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1937年8月19日，周恩来和朱德飞回陕西，叶剑英以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和秘书童小鹏留在南京负责组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派钱之光负责军需、财务。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带领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人来到南京。齐光

负责文书、采办；吴志坚任副官；李白任报务员；康一民任译电员。9月12日，按战斗序列，八路军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称为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设在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公馆附近的傅厚岗66号，那里本来是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因为周恩来与张校长的师生关系，所以张校长将房子借给了八路军作为驻京办事处。

在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还同国民党代表商谈了在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事宜。

二、艰难争取尽早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国民党相关谈话，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争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并召告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周恩来起草并修改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历两个多月，多次与国民党代表交涉，终于促使《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蒋介石谈话成功发布。

1937年7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初稿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②实现民权政治；③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7月上旬，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上海探望了宋庆龄，并征求宋庆龄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不肯宣布。7月17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周恩来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7月18日，周恩来将所拟的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



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等。最后，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入僵局。

7月21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建议：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并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必须立即自行改编，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7月21日，周恩来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表示红军可以迅速出动抗日，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8月12日，周恩来和朱德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患难等。周恩来、朱德严词批驳，并要求将中共的意见报给蒋介石。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①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②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③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④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8月24日，周恩来致电张冲、康泽并转蒋介石，说明八路军先头部队第一一五师，已从陕西出发向指定区域开进，希望蒋介石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表示赞同此宣言的谈话。

9月2日，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决定《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当即致电康泽转蒋介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赞同此宣言的谈话应该依照庐山谈定方案及时签字发表。9月8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名义，以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日后的9月25日，八路军不负

众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1000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

三、重视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战斗捷报，促使我党我军的声誉在全国大大提高

周恩来等人抵达南京以后，除参加国民政府的一些会议以外，还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战斗捷报，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与扩大。

（一）争取得到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在国统区筹备办报宣传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它筹备于南京，出版于武汉、重庆，前后共经历了9年1个月零17天，周恩来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创办《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结果。

早在1937年7月10日，周恩来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谈到要在国统区办一张党报。7月1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8月，周恩来让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创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8月中旬，周恩来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不久，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同时，周恩来和朱德探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并成功地邀请到于右任题写报头。

10月，根据周恩来指示，相关人士聚集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短短两个月时间，他们租到了中山路的营业部、印刷厂，采购了大批纸张物资设备等，筹备工作大体就绪。报社筹备处由潘梓年全权负责，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编辑部，由章汉夫负责，成员有徐迈进、杨放之



等；另一部分是经理部，由钱之光负责，成员有寿乐情（寿松涛）、李培之和赖祖烈等。但10月中旬，因为战局紧张，南京面临失守的危险。邵力子部长打电话报告潘梓年，建议我方先行撤退，转移至武汉再筹备出版该报。

（二）利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出资办的《金陵日报》为我党我军做宣传

地下党员陈同生（陈农菲），早年被派往成都，先后在《日邮新闻》《成都快报》和《新蜀报》任记者、编辑和总编，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在上海“特科”工作时被捕。1937年8月28日，陈同生被保释出狱时都不敢相信，自己是被周恩来保释出狱的，心中无比感激。由于陈同生身份没有暴露，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让陈同生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开展工作。

陈同生出狱时，《新华日报》还在筹备出版。我方故意将他出狱的消息透露出去，《金陵日报》董事长吕超（汉群）当即邀陈同生去当总编辑。《金陵日报》幕后的出资人是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李克农得知吕超的邀请消息后，高兴地对陈同生说：“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日报，国民党用尽一切办法，与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也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总编辑！……看吧！国民党白色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①

后来，他们利用了林森与蒋介石的矛盾关系，使得《金陵日报》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的检查就可出版，从而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八路军平型关

大捷的消息等。当然，这样做也曾多次引起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检查室主任彭革成的不满，然而报纸“后台”过硬，彭革成也奈何不得。后来，主管部门明确规定报纸上不得出现“八路军”的番号，编辑们便用“第×路军”代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八路军，他们就是这样斗智斗勇开展工作，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上做出了贡献。

宣传工作的良好效果从《新华日报》筹备处撤离时的一件小事便可看出。当时，组织上委派赖祖烈和史维然将筹办《新华日报》用的物资送到西安，在南京下关码头，工人搬运货物装船过江时，得知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物品，只肯收一半搬运费。工人们说：“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②大家明显感觉到，八路军的抗日工作通过宣传已经广为人民所知，我们党和八路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可以说，在《新华日报》无法出版的情况下，陈同生与他主编的《金陵日报》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为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八路军的战斗捷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亲自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周恩来在与国民党各界代表接触中，时时处处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为重，在不违反我方原则的情况下做出让步，促成共识，彰显出我党我军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坚定决心与爱国情怀。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会晤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何应钦、刘湘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同时，周恩来还会见了叶挺，并积极联系项英、陈毅、傅秋涛、郑位三、方方等人，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1937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会见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大公报》记者孟秋江、陆诒。他指出：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

① 李力：《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②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11月，周恩来在临汾会见了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说坚持华北抗战最紧要的是加强中国的军队，发展群众运动，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并一起翻阅了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将领坂垣征四郎的副官的日记。1937年冬，周恩来还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1937年年底，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做《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报告，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为此，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①

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也是周恩来重点团结统战的对象，事实证明，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共事，周恩来炽烈的爱国情怀、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卓越才干，使周恩来和我党我军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大提升，甚至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把卫立煌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使卫立煌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1937年秋，日军猛攻忻口，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驰援山西。10月初，卫立煌到达太原，并见到周恩来。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坂垣师团，消灭日军1000多人的重大胜利时，卫立煌当即向周恩来祝贺，并致电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海德，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当时卫立煌的夫人是韩权华，也是邓颖超的中学同学。1954年，我党发出“爱国一家”的号召，卫立煌在香港对自己是“战犯”一事尚存疑虑，不敢返回大陆。周恩来便嘱托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写信给卫立煌：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

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卫立煌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返回大陆。

以下一件小事也很值得一提，1937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在西安乘火车与刘长胜同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由于刘长胜看上去像日本人，引起了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的怀疑与敌视。钱之光立即与这位国民党空军军官攀谈起来，并拿出了周恩来同志写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名片给他看，没想到那位军官知道他们是周恩来派到南京去的之后，立即肃然起敬，态度变得很热情友好。后来一同在徐州下火车后，那位军官还特地为他们找旅馆，并为他们付了旅馆的房钱。第二天他们也给那位军官代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国民党军官中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国民党爱国军官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四、领导营救接待政治犯工作，促使我党我军的优秀骨干迅速为抗战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解决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是周恩来在南京期间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同志多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要求。可是国民党方面故意拖延，难有进展。为了打开缺口，解决问题，周恩来一再交涉，要求去看望犯人，并去做抗日战争的形式报告。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晓庄附近的反省院做报告，周恩来首先让长期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了解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情况告诉大家。接着从“西安事变”谈起，谈到形势变化，日本侵略者残忍地压迫和屠杀我们同胞时指出：“在这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应当大家一致，举国一致。……在求活命的抗战过程中，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前方后方，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心，打日本！把每一支枪口都向外，每一颗子弹都瞄准共同的敌人，集中一个方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我现在告诉诸位，自和平解决后，红军即进行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准备着随时开赴前方，现在已经开到最前线去了。我们愿把这十年艰苦奋斗保留下来的这一点力量，用到抗战的最前线上去！”^①周恩来还鼓励大家增强信心，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一个弱国要对付凶猛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只要我们长期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最后，周恩来要大家做好出狱后参加抗战的准备。之后，周恩来当场点名把夏之栩（革命烈士赵世炎妻子）、王根英（陈庚妻子）、熊天荆（伍云甫妻子，曾经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3人保释出来，送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当年南京有三处监狱：中央军人监狱、模范监狱、首都反省院。政治犯大致有两种释放办法：一是国民党根据犯人刑期长短分期分批释放；二是由先从牢里出来的人提名单，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或者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向国民党点名要求释放。

周恩来在谈判中，经常催促国民党履行协议，尽快放人。国民党代表无法推脱时便故意摆出难题，要求我方提出具体释放名单。对于释放名单，如果直接照办，难度很大：有些党员被捕后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身份，用的也是化名，我们提出名单，无疑给国民党当局的识别工作提供帮助，反而会给他们造成伤害；万一有一些名单提得不对，对方抓住把柄，也可大做文章。而且多年来各地党员分散斗争，被捕被害的同志也很多，我方对情况也掌握得不全，但如果我们提出的名单不完整，有些被捕的同志就不能出狱。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滚雪球”的方法，通过先出狱的同志提供名册，分批次申请

要求释放。

所有出狱的人，都要接受组织审查。审查后分三类情况处理：第一类是从口供，以及监狱里其他同志证明是坚定的，送延安或者留在白区工作；第二类是比较好，但还是有些问题要审查清楚的，也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第三类是很有问题的，供出同志来的，也会发给路费，请他回家乡去继续抗战。据负责审查工作的刘顺元同志回忆：“释放政治犯是国共两党谈判的结果，被释放的有上千人，包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监狱释放的。……在南京审查后，介绍去延安的有700多人，遣散或派往南方各地工作的有二三百人。”^②周恩来领导营救的政治犯都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骨干，出狱后，他们很快投入到全国各地的重要岗位上，迅速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五、领导隐蔽战线屡建奇功，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杰出贡献

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一向出人意料、屡建奇功。1937年，周恩来亲自介绍阎宝航入党，并成为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使其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

我党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阎宝航是张学良的挚友，在张学良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分任会长和指导长），阎和蒋还曾共用一个办公室。后来，张学良还保举阎宝航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成了蒋、宋身边的“红人”，博得了国民党上层的敬重。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不久，阎宝航主持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从北平迁到南京，他来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希望会晤负责人，李克农接待了他，

①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9页。

② 同上书，第69页。



并立即向周恩来汇报，阎宝航在南京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就抗战形势、特点、前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及抗战方针政策、国共合作、力促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等问题一直谈到深夜，两人“谈话投机”，意兴颇浓，当晚周恩来便住在了阎宝航家里。此后，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多。

1937年9月，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阎宝航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吸收阎宝航入党时，党内有人提出阎宝航经历比较复杂的意见，周恩来说：“他复杂，你不复杂，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来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①周恩来还决定阎宝航作为秘密党员，并亲自给他取了代号“阎政”，成为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周恩来叮嘱他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以党外“进步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及统一战线工作。阎宝航以良好的人际关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

周恩来、李克农把收集国际情报的任务交给

了阎宝航，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领导他。后来，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利用担任过的合法身份，凭着卓越胆识，获取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3份举世公认的最有价值的情报：①纳粹德国决定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②1941年11月，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③1944年夏季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包括陆海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这些情报对苏联卫国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苏联出兵东北战争有着极大帮助。

阎宝航在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重托，成为我党情报史上一个神秘而闪光的名字。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

（刘媛之：南京市博物总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

① 李恩和：《红色间谍阎宝航的传奇人生：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原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详见<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0505504.html>。



农村妇女动员与中共的策略选择

——以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徐霞翔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江苏南京 210012)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日益重视。在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了动员广大农村妇女,中共一方面凭借妇女协会、妇女抗日会等“正式”组织资源,另一方面则利用保甲制度、旧式组织等“非正式”组织资源。中共的农村妇女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且具有鲜明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共在一个具有浓郁传统色彩的乡村社会利用多重组织资源实现革命动员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 农村 妇女动员 组织资源 中共 策略选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场全民族性的民族抗争渐次展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妇女群体尤其农村劳动妇女群体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日益重视农村妇女动员工作,并通过多种组织资源的选择运作推进农村妇女动员,从而实现巩固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在以往的对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妇女动员的研究中,论者大多注重从宏观层面对妇女动员方式和特点进行梳理分析,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①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缺乏从组织资源的视角对中共妇女动员的策略选择进行微观考察和运作透视。本文拟以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剖析中共对农村妇女动员所凭借的两种不同的组织资源系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并着重分析两种组织资源系统运作的具体情形及呈现特点。由此,

力图探讨出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下,如何依托传统乡村社会两种组织资源,为实现农村妇女动员而采取的策略选择。

一、农村妇女动员与“正式”组织资源选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的妇女动员工作逐步提上日程。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日战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为基本任务。”并且提出“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②中共上述的妇女工作大纲,为抗日战争期间农村妇女的动员指明了方向。

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随即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

① 杨颖:《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动员》,载《党史文苑》2008年第10期,第18~19,25页;王国红:《抗战时期妇女动员的历史考察》,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第106~108页;唐秀平:《论抗战期间的妇女动员》,载《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9~33页;刘莎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东南地区展开妇女动员的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年。

② 《妇女工作大纲》,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由陈修良任书记。省妇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制订了具体的工作计划。^①此后,依据省妇委的指示精神,江苏所属的抗日根据地纷纷出台妇女工作政策。19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发布《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提出“实行男女在政治上平等,保护与扶植妇女解放运动。”^②1940年8月12日,苏北特委发出《为创立抗日根据地对目前党的工作任务的决定》,提出要“以工抗、农抗、青抗、妇抗、青年团救国会、青工团、儿童团等形式,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③,从而支援抗日战争。在此前后,江苏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始广泛动员广大农村妇女。

1940年6月,中共在苏州农村地区是通过成立妇女群众组织——妇女协会来逐步对农村妇女进行动员的。一般来说,镇上的妇女工作先于农村妇女工作的开展,随着镇上妇女协会的成立,“农村中妇女协会的组织都纷纷成立起来了,单唐市一区一个月里就有五个妇协的组织,其他各区妇协也像雨后春笋般的在各村出现。”^④由于农村妇女们被广泛地组织起来,她们的活动方式相较以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从来听不见妇女口中讲‘会’的,今天她们常常要去开会了,妇女开会的事从稀有新奇的事情渐渐地变为普通的,不足为奇的事了。”^⑤这一时期,为了做好农村妇女动员工作,“妇协的

经常工作是宣传号召和发动慰劳,在各个村庄里,普遍的造成开会的空气,妇女工作同志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去进行宣传,使民众们了解妇协是什么东西,鼓励她们能踊跃地参加,这个工作的完成,妇女工作同志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的”。^⑥

随着苏州地区妇协纷纷成立,客观上需要统一的领导,以确保农村妇女动员工作的统一有序开展。1940年7月底,县妇协应运而生。^⑦此后,妇协的日常工作得到广泛的开展,并以识字运动作为日常工作的中心工作,妇协“配合政权把各地的妇女识字班建立起来,使年轻的妇女都参加到识字班去,加强他(她)们工作上的领导和教育”。^⑧此外,“县区妇协特别妇女福利事业,并动员一批人来负责这项工作,使妇女们深切地感到妇协给她们的好处和帮助,加深她们对于妇协的信仰。”^⑨“同时,在争取男女平等,肃清封建残余,减除妇女痛苦的工作,妇协还是抓得很紧,不过,不像以前那样狭隘,单负解决婚姻纠纷的责任。”^⑩通过妇协的上述活动,苏州的农村妇女更得到广泛的动员:“妇女们今天在新的号召和鼓动下,在新的工作上又活跃起来了,对于妇协又有了新的了解,她们的热忱又提高了,对于谋自身解放,谋民族解放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参加。”^⑪

中共对常熟地区农村妇女的动员开始于1939年秋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被动员的妇女,“成

① 冯月华:《江苏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② 《苏皖区党委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1940年4月),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1984年,第159页。

③ 《苏北特委为创立抗日根据地对目前党的工作任务的决定》(1940年8月),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60页。

④ 松泉:《妇女工作在苏州》,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63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第165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

⑪ 同上,第166页。



分大多为市镇上的青年知识妇女、女教员与少数农村中的小细娘。”^①因此，该地的广大农村妇女并未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到1940年5月，常熟的农村妇女动员工作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成绩是：一、普遍的发展，县妇协的成立，统一的全县妇运的领导。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妇女参加各级自卫会，并在自卫会的工作纲领中，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并实施婚姻自由废除童养媳与婢女制度。三、开展生活斗争，特别是婚姻问题的斗争。四、产生了大批的干部，很多的女干部被动员到政权机关中，教育机关中，训练班中去。”^②由此，常熟妇协的农村妇女动员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在活动内容和妇女干部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为了从组织方面强化动员效能，常熟妇协不断充实活动内容。对农村劳动妇女，“我们就可以用各种合作社团结她们，虽然她们还是手工业的（当然副业的），不及都市产业女工那样有组织性、斗争性。但无论如何，是妇女群众中较有组织性的一部分，对于她们生产事业上的领导是不能忽视的。”^③具体到抗日战争方面，“在抗日动员上，过去仅限于做几双鞋子，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动员起来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例如洗衣队、缝纫队等组织可以建立，发动她们帮助战士们缝制衣服。另外检查盘问外人与村乡中的情报工作，妇女也可以胜任的。”^④此外，常熟妇协还强调慰问工作的作用，“对抗日军人家属发动妇协去慰问慰劳等，这样可以提高她们对参加部队引以为荣的观念。”^⑤在1940年妇女工作的总结中，常熟妇协提出：“常熟全体妇女则随着群众运动的蓬勃组织起来，成为坚强的一支抗

日战争姊妹军，为反对反共、反对投降妥协而斗争，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斗争！”^⑥由此可见，常熟妇协在动员农村妇女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由上可知，中共在江苏抗日根据地对农村妇女的动员主要凭借妇女协会、妇女抗日会、妇女救国会等“正式”组织资源的运作并开展一系列目标指向非常明确的活动。这种“正式”组织资源主要是指在中共的领导和控制下，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政治价值导向，并以合法形式存在于江苏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组织。这种“正式”组织资源运作在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双重诉求叠合的背景下具有相当的民族感召力和道德正当性。为中共动员广大农村妇女投身于抗日战争事业，宣传中共妇女政策，强化农村妇女组织性和凝聚力，实现农村妇女力量的整合，都起到预期的动员效果。总之，中共对“正式”组织资源的选择运作契合江苏农村社会生态和具体情形，从而为“非正式”组织资源的选择运作做了一定铺垫和准备。

二、农村妇女动员与“非正式”组织资源选择

中共对农村妇女的动员除了凭借“正式”组织资源运作之外，还利用了“非正式”组织资源。这种“非正式”组织资源主要指传统农村基层的政治组织、传统的民间妇女组织、帮会组织等资源。相较于“正式”组织资源，中共凭借的“非正式”组织资源往往具有迂回性和隐蔽性：“不同秘密的组织，更不似公开的抗会组织，是一般性的群众性的组织。其特点是不突出政治面目，而是掩护半公开

① 吴中：《一年来的常熟妇女工作》，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69页。

② 同上，第171页。

③ 同上，第176页。

④ 同上，第176页。

⑤ 同上，第175页。

⑥ 同上，第177页。



的形式,免得在反清乡斗争中,遭受敌人摧残。”^①因此,这种“非正式”组织资源往往是“正式”组织资源运作的必要补充,凸显了中共在农村妇女动员方面的冷静现实的策略选择。

之所以采用“非正式”组织资源来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农村妇女的“落后性”。对此,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妇运领导是有相当普遍的认识。苏州地区妇协在工作实践中知晓做农村妇女动员工作的不易,强调需要增添更多的人手:“更因为农村妇女的封建落后,妇女工作更要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因此在红五月后马上把妇女工作注重起来,配备了很多干部来突击这项工作。”^②在开展农村妇女动员的过程中,苏州妇协逐步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难度,“因为农村妇女是最封建落后的,要说服她,鼓励她参加工作比任何人都困难”。^③对于动员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苏南妇运领导认为,“这由于在我们意识里或多或少地存有避重就轻的倾向,认为农村劳动妇女文化政治落后,不很容易搞好,看作团结农村劳动妇女为畏途,我们必须与此种不正确的工作倾向做斗争,我们唯有团结广大的农村劳动妇女,我们的妇运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才能有伟大的力量”^④。涟水妇运领导也认为,“由于妇女此(比)较落后,因之妇女工作比起农民工作来说是不大容易做,我们不要主观地去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妇女工作”^⑤。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章蕴还就苏中农村妇女工作提出:“农村妇女虽然被罪恶的旧社会压迫得愚昧成性,落后成习,可是她们占人口的半数,还是一个伟大的力量。”^⑥那么如何动员这个“伟大的力量”?“目前苏中妇女大都愚昧落后,我们还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和口号,首先应该从解除妇女切身痛苦做起。”^⑦既然,广大的农村妇女的“落后性”是较为普遍存在的,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群体,“正式”组织资源的动员力显然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且在事实上势必需要付出更多的动员成本,因而,“非正式”组织资源在此时恰恰凸显其潜在的“工具价值”优势。

涟水的农村妇女动员工作在很多方面体现了“非正式”组织资源的“工具”优势。其中,农村传统的社会基层政治制度——保甲制度凸显了“天然的”组织功能,“在开始时应该在党与农会工作有基础的乡保去利用党与农会的力量将妇女工作首先做起来,在把妇女组织起来,并且相当活跃之后,可大大影响与推动其他落后地区之妇女工作的开展,古桥便是一保组织好而影响到全乡的,这种方式叫作由点推动到面的工作方式”^⑧。利用保甲制度动员农村妇女,在具体操作中还要注重方法的运用,“在保与甲先找出些比较泼辣热心的有些威信积极分子,给以深刻的解释与教育,在自愿条件下给他以小组长和妇女会长的名义以她们做号召

① 《泰州县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43年5月),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99页。

② 松泉:《妇女工作在苏州》,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62页。

③ 同上,第163页。

④ 《三八节与苏南妇女》,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79页。

⑤ 荫华:《开展妇女工作的点滴经验》,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83页。

⑥ 章蕴:《纪念“三八”与开展妇女运动》,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29页。

⑦ 同上,第230页。

⑧ 荫华:《开展妇女工作的点滴经验》,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83页。



宣传与发展妇女会员，确立妇救会组织，这是组织妇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古桥几保便是这样做起来的）。^①这种利用传统农村基层政治组织资源动员农村妇女的做法既符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形，也便于长期生活于“熟人社会”的广大农村妇女接受。

中共还注重利用旧有的妇女组织。1943年5月，泰州县委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提出，要以劳动妇女为主要对象，克服过去不愿组织劳动妇女，轻视劳动妇女的不正确的观念，并提出可以采用姊妹会、观音会等封建的形式来组织动员广大农村妇女。^②其目的是，“以拜姐妹的形式先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再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使这些带封建色彩的妇女组织具有进步性。”^③同样，1943年7月，苏中三地委在第一次地妇委会决议中强调指出，进行妇女动员工作，要“恢复与整理旧有的妇女组织”，并且提出要“注意争取和利用农村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来推动工作”，其中强调要“通过封建组织，组织中年以上妇女”。^④之所以尤其强调组织动员中年以上妇女，是因为“老年中年妇女在社会中，她们有很多的群众的，一句话可以吸引许多的群众”。^⑤为了厘清农村旧式组织与妇女动员的关系，苏中三地委妇委尤为注重对农村旧势力的调查，提出要注意“封建势力强弱，有无集团组织，对群众组织

和妇女组织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如何”^⑥。

在动员的同时，中共还凭借“非正式”组织资源对边缘农村妇女群体进行组织整合，其中帮会组织对于实现此目的起到了有力作用。1943年5月，苏中三地委提出，“通过支部基础的配合与帮助，利用帮会形式组织农村和社会上流氓女性，此项工作，地委另有指示”^⑦。1943年5月，泰州县委特别强调妇女工作和帮会工作的配合，并明确了任务分工：“进行妇女帮会工作（对外不公开）。A. 分区由杨桂芳同志负责。B. 各级党委配合进行调查，对于有流氓习气的女党员，准备开除的，可布置她去拜杨桂芳同志为老师。C. 对于群众妇女，在社会上被人轻视的农村女流氓，一般是有活动能力，敌伪易利用的，我们对其不应忽视，尤其是据点附近，我们应适当地介绍她到杨那边。”^⑧对于边缘农村妇女群体的孤立、规训和有意识的组织化引导，其实恰恰有利于中共实现对广大主流农村妇女的抗日战争动员。

三、农村妇女动员与组织资源选择的特点透视

中共在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利用两种组织资源进行农村妇女动员呈现出诸多特点，这些特点与乡村社会生态、抗日战争态势以及中共的革命政党特质紧密相连。动员农村妇女往往需要遵从传统乡村的

① 蒯华：《开展妇女工作的点滴经验》，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83页。

② 《泰州县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99页。

③ 冯月华：《江苏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④ 《苏中三地委第一次地妇会决议至各县传达提纲》，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09页。

⑤ 吴中：《一年来的常熟妇女工作》，原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71页。

⑥ 《区乡妇女工作概况调查研究提纲》，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25页。

⑦ 《苏中三地委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96页。

⑧ 《泰州县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02页。



道德伦理规范。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实际上也表现了对传统乡村旧式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的宽容,同时也无暇顾及乡村旧式伦理道德风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示默许。做妇女工作,“在开始组织妇女时要百倍慎重,不使一个破鞋妇女参加或当会长,否则妇救会威信大为降低,而使许多妇女不愿参加妇救会。”^①这里,根据乡村传统伦理所鄙薄的“破鞋妇女”是断无资格跻身于农村妇女运动的核心,这种旧式的伦理道德和革命环境下对革命群众道德纯化的要求以迂回微妙的方式紧密勾连,一同致力于抗日战争动员。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多存在“精英”式女性人物,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典范人格化的代表,是当地妇女群体中的潜在“领袖”。若能够实现对她们动员,也即意味着动员了大部分农村妇女,因此在动员中务必利用她们在农村妇女中的道德感召力。动员农村妇女时,“集合几个干部,最好是妇女干部去在全保挨户宣传挨户发展,可是要先宣传与发展本保中有些威信的大娘或老太太,在她们加入后,许多妇女便感到张大娘李二嫂都加入了,我还为什么不加入?!这样便很快把全保绝大部分组织到妇女会来……”^②把农村妇女动员好以后,为了健全组织机构,还需选举组长和会长,在选举之前,“事先一定要与泼辣热心的妇女谈好,解答清楚,然后再布置选举她,只有如此才能选举出这个小组长及会长来。”^③上述“有些威信”“泼辣热心”的妇女大多是乡村妇女“领袖”,把这些人发展为妇运积极分子,

也表明了中共对乡村“精英”式女性人物的一定认同。1943年10月,苏中三地委妇委强调在妇女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即要求调查“各阶层妇女中自然领袖各有多少(姓名),其能力与威望如何?”^④亦表明中共对于乡村女性“精英”的看重。

做好农村妇女动员工作,还需要根据农村妇女的性别特质来进行具体操作。一般而言,农村妇女的“落后性”大多与妇女本身的性别特质相联系,如胆小、柔弱、局限于家庭生活而未进入社会生活等。对此,中共在动员农村妇女时特别注意其性别特质,往往采用较为细腻和耐心的工作方式。为了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妇救会,涟水的妇运领导提出:

“抓紧妇女的好胜心理,将其他地方妇女工作做得如何得好,大大地向她们报告,以启发与鼓动她们迅速组织迎头赶上。”^⑤此外,在组织妇女开会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在每一保妇女未组织之前,先进行调查,了解一些本保妇女受痛苦的最生动的例子,以便在召集妇女讲她们的痛苦时联系起来去谈,这样最易打动她们的心坎和投合她们的心意而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妇救会。”^⑥由于进行了相关“调研”准备,并把握了农村妇女的一般心理状况,且注重循序渐进,这种润物无声的动员工作不难收到成效。

然而,抗日战争动员与妇女解放动员并非完全契合,有时也出现意外的撕裂情形:“……我们亲自看到在徐市区××乡里有这样一个妇女,因为参加妇协常常被父亲鞭打。这个妇女说:‘我没有参加妇协时我的生活还好一点,现在倒这样痛苦。’”^⑦对于此种类似情形,苏中三地委强调:

① 荫华:《开展妇女工作的点滴经验》,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85~186页。

② 同上,第183~184页。

③ 同上,第185页。

④ 《区乡妇女工作概况调查研究提纲》(1943年10月),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26页。

⑤ 荫华:《开展妇女工作的点滴经验》,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85页。

⑥ 同上。

⑦ 吴中:《一年来的常熟妇女工作》,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70页。



“注意在发展与建立组织中妇女家庭统战工作，应确立对家庭团结的方针，任意造成妇女与家庭的对立，只有酿成工作失败。”^①泰州县委指出：“对妇女宣传教育主要以民族解放斗争为主，反封建为次，使妇女认识到切身利益的保障，离不开民族斗争，离不开保家自卫。妇女应团结家庭在抗日的行动下一致，反对过去强调反封建，造成妇女与家庭的对立分裂。”^②“妇女对家庭问题的必要改善，可向家庭说服，反对一动即使妇女与家庭对立。”^③这些都深刻凸显了在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存在的内在紧张态势，这种紧张态势亟须中共在对农村妇女动员的策略选择上有一个现实平和的考量。

四、结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逐步展开。在江苏抗日根据地，中共主要凭借两种组织资源系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进行农村妇女动员。前者以合法形式存在，后者则以较为隐晦形式存在，前者更多彰显了中共作为革命政党因应民族危机的理性抉择和政策“输出”的主流组织渠道，后者则反映了中共在复杂的危机形势下冷静现实的

政治考量。换言之，如果说前者反映中共在农村妇女动员中具有“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后者无疑反映中共动员的“工具理性”。

不管是运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资源系统，中共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呈现了诸多特点：往往需要遵从传统乡村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式女性人物的看重；根据农村妇女性别特质来进行具体操作；现实平和地把握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存在的内在紧张态势。正因如此，中共才能在复杂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实施有效的妇女动员，并将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内在冲突审慎地厘清症结，从而团结所有可能的力量投身于抗日战争事业。

总而言之，中共凭借两种组织资源运作来动员江苏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村妇女，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种极为务实冷静的政治策略选择，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这种策略选择既凸显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传统乡村固有的社会生态面貌，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在一个前现代国家的具有浓郁传统色彩的乡村社会利用多重组织资源实现革命动员的策略选择。

（徐霞翔：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史料科科长）

① 《苏中三地委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195页。

② 《泰州县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载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资料）1984年，第201页。

③ 同上。



董必武的“严”与“实”

胡妍娟

(南京市博物总馆 江苏南京 210018)

内容提要：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对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新要求。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和精神楷模，其讲严求实、严实相济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品质，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本文希望通过研究董必武的思想、生平，能够透过历史看到其革命思想的闪光点，为我们今天践行“三严三实”提供价值典范和行为标杆。

关键词：董必武 三严三实 优良 作风 楷模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和精神楷模。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董必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以高尚人格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精神境界、务实作风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董必武讲严求实、严实相济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品质，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也为我们今天践行“三严三实”提供了价值典范和行为标杆。进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并联系到“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运用，为当前党员干部素质教育提供思路、指明方向。

一、董必武“严”“实”作风的形成

一种思想、行为习惯的形成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环境又可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社会，小环境是家庭。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董基文为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董基文为人正直、朴实，鄙视趋炎附势，颇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风，因而受到当地人的敬重。董必武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逐渐养成坚忍不拔、鄙视趋炎附势、内敛持重的品格。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考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青年董必武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清王朝统

治者的昏庸无能，深切地希望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已在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的董必武毅然剪掉辫子，赶赴武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洪流中。而后他又参加了“二次革命”、反袁护法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虽历经坎坷，却斗志不减。

1914年，董必武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董必武再赴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新的思想在脑海中激荡。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毕业回国后，他赴四川进行革命工作。在赴四川途中，两岸景色和逆水行舟的险阻，更激发起他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感慨与希望之情。正在这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位民主主义战士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新出路。他多次给日本朋友写信，探询情况、索取资料，并经常去利川县教堂借阅英文报纸，以便进一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董必武驻会主持会务，结识了刚由日本留学归国的李汉俊。李汉俊带回了俄国十月革命比较详尽的消息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交流情况，共同学习，相互探讨。渴望了解十月革命真谛的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这些书籍，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董必武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①正在董必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董必武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六三”工人大罢工后，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又使董必武进一步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五四运动”的鼓舞，使无私无畏、赤心为国、寻求革命真理的董必武，逐步由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此，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终身信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董必武“严”“实”作风的主要体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董必武是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类拔萃的成员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锐意开拓的创新意识，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一）严以修身，坚定的理想信念

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信仰是人类对崇高价值目标的敬仰和追求，它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政党的目标方向，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选择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董必武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保持纯洁，只能信仰共产主义。”^②他还说：“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是具有崇高理想而且有科学的根据。”董必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农工厅厅长等重要职务，是国民革命中心地区的风云人物。由于董必武在国民革命中有资历、威望，并在湖北有深厚的基础，蒋介石想拉拢他，于1926年12月和1927年1月，两次派专人求见董必武，竭力劝他参加“政务委员会”和“临时政治会议”。面对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董必武不为所动，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毅然辞去在国民政府中的一切职务，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工农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悬赏通缉，黄安老家的房屋被拆，亲人背井离乡，他始终坚持革命，矢志不渝。支撑着他的就是一种信念，是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严以用权，坚持用权为民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在党内和政府里，董必武一直身居要职，可以说是一位大“官”。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滥用权力，把自己当作可以居于党和人民群众之上搞特殊化的“大人物”“官老爷”，而是以党和人民的“抹布”和“老牛”自勉，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董必武对子女严格要求，教育他们要正直做人，

① 谭雨轩：《董必武同志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第17页。

②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载《解放周刊》，1937年6月14日，第一卷第六期。



勤奋学习和工作，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他将大儿子良羽送到部队当兵，一直在部队干到退休；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他将小儿子良翩及儿媳送往河北晋县农村，要求他们“拜农民为师，真心实意地当个好农民”。良翩在农村表现得不错，晋县的组织想吸收良翩入党，提拔他当干部，董老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良翩还需要在基层多锻炼。女儿良翬参加工作后，在和董老谈她的工作时，偶然一次流露出“我只要对得起人民给的46块钱，对得起8小时就行了”。董老听到后严厉批评道：“你和人家不同，你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他还批评女儿不只是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也远远不是个党员。^①

董必武爱憎分明，从不滥用职权为家人谋私利，对亲友提出的不当要求，也总是耐心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董必武做了“大官”，家乡的亲属便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购买拖拉机。他一律拒绝并教育他们，自己受党的委托和人民的信任，成为国家领导，虽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但更是维护者，绝不能滥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

为树立干部的公仆意识，董老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1. 不许向地方要东西；2. 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3. 不许接收礼物。^②

在董老的身上，真实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党的高级干部心底无私、廉洁自律、一心为公的优秀品质。

（三）严以律己，做到为政清廉

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董必武一生保持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57年1月，他亲笔写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16个字，以勉励自己，教育后人。

董必武参加革命时，从红安老家带出来的半块毛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伴随他转战南北，遮风挡寒，有的地方磨破了，他就打上补丁，一直用到逝世。这半块毛毯（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他艰苦生活的见证。

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飞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会议期间，他节衣缩食，对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回国时没有为自己和亲人购买一件礼物，而是把节省下来的钱为在延安的党中央购买了急需物品。回国后，董必武亲笔写下《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其中三项：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圆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圆整，董交制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圆整，共计美金2645元。董必武用这些资金连同他带去的外汇，为《新华日报》购买了先进的印刷机；自费出版了5000册英文版《解放区实录》；购买了英文打字机、留声机带回国内；还为唐明照主办的《华侨日报》及一家英文刊物提供了一些补助金。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苛刻”，据负责照顾董必武生活的徐永瑛回忆：董老用的一块旧毛巾，直到发黑洗不净了，也没有想到去买一条换掉。在公利和私利面前，董必武从未想到过个人利益，而是一心为公，时刻想着如何减轻国家负担，想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四）谋事要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作风。1945年，董必武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在美工作的中国同志谆谆教导说，“做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③

① 董楚青：《忆我的爸爸董必武》，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②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③ 董必武：《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在日常工作中，他更是坚持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从实际出发，把实事求是的方法运用到各个方面。董老要求司法工作者在工作中要认真按照“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审判原则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董老提出在审判工作中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就是说，有法可依时，要反对教条主义；无法可依时，要反对经验主义。1958年4月，针对“大跃进”中司法工作提出办案数量高指标，董老语重心长地说：“跃进”要放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跃进”不是提的口号热闹就好，要实际干。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地提口号不好，并表示“司法工作怎么样跃进，怎样跃进的好，我们还没有想好，你们是先行的”^①。1961年5月，针对“大跃进”中农业的某些错误做法，董必武指出：有些事本来是好事，如农业搞密植试验是可以的，但提出越密越好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应该合理密植。董老这种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五）创业要实，勇于直面矛盾

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依托，完全要靠自己，这注定是磕磕绊绊的。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进行积极地探索。

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没有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一事，有些人想承袭旧法，董老进行了坚决反对。董老认为国民党的旧法带有阶级属性，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法律就打破了桎梏劳苦大众的枷锁。他在1949年3月21日的

《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中指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

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红潮中，董必武还敢于和当时的“主流”思想唱反调。在全社会都忙于大跃进时，他指出“社会主义还要有好多阶段”。当全社会都沉浸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时，他说“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不少是可用的东西，可用的部分就要保留下来”。当其他很多领导人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时，他清醒地看到“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在这些潮流面前，他没有赶浪头，他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实事求是、不计安危、敢于直言。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对司法工作“大跃进”中“左”倾思潮泛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实乃发人深思的金石之言，令人折服。

（六）做人要实，襟怀坦荡

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坚持和倡导讲真话、说实话、守信用是党的一种优良传统。对人民群众说老实话，也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具体体现。

董老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坚持讲真话、说实话的工作作风。针对审判工作中提出要做到“几满意”，即“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对案件的处理都满意”。董老指出：“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地提不好，有的地方提所谓‘几满意’这种口号怎样实现呢？不好检查，无从验证。比如：党委不一定对法院工作都满意……兄弟部门也不会都那样满意……还有，当事人判了刑，他能满意吗？民事案件也有是非之分，哪能都满意？对别人的意见要分析，意见不正确的不能采纳，对提意见的人来说也就不能都满意。……‘几满意’这种提法是一种空泛的口号，是不符合实

^① 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际的。”^①工作细节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董必武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的可贵品格和高风亮节。

三、学习董必武“严”“实”作风的当代价值

学习董必武的“严”与“实”，要始终做到信仰坚定、对党忠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一个道理要反复讲，就是党的干部必须永不动摇信仰。”因为“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当代中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进入凸显期，物质诱惑席卷而来，冲击着党员干部的自律防线；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挑战着主流价值观念。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之下，一些党员干部失去了信仰，丢掉了理想。我们应该学习董必武精神，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党忠诚，积极完成党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学习董必武的“严”与“实”，要始终做到严于律己、用权为公。领导干部手握的是公权，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董必武严格律己，为每位党员干部做了好的榜样。学习弘扬董必武精神，就是要时刻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学习董必武的“严”与“实”，要始终做到一心为民、求真务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学习弘扬董必武精神，就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牢扎根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始终想着群众疾苦、念着百姓期盼，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造福。人民群众是最讲实事求是的。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群众的事再小，也要当成大事来办；再难，也要全力以赴去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一流业绩。

学习董必武的“严”与“实”，要始终做到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担当精神是党员干部胸怀、勇气和品质的重要体现。董必武为党的事业付出毕生心血，以无私无畏的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担当。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唯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唯有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才能增强发展的意识、干事的勇气、履职的胆识，才能肩负起岗位和职务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董必武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光辉思想和崇高品质将长留天地，历久弥新。我们缅怀、学习董必武，就是要将他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让我们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光辉榜样，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永葆党的本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胡妍娟：南京市博物总馆综合业务部文物保管办副主任、文博馆员）

① 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417页。



征稿启事

《中国纪念馆研究》是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性出版物，由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组稿，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纪念馆研究》以博物馆学理论为指导，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中国纪念馆的现状和特点，深入探讨中国纪念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广泛介绍国内外纪念馆的概况、工作经验和前沿理论，关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纪念馆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中国纪念馆工作者和关注纪念馆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探讨、研究及交流经验的平台，是以“加强纪念馆业务交流，提高纪念馆研究水平，促进纪念馆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出版物。

本书设有以下栏目：馆长论坛、纪念馆建设、陈列设计、文物遗迹、社会教育、工作论坛、历史研究等。

来稿具体要求如下：

一、文章有新意，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引用、考据精确。

二、文章标题不超过 15 个汉字（可加副标题），100~200 字中文内容提要，6~8 字关键词，正文 6000~7000 字。

三、注释及参考文献要求：

（1）注释采用页下注，引文标注若为论文，请依次写明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年份）、起止页；若为图书，请依次写明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注）、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

（2）参考书目放于文章末尾，请依次写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四、来稿请用 Word 文档格式，以文章名、作者及单位名称命名。

五、本书只接受电子投稿，来稿一般不退，3 个月内未接到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一经发表，即按国家标准从优支付稿酬，并赠送当期出版物 2 册。

六、投稿者应恪守学术道德，反对抄袭，严禁一稿两投；文章中的图、表及引文等，如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由投稿人解决；署名文章为作者研究成果，文责自负，不代表本书编辑部的意见。

七、本书编辑部对来稿有编辑修改权，如不同意修改，请特别说明。本书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网》（光盘版）等电子期刊，凡发表文章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物，所付稿酬已包含各种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凡有不同意见者请特别说明。



□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7 · 第 1 辑

八、投稿邮箱：jinianguanbjb@1937china.com

电话：（010）83892355-285

传真：（010）83895138

九、来稿请务必注明作者姓名、职务、职称、详细的联系方式（地址、邮编、手机、固定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

如有疑问或建议，请与本书编辑部直接联系。

《中国纪念馆研究》编辑部

2017 年 6 月



